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走进世界第一大峡谷



序言

如果张继民同志兑现承诺的话，这本书他是一定要写的。

这，他已经在 1998 年 4 月出版的《未必你知道》一书的“后记”部分，作了如此明确的文字限定：“有的朋友问我是否还想写第 7 本书，回答是肯定的，且书名已定，即《我与世界第一大峡谷》”。现在只是书名有了些许变化。

就此，我曾问过他：“为什么在这本书的撰写上，你尚未动笔就不给自己留有回旋的余地，”张继民同志回答说，他主要基于三个方面考虑：

一、他作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者之一，同时又是一位新闻记者，包括写书在内，有责任在宣传上以最积极的态度对待这条世界第一大峡谷，让中国乃至世界上更多的人去认识它和了解它。

二、自 1994 年 4 月 16 日经科学家论证，确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谷以来，他一直为著此书做资料贮备。

三、1997 年底，他已准备赴藏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科学探险采访。

百闻不如一见，他相信此行会有更为直观更为丰富的收获。显然，写书是他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从事科学探险采访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 1984 年 4 月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春季预察中，我与张继民同志在同一科学探险队中。我们也是雅鲁藏布江被确认为世界第一大峡谷之后，来到这里的第一支科学探险队。我看到，队友们无不以新奇的眼光重新看待“地位”已经改变的这条大峡谷。

张继民同志为了变陌生的世界第一大峡谷为熟悉的世界第一大峡谷，总是尽其可能的细致入微的去体会大峡谷的一切。如大胆的喝山水，了解它的洁净度；细瞧冰雪中的杜鹃花，看它的叶面怎样过度卷曲；用力扯断林中细藤，试试它的韧度；清晨早先钻出帐篷，去辨析鸟儿歌唱。

还有，与队友同行，走滑坡、过险桥、攀陡崖、跨急流，这用不着着意去体会，他便感到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其附近地区行车与徒步的艰险。一度，他曾把泥石流、雪崩、滑坡、山崩比较集中的通麦地区称为“坟场”。这个概括是有道理的，因为拉月大塌方、古乡泥石流等多种类型自然灾害频繁地在这里发生，使得这一带死人太多太多，好像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得上。特别是科学探险队徒步沿帕隆藏布江到达扎曲的那一刻，由于那天头上骄阳似火，脚下步步登高，人人都精疲力竭，叹行如蜀道，难于上青天。

一路上，他为了抢拍镜头，跑前跑后，更累得面部浮肿，站都站不直，一队友为他拍摄的照片最真实的反映了当时的他。

为了读懂世界第一大峡谷，在科学探险中，他“为什么”不断，总是主动地向随队的专家们求教。他利用科学探险行动的间歇，日日认真细致的作笔记，到考察结束时，已经密密麻麻记了一大本。为了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留下更为久远更为形象的记忆，他还拍摄了 1600 多副照片，直观地反映了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形态。

可以说，没有这切身的感受，就不会从更高层次上理解世界第一大峡谷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怎样发挥水气通道作用，在西南季风的作用下，驱

动印度洋暖湿气流长驱北上，致使藏东南成为一片绿洲。也不会从根本上领略世界第一大峡谷的神秘与雄奇。

在深入生活、深入第一线上，这里没有蜻蜓点水、没有矫揉造作，有的是他与队友们一道，历尽艰辛，以至不惜付出生命为代价，会去换取对大自然、对科学探险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如同没有万千条细流的汇聚，就没有浩浩荡荡的江河一样，这些科学探险生活与文字的积累，对于他写一本描述探险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书来说，已经是积厚薄发了。我相信，作者用他这样难能可贵的感受，以及他掌握的大量第一手材料，并配以他拍摄的 150 多幅照片撰注而成《走进世界第一大峡谷》一书，无疑会充满惊险性、知识性、鲜活性、可读性。出版后，必然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读者的欢迎。

高登义

中国科学院院士评说大峡谷

刘东生院士曾参与确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科学论证工作。他说，雅鲁藏布江下游大拐弯峡谷，是当今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大的峡谷。这个峡谷的发现，是 20 世纪末世界上一次重大的地理发现，也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认识自然做出的重要贡献。

它凝聚了几代中国科学家研究青藏高原的辛勤劳苦和成就。科学无止境，高峰勤攀登。

我们要努力工作，迎接 21 世纪大峡谷崭新时代的到来。

叶笃正院士认为，发现并论证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这应该是世界上一次重大的地理发现，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认识自然的重大贡献之一。

作为一名大气科学家，叶笃正院士表示，他更赞赏中国科学家对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水气通道的观测论证，以及这条青藏高原的最大水气通道对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影响的研究发现。他说，雅鲁藏布江水气通道的论证及其对人类和自然环境重要作用的研究与发展，是大气科学与其他地理学、生物学相互渗透的初步结果，是研究山地地形与大气、自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尝试和起点，很可能成为新的学科生长点。

魏江春院士强调，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在地理上和科学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是揭开地球周际空间变化及地球历史的关键地区之一。他指出，如果说我国出土的秦兵马俑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高度发展的见证，那么，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则是出现在中华大地上迄今世界最大的峡谷，是大自然中具有科学意义的世界第一大奇观。

洪德元院士提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不仅是新发现的世界最大峡谷，而且它处在世界屋脊上，植被垂直带完整齐全为世界之最，更为独特的是它位于欧亚与印度两大板块碰撞处。

王文采院士说，在第三纪，印度板块北上和欧亚板块碰撞、结合后，形成了高耸的喜马拉雅山系和辽阔的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一个独具特色的

地理单元。对这个奇特的高原，过去只有少数欧洲国家的探险者和标本采集者作过零星的考察，我们中国人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的才对这个高原进行了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并取得了大量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对雅鲁藏布江下游大峡谷的研究成果。

经过考察者在野外连续数年的艰苦努力，获得大量宝贵科研资料，发现了雅鲁藏布江围绕南迦巴瓦峰向南急转弯形成的连续大峡谷乃是世界上最大的峡谷，这是一个突出的重大研究成果。

裘维蕃院士表示，以中国知道，各种资源的丰富，实在是一个资源大宝藏。中国科学工作者历尽千辛万苦，为了发掘祖国的宝贵资源，不惜冒着各种危险，进入世界闻名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以调查考察各种资源的情况，为祖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以上据新华社北京一九九八年五月 14 日电）

现在，对有关历史事件揭密的文章很多，一些执笔者之所以把尘封十年或百年左右的事件公诸于众，往往是这些“历史的故事”，囿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原因，当时作为秘密封闭起来，不大为人所知。尽管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发现，不存在任何秘密，但限于其发现过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是有必要作一认真回顾的。这个世界之最大的发现，迄今还不到五年，我作为发现者之一，稍作回想，便历历在目。

世界第一大峡谷发现始末

圈外的建树

不止一个了解内情者肯定的对我说，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重大地理发现上，我的特殊奉献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新闻记者，居然也有自然科学工作者一样的建树。

他们见解是基于了解了我对这一重大地理发现本身做出的成绩，而非仅仅作为一位新闻记者的报道上所付出的努力。他们认为，尽管在报道上，1994 年 4 月 17 日，我的“我国科学家首次确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消息，作为新华社通稿播发后，由于它具有极其重大的新闻价值，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为国内外的新闻媒体所采用。此后，又在 1994 年底被评为新华社社级好新闻和中国科学院“科星”奖一等奖，但那仅仅是一位记者所得到的荣誉，与这一重大发现本身应该受到的褒奖无涉。

因为，“重大地理发现”与“重大地理发现报道”完全是两码事。前者是自然科学工作者对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后者是新闻记者向社会转达“新近发生的事情”，虽然也是有益的，但一个是认识世界，一个是记录世界，两者有着明显的差异。一般来说，一位记者可以在新闻领域中奋笔疾书，呼天唤地，驰骋在舆论界，但难以同时在自然科学领域有所发展，哪怕是偶有所为。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成为新闻工作者中的个例，即在雅鲁藏布江大峡

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上，我既是重要的发现者之一，又是这一重大独家新闻的报道者。

当然，我的最初发现是在科学家深入考察以及他们发表的论文中，后又经过科学家的论证与再度计算。尽管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不是我率先将其提出，这个世界第一大峡谷仍然会深深地埋藏在他们的论文中。这样一来，就形成一个颇为有趣的局面，即记者率先发现并提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很可能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反复提示给有关科学家后，他们确认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或说，这一世界之最大的发现和确认，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有效合作的产物。

从论文中发现隐秘

我得承认，我虽然踏访过南极大陆、远渡过南沙群岛、穿行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在1998年4月之前，西藏这块广袤的土地，我从未涉足，更不要说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做过探秘！既然如此，读者可能会问，我对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最终发现从何而来？这，需要从写《武井义隆之死》的文章谈起。

1993年11月，由中日两国队员组成的考察队赴雅鲁藏布江下游一带考察，日本队员武井义隆在雅鲁藏布江的支流——帕隆藏布江漂流时，由于江水水势太猛，他刚一下水就被卷入江心，小艇翻了，人也被冲走。接着，他又很快被裹进水势更猛的主流——雅鲁藏布江。为寻觅这位年仅24岁、身高1.8米的英俊的日本队员，考察队在西藏林芝地区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组织了为期三次为期一个月的沿江搜索，仍然未果，不得不宣布他失踪了。

武井义隆之死是颇有故事性的，我很想写写这一事件的始末。为积累素材，我除找武井义隆所在探险队负责人采访外，又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逸畴那里借来一堆资料，以便更细致的了解帕隆藏布江和雅鲁藏布江及其周围地区的地理情况，如水温、流速、植被、山势等等。我知道，杨逸畴曾多次深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考察，并走了大峡谷的部分路径，他所掌握的资料是很有价值的。我与杨是熟识的，1992年，杨逸畴成了我的队友——中日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险队队长。我作为唯一的随队采访记者，大漠中同他结下友情。

从杨逸畴研究员那里拿来的材料，不仅给我写长篇通讯《武井义隆之死》提供了难得的背景情况，保证了文章的完成，并于1994年1月28日刊登在《南方周末》头版头条位置。重要的是，我从杨逸畴、高登义和李渤生三位科学家合写、1987年刊登在我国最权威的学术期刊《中国科学》上的题为《雅鲁藏布江下游水气通道初探》论文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青藏高原上的大河雅鲁藏布江由西向东流，到了米林县进入下游，河道逐渐变为被北东流向，并几经转折，穿切过喜马拉雅山东端的山地屏障，猛折成近南北向，直泻印度河平原，形成了几百公里长，围绕南迦巴瓦峰的深峻大拐弯峡谷，峡谷平均深切度在5000米上”。

需要强调的是，通篇论文中，丝毫没有论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

1995年3月15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高登义研究员在回顾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发现的过程中一文中，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在这

篇论文中，我们论证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形成历史；论证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青藏高原四周向高原腹地输送水气的最大通道；论证了这条水气通道对青藏高原东南部气候、自然环境、生物和人类活动的影响。然而，我们并没有论证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

这样以来，他们的“遗漏”就为我与幸运拥抱提供了机会。

当我读到“形成了几百公里长”，“峡谷平均深切度在 5000 米以上”等字句时，猛地一惊，觉得这是一条十分重大的科技新闻，深埋于科学家的论文中。我的记忆里，被称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好像才深两三千米。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平均 5000 米的深度，即使它不是世界上最深的峡谷，也是中国最深的峡谷，颇有报道价值。

继而，我敏锐、强烈地感到，搞不好这是一个重大的地理发现！

率先提出峡谷之最

当时，这一重大科学发现好象一股强大的激流，猛烈的冲撞着我的心房，使我兴奋的夜夜难以成眠，决心协调和依靠有关科学家，确认其结果。

高登义研究员在回忆文章中记录了我当时的激情和积极进取态度。

他说：“时过 7 年（指他们的那篇论文发表 7 年后），于 1997 年初，新华社记者张济民先生偶然谈到我们这篇文章，大为惊叹。也许是新闻工作者对‘新闻’的特有敏感吧，他当即给我打电话：‘拜读了你们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文章，非常兴奋！这条水气通道深度 5000 多米，长几百公里，会不会是世界第一？’

‘我开玩笑说：‘又发现什么新闻了？’

‘张认真地对我说：‘你和老杨认真考证一下，比较一下美国的科罗拉多峡谷，拿个结果好吗？’说完，他又加重语气说：“如果是世界第一，我们一定不要放过它！他可是中国的财富啊！”

4 月 5 日，我又给杨逸畴同志打电话。我说：“从已掌握的材料来看，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基本可以成立，请您在已有的基础上再认真核算一下。还有，把世界第一大峡谷作为新闻发出，单单拥有 5000 米深度的数据是不够的，未免有些单调，需要扩展内容。”背着，我把下述几个问题说给杨逸畴，请他思考思考，日后做符号，即峡谷有多长？峡谷最窄的地方是多少米？其地貌如何？它是怎样形成的？较精确的深度是多少，实地勘测者的感受是什么？”

之后，我又给高登义同志打电话，请他提醒老杨，对此事要持积极、科学的态度。

老杨刚从台湾考察归来，手头上的事太多，千万别让他拖下去。作为队友，高登义曾同我一块远征过南极大陆，有过同舟共济之交。他表示，他会和杨逸畴、李渤生一道，以严谨的科学态度认真对待这件大事。

4 月 11 日，杨逸畴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测算基本结束，它作为世界第一大峡谷是没有问题的。

出于发表新闻的需要，给读者以简洁明快的印象，我要打电话给杨逸畴，请他画一张大峡谷的剖面示意图。他说这是相当费事的，必须在海拔高度上作比较准确的绘制。

尽管如此，他还是答应了。16 日 9 时许，我去了他家，看他戴着老花

镜，伏在案头以 1:5

南迦巴瓦峰地形图为基准，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海拔 2400 米的高度往上算，可谓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接着，高登义、杨逸畴和我，以及新华社摄影记者王呈选等相约，共同来到中国科学院院士、曾 6 次赴青藏高原考察的刘东生教授家中，把我们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计算结果及新闻报道的设想向他作了汇报。在进一步共同论证的同时，刘先生还审定了我写的消息稿。刘先生指出，我国学者首次发现和确认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是国际地理学界的巨大贡献，再一次向世人表明祖国江山如此多娇！

这些科学家对雅鲁藏布江提出的见解颇具权威性。1982 年，我国组织南迦巴瓦峰考察队，队长就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刘东生，副队长为杨逸畴和高登义。后来，因为刘东生当时新任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离不开岗位，考察队只好由杨、高带队负责赴藏。李渤生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考察中，竟破纪录的连续作业一年以上。出来时，他皮肤黑红、胡子拉碴，行同野人。高登义是一位研究喜马拉雅山气象学的权威，他提出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水气通道理论，从理论上解决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高山之上为什么会形成海洋性冰川，山下为什么会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的问题。还说明了大峡谷的特殊通道功能，竟然把亚热带的北限，在等距离上比其他地区向北拉伸了 6 个纬度。

我在这次地理大发现中有所作为，应该说得益于孟子所说的“行成于思”，即在捕捉重大科技新闻时，多思多想了几步，才使这个真正的世界峡谷之最大放光彩。其实，有些重大自然科学也发现也得益于多思。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理论，据说是他躺在床上凝视挂在房间里的地图，突然发现各大陆边缘可以拼接吻合，才提出这一学说的。海底电缆创始者，英国的威廉·汤姆生，对铺下的海底电缆信号微弱，接收困难正一筹莫展时，突然从朋友与他开玩笑时，用镜子反射阳光照他的脸受到启发。“镜子只要在手稍微移动一下，远处的光点就会大幅度的跳动，这就是一种放大吗？”由此，汤姆生发明了镜式电流发报机，解决了信号弱的技术难题。

还有没有其他潜在因素，促成了我对大峡谷的发现？我想是有的。如多年来我致力于科学探险采访，走南极、闯南沙、穿大漠，开阔了我的视野。

艰难的抉择

谁不想走进青藏高原呢？皑皑的雪峰，纯净到了极致的蓝天，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悠远神秘的藏传佛教……这一切都在诱惑世人去走近她，却领略那儿的壮美与神奇。然而，又有多少人能撩起她的面纱呢？且不步说山高水险路漫漫，光是 3000 多米或是更高的海拔高度引起的高原反应，就让很多人在畏惧中压抑着渴望与心动。

考察前，首次徒步穿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科学探险队队长高登义打电话找我，“怎么样，你去一趟吧？”我说，“我是想去。”了解我的高登义立时就指出我底气产足。

可我又怎能做到底气足呢？

作为一个经常报道科学探险及其它科学新闻的记者，我是清楚高原反应的后果的，轻则头痛、恶心，重则会犯肺水肿和脑水肿，抢救时稍有延误，就可能在抢救的路上气绝身亡。这方面的例子并不鲜见。

不是害怕死亡，而是不忍心再让挚爱我的老母与妻子为我担惊受怕。我踏访过南极大陆、远渡过南沙群岛、穿行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每回妻子都在家里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焦灼与担忧。尤其是我赴南极的那段时间，浓浓的牵挂竟使妻子的头发小块脱落，就像“鬼剃头”。我以前不相信李自成因为渡不过河而白了头，但当我见到妻子的头皮时，我相信了。我回来了，我妻子的头发脱落处又长出新发，依然秀发如前。如果我去西藏，很难说生命不像一缕轻烟，会随时飘散。我怎能再让妻子为我担心，惶惶不安地过日子呢？何况我已向她许诺过，再也不做科学探险采访了。我又怎能让 70 多岁高龄的老母提心吊胆，甚至承担突然的打击吗？要知道，她是根本经不起的呀！

不仅如此，我还担心自己年过五十，身体禁不住折腾，未到目的地就被迫飞回北京。

这样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去年国家测绘局组织记者去西藏采访，一记者在那儿待了不到一天，就因高原反应而被迫乘飞机返回成都。我问他感觉如何，他作如是回答：“甭提的，那儿空气稀薄简直没法待。”假使我也因身体吃不消而中途返回，别人会不会笑我不知天高地厚，光顾逞强？果真到了这个地步，将是非常难堪的。

其实，当记者以来的二十多年间，我有过多次去西藏的机会，但都放弃了，最主要的顾虑，怕承受不了高山反应。因此，我曾经下过断言，“去不了西藏恐怕会是我永远的遗憾！”

这一回，当机会再次来到身边时，我又犹豫了。确实，我有足够的理由不去。但是，我不甘心，不甘心又与机遇失之交臂，不苦心自己陷在遗憾中。

作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发现者之一的我，虽然掌握着有关大峡谷的丰富的材料，却从未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做过探秘。我不想再像以前那样，只能被动的使用他人提供的材料写文章，而没有自己真实的感受，去坐在论道。因此，这次我真的想涉足西藏，亲临大峡谷，完善自己对大峡谷从发现到亲历的过程。觉得只有这样才算对得起“大峡谷发现者之一”的称号。

不去的理由很充分，想去的愿望又特别强烈，于是我不停地给自己找理由：

参加考察队的记者名额十分有限，想去的都得经过反复讨论才能批准。但我不需要，因为我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却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者之一，加上我又有多次参与科学探险的经验，考察队组委会的一位同志就声称，在这次赴藏探险上，张继民是记者中唯一不需要讨论者。对我，他们显然开一个大大的绿灯。别人想去都去不了，我为什么要白白放弃这个机会呢？

我是有 50 岁了，但 50 岁有什么可担心的？参加考察队的，还有五个同志比我大，最大的都有 63 岁了。他们都不怕，为什么我要怕？例如，中国科学院的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杨逸畴也参加这次考察，而他有着严重的高原反应。90 年代初，他去海拔只有 2000 多米的四川松潘开会，结果因高原反

应严重，呕吐不止，被送下山。后来，他去不了青藏高原，但内心缠结着的对青岛高原的依恋使他无法放弃她：去不了海拔高的地方，就去与其相关的高海拔低的地方吧。于是，他又赴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站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再往南望去，便能看到巍巍昆仑。正是此种解不开的情结，这次终究使杨逸畴不畏高原反应，决定再赴藏参加考察。

杨逸畴尚且不惧，我为何要怕呢？一是我未去过西藏，身体不见得就不行；二是万一有强烈的高原反应，被迫返回，也不是什么“无缘见江东父老”的事，重要的在于参与嘛！

抉择是艰难的，去与不去两种想法展开拉锯战。最终，去的念头还是占了上风。

妻子是通情达理的，尽管她的心又将悬挂起来，但她没有阻拦我。

参加考察需要进行心肺功能和肝功能的检查，合格者才能最终成行。当我看到体验表上盖着的红红的“合格”二字时，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接下来的日子紧张而忙碌，临行前的准备工作是必不可少的。

先是资料的准备。作为一名记者，必须搜集剪贴将要考察地区的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等有关资料，以备随时写出准确的探险考察报道，不仅论而有据，而且能开阔思路。

虽说已决定去了，但到我内心并不是没有担忧与动摇，因此思想上也得准备。换句话说，叫进一步坚定信心。在得知我将赴西藏探险后，有的朋友开玩笑说：“张继民，下次再见你时，是给你接风洗尘还是开追悼会？”玩笑是善意的，我对此并不在乎，但它确实说明了探险的前途莫测。决心一下，我给自己加油鼓劲，便对自己说：不管前方等待你的是什么，你都要勇敢的面对！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平常讲起这句话，总觉有点空和大的色彩，然而，对探险考察者而言，强健的身体真的比什么都重要。记得1997年12月游张家界时，陪同我的小我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都走不过我。常年锻炼增强了我的体质，但若想顺利完成此次考察任务，我还得强化训练。为此，我每天都去离我家较近的玉渊潭公园走一圈，或跑一圈。

以前疾走需一个小时，后来我半个多小时就能走完全程。

公园内两湖中间有很多连绵起伏的小山包，一二十米高，有的还挺陡，我不停地爬上爬下，锻炼脚腕的灵活性，以使自己能经受住日后陡峭山路的挑战。自我设计的一个月的强化训练使我的体质大大增强，并让我充满信心：我一定会成功！

再就是时间上的准备。在我所在的国内部政文编辑室中，我担任着行政职务，是主任。编辑室人手又少，我一走，大家的任务就更重。考虑到这一点，在临行前的两个月中，我就尽量多带班，从早盯到晚，以减少其他同志日后的负担。按理，考查前，我应集中精力准备资料，锻炼好身体，但作为编辑室负责人，我得为同志们着想，不能过早地抛下编辑室的工作。

出发日子一天天临近，家中的电话也益发的热闹，时时传递的亲朋友好朋友的关心与问候。我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但说实话，真的不喜欢这种要我千万注意安全的叮嘱，这是对我的强刺激，让我意识到自己将要面临的危险。

4月6日终于到来了，队友们相聚在北京南苑机场，虽然互相认识的并不多，但彼此之间都很亲切，因为大家都不去想即将可能遇到的艰难与危险，而是怀着共同的心愿：顺利完成科学探险考察任务，早日凯旋归来。

第一个吸氧者

6月的下午，我们到达四川成都。由于乘坐的是军航飞机，降落在太平寺空军机场。

当晚我们没有进城，住在机场附近的楼内。这样也好，年的明早赶飞机，匆匆忙忙的再从市内往地处远郊的太平寺机场跑。我同植物学家李渤生、《人民画报》社摄影记者杜泽泉三人同住一个房间。李渤生打开一盒“红景天”各分送我们几只。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补品。只见说明书上写到：根据西藏传统藏医经典，本品具有养肺、清热、滋补元气的功效。经研究表明，分品有抗缺氧、抗疲劳、延缓衰老、抗微波辐射作用。看后，我心想，我要是早知道这种补品就好了，为了保障赴藏探险，无论如何也要买来些饮用。

虽说我已来参加这次科学探险，但对高原反应的担忧一直如影随形。喝些抗高原反应的“红景天”，不见得很灵验，至少会给我许多安慰。

7日晨，早早的，队领导陶宝祥就敲门叫醒我们去登机。拉开窗帘一看，外边天黑黑的，还哗哗地下着雨。从住处到机场，约有三四百米长的路，我们冒雨而行。心想，这样的天气，飞机能按时起飞吗？成都的天气真怪，待我们走到机场候机室，雨停了，天也放晴。坐飞机者都盼有好天气，因为有利于安全飞行。7点38分，“图154”班机冲上蓝天，直飞西藏贡嘎机场。就太平寺机场而言，当前赴藏不再有第二个航班。为何这么早呢？因为高原上空的气流扰动约在上午十点后非常强烈，严重影响飞行安全，所以去西藏的飞机都是早去早回，十点后的贡嘎机场一般不在有飞机，即便有，也使当日不再返回的。

高原反应是我们永远的话题。途中，“老西藏”高登义谈起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那就是，一到拉萨，密封的袋装食品就会膨胀起来；汽车轮胎也得放放气，否则就会爆裂。道理简单可信：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些怀疑。不过，没几个小时，我的怀疑就消失了，飞机上所发的一在四川德阳市德城食品厂生产的“蜜酥花生”确如所言，独自在背囊里胀鼓鼓的，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气鼓鼓”。

9点30分，飞机到达雅鲁藏布江畔的贡嘎机场。我记着高登义提醒我的话：下飞机慢慢地走，就是前方有人敲锣打鼓的欢迎你，还有少女向你献花，也不可快步行进，越慢越好，以减少身体的耗氧量。我照办了。就是队友们往车上搬背囊，我也不动，而是留下看守队友的手提物品。我知道，这个时候可不能主动地承担什么工作，一旦因负重引发高原反应，得不偿失。刚开始，感觉尚可，可后来就觉得不对劲儿，坐在开往拉萨的车上，明显感到憋气，头晕，对车外的陌生景物没兴趣。

我的住间被分在喜马拉雅饭店大楼333房间。头一次，爬楼是这样的费劲吃力：每上一级台阶，就得停下来喘口气，过一两分钟后再迈一步。肩上的3公斤重的小包越来越沉，喘气越来越难。333房间就是三楼的33号房间，虽然近在咫尺，现在却感到它是那样的遥遥不可及。“对了，‘333’就

是山山山嘛，要不它怎么这样难爬。”我胡思乱想着。

好不容易到了 333 房间。刚进门，我就一下子瘫坐在门边的圈椅上。同屋的水资源专家官关志华见状，叮嘱我不要动，并下楼为我扛背囊。不一会儿，他上来了，背上背着的是他自己的背囊，手中拎着的是我的背囊，加在一块足有三四十公斤。我非常感动得说：“老同志，我这年轻的让你年近 60 的这样帮助，实在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短短的一句话，我来了两口气才说完。“你别客气，科学探险队都是讲互相帮助，这根本不算什么。”平日里，这样的话难免有唱高调之嫌，听到耳里也不是很舒服。可在科学探险队，这都是发自内心的。闻听此言，我心中充溢的是无法言表的感动，不仅为老关的帮助，也为人与人之间纯纯的温情。

老关见我脸色不好、嘴唇发紫，便叫我赶快上床躺着，并把被子、枕头等叠放在我背后。躺在床上，我总想深呼吸，可怎么频繁的深呼吸，也感到气不够用。过了一会儿，眼睛也不想睁开。这时，为适应高原反应提前三天到达拉萨的杨逸畴来看我。见我如此难受，就找服务员要氧气袋。

氧气袋来了。我以前见过氧气袋，但不知如何使用。其实很简单，松一个小口，让氧气从胶皮管里慢慢溢出即可。我把吸气管放到鼻孔处，贪婪地吸着。头一回，我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了无色无味的氧气的存在与宝贵。胸部不再憋闷，呼吸重新顺畅，我好像从地域边缘回到了人间。

正想继续享受氧气，多次进藏考察的队友王维进来了，也来看我。他说我是队里的第一个吸氧者。还提醒道：“你能不吸就尽量放弃，一旦形成依赖性，就会减慢适应高原生活的过程。要依靠身体自身的调整。”他的话让我想起赴南极考察时海上航行的情况。由于常吃晕船药，如果不服药，见到小浪，我都想吐，什么也抗不住。当时服的药是海军总医院生产的未经药理试验的防晕药。这药很有效，服下后，两个小时内不被吐出，保证几个小时内不再晕船。但人显得呆滞，对什么都不感兴趣。随队的医生曾劝我不要再吃药，否则，机体适应性会越来越差。高原反应与海上晕船虽不一样，道理却是相通的。我听从王维的劝告，扎紧氧气袋。不过，我成为队里一个吸氧者的现实也随之成为历史。恰在此时，门外面有人在喊：“氧气袋还用不用？这里等着急用！”就这样，刚为我完成“历史使命”的氧气袋又接受了新的“任务”。

午饭时，我们科学探险队的政委王富洲叮嘱大家少吃。王富洲曾是我国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探险队员之一，为此冻断了一个手指。他对高原反应了如指掌，告诫队员们在适应阶段一定要做到“三少”，即少说、少动、少吃饭。

我一直很向往辉煌的布达拉宫，也想去大昭寺看看。为了让自己尽早尽快适应低氧的高原，我克制着欲望，老老实实地呆在房中。有的队员经不住拉萨风光的诱惑，出外转悠，结果到吃晚饭时，有好几位吃不下饭，呕吐。不过，中央电视台的韩东光出人意外。他个子高大，一到拉萨机场，队友们就估计他该是个高原反应强烈者，强制他少动，别干活。他也被吓的绝对听话。但到拉萨后，他管不住自己，又玩又吃，结果什么高原反的事也没有发生。从此，他为自己总结出一句话：“啥毛病都没有”，并时时挂在嘴边。我的拉萨第一夜是难熬的。由于气短，刚一睡着，就被憋醒。有一种年过半百，居然不会自主呼吸的感觉。好像只有醒着，有节奏地做深呼吸，才能勉强保证身体对氧气的需要。一睡着，就不知怎样去呼吸。

第二天早上，我见到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的记者张贞璞从他房间走出。我问他：“怎么样？”他一派痛苦状的回答：“太难受了，快要死了，活不了啦。”“昨天晚上吃饭了吗？”“实在不想吃，今早更不想吃，难受，恶心。”他说。他之所以这样，就是没做到“少动”。到了拉萨，就出去完。因为他觉得在来西藏前，和同事熊移山登上台湾一座海拔 3000 多米的高山，做过适应性锻炼，以为自己有对付高原反应的基础，结果是依然不行。原因在于，虽然两者海拔都是 3000 多米，但台湾那座山上的植被丰富，含氧量高，而拉萨城四周的高山光秃秃的，城内的树还未发芽，含氧量低，两地的含氧量是不均衡地。可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作为新华社总社的记者，到了地处偏远的西藏，我应该去拜访一下新华社西藏分社的领导和同志们，一则我们之间平常业务联系紧密，二则应将他们汇报一下我赴藏东南从事科学探险的内容和目的，借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但考虑到要“少动”，尽快适应这缺氧的高原，我也只能怀着歉意待在 333 房间，给分社同志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已到拉萨。分社采编室的多焚占堆、朱忠良同志闻讯来看望我时，我请他们转告分社领导，我由于身体不好不能前往拜访，并保证从藏东南返回拉萨时，我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分社。他们常年身处高原，深知我的身体正处于“爬坡”阶段，高原反应强烈，说话上气不接下气，要我一定减少应酬，避免干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来。当天晚上分社又派人来看我，还带来滋补剂“红景天”。此中的同志情谊着实让我感动。

听说喜马拉雅饭店南约 200 多米处是拉萨河，我很想去看看这雅鲁藏布江的五大支流之一。8 日，我试着走出饭店大厅，想去河边。但没走几步，感觉体虚无力，就又慢慢地回到房间。9 日，我再次试着走向河边，终于成功了！虽然走得很慢很慢，似大病初愈一般，可中间没有休息，已刚到拉萨时爬楼的感觉强多了。队友们戏称我采取得是“保守疗法”，我觉得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初到西藏者，越少消耗体力越好。特别是那些自视身体强壮，更不可大意。虽说我没有尽早领略到布达拉宫的风采，可我也没有因高原反应呕吐过和头疼过。更为重要的是，我为下一步实施科学探险打下了比较好的身体基础。

未参加考察队前，我以“队里还有 5 位比我年纪大的老同志都参加”为理由来给自己打气。私下一直认为：他们都不怕，我怕什么？事实证明，我的想法谬矣！杨逸畴确实不如我，他不但提前 3 天到达拉萨，而且上楼梯时，由于缺氧腿发软，“扑通”一声，摔了大跟头。刚爬起来，“扑通”，又是一个大跟头。幸好楼道铺有地毯，否则，他 1.8 米的大个头，不摔的鼻青脸肿才怪呢！出他以外，四位老同志都比我强。高登义、杜泽泉没什么反应。李渤生呢，外号称“牦牛”，适应力之强，体力之好是可想而知的。更神的是关志华，简直不可思议：别人都不敢喝酒，他敢，而且一点事都没有；怕耗氧太多，别人不敢洗澡，他也敢。他 58 岁了，的的确确是“老当益壮”。与他同屋的我，当然不敢仿效，只有羡慕、佩服的份。

这四人对西藏的适应，原因是他们长期从事青藏高原考察，属于被筛选出来的，或叫“登高原合格者”。那些与他们同龄的被淘汰者，一般是不大敢再来西藏的。

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世居藏民为何能在青藏高原很好的生活的？我国医学专家通过长期的研究发现，与其他移居高原的人群不同的是，世居

藏民有显著的耐低氧能力。

他们胸廓与肺发育良好，肺活量、肺总容量较大，心脏储备功能强，耐低氧能力显著，红细胞数、血红蛋白保持平原正常值范围内。在氧气含量仅为平原区一半的高原，世居藏民的红细胞不会增多，不会产生肺动脉高压，最大摄氧量和无氧代谢指标均比生活在低海拔区的人群高。即便做超负荷运动，世居藏民的血氧水平也比平常人高出许多。

踏雪登高 5000 米

我游历过祖国的许多江河湖海，也领略过泰山、衡山、华山、黄山、五指山的壮美与秀丽。1997 年 4 月，我又来到号称“天下秀”的峨眉山。此时，山下绿树成荫，油菜花黄。山上冰结雪覆，风吹疏枝。汽车沿着盘山公路上升，渐行渐高，也渐行渐冷。到得山巅——金顶，便见树上垂着白白的霜结体——树挂。这里是寒冷的，我身上裹着厚厚的大衣也不觉得暖和。四周茫茫，左起路来如同踩棉花，云里雾里的，头有些晕。当时使我想到了，在海拔在 3000 余米的金顶就有高原反应，看样子，我的身体容不得我攀登更高处。

10 日晨，队里通知当日出征，并要通过海拔 5000 米左右的米拉山口。一听，心里就直打鼓：在峨眉山金顶，我都很难受，到拉萨后的第四天，就上 5000 米的高度，我能行吗？虽说我已能从喜马拉雅饭店走到 200 多米远的拉萨河畔，中途已不用休息，较之刚到拉萨时好多了，但这 200 米的行走能力实在算不了什么。在北京的玉渊潭公园，我连走两个多小时，也是不觉得累的。以健步如飞来形容，毫不夸张。忐忑不安之中，我又想起秦大河，这位横穿南极大陆的勇士，却因为高原反应，险些与珠峰共眠。

那是他从事横穿南极大陆科学探险的 3 年之后。1993 年 7 月 7 日，中国珠锋科学考察队中方队长秦大河率领他的研究生侯书贵、挪威专家托尔和民工等，赶着牦牛上爬珠峰，目的是到海拔 6000 多米的高度钻取冰岩芯，以了解环境演变历史。副队长王维从设在绒布寺附近的大本营出发，送秦大河一行出征。车行 50 多公里，来到了车子再也无法向前开的一个山口，便停住了。告别时，秦大河嘱咐王伟：“11 日下午 2 点来到山口接我们，若接不到，12 日再来。还见不到，就上山找吧！”“怎么能接不到呢？会接到的。”王维听了秦大河这不吉利的话，马上更正道。已 4 次进藏考察的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王维认为：“若真的到了这个地步，必是凶多吉少，山上的人不是死就是伤，这秦队长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

7 月这天 18 时，秦大河一行爬到了 5400 多米处，变宿营了。8 日上午 10 时，队伍又出发了，继续往山上爬。民工们赶着牦牛走得快，先期到达海拔 6050 米的预定宿营地，并支起了帐篷。约在 19 时，考察队员才接近营地。侯书贵最先看到支起的帐篷，赶紧把喜讯告诉秦大河。然而，由于高原反应和过度疲劳，秦大河不但没有表露出喜色，反而立时瘫倒在地。躺了近一刻钟，他才慢慢站起来，拖着沉重的双腿，向宿营地移去。这天晚上，秦大河一时明白，一时糊涂，说出的话竟让队友莫名其妙。

9日，已没有登山能力的秦大河留在营地休息。为完成考察任务，侯书贵、托尔同民工一起继续向上爬。他们将钻取冰岩芯的器械运到海拔6400米处，可以采集冰岩芯的粒雪盆后，才返回营地，进入帐篷已经20时，秦大河一如队员们早上离开时那样躺在帐篷里。侯书贵叫醒他，并汇报上山时的情况。这时，秦大河要出外小便，但坐不起来。秦告诉他的学生，从早上开始，他就已失去平衡能力。侯书贵扶着老师走出帐篷，尽管小心翼翼，两人还是摔了一跤，秦大河的手被摔破。“老师变成这样，明天能上山吗？”侯书贵感到十分忧虑。

迎来的10日，秦大河病情更加厉害。面对失去自制能力、满口妄语的秦大河，侯书贵和托尔都感到，最要紧的不是登到6400米处钻取冰岩芯，而是要尽快把秦大河送下山去，否则太危险。

他们首先想到用耗牛把秦大河送下山。可大家把秦大河架在牛背上后，牛不但连连后退，而且频频向后扭头，利角几乎触到秦大河。这太危险，队员们只好把秦大河从牛背上抱下来。

背，背不动；抬，又没有可绑成担架的材料。没有办法，侯书贵只好请托尔立即下山报信，又派民工爬到6400米处取回放在那里的器械。他明白，事情到了这种地步，科研工作不可能再继续下去。

珠峰海拔6050米处，只剩下侯书贵和他的老师秦大河。太阳升高，炽烈的白闪闪的光焰投下来。侯书贵有心把老师移进帐篷，可他移不动，只好随着太阳的运转，不时地变化着位置坐在老师的身旁，用自己的身体为老师遮阳。缺氧，呼吸困难，迫得秦大河撕开衣服，胡乱的抓着露出的肚皮。时间长了，以致本该白白的胸部，受阳光紫外线的轻度灼伤，不仅黑黝黝，而且打起了小卷卷。

再说王维，自送走秦大河后，夜里就难以成眠，他反复咀嚼着秦大河临行时说过的话，总觉得话里含有莫大的隐忧。他越来越沉不住气，10日便约同队员郜永祺来到山口接秦大河。没想到，这不在计划之内的举动，竟然挽救了秦大河的性命。

接信后的王维立即全力以赴的组织援救队伍，并向路遇的美国登山队长约翰@罗斯克拉求助。捆担架，备寒衣，救援人员在约翰@罗斯克拉的率领下，星夜上山了，于11日晨3左右到达6050米出的宿营地。一进帐篷，富有登山经验的约翰@罗斯克拉就为秦大河注射了两针防治高山脑水肿的特效药，并指挥大家把秦大河抬进他们带去的简易加压舱，通过充气，增加舱内含氧量。

好不容易等到天亮，抢救人员把秦大河牢牢地捆绑在担架上，穿山越岭，奋战了16个小时，才到达山口。一到山口，秦大河被速送日喀则陆军第八医院，并于12日16时到达那里。其时，秦大河已大小便失禁。主持抢救的李露斯医生惊叹：“好险哪！若再晚送几小时，秦大河就没救了。”就在不久前，一位外国人也是在珠峰患了与秦大河同样的高原反应症。在送往医院的路上，那人就死去了。相比之下，秦大河是幸运的。

正因对高原反应的危害有着相当程度的了解，我才会如此心绪不安，然而，事已至此，我唯一的选择就是勇往直前。临阵退却，那不是我的品格。上午9时，我坐上了汽车，随队出发。走出拉萨城，向东前进。

行了20多分钟，便见左前方群山连绵，茫茫一片，似大雾笼罩。我问为我们开车的扎西师傅：“左边怎么是雾蒙蒙的呢？”“那儿正下雪呢。”“我

们会进入下雪区吗？”我又问。“会的。”听了后，我半信半疑。

右前方晴空一片，能见度很好，不远处的山上有几只山鹰在盘旋，缕缕轻烟袅袅升起。我很奇怪，又问扎西：“秃秃的山上怎么会有烟呢？”扎西告诉我，“那是山葬，鹰是来吃人的尸体的，烟是烧的香或木头生出的。”乍一听，我当下沉默不语，只觉无限凄凉在心中弥漫开来。

但我尊重当地人的这一习俗。文化的视角不同，这在他们看来，也许是最神圣的。

人死之后，由火葬、土葬、水葬、树葬、山葬等，究竟哪种好，搞不好还真的只有天知道。人死如灯灭，进入大自然的另一循环，其实哪种葬法都是一样的。

又过了不久，果然如扎西师傅而言，我们进入了下雪区。雪区的界限真是太明显了。

车头落上了雪，因为路上石头多，缓行的车座窗外处却没有雪，只有再前进二米，才行入雪幕。雪花漫天飞舞，轻柔得落在车的左右，模糊了视线。车驶了 20 多分钟后，明媚的阳光又直射下来。初次见到界限如此分明的下雪带，山葬引发的悲凉慢慢隐去，我又渐渐兴奋起来，对高原反应的担忧也突然重新泛起。记得看过一本书，是记述 50 年代初我军解放西藏阿里的。当时的解放军受文化水平所限，不懂得缺氧引起高原反应，还以为是要到高原遇到“瘴气”，引发呼吸困难，继而全身浮肿，并放出光亮，然后死去。还有的干部与随军的妻子、孩子因高原反应得不到及时救治，全家人先后死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上述的情况一般是不会再发生了，但在科学探险队里，是个例外，因为他们远离城镇和交通便捷的地方，一旦发病，抢救起来很困难，秦大河登珠峰造成轻度脑水肿就是个例证。

高原反应真是个挥之不去驱之不去的魔影。看到前方有道路的工人在修路，扎西师傅减速。我坐在第二排座，将身子往前探了探，问扎西师傅：“还要多久才能到米拉山口？”“快了。”他回答。从拉萨一上车，我就从邻座的陶宝祥手中要过状如马蹄表的沉沉的海拔表，以了解我们行进的海拔高度。听说它的精度很高，误差在三四米之间，比其他队员使用的美国麦哲伦先锋型 GPS 手持机要好。科学探险 GPS 手持机的液晶框内，也能显示海拔高度。看着海拔表的指针指向 4400 米，又指向 4500 米，随着数字在不断的增大，我也越来越紧张。想着科学探险队没有带氧气袋，也没有带氧立得、制氧齐等对抗高原反应的药物，万一在米拉山口出现问题，可该怎么办呢？但我很快否定了这个“万一”，因为我发现我在这 4500 米的海拔高度上没有什么异常的反应，呼吸还算通畅，估计到达 5000 米时，并不会构成太大的困难。这要归功于坐车去海拔高的地方容易此，耗氧少，高原反应不如徒步强烈。

一扇用木头搭成的山门映入眼帘，旁边的雪堆上插满五颜六色的经幡，随风飘舞，米兰山口终于到了。看看海拔表，指针停在 4987 米的刻度上，我果然没有明显的不适，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我高兴地下了车，四处拍照。我突然感到有些不甘心，觉得既然没什么反应，就应该再往上爬一段，只差三四米就到达 5000 米的高度了，放弃太可惜！

拍完集体照，我踩着没膝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往上爬。爬了一段后，腿发软无力，登一步要喘好几口气，估摸着也爬够了 13 米，我就缓步往回走。当我回到队友中间，感到高兴极了，认为我这 50 岁的年龄，还远

离事业征程的萎缩点。我同时认为，如果我在拉萨休息一星期，营养好些，乘车再爬高一些也是可以的。可见，人对自己并非那么了解，特别是人的潜能。因而，过于狂妄和过于悲观都是要不得的。只有在勇于实践之后，从反复的成功与失败中去认识自己，才会真正认识自身。大胆地放飞自己，人，本来就应具有这样的天性。否则，猿不会变成人，人也不会成为万物之灵。

米兰山口很重要，它既是雅鲁藏布江支流拉萨河与尼洋河的分水岭，又是印度洋水气到达的顶点之一。山口的东边，由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带来了充沛的降雨，故而植被丰厚。西边，颇为干燥，山秃秃的，植被很少，使得群众烧柴都很困难，主要是靠烧牛粪。我们沿途看到藏民把草絮、泥、牛粪和在一起，做成一个个的牛粪饼，然后贴在墙上。尤其有趣的是，有的藏民将晒干的牛粪饼别的整整齐齐的，竟然形成了高达一二米的牛粪饼院墙。当时我特想拍照，队友说：“这样的景观，以后多的是。”一犹豫，没拍了，结果遗憾至今。以后沿途侄没少见过牛粪饼，但再也没见过颇有规模的牛粪饼院墙了。可能是缺氧所致，当时愣是没记起“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名言，否则，就可奉献给读者一张极有意思的照片啦。

上得车来，有人就开玩笑：“我怎么觉得这山直摇，摇了两次。”这是冲着杨逸畴说的。老杨到达米兰山口后，过于兴奋，东跑跑，察看地貌；西跑跑，摄影拍照；他步幅稍微大了点，加上身体本来就不是很好，高原反应较强，结果先是摔了一个大跟头。

临要上车了，又摔是一跤。好在他穿的厚实，没有伤着身体。车顺山而下，到了一个叫“松多”的地方。“松多”在藏语里是“山岔口”的意思。这是一个小村子，我们找了一个饭馆准备午餐。做饭的师傅在厨房里忙着张罗。由于厨房与饭厅之间没有间隔，升腾的旺旺的灶火，呛人的油烟，坐在餐桌前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时浓烟滚来，顿时隐去了每位来客。好在屋内通风好，弥漫的油烟很快又散去。我们趁等待就餐的机会聊天说笑。杨逸畴独自坐在靠墙处，相机挂在脖子上，脸色铁青，嘴唇惨白惨白的，不说话，也不开玩笑。饭菜上来后，他吃得很少。看来，他高原反应还在继续。和他相比，我真是强多了。

饭后，继续前行，哗哗作响的尼洋河一直陪伴着我们。快到工布江达县时，在河流转弯处一块高30多米、宽20多米的巨石横空出世，巍然屹立于河中央。此情此景，吸引着大家纷纷跳下车去拍照，兴高采烈我当然也在其中。谁知，正用的“富士”相机出现卡卷没法拍摄，另一台相机胶卷已拍摄用毕，未早些将卷倒回卸下，加上车子要开走，已来不及再装上新卷。坐在车上，听着队友说从几个角度拍下了这中流砥柱，我却白高兴了一阵，那懊恼和不平衡劲儿就甭提了！

6时30分，我们到达宿营地工布江达县。夕阳西下，柔和的光辉洒在用瓦楞铁皮覆盖的一座座屋顶上，和谐而安然。宽宽的街道上垂柳依依，茂密的高山栎在城后的山坡上显示着骄人的绿色，使我顿时喜欢上了这个美丽的小县城。

我们住在一家招待所里，比较简陋，四人一个大通间。我被分在3楼，20多公斤重的背囊，是我自己背上楼的，可见我的体力恢复得很好。灯下回首，初战告捷，只有遗憾，内心的喜悦是无法言传的。我终于跨越了高原反应的障碍，成功的经过了米拉山口。在随后的日子里，我再也用不着担心因氧气不足被憋醒的愁苦，更不怕再过什么山口。听说以后要过的山口，再

也没有一处高过米兰山口的，心头的重负已卸掉，想着自己身体还棒，便甜甜蜜蜜的睡去。

艳艳桃花 600 里

每到春天，桃花盛开的时节，北京植物园总要举办桃花节，久居闹市的蜚居了一个寒冬的人们利用闲暇之余，纷纷涌向那儿，去感受春天的美好。然而，都市里或者都市附近的桃花不管开得如何是灿烂，与我所见过的藏东南的桃花带相比，颇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春季预察人员的主要目标，一个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起始点——米林县一个叫派的地方；另一个是大峡谷马蹄形大拐弯的顶端——林芝县的扎曲。为此，考察队从拉萨出发后，必须沿尼洋河、松巴河、东久河、帕隆藏布江和雅鲁藏布江岸边行走。

走着走着，不时有桃树映入眼帘，起初大家并未注意，也没想到这仅仅是自然间美景的序曲。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阿沛·阿旺晋美的家乡工布江达县后，只见沿河沿江遍是盛开的桃花，如流霞飞云，竟断断续续形成了一个长达 300 多公里的桃花带。

频频穿行在粉白相间桃花林中的考察队员，纷纷对此惊叹不已，大伙都是生平以来第一次见到如此壮观的桃花林。且不说初次奔赴藏东南的队友们，就是曾经赴藏多次的李渤生等也是头次领略，因为他们以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恰好是桃花“卸妆谢客”的时候。

低处是桃花麦地，中处是郁郁葱葱的高山栎，再往上是裸露的山坡，高处为冰山雪岭，在这醉人的蔚蓝色天幕下，构成了一幅幅绝美的图画，引诱得考察队员一次次举起相机。尤其让人惊奇的是，桃花在与高山栎树林的交界处：往下是怒放的桃花，往上是绿油油的高山乐，绝少错杂相生，界限十分明显，不是一条直线，就是弯得很好看的弧线，可谓盛景天成！

这些桃花林多半生长在河岸江畔的农耕带，越是靠近村庄越是密集。桃花掩映的村舍，处处可见，温馨静谧。据说，藏东南的气候与土质特别适合桃树的生长。桃林中有很多是已达百年、数百年的老树。有的主干直径达一米、高达一二十米，满树灿烂明艳的花朵，给人以生生不息的强烈印象。苍老的大树旁，新生的一棵棵小树又茁壮成长起来，在微风中摇曳着柔枝。

念念不忘的是在派那个地方见到过的一株小桃树。那儿有一块从山上滚下来的三米多高二米多宽的巨石，自然开裂成两半，中间是人和猪羊都不能进去的裂缝。而就在这窄窄的裂隙当中，生长着一棵高出石面，粗于腕部的小桃树，煞是好看，让人惊异于桃树的生命力之顽强。我看到此景，当时想拍一张照片，但不好意思叫全神贯注开车的扎西师傅停车，第二天事情一多，也未顾上返回补拍一张。

关于照片，还有一个至今未解的谜，途经桃花带时，遇上太阳当空照的晴好天气，为桃花所吸引，我往往尽力多拍几张，而在阴天或雨天，想到拍摄效果不会好，就拍得很少。谁知照片洗出来后，事实正好相反，越是阴雨天，拍出来的桃花就越是好感，而晴天里拍出的桃花则十分苍白，根本不

能反映实情。说真的，即使效果好的照片，以盛开的真正的桃花相比，又逊色了许多。也不知怎的，艳丽无比的桃花林就是不上相。

藏东南数百公里的桃花林带，是野生的还是栽种的？随队的中国科学院植物学家李渤生说，这种桃树果实内核表面比较光滑，被称为光核桃，是此地所特有的。它最先伴生在原始森林中，后来经过当地群众的选育，移植到地角田头，现在则自然漫生。此种桃树树龄可长达几百年，每年花期 20 多天，如果引种到内地，很有观赏价值。

当地干部普布多吉说，光核桃成熟后，口感尚可。不过，当地群众对其利用比较有限，或砸些桃仁卖掉，或少量用其榨油。桃子成熟后，牛和猪很爱吃。吃桃吃久了，当地的牛甚至练就了边吃边吐的本领，笨笨的猪则尚未练就此本领。也许它们还似猪八戒嚼也不嚼，就迫不及待的一口吞下人参果那样来个囫囵吞“桃”。不过，咱们也不应因此抹杀猪的功绩。藏东南的猪都是散养的，任它们在山上乱跑乱窜。猪跑到哪儿，屎就拉到哪儿，也就把桃核带到哪儿。在桃树的漫生上，猪是功不可没的。

隔海树同根

此次藏东南之行，见得最多的便是高山栎。洁白的雪峰以下，是寸草不生的石质荒凉带，再往下就是成片成片的高山栎，翠绿翠绿的，形成高四五百米的垂直带。站在山脚往上望，它们矮矮地趴伏在山坡上，看样子不过一米高。其实并非完全如此。长在尼洋河畔的高山栎就高高的，有一二十米。

说来也怪，这些高山栎不知怎么长得，不似杨树那么挺拔，而且歪七裂八的。有一株高山栎主干一段粗得像桶似的，一会儿又细得可怜，整个主干就像一根竹棍上稀稀地插着几个糖葫芦，怪得让我摸不着头脑：都说高山栎木质不错，可它怎么长得像不成材似的呢？

人人皆知，海峡两岸同胞有着割不断的骨肉亲情。有趣的是，大陆学者赴台湾中央山脉合欢山考察后发现，那里的高山与亚高山植被竟也与大陆植被同出一脉，源自喜马拉雅山。

这一结论是李渤生在台湾合欢山考察后得出的。他曾 22 次赴青藏高原考察，对喜马拉雅山地的植被有着深刻的了解。但他绝没有想到，登上合欢山，竟然到处是他所熟悉的植被，宛若又一次置身喜马拉雅山地之中。

海拔 3000 多米的合欢山，位于中央山脉的中段。在山中腰，他不胜惊喜地看到一棵 5 米多高的长满绿色叶片的阔叶树，硬革质的叶片边缘布着尖尖的小刺。李渤生认为它是刺叶高山栎，属于壳斗科植物栎属的一个特殊类型。这种植物在大陆上主要分布在秦岭等北亚热带山地。

台湾与喜马拉雅山相距数千里力，中间有蓝色的大海相隔，两地的高山栎以及别的植物何来如此亲缘关系？李渤生指出，在第四纪冰期大陆与台湾相连之际，生长在喜马拉雅山的高山和亚高山植物物种便向四处扩展，自然影响到台湾山地。台湾海峡地层陷落以后，虽有滔滔的洋流涌动，留在岛上的植被也有了自己的发展，但这并不影响两地植被的亲缘关系，它们的根在大陆。

科学需要严谨。为了从理论上求证喜马拉雅高山栎与台湾高山栎树的同缘关系，借此次机会，李渤生采了两大包高山栎与通麦栎的标本，每到一处宿营地，就把标本放在水池旁边，以免它们干枯。不明就里的我好奇地问道：“难道你回去后要栽种它们？”“哪儿呀，做实验用的。”原来，赴藏前，他与一即将来大陆考察的台湾植物学家约定，利用这难得的机遇，双方各自带一些样本到北京会面，通过生物活性分析最后确认两地高山栎的同缘关系。

相信不久的将来，隔海树同根将从理论上得到证实，我也衷心地盼望大陆与台湾能早日统一。本是同根生，分离太不该！

迷人的巴松湖

11日早上8时，按照计划，我们从工布江达县城出发，前往巴松湖。巴松湖又叫错高湖、巴松错。这也是我们所遇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在藏东南，同一个地方往往有不同的叫法，很不规范。没有时间去深入考察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给人们的交往，尤其是给外来的旅游观光者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巴松湖风光旖旎，已被世界旅游组织列入世界旅游景点。我们去巴松湖的目的不是为了观光，而是考察来自印度洋暖湿气团对藏东南的影响。

顺着尼洋河，汽车行驶的一个多小时，只见岔路的左侧，一座漂亮的牌楼呈现在我们面前，上面写着“巴松湖风景区”。此处地形平坦，视野开阔，可是队里有规定，行车途中，不得随便停下拍摄。就这样，一处美景匆匆在我们视线中消失。

公路平直，往东北方向延伸，一眼望不到头。过了半小时，地貌起了变化，远远地，就看见山势猛然陡峻起来。巴河从峡谷当中冲出，扑面而来。让人拍案称绝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然在峡谷的右侧造就了一块很高很高独立的巨石，使它形成了陡峭的悬崖。可爱的藏族同胞们，将一根100多米长的钢丝绳高高的架在河两边的悬崖上，上面挂满了五颜六色的经幡，在微风的吹拂下飘动。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藏民们是怎样把钢丝绳横空悬挂上去的。自然的神奇与人类的智慧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如此动人心弦的景观。

有的老队员称，这里名叫老虎口。大家纷纷下车拍照。景险且美，可拍摄点却实在不好找。附近的巴河藏而不露，不靠近是看不到河流的。穿过密林，走到悬崖边，往下一瞅，五六十米深，不由得心惊胆寒。举起相机试试，树挡住了镜头，欲摄到全景，还得下去一些才行。我不干，胆大的杨逸畴什么都不顾，就手扯着树干下到陡崖的一个坎处，小心翼翼地走了两步，侧躺着拍了几张。我也把我的相机递给他，请他也帮助揸一下快门。在他颤颤站起想爬上来时，悬崖上的我则被他的举动吓的大气也不敢出，生怕他脚下一滑，不小心掉下去。

为了找到拍摄老虎口好的角度，我拿着相机，穿过高山栎，沿路往上爬，只见几根并排圆木一端深深插入悬崖，把不知何故断了的路接了起来。

此处视野开阔，我高兴地举起相机就拍。拍完后，忘乎所以的往回走，没想到一脚踩到木头的边缘，下边就是深深的谷底。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站了好几分钟才缓过神来。还好，有惊无险，我没有掉下去。凡事都有两面性，这次虽让我胆战心惊，至今还想起还心有余悸，但当时也让我深深意识到：以后拍照，尤其是野外、山地，摄完后，一定要先看清脚下的地形后再挪步！血的教训今年年初就发生过，新华社广东分社的一位摄影记者在楼顶上拍摄，就因为一脚没有站稳，从楼上摔下，不幸身亡。

不知杨逸畴又扎到什么地方去拍摄了。这里树多林密。近在咫尺也难以发现。大家扯着嗓子喊他，他才不紧不慢地拨开树丛钻了出来。大家说，老杨像是一只被关在城市里的老虎，一放虎归山，他就活了。不能想象，他一辈子搞野外考察，对大山的依恋是相当强烈的。我们上车，继续前往巴构湖。中午时分，到达目的地。巴松湖是尼洋河最大的支流——巴河中上游的一处高山湖，在工布江达县西部约90公里处，湖面平均海拔高度约3538米，面积为25.9平方公里。但见碧波荡漾，蓝天、白云、雪峰、绿树争相倒映在湖中，错落有致，水天浑然一体，让人陶醉。

巴松湖有一湖心岛，为古冰川作用遗留下来的大型“羊背石”，顺其古冰川滑移方向，可以观察到明显的冰川擦痕。兴之所至，大家顾不上吃午饭，就拾级而下，小心翼翼的走湖畔，招呼对面岛上的摆渡者，请他渡我们过去。

除了木筏子，你还能想象出这儿摆渡的特色吗？想你也猜不出。这不像内地的摆渡方式，摆渡者根本就不用木桨划筏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且听我慢慢道来。湖心岛与岸边连着一根粗粗的钢缆，木筏上有一根绳子，绳子的一头系着一个结实的木钩，木钩就搭在钢缆上。我们站在筏子上，摆渡者就用手抓着钢缆，毫不费劲的把我们拉到湖心岛上。其实不用他，我们也能把自己摆渡过去，由于有木钩的牵系，无需担心筏子会漂离。这绝对是一个高招，既省事又安全，也不知聪明的藏民当初是怎么构想出来的。

岛上有座庙宇，属黄教，建立于17世纪，庙前是两个篮球场那样大的开阔地。一只饲养的獐子，在开阔地上走动。庙的左面有一棵树，让我称奇的是老化的树的主干中间竟然长出了另外一棵树，难怪当地人视之为神树，上面挂满经幡。树前方一座房屋，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转经筒，用牛皮制成，直径一米多，高五六米，上面绘着经文。筒的四周设有几根木杆，如同推石磨的木把，供信教的藏民推动转经筒时用。房里很暗，平添一份庄严与神秘。

想泛舟湖上，去看看湖对岸的山体，眼睁睁地瞧着游艇静静地泊在岸边，就是找不到管理人员，真是让人不解。看到在岛上实现不了继续考察的目的，我们只得离开了湖心岛，回到岸边。

湖畔有几块办公桌大小的石头，上面刻着经文。不远处，栋栋小屋别具特色，有些近似欧洲哥特式建筑风格。大家拾级而上，回到停车的道路上，观湖光，吃饼干，喝矿泉水。

我吃完午餐，不忍将宝贵的是时光花在聊天上，征得队领导同意，挎着相机，独自沿唯一一条道路往回走。待他们启程回走后，必会看到我的。

路的两边都是山崖，树木青葱翠绿，原始林区的气息浓郁，耳畔不时传来说不出的鸟兽的怪叫。刚走两百多米，就觉得毛骨肃然，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可我又不愿退回去，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向前。

走着走着，听身后了一辆大卡车，响声隆隆，若在平日，这是噪音，感觉特烦。可这回我像遇见亲人似的，打心眼里欢迎卡车的到来。因为它使

我不再感到孤单。车子开过去了，拉着满满一车原木，木头都很粗。不过十多米远，车便停住在一处小坡前，上不去，司机下车查看。拿着相机，调好镜头，我就冲着汽车与原木拍照，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以此说明巴松湖区丰富的森林资源。谁知司机见了直向我摆手，看来他有所顾忌，我只好停拍。记得几年前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达里雅布依考察时，曾遇到运胡杨木的大卡车，司机亦不让拍照，因为车上的胡杨木是他们违禁砍代的。或许这一车原木也是未经允许砍下的，否则，司机忌讳什么？

车又发动了，缓缓地，上了山坡。忽听“嘭”的一声，右后轮爆了。我快步走到跟前，称司机还未走下驾驶舱，举起相机，“咔嚓”、“咔嚓”，趁乱拍了几张。我继续前行，又成了孤家寡人，看到路两侧阴森森的原始林，更为可怖。我有些后悔，出发时再叫一个队友同行就好了。

没走多久，便见路旁一块大大的石壁上，上面刻有经文和佛像，全都用红色颜料描绘过，这意外的发现让我欣喜万分，正面拍一张，侧面拍一张，再细细的欣赏一阵，乐滋滋的我全然忘却了独处的紧张与害怕。

越行景色越美，树木高耸入云，透过林间空隙，在阳光的照耀下，被分割的湖水似一片片碎银，若隐若现。再看远方，那是什么？一片过火林，灌木丛全被烧光了，破败中，被火燎过的黑黑的挺拔的主干直刺云霄，颇有睥睨灾难的壮烈雄风。继续向前走几步，见松萝密匝匝地垂挂在松树上，掩住了翠绿，呈现出一片柔柔的淡黄，美得让人心碎。

看看表，已独自走了半个多小时，其他队员乘坐的前4辆车早就过去了，我坐的第五辆车怎么还不来呢？我不由得填犯嘀咕：这车是不是开过去了？纵有美景万千，我也不愿被抛在的荒郊野外。我无心再领略秀丽的自然风光，索性站在路中间，伸长脖子，看着车来的方向。在我的千呼万唤下，我乘坐的车终于开来，我在心里高喊了一声：“谢天谢地。”

高原明珠八一镇

未去西藏以前，我总认为除了拉萨建设得好一些外，别的地方是比较落后的，理由很简单：它是边远地区，海拔又高，交通不便，这都会导致该地区经济建设等各方面的滞后。当我随科学探险队已进入西藏林芝地委、行署所在地的八一镇，我的偏见就自然地不翼而飞了。

4月11日，考察队沿尼洋河和巴松湖考查一天后，到达八一镇，只觉眼前一亮，一个富有民族风情和现代化色彩的城市展现在面前：宽敞整洁的水泥街道，设计新颖的楼群，漂亮的临街旋转楼梯，造型独特的阶段……

放眼四周，群山环绕，森林茂密，雪峰在阳光的照射下泛着悠远而神秘的光，绮丽的自然风光为八一镇增添了无限的魅力。于是，人们给予她一个雅名——“高原明珠”。

确实，八一镇的自然景观如诗如画，这一点是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不能媲美的。拉萨四面是山，但山上都光秃秃的，没有什么植被。八一镇则不然，林木蓊郁，一片片醉人的绿又为她赢得了另一个称号——森林小镇。丰富的植被，再加上不到3000米的海拔高度，在林芝八一镇，内地人一般是不会有高原反应的。因此，惧怕高原反应的人们在此地可以似内地那样自

如的生活。

安顿下来后，沿着一条南北向马路信步闲逛，两侧商店、饭铺林立，装饰得与内地无异。路的尽头，是一处广场，非常漂亮，地面由花格的地砖铺成，间或植有绿化带，整个广场整洁美丽。迎面是六层高的银行大厦，两侧为三层高的顶部饰有琉璃瓦的耳楼，整体上横贯广场的正前方。东侧的楼体，由新华书店、照相馆、眼镜行、急救站等服务业所占有，门面的装饰追求华丽、现代，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西侧是装有蓝色玻璃幕墙的商厦，几条标有“领导潮流、食品荟萃”等字样的广告条幅从楼顶垂下，更给这里增添了浓浓的商业气氛。一座高杆灯竖在广场前侧中心处，加上广场数座双球型照明灯，保证了广场的夜间照明。

最有意思的是，在广场的东北角，为方便顾客，几台缝纫机等距离地一字儿排开，裁缝师傅们不停地忙碌着。他们的后面是电信营业厅。门两侧的几根圆柱皆用金色的不锈钢片包卷，给人以豪华、辉煌的强烈印象。“电信营业厅”几个大字镶在乳白色的装饰板上，又平添了几分素雅。

一看到“电信营业厅”五个熠熠发光的大字，我就按捺不住，朝她走去。没想到在偏远的林芝八一则还有如此先进的电信服务。厅内铺着大理石地板，里面宽敞明亮，设有供顾客休息等候的沙发。电话玻璃隔间在大厅的南侧一字排开，整齐有序，隔间内放有高脚椅，通话、记帐全由电脑控制。和内地通话，一拨即通。这一切都让我感慨万分，尤其是服务员细心而又热情的服务态度，远远超过内地的许多地方。

不只在此，在别处，我也不时感受到这里服务人员的热情周到。我和几位队友去了新华书店买书，挑完书交给营业员算帐时，顺便说了句，“像咱们这么长距离来回奔波，书不弄坏才怪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一位细心的营业员马上说：“那我给你们去找包装纸去。”等她返回时，手里不但拿了包装纸，还多了几根尼龙绳。“你们书多，用绳子捆好，拿起来也方便些。”她解释道。闻听此言，只觉一股暖流涌入心田，不由得又想起内地常有的不停嚷着“顾客是上帝”，实则却是“自己是上帝”的那种爱理不理，甚至说胡子瞪眼睛的服务态度。

隔着楼群的广场的再北侧是自由市场。市场里不仅人来人往，商品也非常丰富，蔬菜、瓜果等应有尽有，而且物美价廉。就拿苹果来说吧，都4月份了，10块钱就能买到4斤个大味美的苹果，觉得比北京此时的苹果价格还低。

一到晚上，明亮的路灯，闪烁的霓虹灯使八一镇成了不夜城。卡拉OK厅里传出悠扬的乐曲，宾客盈门的餐馆旅顺，热闹的酒家酒楼，欢快祥和，与身处内地并没无什么两样。

多次来到这里的老队员总爱念叨的一句话便是：“八一镇变化太大，超出想象。”以前的八一镇是个什么样子呢？老队员们便描述道：“尼洋河料伫立着几个自然村落，为数不多的农牧民从事着简单的农牧业生产，简陋的铁皮房是商店、银行和医院，一切空旷而又沉寂。”

1986年2月，林志地区恢复成立，辖林芝、工布江达、朗县、墨脱、波密、察隅七县，总人口为14万余。由藏、珞巴、门巴、汉和各个民族组成。林芝地区东部和北部与昌都、那曲地区连接，西部和西南部分别与拉萨市、山南地区相邻，南部又与印度、缅甸两国接壤。

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涌起，昔日人烟稀少的八一镇迈出了雄劲的建设

步伐。八一镇抓住与广东、福建两省对口援助的机遇，大力实施“以城带乡，以乡促城，城乡一体化协调联动发展”战略。在建设者的辛勤劳动下，这个镇发展迅速，绽放出日益迷人的光彩。八一镇的经验离不开当地人民的努力，同时，外界的经济援助处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从广东路、福建路、珠海路、香港步行街、厦门广场、珠江市场等街道的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

在镇上游览了一天，我特别想去乡下看看，恰好第二天考察队的领导要去林芝军分区汇报秋季实施首次徒步穿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事宜，以取得军分区的支持。于是，我和杜泽泉一同搭车离开八一镇，东行在土石公路上。经过 30 多分钟的颠簸，来到一处景色秀美的地方，我和老杜下车，考察队领导则继续前行，说好返镇时再来接我们。

人生地不熟，自然不知我们落脚的具体地名，但此地真的很美：公路两侧杨柳依依，路旁是绿油油的麦田，尼洋河静静地流淌着，两侧漫成很宽的河滩，远处的山峰白雪皑皑，一切显得安静而和谐。我们正想拍照，忽见田地里有几个藏族年轻妇女在锄草。杜泽泉想把此场景拍摄下来，但她们散得很开，构图很不好。他就去和她们商量，请她们互相靠近些。杜曾经进藏多次，了解当地的风俗，知道称藏族年轻的妇女为波姆。本想会遭到她们的拒绝，没料到她们竟爽快地答应了，不过提出拍完后给她们照片。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使用的不是即刻成像的相机，便向她们解释，她们也没再说什么，任由我们拍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也许是天高水阔的藏东南养育了她们这样善解人意的性格吧。天公作美，拍照时，一阵风吹来，大片薄云缭绕在远山之间，于是有了非常漂亮的构图。

拍完后，继续沿路前行。走了不久，就见一桃柳林带。怒放的桃花，嫩绿的柳枝，交相辉映成一幅绝妙的风景画。我和杜泽泉不停地牌照，结果竟然没有看见返城的汽车。

正拍着，飘来了一片降雨云，雨也紧接着下来了。抬头四望，只有村边立着一块石碑，就跑那儿去避雨，但是没用，两人还是被淋成了落汤鸡，不由得更盼望汽车的到来，正在谈论汽车是过去了还是未对过去时，只见扎西师傅从八一镇方向开着车来找我们，真是谢天谢地。

说到雨，就想起八一镇的阴天，不知是什么缘故，云层压得极低极低，几乎伸手可及，让人觉得八一镇就是云层下的一座城市。我使劲琢磨也没有想出个所以然来，但这一景观将永远烙印在脑海中。

离开八一镇已经有一两个月了，但她的亮丽风采，服务人员的热情纯朴，仍时刻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相信，位于东经 94 度 24 分，北纬 29 度 40 分，据自治区首府拉萨 400 公里的八一镇，在当地人民和内地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建设下，这颗“高原明珠”将会更加光艳夺目。

巨柏沧桑

在林芝地区八一镇东面的巴结乡，幸有一片巨柏保护区。未去保护区之前，植物学家李渤生就告诉我们，古柏森林的巴结保护区是国内唯一的巨柏保护区。作为记者，我向来对“唯一”的事物深感兴趣。因此，自从知道

这个保护区后，心中颇为神往。

4月12号下午，我们沿着尼洋河向保护区进发，远远地，就看见保护区坐北朝南的位于山窝里。它高树丛丛，绿意浓浓，十分显眼。下车后，便见“工”字形基石上立着一块长方形的石碑，上面分别用中文和藏文刻着保护区的有关情况，其中文如下：

%%巨柏，又称雅鲁藏布江柏木，柏科柏属，藏语称拉薪秀巴，当地誉为“神

树”，是国家珍稀二级保护树种，也是西藏特有的树种之一。

保护区位于东经94度20分，北纬29度40分，海拔高度3040米，面积130亩。

巨柏林平均高30米，平均直径100厘米，郁闭度0.5，总蓄积量5400立方米。其

中最大一株高近50米，大径5.8米，已经生长2500年以上，被誉为中国柏科之最。

巴结自然保护区是1982年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的自治区级自然

保护区，她对旅游、教学和科研都具有十分宝贵的价值。%%

读完碑文，我就直奔最大的那株柏树——柏树王而去。但见水泥护栏围住的巨柏异常粗大，要六七人才能合围。岁月的长河已剥掉了树的根部的表皮，如同一张印第安人老者的脸，布满了沧桑。我们杨逸畴研究员，这个数的树龄是怎样测算出来的。他告诉我，有关科研部门曾对这棵巨柏打过钻，取样后方知它的树龄。站在它的面前，只觉自己是那样的渺小，不由得感叹大自然造物的神奇，怪不得当地藏民称它为“神树”。

“这些巨柏被什么生长得如此高大？在这个山区又仅存在这个山窝里？”杨逸畴走到一块近两米高的土崖前，回到我说：“看看这儿的层位，就知道它是湖相沉积。很久以前，这是一个高原湖。如果认真从层位寻找，还可找到螺壳。后来，由于地质的变化，湖岸被尼洋河冲开，只剩下山窝里这块遗留的沉积地，变成了巨柏生长的好地方。”

听了这番话，我茅塞顿开，明白了这片柏林为什么既不往山上蔓延，又不往南滋生，而独独长在山窝里。

怀着好奇心，我认真地在那片土崖里搜索着，结果真的找到一个螺壳。尽管长期的风吹日晒已使贝壳丧失形状的完整性，但大体的样子还是存在的，只不过稍稍一碰，便粉碎。

望着能反映远古时期古柏区自然地理环境的沉积层，我情不自禁地想起来印证着帝国主义侵略者罪恶历史的昆明湖底沉积层。

1993年在颐和园昆明湖亮出它的底色之际，众多的游览者往往把黑黑的散发着腐味的湖底，仅仅看成个泥塘。其实不然，昆明湖底的沉积记载着北京西山地区的气候变化和環境变迁。自1749年12月乾隆皇帝雇用民工开挖昆明湖，至1750年1月施工结束，在封闭的皇家园林中，昆明湖已平平静静地度过了240余个春秋。

寒暑易节，昆明湖底的淤泥每年堆积一个清楚的层位，叠加为2.7-2.8厘米的沉积厚度，层层码放如同书籍。从上层到下层，科研人员不仅可以“读”到现今至1749年的环境信息，从更下层的剖面 and 桩样中，还可以“读”到更远的相关历史。

经过研究、科研人员发现，相应于 1850~1910 年的沉积样品中，每克炭屑总量竟然达到 19992 片，而其上的样品，每克炭屑样品总量是 1140 片，其下的样品，每克炭屑样品总量是 2544 片。

炭屑素有“火的化石”之称，它是有机物不完全燃烧的产物。在地质研究中，人们之所以把它看得这么重，是因为炭屑经过吹动和水的冲运，可以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洼地沉积起来。科学家通过地层中炭屑量的多少和沉积所展现的年代，可以推论火灾的发生或者用火的强度与频率，进而揭示火的自然灾害和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

导致昆明湖底沉积样品发生信息突变的原因，并非自然界界的重大灾变，而是英法联军 1860 年对颐和园及其周围地区的焚烧，以及 1900 年八国联军对颐和园的破坏。当年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的强盗行径竟然沉积在静静的昆明湖中，被无情地刻在地质历史的耻辱柱上。

昆明湖沉积反映的是中华民族灾难的一页，巨柏区沉积则述说着此地的地质历史。

巴结能生长出这么好古柏林，说明这儿的古今环境很好，雨水湿度，阳光充足，林后的大山又挡住了冷空气的侵袭。

原以为巴结乡是西藏唯一拥有巨柏的地方，事实并不如此。后来路经朗县时，在雅鲁藏布江的江畔，我又见到了巨柏，只是这些巨柏全然没有巴结古柏的高耸，有的才一人多高。有趣的是，这些巨柏要不零落地散布在山坡上，要不排成整齐的一排，沿着雅鲁藏布江的水线生长，好似人工栽种的。这里所说的水线，是指雅鲁藏布江一年中水位最高时形成的线。

我觉得，朗县的小巨柏难以长成大树，因为它生长的环境比较恶劣，此处沙害严重，有的巨柏周围已堆满华沙。由此可见，巴结乡巨柏保护区的价值之高！它充分反映了古环境的变迁。

色齐拉山惊回首

色齐拉山位于波密的东久和工布的足木宗中间，海拔为 4728 米，属念青唐古拉山脉，是尼洋河与帕隆藏布江的分水岭，为川藏公路所跨越。

按照 1998 年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科学探险春季预察行动计划的形式，我们应是先到派，再去大峡谷，最后才赴波密。12 日夜，考察队决定改变路线，怕的是一旦雨季提前到来，再来波密及帕隆藏布江下游一带山势险峻的地方，与滑坡和泥石流相遇，必然会影响这次考察的圆满完成。这是基于晚饭后，考察队派出多次赴藏的关志华、李渤生去墨脱县设在林芝的办事处了解情况后，做出变动计划的。考察队决定先去波密，再去大峡谷大拐弯，最后去米信的派。

13 日早晨，考察队从八一镇出发前，又全队去拜访墨脱县驻林芝办事处。县长普巴、常务副县长何玉成接待了我们。县长是门巴族人，他说：“早就听说考察队要来，一直想去拉萨找你们，想不到在这儿见了面，真让人高兴！欢迎你们来考察，你们的到来，会对墨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好处，所以我特别高兴。”副县长是汉族人，讲起话来词汇更为丰富些，他说：“雅

鲁藏布江大峡谷大部分谷段在我县，但过去我们对它的价值没有认识清楚，这两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们这次来墨脱县考察，不管是民工的派出，还是有其他方面的需要，只要你们提出要求，我们一定尽力加以协助。”听到县领导这些充满真诚的话语，我们热烈鼓掌。我们每个人都十分清楚，待到秋季大批队伍来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穿越时，没有波密、林芝、米林，特别是墨脱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座谈延误了启程的时间，直到中午 11 时，我们才开车向通麦方向前进。根据林芝地区领导的要求，林芝电视台和宣传部也派出了一辆新式的北京吉普车随行。

过了林芝县城，我们很快就进入了色齐拉山。汽车沿着盘山公路往上行驶，路旁两侧的植物使我颇感兴趣。一是成片的毛竹，修长纤细，恍若置身于水乡江南；二是路旁的杜鹃花，花儿开的虽仅有酒瓶盖大小，但一丛一丛的，着实让人喜欢。色齐拉山东南部与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东端相接，西北部与高原面向连接。夏季，印度洋暖湿气流被高大的喜马拉雅山所阻挡，在西南季风的作用下，被迫沿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北上，进入高原腹地，从而导致色齐拉山温凉而潮湿。这里的年降水量 600~1000 毫米，降雨的时间集中在植物生长期的 5 至 10 月份。潮湿的气候，使得山体植被生长茂盛，种类繁多。

这也是得以看见充溢着浓郁江南气息的毛竹等植物的原因所在。

越往上，山体越陡，郁郁葱葱的冷杉高大挺拔，满山遍野，有的是深绿色，大部分则呈淡黄色，因为挂满了棉纱一样的松萝。松萝是菌类和藻类的结合物，靠湿润的空气及光合作用生成。它是无根的，攀附于树上，对树木无害。近 12 点，对讲机突然响了，坐在前车的一位队友突然呼叫我：“张继民，张继民，前面发生雪崩，前面发生雪崩。”我赶紧回应：“我听到了，听到了。我明白，明白。”

下车前去查看，雪崩规模虽然不大，但在路上形成了一堵雪墙，一辆大卡车陷在雪堆中。队友们都下车去推，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大卡车依然纹丝不动。恰在此时，迎面开来了一辆大客车，司机用粗绳把大客车与货车连上。于是，客车后退拖拉，我们也在卡车后面使劲推，终于成功了，笨重的卡车驶出了雪堆。卡车一过，我们的车也跟着轻易地过去了。我们乘坐的是越野车，马力大且轻便，是没有陷入雪堆之虞的。

见到插在雪堆中的经幡又在中飘动摇荡，这表明色齐拉山到了。汽车拐入背风的东坡，只见厚厚的积雪覆盖了大半个山野，车子只能沿着深深的辙印缓缓行驶。自进藏以来，还从未见过如此深的积雪，此时我们特别希望下车拍几张照片，但扎西师傅坚决不让。他告诉我们，此时车一停，恰好是被山遮住的地方、迎面来的车看不见，会继续开过来，路窄不能会车，双方处于退不能退，进又不能进的状态，加上路滑，一不小心，就会滚到山下。扎西正说着、汽车尾部不受控制的来回摆动，旁边就是深不可测的坡底，一旦滚下，后果真是不堪设想。我们个个战战兢兢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皇天不负，我们总算平安到达山下，悬着的心才放回原处。

路太险，我太紧张，竟然忘了感受在海拔 4000 多米山口时的身体反应。看来当时肯定没有什么明显的不适，我的身体已经有了一定的适应能力。

回望色齐拉山，悬崖陡峭，白雪皑皑，川藏公路穿行其间。不用想象，便可知道当年筑路工人们修建此段公路时的艰苦。色齐拉山是川藏公路东

段通往拉萨的最后一座大山。1954年，筑路人员在“保证今年把公路修到拉萨”的口号鼓舞下，决心提前打通这座大山。9月间，这里的山下就开始落雪结冰。为了争取在大雪封山以前完成这一工程，战士和工人们背着工具、帐簿和粮食，在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原始林区开路前进，于10月份赶到工地，把约定开工的时间提前了五天。

为了开通道路，筑路人员在山坡的原始森林里，伐掘了几万株树木。与此同时，在山顶施工的战士们也冒雪昼夜工作，提前劈开了几十米的石崖。施工中，他们还遇到几公里长的泥沼草地，为解决这个难题，筑路者掀掉草皮，挖除了一两公尺深的稀泥，填上石灰，然后用树干铺好木排路基。在修筑山西麓的一段泥沼泽地的路基时，不论是下雪的清晨还是刮狂风的傍晚，筑路战士们在腿上抹一点防冻油膏，就下到结着薄冰的泥沼里工作……筑路人员的艰辛换来了色齐拉山公路的修通，路经川藏公路者应永远铭记着这些筑路人员洒下的血与汗。

色齐拉山西坡达则村旁的本日拉山，是西藏本教的圣地，也是西藏的四大神山之一。

每逢藏历8月10日，来色齐拉山转山朝拜的人，常常从四面八方涌来，并举行规模盛大的转山活动，称为“娘布拉酥”（请神求宝之意）。试想，若无当年筑路人员的辛劳，又怎能有今日来往色齐拉山的便利呢？对那些为修这条路默默无闻奉献过的人们，我们是应该心存感激的。

下午1点多，来到东久。在一略为干净的饭馆，我们歇息用餐。吃的是面条，每人两大碗。饭后，人人都说好吃。其实，只是加点肉丝的汤面又能好到哪里！主要是饿的。

屈指算来，我们已有六七个小时粒米未尽。

出东久，沿东久河前进。抬头仰视，高山耸立，林木茂密。此处的植物资源丰富得让人惊叹！路边，腐烂的大树上长满青苔。呈浅灰色的废弃的十多米长的断木到处都是。

东久河里，横七竖八地浮着从上游漂下来的树木，有的地方竟盖于河水之上。

这里的林木真是太多。在我们就餐的东久餐馆后厨房，就见到地板、顶棚、墙体全用新的并且还散发着木香的木板拼成。有队友见状，拍了一张照片，号称“体会一下全木结构的感觉”。感觉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每天窝在用混凝土与砖块构成的房间里，又被建筑物与器具散发的大量化学元素包围着，越来越远离自然。这是祸还是福？好像强调哪一点都成立。看来，现代文明的发展也有误入歧途的时候，实在应引起人们的警觉。

惨烈十英雄

过了东久，沿东久河前行。由于山的坡度很缓很缓，穿行在林间的路也没有什么大的起伏，望望路两侧不尽的莽林，吸一口沁人心脾的清新的空气，一种舒适之感油然而生。我多么希望前方的路一直这样延续下去。然而，

行了 20 多分钟，为左侧直立的山地所限，右面又紧临咆哮的东久河，路面明显变窄，有的地方仅容两辆车勉强错过。

再前行，东久河右岩的峭壁与路左边的峭壁高高并立，明显形成了峡谷，加上东久河猛烈的回响，又使此地多了一份慑人的力量。

我们过了林芝县排龙门巴族自治乡政府，来到通麦大桥，一座饰有低矮廊首，砌着基座的长方形高大石碑猛地映入眼帘。我很是诧异，便问随行队员，“怎么这儿还立着一个碑呢？”“你可不知道，这就是为有名的拉月大塌方牺牲者所立的碑呀！”

拉月，是我们刚才经过的地方，在排龙村的前方。一般说来，纪念碑通常立在事发地点，但拉月大塌方纪念碑却距拉月 15 公里。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猜想，一是途经拉月的东久至帕隆段的公路都紧靠路边的山崖，很窄，没地方可修；二是如果硬要在拉月修筑，碑体只能顺着路的方向构筑，来往车辆很难注意到。通麦大桥的桥头是一处非常好的地方，它背靠一座隆起的郁郁葱葱的小山，这山后又有秀峰相衬。前方是日夜奔腾的易贡河。一条横跨两岸，使易贡河变为通途。左前方是拐向通麦的路。依山、临河，前方开阔，所以把碑立在此处，真是一块难得的地方。

下得车来，我走向纪念碑，但见正面写着“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永垂不朽”几个大字。纪念碑的本底被漆成红色，岁月的流逝已冲淡其色彩，有些泛白。

转到碑的背面，上面竖刻着烈士的英雄事迹。然而，不管大自然如何侵蚀这块纪念碑，历史已永远记住了拉月大塌方，记住了十位解放军指战员，他们分别是：营副教导员李显文，连长杨星春，副连长陈洪光，副指导员陈德凤、谭仁贵，排长曲月伦，班长杨庆忠、李荣昌，战士陈昌元、李兴富。

1967 年，那时部队的着装，有别于现在的军衔制，是“红色的帽徽红领章”的年代。

为了保卫祖国边疆，总后勤部某部三营副教导员李显文同志奉命带领十一连和十二连车队执行战备运输任务，由东向西，飞驰在千里川藏运输线上。

这年的 8 月 25 日，十二连车队来到川藏线著名的险区——帕隆拉月大塌方区。当时，险区中心烟雾沉沉，响声隆隆，巨石纷纷飞向公路，严重影响了车辆的通行。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战备物资运输任务，李显文同志带领连队干部战士驱动车辆不畏艰险，迎难而上，数次冲入险区，冒着滚滚飞石，排除路面积石，与塌方顽强搏斗，终于强行通过险区。

26 日，当一连连长杨星春带领十一连车队赶到这里时，公路已被土石完全阻塞。他虽然组织连队多次清除路障，但由于塌方越来越严重，始终未能通过，被阻在险区东端。

为了保证全连人员、车辆和战备物资的安全，杨星春同志果断决定车队后撤到 1.5 公里外的安全地带。在受阻的日子里，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杨星春几次把战士们召集在一起，介绍险情，然后严肃的命令道，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不准擅自到险区去。他自己则不惧险情，每天总要和干部们深入险区三四次，迎着滚滚飞石，观察和记录险情，研究塌方规律，随时准备带领连队强行通过险区。

28 日，由李显文率领的十二连车队把前运物资送到目的地后，返回拉月塌方区，又被阻在险区西端。为了勘察塌方情况，十二连副连长陈洪光与

副指导员谭仁贵，冒着生命危险，当天穿过险区，同被阻在险区东端的十一连会合，共同研究强行通过的方案。

29日下午，塌方加剧，险情扩大。山上飞下的巨石掉入河中，溅起一两丈高的水柱，显然，更大的塌方即将爆发。为了进一步摸清险区情况，“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李显文不顾个人安危，从西端冲进险区。看着飞石不断从他头顶呼啸而过，一位战士喊道：“副指导员，快转回来！”他摆了摆手，继续前行。

处于险区东端的杨星春、陈洪光、程德凤、谭仁贵、曲月伦，从电话中得知李显文已冲进塌方险区，一致决定：立即去险区同李显文会合，一起研究车队通过险区的方案。

共产党员、班长杨庆忠、李荣昌，共青团员、新战士陈昌元和李兴富听到这个消息后，也要求一起到险区中心去勘察道路。于是，10人一起冲进了险区。

正当李显文、杨星春等十同志分别从东西两端向险区中心前进时，突然一阵惊天动地的巨响，特大山崩爆发了。

山崩之下，飞鹰难逃。十位解放军战士全部牺牲，无一幸免。当时的情况是，一山体突然崩倒下来，猛烈撞击公路对面山体，对面山体又反撞崩塌。自此，拉月山河为之骤变，倒下的山体塞满了东久河，迫使东久河改道。我们路过拉月时，只能看到一座整体已落架、仅余桥头石碑的桥位，有关研究人员估计，拉月山体崩塌土方量达2000万立方米。

我是1965年从辽宁铁岭参军的，在当时的工兵五十一师一一五团一营三连服役。

1967年，是我服役的第三年，因此，我记得，拉月大崩塌一度轰动全国，为表彰十烈士的先进思想和英雄事迹，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某汽车部队三营副指导员李显文等十烈士以“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光荣称号，并于1969年2月20日在北京举行隆重的命名大会。

大会庄严的《东方红》歌声中开始。全体到会同志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的牺牲了，让我们高举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当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代表中央军委宣读了授予李显文、杨星春等十烈士“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光荣称号的命令，并把“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的锦旗授给十烈士生前所在部队。

会上，总后勤部另一负责人宣读了总后勤部党委《关于向“无限忠于毛主席的川藏运输线上十英雄”学习的决定》。十英雄生前所在部队代表王守富、总后勤部所属单位代表年四旺先后在大会上发言。他们一致表示：一定要继承烈士的遗志，走英雄的道路。

十英雄作为部队的先进典型，我所在的部队也学习过。“含泪继承英雄志，誓将遗愿化宏图”，这是我们当时学习这类先进典型时说过的话。我决没有想到，31年后，我来到英雄们献身的地方。所想到的是，如果他们还活着，李显文、杨星春等该是60多岁，杨庆忠等该是50多岁。1967年，

我在部队也是任班长。可以在年龄上对他们作出比较准确的估量。然而，他们尸骨无存地被埋在大山之下，惨烈地早早地走向了另一个世界，我觉得，我应该表达一下我对烈士们的敬仰之意，顺手从碑旁采几朵小花，庄重地放在碑前，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江玛曲米随想

通麦路北设有驻军的转运站，路南有十多户人家，多以开小饭馆为生，这里地处交通要道，估计生意不会太差。过通麦邮局就算出了村。13日夜，我们就宿在通麦，绵绵的细雨足足下了一夜。14日晨，小雨停了，空气格外清新，吸一口甜甜的。我们继续登车赶路，奔赴波密。路旁的麦子齐刷刷地已长到膝盖高，这次我们此次赴藏以来看到的长的最高最好的庄稼。八一镇附近的麦苗才有十多厘米高，不知道与此地的麦子为什么差距这么大？20分钟后，我们的车子拐入呈南北向的塌方区。车左上方，右下方，全是塌方后堆积的土石。我们慑于塌方区的危险，不再议论麦田。看着车右下方松软的土石，心想，一旦右轮压不正，连车带人必定滚下无疑。十多分钟后，车子终于通过这个险段。

心刚刚放下，不料过了五六分钟，我们又拐入呈东西向的另一个塌方区。林芝地区宣传部副部长普布多吉告诉我，这两处塌方区均属于318国道102道班所管辖，地名叫江玛曲米。

东西向塌方区更是危险，坐在车里，紧张地感到手指梢一个劲儿冒凉气。左边，是高两三百米的塌方堆积；右边，也是塌方堆积，深达一二百米，滑坡区下就是隆隆作响的帕隆藏布江。公路修在滑坡区的拦腰处，只有一个车道宽，有一段路塌陷得甚至只剩下大半个车道，此处横着几根木头，车可勉强通过。司机稍有不慎，车就会滚到崖下，真是危险至极。就在崖底下，一辆滚下的解放牌卡车的残骸静静地躺着，无言地述说着以往的悲剧，恐惧不由分说攫住了我们。坐在轻便的越野车，尚且吓得心怦怦直跳，真不知道大卡车，尤其是双层大客车是怎样从这段路开过去的。我们从林芝县城过来时，就路遇一辆大卡车，满载着进藏做工的来自四川的农民，他们也必须经过这两个险区。

看到路况如此之险，感慨涌上我的心头：为了生存，他们努力搏击着，而在这奋进的途中，他们却面临着太多危险。尽管如此，一批批民工仍在不断奔向西藏，为了心中那“活得更好”的渴望，活着，就是美好，活着，就有希望。人们对生存的执着追求让我难忘。

两个塌方区之间的那个拐弯，可能是最令司机挠头的。他们都从对面开来，因为拐弯，被山所挡，谁也难以早早地采取规避措施，搞不好只有在急拐弯处相遇。这种情况一旦发生，路窄，无法错车，其中一辆车只有往后退，直到退至稍宽的地方。相遇的司机是否为谁退谁进而争吵呢？这是我所想的一个问题。如果一方认死理，那就意味着谁也甭想通过，曾经在书上读到这样一则小故事：过去在西藏，如果走马道，两马相遇而无法错行时，马的主人就会商量把一匹马推到崖底下去。书上讲得不详细，我也一直不相信，

因有太多的疑惑：马被推下后，主人怎么办：他的货物难道不要吗？就算这是真实的，若两车相遇，因为路窄不能错车，即便如此，也不会存在谁驱动车往崖下滚动的问题，结果只能是有一车往回退。

此次在藏东南，几天来行程一千多公里，我未见过扎西与路遇司机红过脸，也没看到司机之间较过劲，他们之间相互十分谦让。车过另一座山时，我看到了他们的礼让。

这条高山险路，需一个多小时才能通过。路窄，绝大部分路段只能通行一辆车。偶尔有个宽一点的地方，供错车用。正走着，迎面开来了另一辆车，那司机见到我们二话没说，就开始倒车。旁边就是 2000 多米深的缓坡，坐在车上的我们直为那个司机担心，不停地祈祷着：千万小心，千万别掉下去，造成别退了。可不接着退又怎么能行呢？路那么窄，窄得可怜。那司机往后倒了五六十米，才找到一处稍宽的地方停下来，而且把贴山的那一侧留给了我们。我可不佩服这些可敬可爱的司机吗？他们那高超的驾车技术，他们那极佳的涵养，都令我心折服！

考察途中，总情不自禁的拿西藏和内地作比较，此次又不例外。我想起内地常见的场面，尤其是大城市上下班高峰期间，车不让车，人不让人，人也不让车。大家都想快一点，结果是乱成一团，挤做一堆，谁也快不了。个别司机动不动就瞪圆眼睛骂行人：“你他妈不想活了？”只有违章后去见交警，他们的脸上才堆满假惺惺的笑，显得极其虚伪。一些地段，闪烁的红绿灯形同虚设。虽然要求“宁停三分，勿抢一秒”，事实上，个别道德水平差的司机却是一秒都得抢，更不用说三分了。如果内地的司机也有西藏的司机们这样的谦让精神，那该少酿成多少人间惨剧呢？如果人们都能为对方多想一点，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加美好！

古乡灾痕今犹在

车东行至波密县的故乡沟，只见湿云低垂，紧压树梢。目力所及，满是黑色的石砾堆中稀疏地长的小树，空旷中陡添一份凄凉。

面对此情此景，我很是惊异，便向同车的杜泽泉询问，这是什么地方？老杜告诉我，这就是 50 年代初爆发特大泥石流造成 140 多人死亡的古乡沟泥石流区。让我吃惊的是 40 多年后，这里的泥石流的遗迹仍然如此触目惊心！好像着意向后人展示它的暴虐。

有沟就有水，故乡沟亦是如此。它是帕隆藏布江下游的一级支流，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系海拔 6000 余米的雪山。这里雪线较低，只有海拔 4300 多米。山上有冰川发育，包括第四纪山地古冰川。科学考察表明，这里的冰川带至少发生过两次古冰川作用，即根据是在山上的不同海拔处留下了两处古冰川痕迹。

未赴藏以前，我与一些读者一样，也不大明白什么是古冰川或围谷盆底。但此次飞越珠峰地区，坐在飞机上，俯视不尽的冰峰雪岭，在科学家的指教下，方明白古冰川和围谷盆地的含义。原来，这些冰山随着小块冰体的下滑，将原先冻结的后来又松动的石块，同时向下方搬运。这些冰体下移时，

往往寻找下面山体的口部，时间一长，发展成了围谷。冰川的长期作用，又使得山脊如同利刃，同内地坡度较缓的山脊相比，形成明显区别。

古乡沟的水流域面积 25.2 平方公里，最高处海拔 6298 米，最低处海拔 2530 米，相对高度 3768 米，山坡平均坡度 37 度。由于雪崩给冰川带来大量的岩块碎屑，加上山地风化物与冰碛物等堆积深厚，围谷盆地堆积物竟厚达 40 余米。因此可以说，流域内松散物质的储存极为丰富。同时，古乡沟通流域又深受西南季风吹来的暖湿气团的影响，降水十分丰富，这些均为泥石流大爆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有关科学家介绍说，古乡泥石流爆发，诱因很多。印度板块与亚欧板块的碰撞，使藏东南地质活动十分剧烈。古乡沟恰好又位于藏东南强地震带的中部，属于察隅——波密——林芝深大断裂带的西段。1950 年，察隅发生 8.5 级大地震，导致古乡沟上游流域产生了大规模的冰崩、雪崩，形成了堵塞堆积石坝高达 40 米。之后几年，这里崩滑不断发生，哗哗流动的冰雪融水自然地往下搬运着冰碛台地的碎屑物质，加上雪水和雨水的浸润，使得堵塞在堆石坝上游库区的淤积物处于饱和状态。1953 年，古乡沟流域内降雨量大而集中，以及持续高温，造成冰雪消融与洪水增大，接着又出现过坝溢流。水流对坝面严重的冲刷，使坝体推动稳定，最终导致突然溃决。

这是入夏的一天，堆石坝体和库区内的饱和泥沙石块突然涌动，一场特大型粘性冰川泥石流发生了。龙头高达几十米的泥石流似一条黑色的泥龙，裹挟着沿河扫荡下来的树木，奔腾下泄，不可阻挡，无情地吞噬了来不及躲开的当地 140 余位居民的生命，冲埋了 8 户民房及大片耕地。直径一二十米的巨石夹杂在汹涌的泥石流里，就似漂浮在水面上的木块。科学估算表明，古乡沟这次泥石流冲出的泥沙石块达 1100 万平方米，其中最大石块重达 200~1000 吨。泥石流冲著山口后，淤埋了川藏公路，并形成了一个宽 4 公里的泥石流堆积扇形区，面积为 6 平方公里。扇形地堵塞帕隆藏布江河道，又形成堵塞湖——古乡湖。

不用去看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殷红所拍影片《泥石流》，眼前那 40 多年后依然堆积的或巨大或细小的累累石块，已让我深深体验到泥石流可怕的毁灭力量。

泥石流的破坏具有毁灭性，它也是西藏主要的山地灾害。这引起了有关研究人员的关注。通过调查，他们发现，西藏的泥石流地区主要位于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昌都沿线以南，西自阿里西南边境，东至金沙江以西地区。从西藏西北部往东南方向，泥石流水平分布依次为：高原暴雨型——冰湖溃决型——冰川积雪消融型——雨水型；有高山地带到河谷，垂直分布依次是：冰湖溃决型——冰川积雪消融型——暴雨型——持续阴雨型。

泥石流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农田水利建设。不用说古乡沟 1953 年爆发的规模罕见的特大型泥石流，就是规模小的泥石流造成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觑。1954 年 7 月 7 日凌晨，江孜地区爆发的泥石流致使年楚河、尼洋河水位猛涨，冲毁大量房屋，淹没了许多村庄和土地，这就是有名的“江孜大水”。1980 年 9 月 10 日夜，墨脱公路 88 公里处发生暴雨泥石流，几乎摧毁了当地工程指挥部的帐号。1981 年 6 月 24 日，西藏洛扎县的一个地方发生泥石流，严重破坏了许多桥梁、水电站和草场等，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困难。

不仅如此，泥石流还严重影响着西藏的交通。据统计调查，西藏的 14

条主要公路干、支线沿线分布有泥石流沟 1064 条，特别到了夏秋季节，泥石流更是活跃。

川藏公路在西藏境内路段 1490 公里，经常受泥石流影响道路约 500 公里，灾害性泥石流近 200 处，主要分布在从怒江到林芝之间。

怒江桥至然乌路段，分布着 40 多处泥石流沟，大型泥石流沟主要有瓦达、拉庚、森格宗等。然乌至林芝路段，公路紧贴波都藏布江、帕隆藏布江和东久河的岩壁而行，泥石流居高而下，经常破山而出，淤埋道路。该段危害严重的泥石流河有 60 多处，其中主要是古乡沟、忠坝沟、大兴沟、新冰川沟、曲则弄巴沟、卡姆弄巴沟、嘎哇弄巴沟、扎头西沟、索通沟、毕通沟、通德沟、白隆沟、加马齐美沟、东久河畔拉月大塌方区等等。

林芝至拉萨路段，泥石流多发生在尼洋河沿岸，其中尤以工布江达西面的唐不朗沟最为严重。

川藏公路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主要道路之一，不时发生的泥石流经常使川藏公路受阻，影响了交通运输。数据虽然枯燥，但能直白的说明这一点，且让我们以川藏公路帕隆沟泥石流为例，看一看它是如何不时截断公路，堵塞车辆的。

1984 年，阻车 67 天。

1985 年，阻车 270 天。而且 6 月 24 日爆发的泥石流还冲毁 5 座桥涵，埋没汽车 80 辆。

1986 年，阻车 175 天。

1987 年，阻车 177 天。

还有，1964 年 9 月，川藏公路达门拉咳冰碛湖溃决，泥石流冲出 160 万立方米的砂石世砾，堵断尼洋河十几小时，沟中公路设施被冲毁，交通堵塞 45 天。

在川藏公路上阻车，可不似内地塞车那么简单，一是时间长；二是许多路段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些路面的过度窄小，往往不能掉头往回开，只能等待道班抢修后才能继续前行。想想看，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一堵就是两个月甚至近半年，该是多么的熬人！

司机扎西师傅向我们讲述了他的一次亲身经历。几年前，扎西在川藏线上开卡车。

一次他在四川给妻子买了许多物品，也为孩子买了许多好吃的，然后往拉萨回赶。行至帕隆的一座大桥前时，桥突然断裂，驶在扎西前面的一辆大卡车随之附入滔滔的帕隆藏布江中。那位司机因此步入黄泉。

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扎西后面的车一辆辆多了起来，断桥对面被阻滞的车辆也日益增多。大家除了干等，等待道班修复断桥，没有别的办法。四周荒无人烟，没有旅社。

吃完了他自己所带备的食品，不得已，扎西只好吃给孩子买的食品。等到桥重新架好，已整整过了一个月，为孩子买的好吃的已被他吃得光光的。可以想象，在家中等待爸爸归来，见到爸爸的车肯定会欢呼雀跃的孩子该是多么的失望！虽然扎西被阻的经历不是泥石流造成的，但由此可知，泥石流阻断道路所带来的不便是多么严重。

读者也许会问，既然泥石流有极大的危害，为什么不像预报天气那样对它进行预报并加以预防呢？历史发展到今天，从东汉的张衡发明候风地动仪开始，科技人员努力不止，至今依然不能完全准确的预报地震的发生。同

样，对泥石流的预报也是困难的。尽管如此，科研人员对泥石流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目前，对泥石流进行监测、预报、警报的方法不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根据降雨因素来预报泥石流发生。暴雨泥石流的发生，主要是取决于泥石流沟前期含水量情况及本次降雨条件；其次是土、石、冰块等固体其物质的累积及补给状况；再次是根据降雨因素预报泥石流的发生及其时间。

1982年至1984年3年中，有关人员在某地共预报泥石流24次，其中报准25次，错报1次，漏报1次，准确率为86%，提前40分钟左右。

二是根据地声预报泥石流。泥石流发生时，会产生特殊的震动声波频率及振幅。在泥石流沟道中上游的沟岸处埋设声仪及接收装置，将泥石流的震动信号发回受灾地点，可提前预报泥石流进入危险区的时间。1983年至1985年，科研人员在蒋家沟泥石流观察站采用地声传感器收集了18次泥石流的地声资料，找到泥石流的特殊震动强度频率范围。

研究人员又与有关单位合作，研制出NJ-2型遥测警报器，遥测距离达8~12公里。1985年成功的预测了12次泥石流，平均提前报警时间7分44秒。

三是根据上断面泥位预报下游泥石流。这又分为接触式泥位报警和非接触式超声波泥位报警，也有一定的效果。

藏东南的泥石流是严重的，尤其是夏季到这个地区工作，预定要给以应有的重视，不但要考虑车辆的通行与受阻，更要顾及泥石流对人身伤害。而要有效的防御泥石流，必须综合地考虑到降雨、所处山势、历史上有无泥石流的爆发等等。或谓之，虑之在前，以防后患。

遗憾未见云杉林

到达波密县后，就听说县城以西20多公里的岗乡有一个自然保护区，并立有石碑。

该保护区建于1985年，东西宽约12公里，南北长约24公里，总面积46平方公里，海拔高度大多在2600~5000米，区内山林茂密，以云杉和华山松为主。古树参天，树龄高达300~400年，有些云杉树干直径达1.5~2.5米，最大一棵大树高达80米以上。这片云杉林的生产量是相当高的，每公顷蓄积量超过2400立方米，是我国东北林区的4~5倍，是西欧、北美针叶林的3~4倍，为至今所知世界上生产量最高的暗针叶林。

闻听此说，焉能不心动？这肯定是一片森森无比的云杉山。考察队决定前去考察，以了解印度洋暖湿空气北上的作用。14日午后，科学探险队驱车从波密县出发，此时，蒙蒙细雨飘飘洒洒。过了扎木镇，车子便上了山，路随山势越来越陡，车子无法开得快。

约莫没过了半小时，行至一拐弯处，“嘭”的一声，我的头撞在了车顶上，“怎么回事？”揉着撞得发疼的头，我心里直嘀咕。摇下车窗往外探头一望，一道不宽的水沟截断了公路。为了通行，施工人员用几根木头顺直搭

在路上。我们的车轱辘没对准木头中部，结果陷进了两根木头之间，卡住不动了。以前，我们的5号车总是被排在尾车，信念此次当了开路先锋。后面的车跟上来了，大家都下车帮助抬车。“一二、一二”，队友们喊着号子，倒也没费太大的劲，车子被抬出来了，只是每个人身上都溅上了泥点。车继续往前开，遭此“挫折”的扎西师傅脸色沉郁，一句话也不说。在科学探险队的6位司机中，扎西开车是最沉隐的，没想一向稳重的他竟将车陷进了木头间，他肯定认为这是他的不顺。我们很了解他的心情，谁也不说话，免得形成情绪反差，让扎西更感到不快。

按照迷信的说法，出师不利，以后也顺当不了。雨水的浸润，使路越来越滑。因为路面左高右低，车尾时不时地往左边摆动，坐在车里感觉十分明显。而再左边就是奔腾的帕隆藏布江啊！这样不紧不慢的行进了半个多小时，我看太危险，再也忍不住了，便说：“扎西师傅，您能不能开快一点？”“快？车快就得冲到江里！”这真是一条要命的路。快又快不了，慢亦慢不得，我们只有提心吊胆的忍受着。

天越来越不好，乌云压顶，黑黑的。看看表，才4点多，感觉却像是晚上8点。往前行到一个村庄，天色更暗，问带路的普布多吉，离保护区还有多远，他竟然也说不清楚。

想问路，四下见不到一人。雨、粘滑的泥浆，把老百姓都堵在了家里。这可真叫人着急：路滑，天又不好，行车非常危险；再往前开，又不知要多久才能到达云杉林，而且当晚还得赶回县城。没办法，因考察队领导去向波密县汇报工作，不能随行，临时带队的王维只好请大家商量讨论，是放弃目标还是不到云杉林不罢休。虽然少数几位提出要去，但考虑到危险和回程的时间，多数人认为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最后一致决定往回撤，就这样，我与岗乡云杉林失之交臂。

返回途中，天慢慢放晴了。或许，没支成岗乡云杉林也是天意！

不由得想起徐凤翔，这位了不起的女科学家。1979年，她带领几名学生到岗乡搞森林调查，发现了这片云杉林。为揭示这片林子的结构、生长与生态环境的状况，她在岗乡进行了七八年的林分定位工作，作了10余株大径级的解析木，进行根系和根量的调查。

正是决心把后半生奉献给高原生态研究的徐凤翔的忘我工作与呼吁，岗乡云杉林才被人们所重视，岗乡自然保护区也才得以建立。不难想象，徐凤翔当年频繁地在这条路上跋涉是何等的艰辛，其研究工作又是何等不易！对她，我是由衷敬佩的。

见识特大雪崩

从波密县城乘车前往墨脱方向的嘎隆拉山口，是我们这支科学探险队的考察计划之一，也是我神往的地方。

考察前查找的资料告诉我，嘎隆拉位于波密的西南方向，风光异常秀美。以往的科考工作者在其南坡4200米处呈建立过营地。此地有三个湖，湖水清澈透亮，犹如嵌在碧绿草甸上的三面明镜。山风吹来，碧波荡漾，映

入湖中的四周的雪峰倒影交相错动，恍恍迷离，美得醉人。

嘎隆拉山海拔 4000 多米，受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影响，降水十分充裕。4000 米下，森林密布。一棵棵冷杉、铁杉拔地而起，一般高达 30~40 米，参天入云，颇有气势。密密层层的阔叶树生长在海拔较低的地方，树下绿草如茵。还有好多千姿百态的蘑菇，吸引的考察队员将其一一摄入镜头。这片人烟稀少的原始森林并不寂寞：美丽的草鸡、活泼的松鼠、调皮的猴子、憨憨的小熊猫、笨拙的大熊猫等珍禽异兽出没林间，带来无限生机。再眺望远方，更有那飞流于陡峭悬崖上的瀑布，响声隆隆，水气腾腾，平添一份娇人的美。

几回回梦里神游嘎隆拉山，想到梦想马上就要成为现实，我异常兴奋。4 月 1 日早晨，队友们为赴嘎隆拉山口做准备。那儿海拔不低，仍覆有厚厚的积雪，队里要求队员穿得厚实些。此前我们曾翻过海拔近 5000 米的米拉山口和海拔 4600 多米的色齐拉山口，山上白雪皑皑，寒气逼人，山下春花怒放，暖意融融，形成强烈的反差。可以想象嘎隆拉山同波密城的景观对比也不会例外。

出发了，棉衣裹身的笨重的我们，纷纷把自己塞进车子。车驶出波密县城后，但见西面云雾缭绕，山峰若隐若现，宛如飘渺仙境。只有仰望才能见到的波密城北的高山，山腰间也飘着白纱般的浮云。记者杜泽泉被其美色所吸引，说什么也要下车不随队前行了，愣是一个人留下来拍摄这美景奇观。不过，他以前去过嘎隆拉，领略过那儿宜人的风光。不去，也不会有什么遗憾。不过也反映出，多次进藏的他波密云雾山峰如此留恋，可见这种美景是多么的不寻常。我们也跳下车来，抓紧时间拍了几张。

拍完照后，继续前行。意想不到的，探险队车队顺着城南的盘山路行不过 5 公里，前方队员通过对讲机报告：“遇到雪崩，不能再前进，请往回撤，请往回撤。”

为什么要往回撤呢？这次雪崩大概同色齐拉山发生的雪崩一样，不会对我们前往嘎隆拉山口构成太大的障碍吧？大家都这么说。

待下车走过长达 50 多米的弯道，来到雪崩带前，才发现色齐拉山雪崩与此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

“吓人得很哟！”队里的一位台湾队员面对雪崩现场惊叫着。这场特大雪崩的确惊心动魄，大量的积雪顺着略为弯曲的沟坡泻下，形成一条 1500 多米长、100 多米宽的雪崩带，而这 1500 多米长还是我们能看见的，因为雪崩滑道有一个弯，弯上的雪崩带还有多长，我就不得而知了。只见带内的森林、灌木丛，被崩雪扫得精光，整个场面形同刚刚修整过的高山滑雪场。我以前到过黑龙江省的亚布力高山滑雪场，我觉得我的这个比喻是贴切的。

还有，我们的车轮本来就要碾过的坚实的砂石道路，连同路基都被崩雪“清扫”得无影无踪，被“轧断”的两端路头遥遥相对。

对雪崩吞没一切的威力我早有耳闻。1990 年 1 月 3 日，中日联合登山队赴云南，准备登梅里雪峰时，由于随队的一位日本气象学博士缺乏实际经验，造成预报错误，结果使视 17 位中日两国队员葬身于冰雪之中。直到 1998 年 7 月 18 日，云南省德钦县村民才在明永冰川海拔约 4000 米处，发现部分登山队员的遗体。

我初次见到这特大雪崩，很是胆寒。尤其让我吃惊和畏惧的是，雪崩带两侧边缘部分产存的林木与灌木丛被暴风雪催倒折断后，皮又被剥得光光

的，一丛丛、一丛，只剩下白条条。若非亲眼所见，我真的有点难以相信，也绝对想象不到。我分析，灌木丛被撻成白条条，很可能是巨大的是雪崩体从高山飞速滚落时，产生的强烈冲击波所致，枝条的完整性表明这一点。试想，如果是人处在雪崩带的边缘，那该是怎样一副惨象呢？很可能是人被气浪猛地推到一棵倒地的树杈处，然后，强大的冲击波将人的皮肉、脏器一扫而光，吹向谷底，仅有几根枯骨卡在树杈是。研究已人员就曾对雪崩风产生的冲击力过计算，认为每平方米可达 50 吨。以这样大的力量，坚固的桥，重重的车，均可被摧毁和掀翻。这样一想，让我心里更是震颤不已。

为了把这特大雪崩的现场永久地留在胶片上，我走上顺坡泻下的堆满积雪的雪崩带。

又是一惊，这雪堆就像硬硬的冰。未踏上雪崩带以前，我以为带内的积雪是松软的，踩上去会陷到膝部。原来，同样是冲击波的力量，以重力加速度的垂落，垒实了积雪。看看这强大的势不可挡的自然力造成的破坏，我思绪如潮，不由得又想起在南极遭遇的那次差点要了我的命的特大冰崩，更是动天地，惊鬼神。

1989 年 1 月 14 日“深夜”(南极极昼期间)，中国首次东南极考察队所乘坐的“极地”号船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距陆岸约 400 米的地方，抛下了沉重的铁锚。抛锚点的景观是壮美的，一座座冰山巍然耸立，侧映在海中，如同水晶一样亮丽；白莲花般的浮冰，宛若蓝天飘浮的朵朵白云。南极毫不吝惜的展现出它的风姿。考察队员们纷纷拿起相机，拍下着难忘的一刻。谁也没有想到，南极考察史上闻所未闻的特大冰崩就要在两个小时后来临了。

1 月 15 日凌晨，像往常那样，魏文良船长去察看锚链抛下的情况。就在他趴在船头向下观望的时候，忽然发现海中的浮冰在激烈地翻动，有的互相撞击着，有的荡着海水哗哗作响，锚链在吃紧。抬头远望，见左舷的冰山在微动，零星的冰块纷纷崩落。魏文良意识到严重的冰崩在即，赶紧从船头跑向指挥舱。广播中马上传出他的指令：“紧急备车，起锚人员就位起锚，所有成员就位应急。”

锚起了。考察船主机又隆隆地想起来。也就在这个时候，船左舷附近的几座高耸的冰山发生了崩塌，扎进海中后，激起的海浪有十多米高。然后，冰块像泥石流一样向考察船倾泻而来。冰崩的冲击波瞬间传递到近岸，把吉普车大小的冰丘也抛到岸上。“极地”号船在剧烈的抖动、挣扎，它受冰块的撞击和挤压，发出“嘎吱”、“嘎吱”的悲鸣声。

幸亏船长下了及时而有效的指令，否则，船不起锚，主机不开动，考察船只能被动地受到滚来的冰块的撞击。考察船的前方是岩崖，后面是基本被崩塌的冰山阻断，右舷是浅滩，它只能在 300 多米的距离内来回“拉锯”。没有塌下的冰山，如同航空母舰一样在船左后方深海做快速移动。第一次冰塌过后，大的冰塌又相继两次出现。考察船从此被浮冰死死钳住，远远望去，它仿佛不是浮在大海之中，而是托架在坚冰之上。

也许是上天有眼，考察等被困一个星期之后，1 月 21 出现了新的转机。阻挡考察船退路的冰山不知是什么原因，突然裂开了豁头，给考察船让出了一条生路，考察队总指挥陈德鸿、船长魏文良发现后，赶紧登上直升机前往观察，认为冰山拉开的豁口距离，已适合考察船突围。于是，“极地”号船掉转船头，顶开重重浮冰，回到浮冰较少的海域。

这次颇传奇色彩的突围，被队友们戏称为“胜利大逃亡”。

向往已久的嘎隆拉山已成为心中的遗憾，特大雪崩又向我展现了大自然让人畏惧的景观。上天是公平的，在让你失去一些的同时，总会赐予一些。这个补偿是有意义的，从此，“雪崩”二字在我脑海中，不再是两个简单的方块字，而是有了亲历的实感，以及有兴趣从更深度和更广度了解它发生的原因和对策。

何日轻车到墨脱

墨脱，这个地处西藏东南部的边陲小镇，地势险峻，环境优美，只是因为交通极其不便，才素有“高原孤岛”之称。它是我国两千多个县中最后一个没有通车的“处女地”。

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生活空间，大大减少甚至阻隔了墨脱与外围世界的联系。

外边的人想进去，除了借直升机偶尔飞进的机会，进入“孤岛”一趟，再就是靠徒步跋涉。然而路之狭窄陡峭，稍不留神即坠入深渊；再加上沿途人烟稀少，行迹寥寥，各种毒蛇怪兽出没无常，更是令行人苦不堪言。对于车辆而言，要想进入墨脱简直是难于上青天。用“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难攀援”来形容也不为过。

由于缺少与现代文明的联系，使墨脱人经常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不可能像北京人、上海人、广州人、西安人那样，了解瞬息万变的世界。有些消息，或者说有些新鲜事，如远程诊断、GPS 定位等，在他们听来不亚于海外奇谈，似乎是发生在另外一个星系的事，令人费解。

交通的不便也造成了当地物资奇缺匮乏，老百姓生活的清苦。每家一些必备的生产和生活用品，多是由男子汉们，把家里的农畜产品背到外边换了钱，买些回来，以保证生活的需要。这样一趟趟来回折腾，风餐露宿，爬山涉石，没有好的体力是难以承受的。

因而，墨脱姑娘找对象似乎有一个亘古不变的条件：必须是身强力壮，且善走山路的小伙子。为了生活，墨脱人要常年走路爬山。过度的行走，使得很多人的脚变了形。唯有迈开双腿，才能与外围世界是沟通，就连这个县的显要人物也是如此。曾经有个全国人大代表赴北京开会，在会前的一个月他就出发了。由于大雪封山，道路艰难险阻，他只能绕道行走，结果花了 14 天才走出墨脱县境。可以断定，在偌大的中华大地上，再也找不到需要花 14 天时间才能走出县境的地方。

以前听从墨脱回来的人说，墨脱县机关所在地无所谓街道，与其说这是一个县城，不如说是个村庄。县城只有为数不多的居民住宅，就连县委机关的几排平房也是建在荒山野岭之中。在县城里，看到的报纸往往是隔年隔月的。同时也找不到营业性的旅馆饭馆，买不到香皂、卫生纸等生活用品。墨脱县的机关人员了解外部世界，比如克林顿访华、世界杯足球赛等，靠的是几台电视机，这还是在县里办起小水电之后。

交通的闭塞也造成了墨脱县文盲比例过高。据统计，到 70 年代末，全

县识字人口比例尚不足 10%，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是寥若星辰。绝大多数人一辈子没有走出过墨脱县境，更不知西藏以外的广阔天地。

如此落后的交通条件窒息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内地经济腾飞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形成明显对比。显然，不解决墨脱的交通，不利于实现祖国共同富裕和共同繁荣的目标。建国几十年来，我国经济文化水平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各地靠修路致富，靠修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结果到头来有一个县仍未通邮通车，不能不说这是我们国党和政府的一大心病。还应看到，没有公路与墨脱相通，不仅现代文明输不进，同时，墨脱丰富的自然资源和雄奇瑰丽的自然景观也得不到开发利用，当然也影响国防建设。因此，修筑墨脱公路，在西藏，以至在全国，一度也成为大事。

可以说，从 60 年代开始，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就一直为修筑墨脱公路做出努力。他们反复勘探，寻找通往墨脱的公路线位，并确定这条公路以波密县城的扎木镇为起始点。

在西藏自治区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共同努力下，计划整个波墨公路分两期施工，第一期从 1975 至 1979 年，第二期从 1989 年至 1993 年。

总算取得重大进展，到 1989 年，波密——墨脱公路已从波密县城延伸到前往墨脱方向的 80 公里处，并在这 80 公里处建立了物质转运站。有了这段路，墨脱县所需物资先由汽车从波密县扎木镇运抵转运站，再由民工运至墨脱县城，由此大大缩短了人背畜驮的距离。据计算，波墨公路以波密县的扎木镇为起程点，到墨脱县城，长为 140 多公里。转运站的出现，意味着用人力和畜力，将物资运到目的地还有 60 多公里。可千万别小看这已通的 80 公里的路程，它使得每公斤物资的运费从 16 元降至 2.4 元，开通 5 年间共节约运费 2700 余万元。并由此结束了政府组织林芝、波密、米林、工布江达、郎县上千民工和 2000 多匹骡马为墨脱县军民运送物资的历史。也改变了县长批条子才能买蜡烛、白酒、胶鞋等生活用品的惯例。如果波墨公路全线贯通，必然会在物资运输上节约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带来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

1989 年，中共墨脱县委书记坚争再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修建墨脱公路的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决心克服艰难险阻加紧实施这一工程。

在以往筑路的基础上，我筑路员工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又在 108 公里路成功建造了达国桥和在 134 公里处建造了西姆龙桥，只得墨脱公路全线基本贯通。试通车阶段，也就是 1993 年 9 月以后，有 3 辆车先后开进墨脱县城并运进物资，这在中国的公路史上是个了不起的突破。汽车驶进墨脱，县城附近的居民奔走相告，上到至耄耋老者，下至三岁顽童，如同过一个盛大的节日一般眉开眼笑。他们扶老携幼围观着这对他们而言并不亚于天外来客的庞然大物，看也看不够。他们也许在想，这东西不用吃草吃料，只消灌一下水那样的东西就可以隆隆地开动，简直太神奇了。有的人又惊又喜，用手摸着汽车，老泪纵横地跪倒在汽车旁，双手合十，念念有词，庆幸墨脱从此有了幸福路。波墨公路通车典礼是 1994 年 2 月举行的。交通部为此发了贺电。当时一些报纸纷纷以“汽车开进墨脱，我国大陆实现县县通公路”。“汽车开进墨脱，我国县县通了公路”。“高原孤岛传喜讯，无路墨脱今有路”等为题，作了报道。墨脱人更是大发感慨：“只有共产党才能把公路修到墨脱！”“修通了墨脱公路，是墨脱各族人民的第二次解放，标志着墨脱县生产力发

展将进入一个新时期！”由此可见，波墨公路的初通，不仅在我国公路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加强民族团结，繁荣边疆经济，巩固国防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外人哪里知道，为了修通这条路，先后耗资 3000 多万元，数十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因工致伤者上百人。然而好景不长，这条公路的寿命并未如人所愿，也没能继续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确切的说，公路只通行了一段时间便宣告失败。在宣布通车的当年，雪崩、泥石流、塌方等各种自然灾害频频袭来，极其严重的毁坏了公路。别说车辆，就是行人也举步维艰，波墨公路也由此名存实亡。

宣告波墨公路通车的当年 9 月，有位记者乘车从波密支墨脱，沿途公路凹凸不平，汽车盘旋在陡峭的嘎隆拉雪山，挨着悬崖缓缓行进，短短 50 公里内，直上直下落差就在 1500 米开外。据他说，当车行至 68 公里处，车轮陷入大坑，几乎翻倒，幸好旁边有大树挡住，否则小命休矣。他共乘车行 70 公里路，竟走了 8 个小时，可见路况之差。由于不堪如此折磨，剩下的 8 公里路他干脆下车步行，免受颠簸之苦。

这次，我们科学探险队也登上被毁的波墨公路，试图从波密县城到嘎隆拉山口。根据老队员的预测，从波密县城到嘎隆拉山口这段路，公路还是可以通行的。可是，我们行不到 5 公里，即被眼前的雪崩带所阻挡，公路被拦腰截断，去嘎隆拉山口的计划由此告吹。据科学家说，此处地质构造复杂，活动剧烈频繁，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发生雪崩、滑坡、泥石流。80 公里处的物资转运站现在也难以派上用场，墨脱又恢复历史落后局面。

不知何日才能轻车进墨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墨脱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交通极为困难的条件下，靠人背肩抬，把发电机运至墨脱县，并建设了一个有 28 千瓦的小水电站，结束了全县夜晚一片漆黑的历史。还于 1994 年，一度结束了不通车的历史。全县居民的收入有了一定幅度的提高。尽管如此，比起内地的一些县市来说，墨脱仍是极端闭塞，极端落后的，离现代文明相当遥远，这一切源于落后的交通条件。

墨脱作为“高原孤岛”，近斯内是难以摆脱这一局面的。这是由波——墨

公路屡屡被自然灾害所阻断，徒步前往墨脱又受季节限制，只能在夏季进行决

定的。针对这一问题，不屈从于大自然安排的人们，又进行新的探索，开辟前

往墨脱的空中航线。

将军飞越大峡谷

二战期间，由于日军攻占了中缅公路南端的腊戍，使得盟军支援中国抗战的最后陆路通道被切断。于是，美军被迫开辟了西起印度阿萨姆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高黎贡山、横断山脉直至我国云南高原和四川的“驼峰航线”。

航线开辟之初，美军损失惨重。据美国官方公布：“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损失飞机 468 架，平均每月达 13 架；牺牲、失踪飞行人员和机组人员共计 1579 人。”而这些飞机的毁坏及飞行员的牺牲，多是非战斗性，主要是航线本身就存在危险。

没了战争，“驼峰航线”也随之消失。但乘飞机飞往西藏的人都知道，至今，从四川成都飞往西藏贡嘎机场的航线，也不是全天候的。一般都是飞机早上成都起飞，民航的、军航的班机均在 9 时左右降落在雅鲁藏布江畔的贡嘎机场。10 时前，这些飞机又载上旅客纷纷飞返四川成都。此后的贡嘎机场空荡荡的，机场里一架飞机也没有。由于赶乘飞机和飞行的时间全卡在上午，进藏与出藏的旅客谁都甭想早上能睡个好觉，均摸着黑急匆匆的往望机场赶。也有起个大早，因为车辆故障赶个“晚集”的，那只能望着腾空而去的飞机干着急。特别是从拉萨到贡嘎机场，路上车辆行驶的时间，约需近两个小时，其中的不便，在国内是少见的。难道不能像国内其他空港那样，把进藏与出藏的时间改一改吗？我在进藏乘坐的飞机上，同机组人员聊天时，曾问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是，为了旅客的安全，不能改。原来，在青藏高原上空，一般上午气流相对稳定性，有利于飞行，过了中午，就远非如此。我们的探险队中，也有个别队员做过下午才从贡嘎机场起飞的飞机，那是因为出了故障不能及时飞行的航班。他说，确实不能同上午飞行相比，飞机颠得格外厉害，好像总被空气涡流所左右。

我没有就青藏高原上空的空气动力学问题请教过专家，因此说不出这个高原的上空，上午气流与下午气流的差异、以及下午气流是如何影响飞机飞行的。但是从直感上，乘飞机在内地飞行，机下多是七八千米高的净空。而飞越青藏高原赴西藏，那一座座冰山雪岭，就在飞机的腹下。以至队友中，一些对冰川学略知一二的专家，有充分的时间对我们实施“现场教学”，告诉我们什么地方是粒雪盆，为什么冰山的脊部如同朝天的利刃。我想，到了下午，青藏高原上空气流恶化，同这些奇高的雪峰有着密切的关系。有的文章就作过这样的描述：“由于青藏高原地形复杂，海拔高，气流量大，风速每小时可达 90 公里，一秒钟可把飞机吹走 25 米，飞机犹如炒菜般地摇动。”我们可把这视为极而言之，但肯定是影响飞机飞行的重要因素。

由此不能想象，二战时，美国为打击日本法西斯强盗开辟“驼峰航线”后损失那么多飞机和飞行员，同没有掌握青藏高原上空气流规律密切相关。就是高新技术广泛应用的今天，在青藏高原上空飞行，也同样受到限制，入藏与出藏航班的飞行状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墨脱与世隔绝的状况是严重的，不仅限制了普通群众与外界的交流，同时也给我们的解放军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大雪一封山，每年要有长达六七个月的时间，不能与外界往来。1993 年 9 月，从邮局送到墨脱部队的信件，有 716 封，其中 204 封是 1992 年寄出的。

耐人寻味的是信件中有 210 封还是快件。都说家书抵万金，而在墨脱，迟迟收不到书信的解放军指战员，由于信件的耽误，不仅失却了应有的价值，还铸就了一个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据说，成都市某医院一位护士的恋人在墨脱服役，她除了第一个月收到男朋友在林芝新兵集训时发出的一封情意缠绵的信外，以后三年再也没有见到片方只语，生死未卜。她为此发“寻人启事”，仍杳无音信，无奈，她只好另择高枝。诸如此类，绝非天方夜谭，故弄玄虚。

鉴于此，牵动了成都军区张志坚政委的心，他决心不论交通如何不便，

一定要去看看卫国戍边的墨脱官兵。1994年9月5日13时30分，张志坚政委和军区司政后机关部分干部，以及西藏军区副政委邱建等一行数人，分乘两架直升飞机起飞，沿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进入墨脱。从此，他们成为我军第一批飞越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将校。

据当事人说，他们的起飞点和降落点，正好途径雅鲁藏布江峡谷最惊心动魄的250公里的地段。直升机刚起飞时，扶摇直上，像雄鹰展翅，顺着V形山势忽而穿云破雾，平衡中略带飘逸；忽而像一叶扁舟，胜券在握地挺进在大峡谷的空域里。飞到大峡谷最狭窄处，机上人员感到，两边的山峰似乎伸手可及，直升机仿佛从两山的缝隙之间呼啸而过。

再放眼前望，雅鲁藏布江像一把利剑把大山一分为二，两侧高耸陡峭的山崖与奔腾呼啸的滔滔江水，形成让人难以忘记的立体画面。继续前飞，不知不觉之间，山势开始变低，前方豁然开朗。最终，直升机平稳地驶出神秘的大峡谷，安全抵达墨脱县城。

将军们安全地从世界第一大峡谷飞行到墨脱，表明大峡谷中强烈的山谷风以及地貌的复杂性，并没有阻碍直升机从这条航线飞往墨脱。如果墨脱有应急的需要，大峡谷不失为一条进出墨脱的空中走廊。

几十年前，“驼峰航线”上飞机屡屡坠落的事实证明，在西藏开辟，然后使用一条航线，这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我又了解到，早在1985年，我国科学家徐凤翔就曾乘直升飞机飞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前往墨脱。据她说，在直升飞机上饱览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拐弯的雄姿，遍坡醉人的绿色，此生一定要在“大拐弯”考察的打算，就是在此时萌发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该是多么富有魅力，一位科学家从它空中掠过，竟决意为揭示其中的科学奥秘而献身！

看来，大峡谷航线早在1985年就开辟了。峡谷飞行，有它的危险性，如撞上山崖、遇上强烈的山谷风等。但对比而言，也许要比从派启程，再拔高4000多米飞过多雄拉山要安全些。过去，就有两架直升飞机在这条航线航行时坠落过。

我不知道我军都有哪些飞行员勇敢地飞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或多雄拉山前赴墨脱。

只是从一些期刊报道中，晓得有一位叫扎西泽仁的飞行员，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飞行过。

他属于成都军区航空兵某部。为开辟飞往墨脱的航线，他的几位战友壮烈牺牲。

近闻，今年秋季，又有另外一支探险队，将使用热气球飘飞世界第一大峡谷。这个热气球直径10米，可以载重2吨。乘员共5人，他们准备一次共同升空，计划用二至三天时间完成穿越峡谷的飞行。我衷心地祝愿他们飘飞成功，在我们四人所发现的世界第一大峡谷里，开创新的探险纪录。但是，我怀疑他们能够取得成功。常识告诉我们，热气球属于无动力飞行装置，面对大峡谷的弯弯曲曲，什么样的风向才能使它顺利飘飞呢？风有自己的流向，断不会出现热气球乘员想象它该怎么拐，它就怎么拐的情况发生。

魂归美利坚

为了解我军将校 1994 年 9 月首次飞越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情况，我发现一份全国性大报和某期刊上，均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错误，即作者把 1993 年在波密县发现美军飞机残骸的地方弄错了，本来是易贡乡，均写成米贡乡。其中一篇还描述道：“从飞机的急速转向拐弯上，就感到大峡谷的‘马蹄形’拐弯处已经到达，正前方的几十公里处，是一个我实在不愿说出的地名：波密县的米贡乡。那里的山谷间，曾发生过美国政府和人民震惊的大事件。”按作者所云，美军飞机坠落地在大峡谷附近。恰好我手头有一幅 1997 年 6 月出版的 1:7 万大比例尺地图——《西藏自治区林芝地区地图》。地图上标明，从地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拐弯的扎曲村开始，下游沿江只有甘登乡、加拉莎乡、唐辛乡、达木珞巴民族乡。后来，我又向工作在西藏的朋友伍皓了解，他说他专门了解过美军飞机残骸在波密被发现一事，其地点不是在米贡，而是在易贡。我们这支科学探险队驱车去过易贡，它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拐弯，直线距离约有 70 公里，处于大峡谷的正北方。

乘直升飞机沿大峡谷飞行，不存在它在“正前方”的方位。

接着，伍皓就易贡乡乡民怎样发现在二战期间，从“驼峰航线”上坠落的这架飞机的过程，向我作了介绍。

意外的发现

易贡乡是西藏波密县的一个乡，这里丛林密布，人烟稀少，是中国第二大林区的腹地。

1993 年 9 月，深秋再一次降临到易贡的茫茫林海，林中出没着成群的野兽和珍禽。狩猎季节又来临了。

一天，易贡乡的村民次仁桑珠、西绕群培、罗松、索巴和白玛郎加 5 人结伴，带足了食品，背起长枪，挎起弓箭，进山打猎。

9 月 17 日，猎人们来到绕果笼山沟若果冰川附近。若果冰川与恰青冰川和则普冰川临近。若果冰川又与南方的南迦巴瓦峰遥遥相对。他们登上若果冰川中部的小山包，上面乱石密布。突然，一个令人震惊的画面映入猎人们的眼帘，只见在这片乱石包上，到处散布着破碎的飞机残片和尸骨。他们迟疑了片刻，又在这方圆百里的地点巡视许久，然后，开始各自搜寻起认为对自己有用的东西。西绕群培从一堆尸骨旁拣了一把折叠刀、一节链节和钢丝；罗松在另一堆尸骨旁拣了一把已没有扩木的长枪；索巴找到了一个带拉链的皮包，里面有印度币 210 卢比和一张用丝绸印制的地图，因为地图上全是英文，认为没有什么用处，他把它放在原处，没有带走。次仁桑珠则在离一堆尸骨 15 米的地方找到了一只手枪，拉出弹匣，里面还装有 7 粒子弹。

接着，他们又拣了些钢丝绳、降落伞绳、氧气筒、滑轮、帆布带、纱布等物品。之后，就立即往回赶。这些山民深知，他们所看到的场面，肯定是一场灾祸，应该报告给领导。回到乡里后，他们马上向乡长包告了这件事，把手枪交给了乡领导。

9 月 24 日，乡里又派员带着这支手枪到波密县公安局报了案。

从此，这个在大山里默默隐藏了 50 年的悲剧被人们发现。

急赴现场

易贡乡的干部，波密县的领导，从山民所拣到的物品及其对现场的描述，不难做出认定：这是一起多年前发生的飞机坠毁灾难。那么，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一架飞机的残骸会这么多年不被人发现呢？这要从若果冰川的地形说起。若果冰川东靠姆沙烈山，西临绒庆扎山，四周高山林立，冰川重重，十分偏僻，荒无人烟，就是当地的猎人也很少到这里来打猎。在乱石之下，是常年不化的冰川，而每年 11 月到次年的 5 月，大部分山体还要被冰雪覆盖。

飞机残骸被猎人们偶然发现的信息很快反馈到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他们一面派人赶赴现场，一面把情况通报给西藏军区，请求军方的支持，共同派人对现场进行全面搜索和核查。

10 天后的 9 月 27 日，西藏军区接到有关通知后，连夜电令林芝军分区派人配合行动。

28 日凌晨，林芝军分区参谋长率领 4 名机关干部和 20 名特务连战士驱车赶往飞机坠毁现场。

当晚 10 时 30 分，他们抵达波密县易贡乡，与先期到达的自治区公安厅、地区公安处和县公安局的干警会合。这段本来 6 小时就可以走完的路，他们整整走了一天，主要受阻于塌方。当天晚上，军地双方组成联合调查组。

29 日，联合调查组没有急于上山，而是分赴村庄，向发现飞机残骸的人们了解详情。

同时请了 30 多位民兵和民工，约定次日一起登若果冰川，实施行动方案。

30 日，他们从易贡乡政府出发，沿着密林中的狩猎小道，攀悬崖，过绝壁，涉冰河，钻荆棘，整整走了 3 天，10 月 2 日下午，终于来到了通往若果冰川的山脚下。

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整，第二天一早，他们开始向若果冰川进发，中午 11 点 30 分，调查组抵达飞机坠毁现场，这里海拔 4100 米。

巨大的收获

在现场，大家按照事先商定的分工，进行了详细严密的搜索。发现飞机残骸散落在一个长约 300 米，宽约 100 米的范围内，各种残留物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几位猎人所报告的情况。

飞机的主要部分依然能辨认出来，其中有只剩下线路和破碎仪表的机头，两只机翼，上面还涂有蓝底白色五角星的美国空军军徽，14 四缸发动机 4 个，直径 1.4 米的轮胎 6 个，其中还有一个形状完好。此外还有起落架 3 个，氧气筒 8 个，机用发报机 1 台，涡轮 1 个，螺旋桨叶片 3 个。

与飞行有关的物品更多。那张被猎人丢掉的丝质地图是美军驻德赫兰办事处制的双面图，一面绘着缅甸南部的掸邦地貌，一面是缅甸北部，包括云南的昆明和大理地区的地貌。有飞机送修存根一张，上面写着“将此存根送俄亥俄帕特尔逊野战部空军维修服务部预算处”，时间是“1943 年 7 月 24 日”。有一张碎纸片，上写“空军作战部 8-A 令”，内容为“试飞时间 1943 年 11 月 24 日，执行官詹姆斯·汉姆上尉”。有一张写着中文的“美国人来

华助战”的碎纸片。还有一张飞行纪录碎纸片，在通信检查情况栏中有铅笔书写的“灵敏”二字。引人注意的还有一块铝片，上面用金属笔手写着“滤波器损坏”字样。

此外，还有一些个人用品。有一个标有“US”字样的军用水壶。有一个蓝底白色五角星的美国空军佩章，上面加缀了两个黄色的鹰。有住宿收据一张，上有“印度加尔各答庄园旅馆”字样。伙食收据5张，标明是第二十二运输大队第七十七运输中队，还有伙食管理军官的签名。中华民国纸币一张，票面呈红色，上面仍能辨认“中、行、拾”字样。有小说两本，一本是《无名小卒》，一本是《北方之北》。有一支绿色的左手用的皮手套。另外，还有些钱包、打火机、梳子、小刀、创口贴等生活小用品。

三具世纪之中有一具较为完整，拼凑起来的尸长为2.1米，另外两具尸体，各呈一堆，难以辨认。

调查人员将这些东西认真地分装包好，带回了设在若果冰川脚下的宿营地。出于慎重考虑，他们未将尸体带回，只由法医提取了几块尸骨回去进行化验。有关人员回到林之后，军分区立即向西藏军区作了汇报，军区指示马上将全部尸体运回。于是，林芝分区又派出7名战士返回易贡，赶往现场，将尸体运出大山。

初步结论

经过军地双方召开联席会议，对现场勘查情况和提取的物证进行了认真分析，认定这是一架由美国制造并由美军驾驶的军用运输机。因为他们发现的飞机零部件全是美国制造的，且大部分由芝加哥怀特 KMFC 有限公司制造。飞机上的蓝底白色五角星机徽，美国空军至今仍在用。已发现的枪支、水壶均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军战时装备。

研究人员还进一步推断出，飞机是1943年援华助战时在执行试飞任务时途中失事的。

二战时期，中美曾作为盟国共同抗击过日本法西斯强盗。在中印缅战区，美国空运总队曾开辟过被称为“驼峰”的喜马拉雅航线，后背统称为“驼峰航线”，频发事故，估计这架失事飞机与此有关。其佐证是飞行员佩戴的标志为蓝底白字五角星上方两只老鹰，是二战时期美国援华飞鹰队的专用标志。而那张用中文书写的纸条“美国人来华助战”，显然是为防备飞行员跳伞时因语言不通造成误解而设计的。那张旅馆收据和飞行员随身带的印中两国货币，则说明飞机是从印度起飞到中国执行试飞任务，或开辟从成都——西藏——印度的航线。

失事的原因初步判断为油料不足或机械故障。因为那块铝片上“滤波器故障”几个字估计是飞行员在飞机坠毁前写下的遗言。

三位飞行员中可以大致判断出两位的名字，一个是此次飞行的执行军官詹姆斯·汉姆上尉，另一个是皮尔少尉。这是调查人员从伙食收据签名上查证的。

发现震动美国

1993年11月4日，正在华盛顿访问的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向美国副国务卿塔塔夫正式通报了这件事。这则简短的新闻一经播出，顿时震动了

美国，也震动了所有对二战记忆犹存的人们。

当塔塔夫从刘华秋手中接过有关失事飞机的照片和录像时，这位副国务卿显然有些激动，他连声说：“谢谢！谢谢！”并说，此事对美国政府和死者家属都极为重要的。

11月5日，当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会见刘华秋时，再一次就此事向中国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说美国政府希望与中国政府继续就此事保持接触和磋商。

12月5日，由美国陆军“中央甄别实验室”主任威廉·乔丹上校率领的专家小组一行到达北京，在中方人员的陪同下，7日抵达拉萨。下午，他们同西藏有关方面举行了会谈，并对飞机残骸和尸骨进行了必要的技术鉴定，断定50年前坠毁的这架飞机是美国制造的军用运输机，机上三名飞行员都是美国人。威廉·乔丹充满深情地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52年前的今天，美国对日宣战，正式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52年后的今天，在中国西藏看到我们的反法西斯英雄的遗骸，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他说，“相信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大力帮助和支持下，英雄的遗骨很快就会归还给他们的祖国和他们的亲属。”

魂归故里

12月11日，三具美国飞行员尸骨移交仪式在北京举行。新华社就此报道说，这天上午9时45分，中国有关方面在北京首都机场将不久前在西藏发现的三具美飞行员尸骨移交给美方。在场的美国军人神情庄严、目光凝重，寒风中，他们一次次向运送中的灵柩举手致敬。迈着沉稳的步伐，四名头戴橄榄绿船形帽、身穿黑色大衣的美国男女士兵，将停放在三辆面包车内的三具覆盖着星条旗的灵柩一一运送到一架灰色的美国空军飞机上。

中国外交部美国司司长马振岗在仪式上致词说，中国政府对在西藏发现美国飞机残骸和三具尸骨十分重视。经过中美双方的努力，三名飞行员的遗骨即将运返美国，安息在它们自己的国土上，“这是令人欣慰的。”

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也在讲话中感谢中国政府在处理遗骸问题上给予的合作，并称这一工作表明，“我们将继续铭记那些为让我们今天生活得更好、更安全而献身的人们。”

15分钟的移交仪式结束后，飞机隆隆的启动声划破了机场停机坪的宁静。长眠于驼峰达半个世纪的3名美国飞行员尸骨返航和美，即将安息在他们自己的国土。

江上试漂

时针悄悄的指到10点整，早已等候在拉月曲河口左岸多时的考察队员激动地行动起来，小心翼翼的把两个红色泡沫塑料放入水中。很快，泡沫塑料就像一支离弦的箭被江水卷得无影无踪。紧接着，两百多件大小不等的漂物被分成好几组按先后顺序也投入水中，顿时，江面上红星点点，若隐若现，

宛若一颗颗玛瑙石镶嵌在一条玉带中，又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盏盏航灯。

这是 1991 年 11 月 10 日上午科学考察队在帕隆藏布江进行的一项漂运模拟试验。参加这次试验的有科学考察队队长李渤生，副市长严征征，以及洪笑天等 10 名队员。试验的目的是试图从水路上解决墨脱这个“高原孤岛”的交通问题，为墨脱人民的经济发展作出努力。

解决交通难题，无疑，这是墨脱人民最大的梦想，然而由于恶劣的地理环境，却把他们与八一镇、与拉萨，如同银河般隔在两边。解放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密切的关注着墨脱的交通问题，并已投入了一定的资金和人力、物力，或修公路，或开辟大峡谷的飞行航线。这些，都取得一定的进展，但好景不长，这种状况并未得到有效维持，至少，陆路通行陷入了严重的瘫痪中，墨脱至今仍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为此，科学家们一直在坚持不懈的作出努力，探讨如何用更好的途径解决其交通落后的难题。

西藏素有“千山之祖，万水之源”的美称，众多的高山雪岭，孕育了众多的江河。

这里湖泊众多，河流纵横奔腾，水资源蕴藏相当丰富。仅百川汇一流的雅鲁藏布江，每秒最大的流量有时高达 1000 立方米，它咆哮着，以火车般的隆隆巨响奔腾下泄。整个大峡谷天然水能蕴藏量高达 6880 余万千瓦。如此高的水能蕴藏量，在中国及其他地方乃至全世界上都是极为少见的。但是，由于山高路远，这些水资源基本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就日夜奔腾流过高山，穿过森林，出了国境。再一想到我国西北干旱地区，水源严重缺乏，人畜饮水困难，特别在沙漠地区，更是滴水贵如油，而这里又清又急的江流就这样被白白浪费实在是太可惜。有些专家指出，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农业用水仅占 2%。这表明，有 98% 的水资源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发和利用。这利用量是何等的有限。

鉴于此，科学家们想借助舟楫之力，利用当地河流众多，水量丰富的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弥补陆路交通的不足。于是，便有了上文开头的那一幕。

科考队员从 1991 年 5 月 15 日开始，便着手进行试漂准备工作。他们选定的考察试漂路线北起川藏公路 144 道班旧址，沿帕隆藏布江末段谷地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北端，再沿大拐弯东段峡谷向南至八玉村。选择这个河段基于两点考虑，一从川藏公路取捷径至墨脱，二可避开河道最复杂，落差最大的大拐弯两段峡谷，因为此段河道弯多水急，河面流态复杂，不利于进行水上试验。

这次试漂的目的，旨在能直观地观察漂载体在沿途的运行情况，分析各段水道是否利于漂运物资流动，以求获得一些具体、真实的数据，为进一步实践做准备。在进行模拟训练之前，他们经过认真考察分析，最后把放漂点定在与帕隆藏布江交汇的拉月曲河口左岸。因为拉月曲水流以顺势的锐角汇入帕隆藏布江，漂载体可以顺势随着帕隆藏布江洪水流去，不易受边沿水流的影响而搁浅。还有一个条件可以利用，拉月曲河左岸有一块紧临着川藏公路的呈三角形的较大的卵石堆积面，正好可以作为试漂队存放物资的场地。

在漂载体材料的选择上，为了节约资金，考察队员对漂载体的形状、尺寸、材料的强度和比重等未做专门的工程设计和加工，而是选用既经济又实惠的民用 PE 塑料桶和泡沫塑料。为了更能一目了然的辨认和观察漂载体

在沿途的运行情况，他们在这些塑料桶和泡沫塑料涂上了一层酯酸红油漆作为标志。为避免在漂流过程中漂载体的口盖掉落，以及出于密封的需要，队员们还用胶粘剂和密封胶粘好它的口盖，以保证有一个理想的收费效率。

剩下的最后一步准备工作，便是怎样才能在地更好的接收试漂物体，即如何布设收漂拦网，防止试漂物体漏掉。为了给实际操作时提供一些实用的设计参数，科学家们事先在尼洋河一条支流上进行了两种方案的拦网模拟试验，一种是尼龙网收漂试验；二是导漂网收漂试验。尼龙网布设在便桥右端的两个桥墩之间，为避免水流冲斜尼龙网，他们在网底拴上四块重达4公斤的石头加以固定。尽管如此，尼龙网在水面上的网片经不住滚滚急流的猛泄，被江水冲成弧形。以至流水的冲力，把拴在网底的石头冲离河床面后，水下的网片也漂到水面上来。这样一来，尼龙网达不到拦网效果，漂体经过网片时，只稍微滞留了一下，队员们尚未来得及收标，漂体便从网底下溜走了。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科学家们只好又大尼龙网收漂点的上游50米处设导漂网。导漂网架在江心滩和右岸之间，与水流方向呈45度夹角。刚开始时，30米长的导漂网在流水的冲力下依然呈弧线，虽可拦住漂体，但无法迅速地把漂体导向岸边进行回收。最后，他们又在网片中间打入一个角铁桩，用拉绳在江心把它固定，铁丝网片的平面一分为二，靠近江心滩的左截，水动力小，网片依然成直线，而右半截，因主涨动力大，网片变成弧线。漂体进入左边，不但能拦截住，而且在水的作用下漂体会慢慢地导向岸边。实践出真知，他们终于摸到了有效的收漂的方法。

经过慎密的研究和准备之后，考察队终于于1991年10月10日上午10点在帕隆藏布江河段和雅鲁藏布江河段进行现场漂运模拟试验。共计216件大小不等的漂体被分成8组按顺序放入水中。为了观测漂体在各段水道的运行情况，从拉月曲河口至八玉村之间20.25公里的河段上，考察队设置了5个观测点，它们分别是岩房芳、玉米、门中、钢朗、八玉、每个观察点分别派两个人观测。

实验结果表明，雅鲁藏布江干流水道漂运要优于帕隆藏布江水道。帕隆藏布江水道达漂率为75~80%，有20%左右的漂体在漂运过程中流失。其原因主要如下：一是漏测，因为观测点离水面较远，不易看清目标。特别是水急浪大的河道，有时一个大浪打上去，漂体要在水面以下运行十几米，甚至几十米，再加上漂体体积太小很容易漏测。二是漂体破损沉没。因为漂体只是一般民用塑料桶和泡沫塑料，在雪水融化不久的低温水道中运行，遇冷容易变脆，最终因破损而沉没。这，可以从群众打捞的塑料桶作出科学的推测：有的是桶盖掉落，有的是把手破损，有的是压膜接缝处裂开。三是在途中搁浅滞留。

由于塑料桶体积小，易受风浪冲击力偏离主泓道，被推到岸边。四是老百姓打捞。当地老百姓出于自家使用，又熟悉水道，便提前在某个地点打捞。如仅在玉米出口处左岸大回流区就被老百姓捞走120多个漂体。上述原因，致使216个漂体到岩旁时还有166个，到玉米时只剩下4个，而到目的地八玉时，仅有1个。

这项实验有一定的超前性、开创性，有成功也有失败，试验获得了一定的数据资料，对以后继续从事这一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遗憾的是由于经费等各种原因，这项试验没有继续开展下去。

与此同时，这些科技人员还探索了在雅鲁藏布江上使用气垫船通往墨

脱的可行性。

气垫船属于现代科技产物，它是依照地表面效应和空气推进原理制造的一种新型交通工具，它改变了常规船舶劈波斩浪的航行方式，具有更高的航行速度和通行能力。

据科学家们分析，墨脱地区山峰林立，谷深流急，强烈的地形起伏使地面通行难度相当大，而气垫船恰恰具备了这方面的特性。首先，它具有优越的快速性能，能大幅度的提高航行速度；其次，它具有独特的两栖性能，既能在水面上航行，又能在急流险滩、沼泽泥泞地带行驶；再次，它具有良好的通过性能，可跨越一定高度的垂直障碍物，能以一定的速度飞越一定宽度的壕沟，还能冲爬一定的斜坡和跳下一定的陡坎。因此，全垫式气垫船具备了很多水陆交通工具所无法比拟的特性。有着广泛的使用领域。

滔滔外泄的雅鲁藏布江水，提供了一条相对平坦的通报表面，可以为气垫船所用。

据科学家估计，如果真能推广使用气垫船，不但可以解决墨脱的交通难题，而且能够为它带来传统运输手段无法比拟的运输效益。

当然，科技人员发现，影响气垫船航行的因素还是存在的，水中礁石等障碍物是影响下垫面形态是否平整的主要原因，而它会对气垫船的航行构成影响甚至危害。因为气垫船是以液态和固态作为运行下垫面的，因此其接触面的形态对航行至关重要。在考察中发现，帕隆藏布江到雅鲁藏布江河段是典型的山区峡谷河道，河流落差大，有些地段有急流和翻滚的浪花，有时浪高1米以上。而这些地方往往会有障碍物存在，如明礁和暗礁，从而影响河面流态的平稳，造成船体不断颠簸动荡。有时水中障碍物还会形成跌水，高度若超出气垫船的越障爬坡能力，会十分不利于航行。

值得一提的是，在帕隆藏布江尾端到雅鲁藏布江的八玉之间的河段，尚未观察到明显的跌水和大浪区，因此气垫船在这个河段具有可行性。

另外，河道的宽窄对气垫船的航行速度也有一定的影响。在考察中发现，除个别河道岸边岩石突出使河道突然变窄外，其它河道的宽度足够气垫船畅通无阻。有些河道较为弯曲，致使气垫船难以达到全速，但仍可满足气垫船航行。

气象条件也是影响气垫船通航的一个因素。如风速、风向、气温、空气密度等。据实地观察，从印度洋吹来的暖湿气流向北关贯通大峡谷，风力明显大于山谷风，可使气垫船免受侧风的影响。而且这里的风速较小，对气垫船不构成明显的影响。再加上当地的气候温和湿润，不用担心冬季河水结冰，也不会造成发动机过热。

各种科学研究都表明，气垫船适合在大峡谷地区通行，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总有一天，高原孤岛不再是孤岛，现代科学技术一定会给它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使墨脱人民逐步走向富裕。

江山多娇在波密

藏东南是个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地方，而波密风光更是景中之景，

奇中之奇，所到之处，令我流连忘返。

波密，这名字给人的感觉极有诗意，颇具特色，意为祖宗、祖先的意思。波密县城正好处在川藏公路的枢纽位置，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县城虽小，但很繁华，居民你来我往熙熙攘攘，十分热闹。

那天上午，我们本打算去神交已久的嘎隆拉山，但由于雪崩阻隔，难以成人之美，只好原路返回。队员提议，应利用下午的时间，顺着川藏公路，往波密城东看看，以便多了解些当地的人文历史，地理地貌。征得队领导的同意，我们分头乘车欣然前往。车刚行至离县城不到两三公里处，停了下来，一台湾记者突然大叫一声：“哇，比阿尔卑斯山还美。”顺着他的视线，我们回眸一看，便被身后的景色深深的吸引住了。

只见县城后面的山川景物交相辉映，融而为一。一座座群山连绵起伏，苍翠欲滴；而山之高大，可谓高耸入云，直指蓝天。雪线以上，白雪皑皑，如同山舞银蛇，分外妖娆；雪线以下，草丰林茂，郁郁葱葱。而此时风和日丽，天空出奇的蓝，那白云朵朵，如各种形状的浮雕镶嵌在山顶上。蓝天下，真可谓万里浮云卷碧山。云山共长天一色。

我们脚下的沥青公路，从城中延伸而来，公路的左边是碧山，右侧是汨汨流淌的清澈的帕隆藏布江。为望地更远些，我们跳上路边的隔离墩，更令人感到人与大自然水乳交融，如同人在画中游，用陶渊明的话说是“此间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时候我们都深深陶醉在如此美景之，不知道谁说了一句：“该走了，无限风光在头。”的确，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有多少奇观异景还不被人们所知道，祖国风光如此多娇，远非只有五岳、黄山、桂林山水、长江三峡的名胜。

队员们恋恋不舍的上车往前行。不久，又被一处景观深深吸引住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几大片碧绿的麦苗，长势良好，麦田的四周，是牧民们用木板条、短木，以及树枝围成的栅栏。它由一块一块横陈的长长的条叠加在一起，依托的支撑物是每间隔一米多埋在土中的木桩，给人以轻松随意之感。看上去有些松散，我爬上试了试市，虽然身体摇晃不止，但决不会压倒栅栏。当地农民构筑它的目的，主要让它起到一种屏障作用，避免牲口践踏庄稼，保证农作物的生长。

我们看到，当地的牛、驴、猪等都是散养着的。连那一匹匹大马，也不用笼头束缚它。牲口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埋头吃草，或毫无目的的游荡，那份悠然自得，那份轻松惬意着实令人羡慕。我们见惯了大都市的喧嚣和纷杂，来到这恬美静穆的大自然，避俗虑，观流云，顾清影，看林泉，任眼睛多方享受绿益，足使胸怀宽广，振心奋志。

这粗犷简单的栅栏与当地散放牲畜的习惯相辅而成，一方面可以保护庄稼，号一方面又顺从了牲畜的无拘无束。由此，使我想起一件事。1992年，我们去塔克拉玛干沙漠探险，其中一支队伍登昆仑山赴克里雅河源头考察时，为探险队驮物资和兼用坐骑的毛驴由于不堪重荷，到了4000米以上的高度，也出现高原反应，气喘、吃力。为了赶路，队员们只好使劲地鞭打他们。随队的19头毛驴的屁股都会打出了血。有些高原反应强烈的毛驴，走着走着，就突然跪在地上，骑在驴背上的队员猝不及防，常常顺着驴头滚落下来，摔得鼻青脸肿，仰面朝天。此时人驴瞪眼相视，人不怨驴，驴也没了驴脾气，两者都无可奈何地躺在地上。此进的驴，不愿再挣扎站起来，它

似乎考虑好了，与工期其这样痛地的活着，让人无情的鞭打，不如与高山共眠。为了完成考察任务，队员们只好晕沉沉地爬起来，抱着驴的前体，驱赶它站起来。可想而知，波密一带饲养的大牲口与艰难地行走在昆仑山上崎岖小径上的毛驴相比，真是一群生在天堂里，一群活在地狱中。

我也看到，此地的马牛由于缺少羁绊和管束，根本就不怕人。常常是车子开着开着遇到一头牛横在路中央，连按风次喇叭，牛也不予理睬。一次，我们的扎西师傅又遇到这一情况，他只好耐心地等下去，谁知那头牛好像存心跟他较劲似的，瞪大两只眼望着他，根本就没有让路的意义。为了赶路，扎西只好转动方向盘绕行，车子差一点翻到阴沟里去。

最使我不解的是，这些散养洋的牲口，当地居民是怎么识别自家牲口的，而牲口们又如何像老马识途一样准确无误的回到各自主人家里？由于行车匆匆，我没有时间去向当地群众请教，这些，对我来说至今仍是一个谜。还有，这地方要是有偷盗现象，顺手牵羊，易如反掌。我带着这深深的疑虑去问我们的司机扎西，他告诉我，当地民风淳朴，从来不存在盗窃问题。当地居民对牲口的散养程度，有时让我感到吃惊。因为散养，我曾经碰到过一件险而又险的事。一次，我沿一条很狭窄的小径行走，路左边是悬崖，岸下即是奔腾本的江水，右边是较陡的山。拍照，使我不知不觉掉队了，这时，前边一头大黄牛迎面走来，然后又横满了只有一米多宽的路，看看牛尾后的陡崖，我根本没法过去。正沉思之际，突然发现后边又来了一头牛，也头部向着陡崖，横满了小路。

面对两头肥硕的牛，我不知该怎么办为好。驱赶它，怕惹怒了他，将我扫到崖下。

从牛尾部夺路而逃，又怕踩空落入崖下。更可怕的是，只要落崖，就会被江水卷走，考察队留给我的亲属以及我供职单位的知，只能是他失踪了。无奈，我只好蹲下，任两头大牛对我怎么处置。我觉得只要我不去招惹牛，牛就不会对我逞凶。约过了20多分钟，适值一个民工过来，把牛吆喝走了，才解了我的围。后来我才知道这一米之宽的小路，有十几公里长，牛被赶进小路后，在路的两端架起一米多高的木架阻止牛走出。行人则从搭成人家形的二根独木上翻过，如果不被人们点破，谁也猜不到这就是“牛圈”。以其长度，这个“牛圈”真可以纳入世界吉尼斯纪录。牛的生存，主要依靠路边丰美的野生植物。

当地淳朴的民风与其人文景观正相吻合，自由自在的马群、牛群、羊群，与古朴不加雕琢的栅栏，形成了一道回味无穷的风景区。而栅栏远处，更是风光无限。只见山脉绵延，群峰挺秀，其蜿蜒之状，灵异之处，处处使人沉醉。还有那山峰之巅，冰雪覆盖，云烟缭绕，有如天籁。加上此地桃花浪漫，香气扑鼻，“人间四月芳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诗句用在此处，真是恰如其分。房舍、雪线、田园、冰峰、雪岭构成一幅空灵恬淡的田园山水画。我想我要是画家，一定把这一人间胜景画下来，因为飞，它太值得我倾注心血。

接着我们又驱车向前，见一钢索吊桥悬在帕隆藏布江上，桥头的立架上标有三字“达兴桥”。伫立桥头，只见江的两岸青松挺立，清流见底的江水，蜿蜒缓缓向前，在净空的映衬下，隐隐地泛着微蓝。

“风光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队领导规定我们6点之前必须返回波密县城。看看天色已晚，我们只好恋恋不舍的赶回。我们的这些景色描绘给队领

导们听，他们直拍大腿，后悔错过了这个大好时光，一个劲地埋怨当领导太亏了。

波密风光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使我想起“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诗句。在祖国的大地上，竟有如此绝世美景，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骄傲，同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到波密去走一走，看一看，定会不虚此行。

易贡湖的悲哀

一直以为西藏是寒冷的，除了密布着冰峰雪岭外，便是无边的旷古荒原。当别人告诉我西藏易贡有着青青茶园时，我颇为吃惊。有人说易贡茶场是西藏唯一的茶场，有人说是西藏建起的第一个茶场，也有人说是世界海拔最高的茶场，众说纷纭，各执一端。

无论如何，易贡有茶场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参观过内地的许多茶场，私下很想去易贡，看看那儿的茶场是否和内地一样。

16日上午8时30分，我们从波密县城出发，往通麦方向赶。途经一小湖，水波不兴，湖面平静如镜，四周挺拔的冰山，投影水中，极为雅臻，颇有韵味，看扎西把车子开得飞快，不好请他停车拍下这个景观，我只好心里惋惜不已。

中午到达通麦，照例是每人两大碗面条，吃起来照样香喷喷，味蕾根本不似平时那般娇气与挑剔。看来，纠正挑食的一个最有效的办法是让挑食者每天累一些，也不给他好吃的，这样过一段时间，保证他逮着什么吃什么，而且吃什么都香。

饭后，邀上李渤生等先期出发，当然是徒步。队长高登义特地叮嘱我们一定不要远离公路，这是出于责任和好意。我们“着重”答应了。其实，用不着他嘱咐，我们谁也没有这个胆子，因为谁也不愿被抛在野外，谁也不愿意给考察队添麻烦。对考察队顺利完成任务而言，后者尤为重要。

走到通麦大桥西侧，看见一座木制二层小楼，还有一根拦路杆，横在路中。原来这是一个监管站，检查进出易贡木头的车辆。正谈论间，车跟上来，我们分别上了车。

车子离开川藏公路，沿着山路开往西北方向。路很不好走，到处是沟坎、石头、泥巴和遗弃的树木。虽然越野车的越野能力很强，但碰到如此恶劣的路面，我们的车也只好减速，在无奈中颠簸着。旁边是易贡河，水流湍急，响声震耳。与我们见过的东久河、帕隆藏布江不同，易贡河水质混浊，也许是上游水土保持差，加上水流过急的缘故。

颠簸了近两个小时，终于到达易贡。只见一列列青砖瓦房整整齐齐的排列着，屋脊高挑，颇有规模与气势。我又是一惊，这远离川藏线的易贡怎么会有如此规模的房子呢？老队员介绍说，自治区党校曾设在此处，还曾一度传闻要将自治区首府迁到这儿，因为易贡海拔低，气候温和，植物茂盛，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当下释然：原来如此！

党校搬迁后的原址成了现在的茶场。站在主楼前，放眼远望，一片相

当大的开阔地后面是易贡湖。让人奇怪的是易贡湖全然没有湖的气势，除几洼积水之外，就是白白的细沙滩。我见过资料，得知易贡湖是西藏著名的外流湖，湖水面积约 22 平方公里，湖体呈河道型，湖面海拔约 2000 ~ 2220 米之间，湖长 17 公里，平均宽度 1.3 公里。按理，易贡湖不该是我眼前这个样子的呀！

面对我的困惑，研究人员王维痛心地说：“从前的易贡湖确实不是这样的。”王维是研究大气物理的，十多年前，他和高登义在通麦和易贡进行过气象观测，通过施放探空气球去了解雅鲁藏布江的水气情况，并首次提出水气通道理论。一次在易贡，由于泥石流的暴发，王维等被堵住了，和前方失去联系，没有吃的，就上山采蘑菇充饥。王维说：“你不知道，那时的易贡湖，可是波光粼粼，烟波浩淼。湖后的高山又像横空出世的天墙，倒映在湖中，美极了。这次来西藏，我就特别想看看易贡湖，没想到她成了这个样子，真叫人难受。”

不用说王维的痛心，没有见过易贡湖以前风采的我也惋惜不已。易贡湖原来是一块肥沃美丽的盆地。居住着数十户藏族同胞。易贡湖自西北向东南流经这里。100 年前，也就是 1897 年的一个夜晚，一次大型的冰川泥石流爆发，堵塞了河道，淹没了村庄，形成了这个长条形的湖泊。村里很多人死于这次泥石流，幸运者只有三人。就是当时在山坡上露宿的三个放牛娃逃脱了这次劫难。同时他们也成为这次泥石流的见证人。美丽的易贡湖畔，系着一个悲哀的故事，如今，她又面临着一个悲哀的结局，那就是逐渐消亡。

前后不过一百年而时间，相对于漫漫的历史长河而言，这仅仅是弹指一挥而已，怎能不让人慨叹呢？

易贡湖为什么会趋于消亡呢？原来，易贡湖湖盆发育在经过冰川作用的河道宽谷中，湖内水流缓慢，淤积架速，从上游和支游带来的泥沙不但促进了洪积扇和湖滩地的发育，还导致了湖心滩的出现。如今的易贡湖，在枯水期已不成其为湖，只有在雨季，出现一定的积水，还有些湖的样子。这是环境恶化的结果。想想罗布泊消失了，青海湖的大面积缩小，均表明人类生存环境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边缘，实在应该引起警觉。

抛下惹人伤心的易贡湖，我来到杨逸畴生的气息的茶场。山风吹来，绿浪滚滚，采茶女工清脆的笑声不时传入耳中，精神顿时一振。我想拍一张满意的画面，扭头看看摄影专家杜泽泉是怎样寻找角度的，希望得到他的点拨。没料到往日里活生生的他却趴在一棵树上，有气无力地，偶尔举了举相机又放下。原来，他吃了队友给他的一个的苹果，只是简单的擦了擦就吞了下去，才吃出拉肚子的病来。可见，野外考察尤其是要注意饮食。因为在行动中接触不洁的东西多，又没有包括洗手在内的“洗”的条件，同时面临着就医条件差的问题。一旦病了，轻则一个人受罪，重则科学探险队受累。基于以上考虑，我采取的办法就是多吃蒜。藏东南的大店小馆都有蒜，只要提出上些蒜，服务员一会儿便端来一盆。在一些小餐馆，我看店主忙不过来，索性自己到厨房里找蒜。那里的独头蒜，辣得人往往胃区疼痛低，但忍它三四秒钟，也就过去了，受益的是全天，以及全考察过程。

任我努力，也未找出易贡茶场与内地茶场不一样的地方。一条条茶垅，并排的或作南北向延伸，或做东西向延伸。茶园滴翠，枝盛叶茂，管理得很好。我从一份资里看到，1994 年，茶场就实现利润 90 多万元，年产绿茶 10 万多公斤。4 年过去了，不知茶园具体状况到底如何。我找到茶场负责人询

问，由于语言不通，问不出个所以然。我又提出：“你最好给我找份茶场的材料看的。”于是，就有了手中的这张广告页，现摘出几段以飨读者：

珠峰圣茶——茶国极品。

珠峰圣茶生长于北纬 30 度，这是一处专出名茶的“神秘纬度”，杭州、洞

庭、庐山、太平、屯溪、邛崃，以及与绿茶极品珠峰圣茶相对应的红茶极品——

祁红的产地祁门，也正好处此纬度。

珠峰圣茶与同类名茶相比较，更有一个得天独厚的好处——她生长于喜马

拉雅山东部易贡湖畔，清澈见底的湖水与雪白的全球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形影相

映。在人类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今天，珠峰圣茶的这一片生长地被公认为

地球上污染最少的“最后一块净土”。阳光充足，空气清新，土壤适宜，雪水

如从天降，浇灌孕育了这一产品。

珠峰圣茶岂止不见于《中国茶经》，甚至不见于产地的《波密县志》。

皓皓珠峰下这一片碧绿，起于何时？源于何地？属于何种？竟成茶国茶乡千古之

谜，唯有西藏世代口头相传演唱世界第一长篇史诗的老艺人充满自信地告诉人

们：自大唐贞观十年（公元 641 年）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和亲带来了蚕种与巧匠

进藏以来，珠峰下便平添这一片碧绿。

眼睛睁得大大的，前后看了个够，也找了个遍，愣是没有在这广告页上找到“珠峰圣茶”的厂家——易贡茶场的电话。广告页上竟然没有厂家的电话，也没有此地的邮政编码。这广告能起哪门子作用？在西藏，有许多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必然的结果是，意欲买茶者，无从与易贡茶场联系。我这当记者的想从易贡茶场再补充些材料，以便更为全面的介绍一番这个在全国、甚至全世界都有些特点的易贡茶场，同样找不到途径。

绝对虔诚

我曾经去过很多地方，参观过不少寺庙。到过承德的小布达拉宫、普林寺，去过浙江普陀山，嵩山的少林寺、洛阳的白马寺，恒山悬空寺，北京香山脚下的大佛寺等。这些或名气很大，或独具建筑风格的寺庙，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看多了内地的寺庙，又想到西藏去领略那儿独特神秘的藏传佛教文化。我早就听说西藏有一套有别于内地的佛教教旨，外来佛教与本土文化的交融契合造就了它特殊的崇拜形式。该地几乎全民信教，其教徒对佛的崇拜和痴迷程度颇具特色。如佛教徒围着圣湖磕长头，或者从大老远的地方一步一磕头去拉萨朝拜。他们往往一磕就是一年多或好几个月。因为路途遥远，有人会因为体力不支，或遇到自然灾害等，致死的。尽管如此，他们一旦上路，从不主动放弃或中途退出，虔诚之至，让人感动。

这一次科学考察，终于圆我心仪已久的宿愿。西藏之行，我们这些科考队员都能尊重当地群众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习惯。在米拉山、色齐拉山等地，我们经常看到一些藏民用石头随意堆起来的玛尼堆，其大小不一，分布也不均，常堆在藏民们认为比较神圣的重要山隘道旁，据说这是当地的一种宗教信仰。我们队员走到玛尼堆旁，都尽量远一点，以免碰散了它，造成冒犯神灵之嫌。在波密寺庙参观时，我也像信徒一样，围庙转动庙外所有的转经筒。虽然我不知道这意义何在，但入乡随俗，也算是表示尊重当地的宗教习惯。然后又进庙内，推着木杠，转动一个直径一米多宽，三四米高的大转经筒。4月10日，我们考察队从西藏出发那天，我就产生一个想法，希望在我们数千公里的考察中，能见到磕长头的。结果两三天过去了，一直未能如愿。后来机会来了。那时从波密抵达通麦的那天，吃完中午饭之后，我们向队长高登义请求先走一步，以便沿途拍照，他同意了。正往前走了二三百米处，巧遇一老一少磕长头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目睹这一场面，觉得非常新鲜。当时我正走在一条较宽的沙石公路上，两侧树高林密，有一丛丛红红的杜鹃花格外引人注目。当时我想，能把这一绿树丛中一点红拍摄下来，一定非常好看。但遇磕长头的机会太难得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于是我放弃了拍摄杜鹃花的念头，改拍磕长头的一老一少。

此时将近中午一点，正值烈日当空，光线耀眼，太阳火辣辣的，而这一老一少都没有戴遮阳的帽子。实际上他们即便有帽子也不会戴的，这是为了磕头的方便。他们装束很相似，都穿着类似于围裙的短黄上衣，一直连到膝部、风尘仆仆。围裙上已经磨破了好几个洞；手上带着木板手套。膝部蒙有厚厚的护膝套，鞋前同样裹着护套。这些部位频繁触地，没有护套是绝难坚持长久的。木板手套的功能者除了在跪地时防止磨破手掌外，看来，也有拍响时，表明一套动作的节奏。他们伏地前先把手举至头部合掌啪地响一下，然后在胸前合掌，再弯腰伏地磕头，头略着地。因而在他们的脑门处沾有土和沙子。伏地时稍停片刻才起来，在往前一步接着一步磕头，虔诚而又执著。

我看着他们样子挺和善的，于是大胆的询问是否可以拍摄他们并合影。征得同意之后，我退出几米外，拍摄他们跪地、起身、直身等六七个动作。接着，我们又合影。我示意年长者站在中间，他不同意，并执意把我让到中间。拍照时，又友好地将他的手臂搭在我的肩上。他们的态度始终很温和，没有一丝厌烦情绪，平和、质朴，令人难忘。

我又询问了他们一些有关事情。他们的汉语不太好，尤其是那个身材高挑，脖子上还长着一些绒毛的青年，很腼腆，不爱说话，两只大眼闪着不雅的光。他说他才21岁。

年长者45岁，被晒得黑黝黝的。他们告诉我，他们的家乡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已经磕了11个月的头了，目标是拉萨。他们估计还得磕4个月的头，才能到达目的地。有时阴雨绵绵，有时烈日当头，又走了这么长

时间的路，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的辛苦，但他们脸上没有出现一丝畏难的样子，十分虔诚，足见他们对佛的崇拜和痴密程度。我想，正是这种精神支柱促使他们不畏艰难困苦，义无反顾的为实现自己的目标而奋斗！

再往前走百多米，我们又碰到两个磕长头的。也是一高一矮，其中一位很粗犷健壮，浓眉大眼，头披长发，肩宽体壮，像个武士。水游戏里，他支演武松是再合适不过了。

他们的装束与前面的一老一少并无太大的差异，也是从四川阿坝取道川藏公路去拉萨。

我问他们是否来回都要磕头，他们说只有来的时候磕，回去就免了。正说着，我们的车跟上来了。时间紧迫，我们只好跟他们匆匆告别，无法更多的了解他们的生活、心态和家庭。

我常常想，作为一个记者，如果不深入到现实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劳动人民的生活，只是雾里看花，无论用多少华丽的词藻写出来的东西也是苍白无力的。笔者过去曾在宴会上碰到一个日本作家，他为了了解中国佛教的教旨经书、祈祷方式，就到庙里去当了三个月的和尚，然后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诉诸文字，内容也就不会虚空。受他启发，我也重视亲身的感受。有一次我去华山，下山时碰到一些挑夫挑煤，沉甸甸一担担煤，压得他们满头大汗，特别是到了百尺幢，极为陡峭。往上一看，挑夫与游客就像串糖葫芦似的，一个中着一个，挂在悬梯上，有一二十人。要是上面一个人不小心掉下来，底下的所有人难以逃脱厄运。下山时，我为了体验一下他们的艰辛，特意找了一个挑夫，把他的担子挑了几百米，直到把我累得气喘吁吁才放下。所以我想，一个记者只有多方面体验生活，才能理解生活的真谛。

后来我们去易贡，归来时已是下午 4 点多。当时乌云密布，天色阴沉沉的，从峡谷吹来的风在呼呼作响，这是山雨欲来的前兆。因为当晚要在排龙村住宿，所以我特别想早些赶到排龙。接近排龙村时，有位队友仍在不停的拍照，司机只好停车等着他。我则和另一个队友索性徒步奔向排龙。冷不丁看见前面一头毛驴拉着车子，载着满满的东西在艰难地爬坡。旁边还有两个人也在使劲的拉。驴大汗淋漓，大口大口地喘着的粗气，蹬开四蹄拼命地向前，坡有 30 多米长，坡势很陡，眼见山雨将至，那几个拉车的尽管使足了力气，由于坡度陡，重载的车子行进时仍然十分缓慢。此时的我们由于一路上来回颠簸，再加上中午没有休息，真是筋疲力尽，困苦不堪。然而出于友善，我和另一队友还是一块奋步向前，倾力推车，总算把毛驴车推上了坡。我一直为中午误了那几个磕头人那么长的时间而内疚，现在我也尽自己的能力帮助他人摆脱困境，我的内疚之心才稍微缓解了一些。驴车被推上坡后，仔细一看，竟是中午碰到的与我合影的那一老一少，我转了三四个小时后又在此地巧遇他们。也不知道冥冥之中到底是谁安排的。想想缘份这东西真是妙不可言。当我问他们是否还记得我们时，他们憨厚地笑了笑，并搭搭肩膀，意即我们曾经合过影。之后，他们还双手合十，致谢我们帮助他们推了车子。这车上装的主要是粮食，还有铺盖、绳子、打气筒，以及防止雨淋的塑料布。我一直很纳闷他们一路上以什么为食，现在终于找到了答案。原来他们先把装粮食的车推到前面不远的地方，再倒回去磕头，然后再去推车，再倒回去磕头，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拉萨。他们一行三人中，另外一个穿得较为整洁，是专门负责看车的。

我又从他们口中得知他们早在 1997 年秋天就已开始为此次远征储备是

粮食，并做好车辆的准备。一路上靠吃糌粑生存。这是一种把青稞和豌豆炒熟磨成面，吃时加水或麻油茶揉成团，再配佐料即可食。有可能他们还带有少量的干牛羊腿，因为光吃糌粑体力上难以支撑，需要用肉类来补充些营养。至于饮用水问题，他们都喝生水。他们的身体已适应了生水，就像很多农民天天喝生水而不生病一样。我问那位 21 岁的年青人，天天反复的磕长头累不累？他说一点都不累。我想这可能是他们的真心话，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作为山民，他们本来就拥有好的体力，加上他们对佛的虔诚，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对生活的要求是最低限度的，从不住店，一般在马路边或山崖下宿营，只要能避风躲雨，不受自然灾害侵袭即可，可以说他们过的是一种风餐露宿的生活。

他们信奉行善助人。中午时，他们愉快接受我们拍照并合影，在他们看来都是善举，没让任何名利驱动。他们不识字，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哪会想到我在书中留下他们的形象。回到北京，我把这张合影照片拿给朋友看，朋友说，从他们的眼神中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善良。的确，仅以磕长头为例，他们不妨碍任何人，更谈不到加害任何人，跟他们交往不需要做任何“设防”。这同我所见到的一些心怀鬼胎者、道德沦丧者有着天壤之别。后来我问开车的扎西师傅是否也磕过长头，他连连摆手，又藏式的汉语说：“哦，没有，没有。”我想，他已经把对佛的崇拜化为另一种形式表达出来，这从他车内后视镜中挂着的一条红黄色的带子可以看得出来。

离开西藏的前夕，队员们纷纷买些东西作为此行的纪念品，而我最想买的是转经桶，以此作为我对神秘的藏传佛教的神往已久的见证品。我买了一个做工颇为精致的银色转经桶。转经桶是用铜做的，上面镶嵌很多小珠子以及许多小佛像。买回来之后，我发现上面不大洁净，就抹上肥皂，把它洗得干干净净。洗后一摇，感觉似乎比先前重了一些，打开一看，发现里边的经文已经润湿了，我当时追悔莫及。到北京后，发现经文虽浸了水，但干后，只是纸张变得浅黄，经文仍清楚可辨。我才稍微心安了些。

贪杯误事

跟磕长头的一老一少道别之后，后面的车子跟了上来，我们乘车前往林芝县排龙门巴族自治乡。一路上，我们既兴奋又有些担心，因为明天，我们就开始进入此次考察中最艰苦最富有探险意义的阶段——徒步奔向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拐弯。

排龙乡政府是我们这次转入徒布科学探险的大本营。从东南方向过来，进这个村最先看到的是一棵高于房子的野芭蕉立于村头。

川藏公路正好从村子的中间穿过，两侧是住房。路的左侧大约纵深四五十米，有民居排列；右侧宽度也差不多，右侧的再往外，便是帕隆藏布江的支流——东久河。河水势很猛，震耳欲聋，打开窗子，或走出房门，就可听到轰隆隆的水声。路左边修建得比较规范的希望小学很引人注目，站在路边，可以看见小学校迎风飘扬五星红旗的。我们在西藏行走了近千公里后，对哪里有学校，哪里就有五星红旗飘扬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更值得肯定的

是，学校的房子一般都是当地最好的房子，这一点同内地是一样的，可见西藏政府部门对教育很重视。离希望小学不远是一所卫生院，院长还是全国小有名气的劳模。我们看到，这所卫生院仍在逐步扩建。几座带有院套的兴建的房子，都是雪白的墙，红色的地板，黄色的三合板顶棚，看去素雅洁净，准备用于做病房。

路的右边是乡政府所在地。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院子，约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乡政府有一个比较大的会议室，铺着地毯，放有沙发，看起来有点档次。村里沿路两侧有五六个个体小商店，品种比较齐全，小商店大部分是木租房。其它的是砖瓦房。不同的是这个乡还有电。有了电便有了电视机，于是电视机变成了村民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乡发电站离村 200 米。1993 年 10 月 26 日，建成了这个 55 千瓦的水电站，从此结束了排龙村用松火照明的历史。村民也有自来水，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自来水。山崖处的小瀑布是“自来水”的源头。村里把接管仰放于瀑布之下，自来水就顺着 100 米长的管道流到村子。

用不了的水就溢在路面上自动流到谷底的东久河。

吃过晚饭之后，考察队通知，为了适应明天奔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褂，要求我们认真清理自己的行李物品，不必要的东西留在排龙，其它的放入旅行包中封好。当晚队里还向队员们分发了食品，有压缩饼干、大白兔奶糖、巧克力、矿泉水、牛肉干等。接着，队里又在我等六人住的大房间开会。队领导提出，民工背的东西不能超过 20 公斤，各位队员根据这个重量要求，对自己的行囊做些限制。这是为了照顾民工的体力。

当晚 10 点，我们就躺下了，一夜无事。

第二天一早，队里请来的 42 个民工全来齐了。这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老队员说过去很少有这一次来的这么齐的。我们知道，这是西藏自治区政府和林芝地区的领导大力支持的结果，他们指示沿途各县积极配合这次科学考察，才使我们徒步出征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好的开局。队里决定趁热打铁，把原计划 10 点 30 分出发提前到 8 点 30 分。

队里提前出发的指令下达后，吃早饭就变得格外紧张。在乡政府的院子里，队领导边端着饭碗吃饭，边核对哪位队员没来吃饭，结果发现少了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的记者张贞璞。老张 40 多岁，别看身体较瘦，体力弱一些，但敬业精神强。考察途中，他和另一位台湾记者熊移山一道，摄像机一直不离手，一有目标即下车拍摄，从不轻易放过任何一处有价值的景观。比如车过水流时，他们中一人下车跪在地上，拍车轮翻卷起来的水花。一旦遇上雪崩、泥石流等，他更是勇往直前。我多次看到，当他发现路边的景观有新闻价值，为了赶路又不能停车时，张贞璞在车子开动中，从车窗探出身子拍摄。每看到这一情景，我们车内的几个人就一致认定，台湾这两位记者肯定收获颇多。回台后，不知会剪辑出多少个让台湾同胞极感兴趣的专题片来。但张贞璞有时也表现得很差劲，比如在这样一个重要关头，他居然醉眠床头。

听说老张昨晚喝酒喝到将近凌晨 3 点中、酣睡的他早把徒步奔向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计划丢到爪哇国去了。为了证实他是不是醉卧床头，我丢下饭碗走出乡政府的院子，赶向领院他的住所。为了照顾这两位台湾同胞，考察队总是给他们腾出比较好的房间住，和干净些，或人少些，或安静些。例如昨晚，我们就 6 人挤在一个房间，以致我们同房间的郭新没有床，只好拼沙发就寝。这次，他们的住宿条件仍然优于我们，住在一个大房间里的内间。

一进他的房间，看到床空空的根本没人。我正疑惑之间，地上棉被裹成的一大团东西把我的目光吸引住了，看来必是老张无疑。我赶紧趋步去掀被子，好半天才找到被角，掀了三层被，才发现里面的他正双目紧闭，满面通红的团在被子里边，心中没有出茧的蚕蛹。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此时的他竟烂醉如泥，依然是一副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样子。我推了推他，他毫无知觉，怕他因被子堵住鼻孔影响呼吸，我又扯了扯靠近他头部的被角。科学探险队不能因为他一个人而影响行动，仍然决定 8 点 30 分准时出发。

同时雇用两个民工看守着他，待他醉来之后再去追我们。

野外考察专心致志十分重要，谁忽视它，谁就要受到处罚，轻则误事，重则伤亡。

1991 年，中日科学探险队乘热气球飘飞珠峰，发生爆炸，就同日本队员玩兴大发有关。

为了迎接第二天飘越珠峰，前一天科学探险队员本应全身心投入到备航中去，而始料不及的是日方队员却提出额外要求，希望派车去希夏邦马峰脚下就餐。希夏邦马峰离当时的宿营地有 5 个多小时的路程，当时中方队长高登义面有难色地对他们说：“我看还是不去的好，明天就要飘越珠峰，飞行员累了会影响飞行效果。还有，去那么远的路，车子一旦途中抛锚，回不来，飘飞任务因此完不成，对谁都不光彩。”中方队长的话句句在理。无奈，日方队员一意孤行，队领导大岩、西野则再三强烈的要求派车去玩，中方队长只好同意。第二天，也不知道是不是鬼使神差，日方三名队员乘坐的热气球在起飞后不久即出事了，气体冒顶，热气球失去浮力，从半空中掉了下来，造成两人重伤，一个轻伤。经过各方面的营救，才找到受伤的他们。教训是深刻的。从某种意义来说，如果他们事先充分做好准备，养精蓄锐，对热气球飘飞后可能发生的一切提出对策，说不定会避免悲剧的发生，并首次创造热气球成功飘飞世界第一峰——珠穆朗玛峰的纪录。

为了更好地完成这次科学探险任务，一次科考队在拉萨喜马拉雅饭店开会。会上，就考察队的纪律和约束，我以一位老考察队员的身份说出了我的见解。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为了统一步伐，为了队员们安全着想，考察队应实行半军事化、准军事化。要求队员们绝对服从命令，不要各行其是，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想起武井义隆之死

从排龙村赴扎曲村，要始终与雅鲁藏布江江水最猛的支流——帕隆藏布江相伴。走在临江的陡崖上，我始终告诫自己，行走时千万小心，否则，会酿成大祸。不是我过于胆小，而是我想起日本的武井义隆，他的体力比我强，他的泅水能力比我好，却让帕隆藏布江夺去了生命。我如果坠崖落江，肯定难逃劫数。

屈指算来，武井义隆已死去 5 年。24 岁的武井义隆是 1993 年 9 月 10 日下午 4 时多，在远离日本的滔滔雅鲁藏布江走到人生终点的。

“人生终点”，是对死的文绉绉的表达。但 1993 年中日雅鲁藏布江考察

队员谈起武井义隆，话里从不含有“死”字，而是说失踪。失踪？里面含有生死参半的味道，说不定在哪一天，他会人鬼难辨地从帕隆藏布江峡谷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中钻出来，让关心他并为他忧伤的人们大吃一惊。然而在私底下，队友们谁都不认为武井那颗强有力的心房还在跳动，他们的结论是残酷的：武井或是被江水卷入印度洋喂鱼了，或许被雅鲁藏布江江流塞进巨砾缝隙中，永卧江底。

野外考察中，最怕遇到这种倒霉的事。它往往如同炸雷轰顶，让队员们陷入颓丧，继而葬送预定的雄心勃勃的考察计划。

毫不例外，武井义隆之死所带来的负效应，也为这次考察工作涂上了浓浓的悲剧色彩。

艰难的行军

1993 年中日雅鲁藏布江考察队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集中后，3 月 1 日从这里出发，乘车到了林芝地区行政公署所在地——八一镇。次日，他们分成两个小队。一个队由副队长温景春率领，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起始点——派一带深入峡谷考察；另一个队由中方队长何希吾、日方队长北村皆雄率领，前往帕隆藏布江江边的排龙乡，并以此为大本营，为下一步进军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拐弯考察做准备。

考察队的到来，使的地处崇山峻岭，因人烟稀少而冷清的排龙乡政府所在地排龙村变得活跃起来。

探险队大本营就设在乡政府的院子里，经过队员们的布置，初具规模。一辆性能良好的日产米黄色丰田越野车停在房前，备作急用。沟通信息一向被考察队员所看重，因为它与考察队员的生命安全息息相关。为保证电台运行，还专门在林芝地区邮电局请来了一位女话务员。就通讯能力而言，日本队员开始完全可以引为自豪，他们带来的一部便携式卫星电话设备，能够通过位于印度洋上空的海事卫星，与全球对话。当日本朋友汗颜的是，这部融汇了世界一流通信技术的装备，很不灵光，拉出天线后，能过调频，虽然与北京通了话，那是在忍着刺耳的噪音、时断时续和连拍带打完成的。日本队员此时才知道，这是一堆废铁，扔在一边，再不理它了。

按预定计划，小分队 3 日在排龙村休整一天。但在实际上，这个休息的权利只属于日方的 11 名队员，中方从队长到队员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要同乡政府领导谈后勤，谈民工。队伍下一步要攀悬崖、走峭壁、溜江索，不要说牛车马车无法跟随，连最擅长青藏高原负重的耗牛也派不上用场。必不可少的食物、器材和帐篷的辎重，只能靠民工手提肩扛。

4 日，一支大大膨胀的队伍出发了。小分队由原来的日方 11 人、中方 5 人，扩展到 100 人。单是民工，他们就雇佣了 84 人，每人负重 25 公斤。排龙乡政府对这支考察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为协调和管理好这众多的民工，乡里专门派出了乡党委副书记嘎玛桑登和公安特派员嘎玛扎西带队。

在排龙乡政府留守大本营的是 56 岁的中方队长何希吾、患有腰病的中方副队长冯雪华，以及报务员肖红等人。

倘若没有身体强壮、习惯山地奔走的民工协助，考察队几乎难以行动，这在 4 日出发的当天便凸现出来。队伍从排龙乡政府所在地排龙村出发两个多小时后，帕隆藏布江就横阻在他们面前。谷底，江水奔腾下泻，发出震耳

的咆哮声。一条粗为 100 多米长的钢质溜索，是队员们到达对岸的唯一通道。民工们显然已经习惯使用这吓人的溜索，他们捆扎之后，坐在吊板上，然后向后伸开双臂，不慌不忙的倒手向前，轻捷地到了对岸。队员们可没有这个本事，面对奔腾的大江，悬在凌空横扯的钢索上，能够眼不晕、心不跳地坐在吊篮里就是好样的。队员们过溜索，全靠民工在对岸牵拉。

队伍从早 9 时就开始通过溜索过江，一直延续到晚上 7 时，所有队员和民工才到达对岸，其中包括随机的唯一女子、47 岁的日本队员明石绫子。她是考察队中绝不可少的人物，明石绫子会藏语，日本人从民工打交道，主要靠她来翻译。

队伍沿着帕隆藏布江，走在临江的半山腰间，真够吓人的，有些地方右面一侧多是五六百米深的陡崖，探头往下一望，头晕目眩，江水宛如一条银链在颤抖，在流淌。脚下和左面是绿树与杂草茂生的山坡，这里本来没有路，勉强能够行走的小径是前行的民工踩出来的。反复的践踏，小径湿润的山土由硬变软，最后成了一行向前排列的深窝窝。

不过这也好，脚窝窝成了队员们安全的寄托，他们绷紧神经，小心谨慎的一步一步地瞄着它，不敢错位。谁都知道，任何大意都可能坠身深谷，命归黄泉。

这里的景观真是美极了。千米左右高的大峡谷，如同被开山巨斧劈开一般，向南呈不尽的延伸。雄奇险峻的山势，到处披着绿装。植被的种类随着山势的高低有所不同。

山底部，覆盖着灌木丛和阔叶林，山上是挺拔的针叶林。物竞天择，针叶林敢于拒寒，阔叶林喜欢温湿。这里没有高原上常见的贫瘠、空旷和荒凉，有的却是大自然的勃勃生机，以及江南山区常见的缭绕晨雾。

不过，队员们谁也不敢忘情地欣赏这让人心醉的风光，他们的精力全部专注在自身的安全上。中方队员陈远生说得好，考虑到行路的危险，他每天早上从帐篷里爬出来，第一件事就是活动自己的双脚，看看是否灵活、正常。还有上路前把鞋带系牢。这都关涉到能否准确地把脚迈到前行者踩出的泥窝窝里。

即便如此，日本队员中村进还是摔个鼻青脸肿。中村进并非等闲之辈，他是日本著名的登山家，巍巍的珠穆朗玛峰、南迦巴瓦峰均留下过他矫健的身影。中村进遇险的地方是个下坡，路上布满乱石，长着青苔，不知是怎么搞的，走着走着，他突然跌倒了，好在下面两三米深的地方有土坎与树木挡着。待队友们跳到他的身旁，只见他左脸骨摔坏，凹了进去，鼻口流着鲜血。然后是左脸红肿，肿得同右脸失去对称，形成了难看的高低差。此进队友们为他所担心的倒不是他的肌肤之痛，而是怕中村进头部受到严重震荡，影响他的平衡能力。险峻难行的路上，失却平衡能力，就失去了安全保障，无法有效地把握自己，极易坠身山深渊。长期从事登山活动、中村进的体能显然强于一般队员，几天后，尽管他的鼻子仍然流血不止，但他还是坚持同队友们一道前进。9 月 25，他带着伤痛，提前回到日本治疗去了。这是后话。

6 日，队伍到了扎曲并扎营。它的西南方不远的地界，便是帕隆藏布江的末端，即帕隆藏布江和雅鲁藏布江的汇合处。几天行进的疲累，加上中村近的伤情，迫得他们 9 月 7 日休息一天。

由于队伍远没有达到预定的实施大规模考察的雅鲁藏布江，性急的日本队员就有些按捺不住了。他们想利用飞行器摄影、还想试一试在帕隆藏布

江能否漂流。他们只是没有想到，由此铸成的无可挽回的大错，竟给武井义隆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无情的滔滔江水

为实施滑翔摄影和试漂流，8日，日本队员有的上山寻觅适于飞行的山坡，有的下到谷底探视帕隆藏布江。实际上，他们没有必要改变原来的计划，即把漂流点放在水势较缓、水面宽阔的雅鲁藏布江上的加热沙至邦兴一段。

9日是足以让日本队员欣慰的一天。民工们在日方队员选定的山坡上，铲出了一条可以带着飞行器助跑的路，然后顺利地腾飞了。飞行器宛如一只大鸟，不紧不慢地在空中盘旋、升高。上面的日方队员俯视地面，深深地为其陶醉了。只见莽莽的森林、下泻的江水、万仞的石壁、叠嶂的山势，构成了一幅美妙的山水画，他们手握相机、摄影机争分夺秒地拍摄。20多分钟的飞行，满足了他们此次飞行的所有欲望，待到飞行器回到跑道附近的树枝上，飞行员毫不在乎树枝的刮伤，乐哈哈回到地面后，还在声声叫绝。

飞行的成功更加坚定了日方队员试漂的决心。中方队员赵军、陈远生等看了帕隆藏布江的水情后，觉得水流太急，向日方提出不宜在此冒险漂流的建议。对此，北村皆雄队长回绝说，武井义隆等日方漂流队员只是下水一试，如果他们认为可以漂，就漂，否则就不漂，因为他们是专家，就不是队长所能决定的。

可以说，日本朋友多次在中国探险所造成的伤亡，都是他们过度的相信了所谓的专家，还有他们的固执。1989年实施的中日热气球飘飞珠穆朗玛峰就是这样，副机长市吉三郎对中方提出的珠峰背风波动下降气流每分钟可达500米的危险不屑一顾，待到登天之日，热气球果然被珠峰背风压得升不到应有的高度、只好加大气球热度，导致爆炸，机上的三位队员坠落到石崖上，全部受伤，这次考察自然也归于失败。

中方队员劝阻日方队员不要在帕隆藏布江玩命的忠告，不仅限于对眼前水情的直管分析，还出于中方地理学家们多年对帕隆藏布江的考察，当然也包括对它的最大的支流——帕隆藏布江的了解。这是全方位的，包括了地貌、地质、气象、植被、动物等诸多方面。

现在，有必要看一看“真实”的帕隆藏布江，它的流域地处岗底斯——念青唐古拉地质构造带的东端。帕隆藏布江发源于阿札贡拉冰川，源头海拔4900米，流经安贡错、然乌错至通麦汇入西来支流易贡藏布江。从此，河道急转南下，在扎曲村附近注入雅鲁藏布江干流。全长266公里的帕隆藏布江，落差3380米，平均河道坡降千分之十二点七，真可谓滔滔江水见上来。

自信的日本人不会想到，从培龙贡支江口到帕隆藏布江河口，沿江共有13条支流汇入，它们就像13个助推器，使得帕隆藏布江江水越来越大，越来越急，到了帕隆藏布江末端的钢朗附近。水面已宽达109米、水深15米、最大流速10.2米/秒。这样的水情，狂暴得近乎脱疆的野马。在西方人看来，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布满杀机的帕隆藏布江，不知是否也与此有关。

为保证安全，日本队员准备采用抛绳的办法，在岸上跟着水中载人的小艇跑，一旦发现不测，就把绳抛向江中，让他们接住。这不能不承认是个

安全措施，但在我们旁观者看来这不是最好的办法，与其这样，倒不如在漂流队员的腰上系条绳子，下水者能漂就漂，岸上的人发现其危险拉上来就是了。

日方队员决意要试漂雅鲁藏布江，出于礼貌，中方不再加以阻止。从扎曲营地出发时，中方派了6名体壮身强的民工帮助扛着漂流装备，尾随日本队员向帕隆藏布江边走去。

他们从营地启程的时间是10日9时30分左右，到达了事先预察过的水势较缓的地方帕隆藏布江边，此处距雅鲁藏布江交汇处较近。

武井义隆等3名漂流队员在做下水前的准备，活动筋骨，检查所带装备的可靠性。救护队员也相应地作了紧急救护的练习。来到这里的10位日本队员的分工是：桨手3人、救护3人、记录2人、现场指挥2人，各司其职。试漂先由武井义隆和只野靖实施。

为防止意外，漂流队员应随身携带对讲机，生于1971年的只野靖接受了，将其别在腰间。生于1968年的武井义隆则拒绝了。这位刚刚从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深谙水性的桨手，实在看不起这200米的试漂距离，认为下水后，只要在水中划几次桨，略有调整一下小艇的方向，就上岸了，要对讲机有何用？

只野靖第一个下水，身不由己，他操桨还未划动几下，小艇就被湍急的江水冲翻。

随水漂动的小艇，在只野靖的努力下，艇身终于复原，但此时已远离预定的缓水区的漂流线，被卷入江心。跟在只野靖后面，几乎是同时下水的武井义隆，因水流太急难以控制住小艇，也迅即被冲走。

3名负责救护的队员，被眼前的场面惊呆了，急得在岸上直跺脚。他们不能理解这是怎么搞的，下水队员好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一下水就向江流中心奔去，似乎根本不想求助于岸上队友的救助。

岸上的日本队员无可奈何的引颈看着队友顺流而下，瞬间，只野靖和武井义隆双双消失的江流的转弯处。此时，岸上的日本队员方长梦初醒，领教了帕隆藏布江水的利害，祈祷漂流者安全返回。

寻找失踪者

科学探险历来容不得大意，谁违背客观规律，谁就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反之，则受益无穷。

两位桨手被江流卷走不久，对讲机里传来只野靖的声音，说已登上岸来，安然无恙，地点在雅鲁藏布江的南岸。据估测，只野靖距漂流启程点为1700米左右。他还得到岸上队友的指示，原地不动，等待援救。实际上只野靖也没有别的选择。别看他登岸的地方距启程点不到2000米，但江边边削一般的峭壁，他是攀不上去的。退一步说，他有猿猴般的本领，能够登上峭壁，面对峰峰相连覆盖着丛林的大山也找不到回扎曲营地的路。

武井义隆怎么样了呢？未带对讲机的他，就是幸运地被江水冲到浅滩上，别人也不知他身在何处。还有一个队友们最不愿想象的可能，他从此饮恨帕隆藏布江，命归黄泉。

当晚，小分队中方负责人赵军通过通讯设备，叫通了探险队设在排龙村的大本营，把漂流人员出现的险情，向队长何希吾、副市长冯雪华作了报

告。人命关天，何希吾思考着他应尽快采取的措施：要向北京报告；考察队和民工的人力有限，搜寻范围有限，要赶快求助林芝地区政府和林芝驻军，请他们沿江设几个点，寻找武井义隆，哪怕是漂浮的尸体。他扫了一眼废铁一般的便携式电话机，知道这些事在排龙乡是办不成的，明早，他必须和冯雪华一道去八一镇。

入夜，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奔腾的江水发出轰鸣的响声，更是让寻找武井义隆的考察队员心中震颤。他们进一步感到，落入令人心悸的江中，只野靖能活着登上岸来真是天大的幸运，他们多么希望，这幸运也给武井义隆一次。他有思念他的父母，他有盼望他凯旋的妹妹。24岁的他，尚处青春年华、灿烂的生命之花仅是初放，高挑的1.80米的身材，一双有神的眸子，就凭这，武井义隆不管走到何处，也是一名讨人喜欢的伟岸的男子汉。

队友们捧起双手成喇叭状，声称深情地呼唤着他的名字，可得不到武井的应答。手电筒射出一道道光柱穿透夜幕晃来晃去，意在告诉武井，只要你还活着，就要坚持下来，至少在明天，队友们就会走到你的身边。

11日。前方发生的事，让何希吾和冯雪华心中焦灼，昨夜一夜也未睡好。他们睁开涩涩的眼睛，早早就起床了，吃罢早饭，坐车上路。从排龙到八一镇需要4个多小时的时间，路途坎坷，且有多处塌方。这些，何希吾都顾不得了，他脑海里反复映现着这次组队之前，中日双方在北京谈判的场面。

中方：“你们要在雅鲁藏布江中作业，最好选择枯水期，否则太危险。”

日方：“不！我们认为丰水期好，唯有这样才富有刺激。”

中方：“由于帕隆藏布江江水是冰雪融化的，而且从发源地到与雅鲁藏布江两江的汇合点的距离只有短短二三百公里，这就决定了帕隆藏布江的江水冰凉冰凉，人一旦不慎坠入江中，透彻骨髓的寒冷必然会限制队员的泅水能力，搞不好会发生意外。”

日方：“这不会构成威胁。”

中方：“沿江的峭壁高达百米或千米，假如试漂时一旦人员落水，无法上岸，难以自救，这一点请日方注意。”

日方：“谢谢中国朋友的提醒。不过，在日方队伍中，有攀援峭壁的能手，那高高的珠峰和南迦巴瓦峰也没有难住他们。”

这些日本朋友好像就是无所不能的太空来客，任何困难也难不倒他们。听了他们绝对自信的话语，中方谈判人员还能说什么呢？除了等待他们成功，预祝成功，其他什么准备也不需要了。何希吾深为日本朋友不拒生死的探险精神所折服，但他通过武警的失踪，也看到，这些日本人有时偏执的令人不可思议，不知道这是大和民族的什么东西在作祟？是不是他们的精神遗产？他感叹，武井义隆、多么英俊而又勇敢的小伙子，江水无情，就这样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真可惜啊！

他们当天下午到达八一镇，在地区邮电局领导的帮助下，很快挂通了北京的电话，两位队长向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有关负责人报告了情况，他们又与日方取得了联系。随后，何希吾、冯雪华又向林芝地区领导和灵芝驻军领导作了汇报，并请求给予援助。灵芝驻军领导机关立即下令所属部队沿雅鲁藏布江设点，监视江上漂浮物，一旦发现目标，立即采取打捞措施，不得有误。墨脱县人民政府要马上组织大拐弯以下的沿江5个居民点的数十位干部群众，去江边进行巡查。

这天，搜寻武井义隆和援救只野靖同时行动。

几名民工带着长长的绳索，翻山越岭花了近一天的时间，才从雅鲁藏布江南岸将只野靖接回扎曲。他的样子真是惨到了家，脸上布着灰暗的疲惫之色，满身是被蚊虫叮咬的创口。队员们都知道，此处最烦人的动物是旱蚂蝗。平时，这种二三厘米长的吸血虫就爬在草叶子上，一觉察有人走动，就伸直了腰，吸附的人身上。它的吸盘只要叮到人的身上，等不到被叮咬者感觉出来，血已被吸出。更为可能的是，这贪婪的家伙不经着力拍打或用烟头烧，是不会松口的。因此，时时提防旱蚂蝗的叮咬，成了队员们最关心的事，就是夜间上厕所，也要系紧衣裤。头、臂、脚全都裸着的只野靖，夜宿江边等于给蚊虫和旱蚂蝗送来一盘美奖。他说一个人独处陡崖下的惊恐，众蚂蝗轮番叮咬的痛苦，把他折磨得恨不得跳到江中了此一生。

只野靖是武井义隆步入阴曹地府的最后一个送行者，他看到了什么呢？他回顾道：“小艇卷入江心后，在波涛中又连续几次翻滚，当时我感到十分危险，便弃艇了。游了大约 500 米，上了岸区。此后，我见到了武井扣翻的艇从江中漂过，但未见到武井。”

寻找武井的队伍最为庞大，考察队又发动了 50 名民工，沿着雅鲁藏布江，以及同雅鲁藏布江交汇的帕隆藏布江进行彻底的复查。他们在两江交汇点下游的 2000 多米的地方，捡到了武井义隆使用的一只桨。

武井有没有存活希望呢？既然他在帕隆藏布江中失踪，然后很快被卷入两江的汇合处，我们有必要看看两江汇合前的水势，以及汇合后的水情。先说帕隆藏布江。它汇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衔接角大于 90 度，呈反向左侧汇入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顶端。此处的帕隆藏布江河道左岸有 40 米宽的阶地，高出水面 20 米。水面宽 120 米，水深 4~5 米，流速 4.5 米秒 / 秒。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西段河谷狭窄，河宽不足百米。其中从白马狗熊到帕隆藏布江汇入口之间流程仅仅 37 公里，落差就有 885 米。水的流速在 8~16 米 / 秒之间变化。江水到了帕隆藏布江至墨脱背崩的 120 公里流程，落差 960 米。河谷呈“V”字型，许多地方直立的江岸峭壁高达千米，有些地方坡度呈 90 度。江水流量仅小于长江和珠江，在我国各江河中居第三位。雅鲁藏布江的河面还形成多处跌水。两侧的大山发生山崩后，小的石块被激流卷走了，大的石块则牢牢地卧握在江中，成了漂流物的撞击体。还有大大小小的漩涡，以及长达 10 米左右的回流。会反复折腾着漂浮物。这跌水、巨石、回流，对于血肉之躯的武井来说，每一个地方都是威胁他生命的死地。人类往往受吹自己能创造生命的奇迹，但哪一个所谓的奇迹，不是有相应的条件来成全！

出于对武井亡灵的安慰，还有对他的亲属关心，人们渴望找到他的尸体。考察队员、沿江部队和民工一起，先后组织了三次为期一个月的沿江搜索，仍然未果。

武井的父亲武井平八也专程来到西藏拉萨，他想去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找他唯一的儿子，但众人劝他去不得，那是个山高路险的地方，没有野外探险经验的人绝难涉足。当他听说因为他的儿子之死，惊动了当地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并纷纷竭力营救时，他一次次顿首表示谢意。拉萨市政府领导接见了武井平八，劝他节哀。武井带着思子的巨创飞返东京。不难想象，这悲伤，这痛苦，他永远也无法平复。

科学探险的“贤内助”

如果说一个成功者背后总是站着一个个默默无闻的“贤内助”，那么民工就是站在科学探险队背后的“无名英雄”。在我看来，进行科学探险考察没有民工的支持是难以成功的。除了在南北极和远洋科学探险没有民工支持之外，绝大部分的科学探险都要依靠民工帮助，他们或当导向，或负重，或驾驭牲口，不可缺少。遗憾的是，他们的付出往往被忽视。

著名的探险家斯文·赫定曾多年深入亚洲腹地进行探险，到达过中国新疆、西藏等地，并取得了丰富的科学考察成果。比如他对楼兰遗址的发现、罗布泊的考察、雅鲁藏布江源头的发现……可以说成绩斐然，在中国探险史上颇有名气。但这些成功与民工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仅看看他在《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一书中的插图就可以深有体会。如在沙漠里跋涉，需要驼工驱赶数十峰骆驼驮运各种器材。

在孔雀河，在罗布泊，他乘坐的独木舟是当地群众制作并为其划行的。半路上，他的汽车陷进沙窝里，同样是民工在地面铺上衣被，以增加摩擦力，才使汽车可以继续前进。

在他的另一本书《我的探险生涯》中，他回忆1895年8月27日率一支科学考察队出喀什，从叶尔羌前往和田河。开始的一段路途还比较顺利，但后来越来越险，人在沙漠里又累又饥又渴，连他本人也差点命归黄泉。而最惨的是民工。家住莎车的驼工穆罕默德沙就因为断水饥渴而死，另外两个人斯拉木巴依和卡栖姆也因断水无力瘫倒在沙地上，并无望的准备去死，后来幸遇路过者，才被救活。这些民工，虽然与科学考察队一路风雨同舟，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但却如飞鸿过客，走入历史的尘埃堆里。他们无非是陪伴斯文·赫定做了几个月，获得一点维持生计的工钱而已。

1929年12月2日，北京周口店第一个猿人头盖骨的发现与发掘，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被认为是人类学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其遗址的发掘、清理靠的是民工。乃至最后头盖骨裂隙的弥补，也是靠技工，才使其有了一定的完整性，运回北京城。

我们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从事科学探险时，同样是这些民工解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他们是向导：库尔班那夫；驼工：艾山·加力雄；翻译：吾布力·库尔班等，默默地成全了科考队的事业。可想而知，没有向导为探险队带队，我们就有可能在起伏不平的沙漠中迷途；没有驼工牵着骆驼提供后勤保障，我们会因为缺水缺粮演化成一幕幕悲剧；没有翻译沟通语言，我们难以了解当地的人们历史。这些维吾尔族民工，宛如铺路石，充当着“幕后英雄”的角色。

有鉴于此，说科学探险队的成功与民工的支持和帮助休戚相关，恐怕谁都无法否认这一点。

这一次我们能顺利、安全得到了扎曲，民工继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从排龙到扎曲，一路上要经过吊桥、栈道、滑坡区等，在这唯一的一条狭窄的羊肠小道上，既不能通汽车，也没法用牲口驮东西，只能依靠民工背我们必备的粮食、帐篷、煤气罐及每个人的行囊。没有他们，徒步到达雅鲁

藏布江大峡谷大拐弯是不可能的。

4月17日，我们按原计划从排龙出发，早上8点多，乡政府为我们约定的民工全到齐了，我们考察队的领导对此感到惊讶，因为这些民工以往很难一下子凑齐。老队员说，民工拖拖拉拉一两天不到位，由此延迟了科学探险队的行动时间，在以前不是件新鲜事。

看到乡政府院子里的民工跃跃欲试，队领导才决定把原计划10点30分出发提前到8点30分。

我们一共请了42个民工，原计划每人配3个民工，实际上只配了2个。他们多数人把我们的行囊放到在他们事先预备好的背篓里。这些背篓有一定的承重力，加上常用，其高度、背带的松紧度，对民工们是极为适用的。只有少数民工直接溺爱我们的旅行袋。

队员们随身携带的主要是自己的工作用品，如相机、挎包等。重量倒是轻些，但我们沿途要不停的拍照，抢镜头，加之体力明显弱于民工，所以并不轻松。

从排龙乡政府出发，大约走了半公里路，我们从川藏公路下来，折向东久河上的一座吊桥。过了吊桥，便是右边为陡崖，左边为急流的山路。这时，一个男民工空手站在桥头。他看我左右肩上各有一个挎包，要帮我背。我就很奇怪的问他为什么不到乡政府去背，是因为没赶上时间还是别的什么原因？他说他不是纳入乡政府序列的正式的民工，只是想在半路上揽个生意。他的这一举动，使我看到，排龙乡虽然地处偏远，封闭落后，但市场经济的意识已经渗入寻常百姓家。自己到考察队找差事去挣钱，对于生活在重峦叠障山区的他，是需要勇气的。后来，我发现我们的民工队伍中又出现了几个女青年，背着探险的物品前进。我当时很惊讶，因为我们科学探险队原来不考虑雇用女民工，首先想到的是她们体力有限。另外，男女相杂，也不方便。我万万没想到想到，半路上杀出几个“程咬金”。刚开始，我以为她们是42个民工的亲属在帮他们分担重量，后来证明根本不是这样。是男民工的亲戚没错，但她们的主要目的是想多挣一份工钱。她们和他们早就有所考虑，并预先在半路上等候。走了近半小时之后，我发现我们的队伍正在逐步膨胀，最后一数，民工总数竟达近50个，其中除了增加的几个女性民工，又有几位“编外”的男性山民入列。

这些民工负重艰难，让我们看了很是同情。特别是背煤气罐、背粮食者，这些物品虽体积不大，但分量很沉，累得他们直不起腰，气喘吁吁地淌着热汗。特别是快到扎曲的那个累得几乎让人断魂的坡上，他们已经没有了一开始上路时一路小跑的冲劲。每当我们看见民工背负着东西过来时，我们赶紧侧过身，让开路让他们先通过。而到了扎曲的这个长坡上，他们往往走上七八十步，便靠在山坡上休息一会。此时，他们的衣衫全被汗液浸透，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但是，不管怎样热，这些民工没有一人敞开衣衫，露出肚皮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们的一种习惯，一种文明对外人不袒胸露背。考察队领导陶宝祥悄悄地对几位同行的队友说，记住那几个背粮食和煤气罐的，要偷偷地都给他们几位加些钱。的确，民工的负重太不均匀，像扛海绵褥垫的，看似体积很大，实则轻飘飘的。对陶的意见，我们是赞同的，多劳应该多得。

他们一路上生活也很艰苦，宿营时，就在我们的帐篷附近，砍几棵小树随便搭一个两三米宽的简易棚架。然后，在棚顶摊开塑料布成坡状，一直

连到地上。这三面透风的棚子，简陋得只能遮些毛毛雨和露水。这些民工几乎不带行囊，夜里就在篝火边坐着，困了打个盹会。过度的劳累，加上得不到有效的睡眠，有两个民工因此患了感冒。我们私下讨论，考察队下次再来的时候应该考虑民工的帐篷，因为民工的身体健康直接关系到考察队能否顺利完成任务。

在这些民工当中，有个叫贡桥次仁的，38岁。这一次他把他在林芝上中学的14岁的儿子也带了出来。他走路一拐一拐的，老落在队伍的后边，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宿营时我跟他聊天，问他走路怎么一瘸一瘸的。他说，十几天前，他的同伴在山上打死了一只野牦牛。回来叫他和另外两人去抬回来，不幸的是刚走到半路就遇上雪崩，雪把包括他在内的三人压在下边，其中一人当场死去，他和另外一个被埋在雪里，要不是没受伤的另外一人吃力地把雪扒开，救出他们，他肯定也没命了。这些天他的脚肿得很厉害，走路都疼，接连走了这些天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估计是骨折，叫他去医院透视，他瞪圆了双眼惊讶地问我们什么叫透视，我们跟他解释了半天，就说医生通过一种仪器可以看得见人的骨骼是断了，还是完整的。但我们看他好象没有听懂，更没有要上医院的意思，就只好作罢。不知道贡桥次仁如果硬是不去医院就诊，会是一种什么结果，会自愈吗？我不懂医，因此不敢妄下结论。但有一点需要强调，这些山民的身体格外强壮，是很多城里人比不了的。

还有一个门巴族小女孩会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她叫次仁卓嘎，今年16岁，正在念中学。赶上这两天学校放假，趁这个机会她也出来揽活，挣点钱。她当时穿着一件牛仔上衣，梳着两条马尾巴，面颊红红的，圆圆的，那是长期风吹日晒的结果，样子很随和，很可爱。我看她背的东西不是很多，为了更进一步了解她，就走过去背起她的背篓，边走边跟她聊天，并希望她好好学习，长大了到林芝看看，再到拉萨走走，见见世面。

休息时，她与她的同伴围坐成一圈。我觉得我应该给次仁卓嘎小姑娘一点小礼物，以示我对她的友好。于是，我喊到：“次仁卓嘎，过来。”她听到我的喊声，高兴地飞跑过来，我把随身携带的一支进口圆珠笔、飞机上发的钥匙串、一袋大白兔奶糖等几样物品送给他，她愉快的接受了。后来，台湾的电视记者熊移山想采访当地门巴族同胞，想让他们唱支歌，又是这个可爱的次仁卓嘎腼腆地起来，很深情的唱了一支门巴族歌曲。回到拉萨，自治区领导同志会见我们，并为我们献哈达。为我献哈达的便是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卓嘎，看！多巧，这位女副主席的名字同门巴族小姑娘的名字完全一样。之后，自治区领导又宴请我们这支科学探险队，次仁卓嘎副主席在席间又是唱又是跳，给我留下了多才多艺的深刻印象。我当时想，那个门巴族的次仁卓嘎小姑娘，长大后能走到自治区副主席这一步吗？实在难以估测。

一路上，民工与我们风雨同舟，为我们分担不少辛劳，同时也给我们增加了许多乐趣，尽管市场经济的春风已经吹到这个闭塞的地方，但是当地还是保持着相当纯朴的民风，从这些民工的身上可窥见一斑。我印象最深的是位村长，脸狭长，留着齐耳长的头发。当时我正爬山，特别累，走都走不动了。这个负重的村长正好经过我旁边，他看见我累成这样，就想帮我提个包，我看他也累得够呛，就没好意思让他提。但一个人处在艰难的境地之下，旁边有人扶你一把或哪怕是一句善意的话，在听者，都会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到了扎曲，山民之间竟然为了谁承担谁不承担我们的负动争执不休，双方都不甘示弱。扎曲村干部提出让从排龙过来的各村的民工回去，科学抢险队回去的雇用民工应由扎曲村承担，工钱也归扎曲村。从排龙乡其他村来的民工见有人夺生意，自然不甘退让。为了解决争端，考察队的领导只好在烈日之下召集各村村长召开紧急会议。两方村领导争争吵吵不说，村民也在旁边参与出谋划策，紧急会议没法进行下去。继续开，仍然各自重复已经说过的话。从排龙乡政府过来的 40 多个民工，认为扎曲村出不了这么多人，没法保障考察队整个负重工作。扎曲村则坚决要求撤走外村的民工，认为既然科学探险队伍已到了扎曲村地界，按过去的规定，民工就由那么村出，扎曲村虽然只能出 20 多个人，人不够，不够也要承担。面对这样难解的题，考察队领导也无可奈何。好在林芝地区宣传部副部长普布多吉在场，看协调不成，干脆快刀斩乱麻，决定让从排龙乡政府过来的民工依然承担考察队后勤工作，下次考察队再来的时候，再由扎曲村的村民承担，理由是扎曲村的人数太少，担负不了考察队的整个负重。幸亏地方干部普布多吉在场，否则这场争执还真不知如何收场。

一路上目睹山民争做民工，这次又看了他们为此互相争执，说明市场经济的观念在此地已经有了一些基础。同时我们也看到，他们对市场经济概念的理解，还只是一知半解。他们仍是单纯的。扎曲村村民，就只知道体力劳动才能给自己创造价值，而不知道如何利用他们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创造财富。比如我们的宿营地，用的是村口边上的一块空地，如果我们来之前，他们把它清理好并拉上上绳子，圈出一块地方，向考察队收取地皮费，考察队也会愿意支付的。因为周围种有小麦、青稞等，根本没有这么大的空地可供考察队宿营。另外，要拍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拐弯全景，站在大拐弯顶端左岸这一角度效果最好，也就是说左岸长长的崖头上，由于沿着崖头的峡谷一侧，多为茂林和灌木丛所挡，往往遮去了一部分江段。没有了 U 字形的江流，照片画面上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拐弯便逊色多了。然而，这里呈东西向的长长的崖头，靠西恰恰有一段开阔的地方。站在这里，望上去，江流和马蹄形山体尽收眼底。但这个地方不大平坦，峡谷一侧即临崖的地方，相当险，稍不留神，就会滚下四五百米深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谷底。

扎曲村的村民头脑若活络些，用巨木搭一个伸出崖头半米的、又有护栏的台子，后面再做些平面延伸，让外来者前驱可临渊赏景、拍照，后退可以休息、聊天。以此付出，对任何使用者收费，又有哪一点不合理？其所得，会远远高于拼尽体力为科学探险队的负重劳动。随着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声名鹊起，扎曲村民守着这个“株”，利用这地宜之便，定会“待”到国外的、国内的很多“兔”子的。此前，已经有些摄影者来到这视野宽阔的崖头，否则，这里不会被践踏得光秃秃的，完全有别于周围草高树茂。不知扎曲村的村民，何时才能意识到他们的优势，并加以利用。

疯长的荨麻

小时候我曾经发生患过荨麻疹，出疹时局部皮肤出现大片的红肿块。

这种荨麻疹虽然很快消退且不留痕迹，但是发病时奇痒无比，令人苦不堪言。到医院去看，医生也找不出过敏的病因，就当皮肤过敏处理，开些扑尔康及利于安定之类的抗过敏药。那副怕冷怕风心烦等狼狈之状，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这一次到西藏我真正领教了荨麻疹的厉害，不禁使我回忆起小时候患过的荨麻疹，更心有惜惜焉。

荨麻疹又称风疹块，在我的家乡辽宁又称鬼风疙瘩。中医学上呈“瘾疹”，病因复杂，有植物性的如花粉、荨麻；有动物性的如羽毛、鱼虾；有化学性的如药物；有物理性的如冷、热、光；也有感染性的如寄生虫等。在我家乡有一种说法是，吃过饭之后满脸大汗，不宜在屋檐下逗留，那么呆在屋里，要么走远一些，否则会招来鬼风疙瘩，看来还是有点道理的。

荨麻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浑身有螫毛，触之奇痛且痒。叶对生，有齿牙或分裂。花儿呈穗状花序或圆锥花序。茎和叶子上都有细毛。据中科院植物生态学家李渤生云：荨麻有 20 多种，最毒的是火麻。我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其毗邻地区看到，它生长随意，在河谷地带，疏林里，路边都长有这种植物，可以说到处疯长，随处可见。

我第一次见识荨麻是在古乡一个村头的石墙下边，杜泽泉指着一种深绿色叶子肥大且长满了刺的植物对我说，这就是荨麻，不能用手碰，否则会痛痒。他还告诉我，过去有的老考察队员，因为出恭时，屁股大面积触到荨麻，还因此病了几天。我由此得出结论：荨麻是惹不起的植物，要尽可能避开它。

从排龙出发沿帕隆藏布江赴雅鲁藏布江大拐弯，荨麻多极了。必经的一条一尺多宽的小路两旁就长满了这种植物。最靠近路边的荨麻长得较低，约有 20 多厘米高。再往外边，长得比人还高。风一吹，两侧的荨麻往往向路中间摆，加上枝叶之间互相重叠，有的地方差一点把路给封死。我们走到这样的地方时，都非常小心，不得不双手握拳缩在胸前，不时还缩着肩膀，弓着腰，唯恐左右两侧或头顶的荨麻触到裸露的双手，以及头部和颈部。双手合握前进，同时还要保持身体的平衡，这是从排龙乡政府奔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一种特有的行走方式。

为了更进一步了解这种植物，我曾蹲下来数了数它叶面上到底有多少个螫。我顺着叶脉数，发现巴掌大的荨麻叶面上就有 90 多个螫。

听说荨麻到了八九月份会长得更高更密，那时更难以穿行。由于荨麻的枝繁叶茂，又为旱蚂蝗贴附人体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它悄无声息地吸附在荨麻叶片上，一听到人的声音或闻到人的气味即探出细小的身子，力图贴到人体上吸血。荨麻与旱蚂蝗的双双危害，令人防不胜防。因此我想，如果要开辟到世界第一大峡谷大拐弯的旅游路线，让更多的人一览它的雄姿，把沿途影响行走的荨麻清除掉是很必要的，否则会给游人带来极大的麻烦。

虽然我们想方设法避开荨麻，但不可思议的是，当地的牛还特别爱吃这东西。还听说当地的门巴族老乡也吃这种植物。他们主要是吃该植物尖部较嫩的部位，用开水烫过之后即可食用。据称哺乳期妇女吃这种植物有助于催奶。也有人说利用这种食物可做纺织原料。可见，浑身是刺且让我们头疼的荨麻还是有其利用价值的，想到这，也就不那么讨厌它了。

我在藏东南曾经被荨麻刺过两次，当时皮肤虽然出现红肿、痛痒现象，但没有因此带来更大的灾难。后来回到北京之后，妻子给我洗衣服时，手上

出现红痒，细究其原因，缘是我通过衣服把荨麻的螫带到北京来了。

误入密林

按原定计划，我们中排龙出发，用两天的时间，徒步到 30 多公里外的扎曲，中途要宿营，但考察队事先没有通知具体的宿营地点在什么地方。也许是走着瞧，到了晚上，沿途找到合适的营址再说。

一路上大家干劲很足，我们这次彻底丢掉了越野车，没有了它的颠簸和方便，反觉得既兴奋又新鲜，因为这毕竟是徒步奔向世界第一大峡谷的第一天。

我们沿着帕隆藏布江边的山崖小路往南走，路的右边是陡峭的高山悬崖，左边是轰鸣呼啸滔滔奔流的江水，山势高低起伏，狭窄的小路在半山蜿蜒曲折的往前伸展。我们科学探险队的于宪光副队长虽然个头不高，但精力特别充沛，像一匹骁勇的骏马一直勇往直前，遥遥领先于队伍。

队伍经过了吊桥之后，江水便处在我们的右边，左边则是悬崖峭壁。自然结合的队伍中，分为多个“梯队”。于宪光等属于“第一梯队”，速度较快，一下子窜得没了影。

我们上午 8 时 30 分出发，中午曾在一个建有三座小木屋的地方稍加休息。因为走得太急，累得我们满身是汗。坐下后，山谷风吹来，又倍感寒冷。为御寒，队友们又纷纷收紧领口。午餐吃得是压缩饼干，喝的是矿泉水。由于做工的精细，压缩钮比几年前要好吃些，咬一口略带炒米的相味。或许是因为太累啦，我还想吃点别的什么。摸了摸挎包内的巧克力，本想把纸剥了放到口里，转念一想，后面还有好长一段路途，于是咽了咽口水，又把它放到远处。

这是真正的便餐，而非内地会议所谓菜肴丰富的“便餐”。之后，我们又接着往前走。于宪光等仍然奋力向前，继续在“第一梯队”。走着走着，我、李渤生、何乎平聚成小分队，因为同样走得较快，当属于“第二梯队”。直到下午 4 点，我们走的一个周围地势比较缓和的路口。这时，站在路边的一个民工示意我们往左侧的河滩走。没弄清为什么，我们三人便深一脚浅一脚的下了一个堆有软沙的 10 多米高的陡坡，再往下是一大片平坦的白色沙滩，约有 100 多平方米。往南是一大片砾石滩，像被什么着意染过一样，红红的。砾石大小不一，密布在帕隆藏布江边，形成条带，约四五十米长。大的有北京吉普那么大，小的也有石凳那么大，石头表面的棱角都被磨得很光，闲适滔滔的帕隆藏布江中上游什么地方把它们搬运而来。我们踩在石头上面跳跃着，艰难的向前走。

此时我们已经走了五六个小时，踩在这种光滑的石头上，又左掩相机，右挎提包，很是费劲。我们三个人中李渤生走得最快，总是把我们俩拉下一大段距离。不一会儿他钻到林子里，我在后便拼命的叫他慢行，生怕他走得没了影。一方面我怕他迷路，走进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另一方面也担心他和我们失散。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原始森林到底有多大，也不知道刚才拐向沙滩前的那条小路是平直向前延伸，还是沿着山势，向上几百米后再南行。

如果是后者，我们走入原始森林不但难觅前进的路，还有可能被直立的峭壁挡住。

我过去从没在原始森林中跋涉过，以前到过黑龙江省伊春的原始森林，只限于在路边行走，后又爬上了望台眺望茫茫林海。说真的，我对原始森林有一种恐惧感，一想到森林里的蛇、蚂蝗、荨麻等我就胆战心惊。

过了一会，我和何平平都赶到森林边上。我对他说：“算了，咱们还是退回原吧，回到刚才那条小路吧。”但看看李渤生，还在一个劲地往前狂奔。我们俩只好在后边跟着，也进入森林。在原始山林里永远不会看到一小块裸露的土地，不是厚厚的枯枝败叶，就是或盘转或横长的粗藤。还有数不尽的朽木上，布满了苔藓和地衣。林子里散发出刺鼻的阵阵霉味。为防止路滑和被藤子绊倒，我们每迈出一脚，都探探是否踩实，然后才能移步。这是考虑到一旦站不稳时，又不能随便抓身边讨厌的荨麻。至于旱蚂蝗是否已贴附身上，我已顾不及。李渤生还在前进。有时回首招呼我们俩一声，有时又听得他踩拍枯枝发出的嘎巴声。森林里是阴暗的，密密实实的树冠遮去了太阳，浓浓的湿气，充溢林间。我们在林子里折腾着，树高林茂，根本找不着道路，我都快绝望了。

好像是过了一个世纪一样，突然听见走在前面的李渤生喊道，他已经看见路了。我们精神为之一振，赶紧加快速度，向前奔去。终于，窄窄的一条羊肠小道出现了。向北望去，正是我们拐向沙滩前的那条路的延伸。此时的路，对我来说是那么的亲切，好像是处于绝望中的人突然遭到一棵救命草一把。其实我们在林子里并没有走多长时间，只是 20 多分钟，而坡距只有 50 多米，我显然是多虑了。

这时，民工过来说，要倒回去，在前面的沙滩宿营。此时“第一梯队”一拨人早已没了踪影，有人用对讲机呼于宪光，于回话说，他们已经冲出了五六公里。

我们按原来的小道返回沙滩。我想过的脚在沙滩上走走，便把鞋和袜子全脱了，哪知经阳光曝晒的沙滩很烫脚，只好又穿上袜子。这沙滩是好地方，到了夜间，睡在上面，即十分清爽，又可免遭旱蚂蝗的侵袭。

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忙着搭帐篷，有些新队员第一次搭帐篷，不知如何才能将它支起来，我过去曾远征过南极，去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所以搭帐篷对我来说算是驾轻就熟。

搭时先把卷好的篷布在地面展开，然后把套管型的龙骨拉长，呈对角线平铺好。两个人一摠，形成弧度，再把套管两头插在篷布底垫四角的金属孔内，摠在地上。帐篷的另一个对角，照此办理。支好后，把系在帐篷左右两侧和后面的绳子绷直，再用锚钉固定在地上，这帐篷就算搭好了。帐篷前边有门，门上有拉链，门的上部还有通气孔。门有两层，一层可以用拉链拉实。为了充分透气和防蚊虫，也可只拉严布满纱眼的内门。我们所用的帐篷有六七种，比较讲究的帐篷方还有“客厅”。

大伙正在搭帐篷之间，于宪光回来了，他一个劲的埋怨不事先通知他，让他们几个人白白跑了很多冤枉路。

这一件事引发我的联想。为避免盲目性，考察队领导事先应该做好宿营规划，如果有老队员到过扎曲，询问一下他们以前宿营在什么地方，然后派位轻装的民工先行，在宿营点示意考察队员停步。据我所知，到过扎曲的老队员并非没有。即使一位没有，也可以在时间上做些限制。如先行的队员，

到下午几点几点，不要再继续前进，要就地等待，以便于后来者共商并确定宿营地点。还有，如果谁体力好，报名先行，任何队员不要超过他，他负有选择宿营点的责任。显然，考察队这些组织工作出现了疏漏。否则，作为副队长的于宪光就不会一味向前冲，白跑了许多冤枉路。我们也不会误入原始森林，惊恐地在密林里做徒劳无益的挣扎。说真的，因此吃些苦头倒没有什么，就怕导致意外，那会悔之晚矣！

温泉漫过石头红

我和李渤生、何平乎三个人找不到路时，曾盲目的穿行在江边一块块又大又圆的砾石上，砾石表面多呈红色，比平时常见的石头颜色明显不同，但是我对此没有认真思考，就踩着红石头急急忙忙追李渤生去了。后来我才发现，这表面赤色的砾石同泉水有关。

这时，部分没有走冤枉路的队员已比我们先到沙滩地，准备宿营。也不知他们从哪儿打听到的消息，发现此处有温泉，而且已经有人泡在沙滩边缘靠山的温泉里边了，边洗还边大声嚷嚷：“真痛快，大家快来洗温泉。”

此时已经下午五点多，走了一天的路，队友们无不疲惫不堪，听说有温泉，精神都为之一振。我快步走了过去，只见在一丈多高的山崖下，有一大块裸露的时候，颜色与我刚才经过的砾石滩的石头一样红红的，大石头的下边是一个幽深的洞，洞口有两处泉眼，泉水源源不断的从里边冒了出来。有两个队员就在洞边一个面积为四五平方米，深约半米的积水潭里泡着。泉水从泉眼里流出后，先容存在小积水潭，潭的外缘形成小溪流，顺直流淌五六米长，便拐了一个弯，静静的朝南泻去，最后汇入 200 多米外的帕隆藏布江。我问队友们温度如何，他们说很合适，叫我赶快下水与他们同浴。

但是我想到应该先把宿营帐篷搭好，所以就沒下去。搭完帐篷后，我回到温泉边，只是想泡泡脚角乏。看看溪流的对面水里有一石头可坐下，就绕到前方，踩着一根独木，到了对岸，又回走到石头处。坐在石头上，把脚放在溪流里边。水温温的，约有零上 40 摄氏度。泡了几分钟，舒适之感油然而生，觉得两脚轻松了许多，全身的疲劳也减去一些。此前，我哪敢奢望在走了一天的山路之后能有洗温泉的享受。于是想到，考察队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宿营地简直太合适吗。

泡了近半个小时之后，我已不愿离开这溪流。再扭头看在水里泡着的队友们，还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竟毫无上岸之意。我禁不住他们一次次鼓动和诱惑，加上一天的劳累奔波，浑身汗渍粘乎乎的，忍不住也跳到泉水里边，让温温的泉水漫过全身。

虽然我过去见过被开发的温泉，也见识过冷浅，但遇到这种纯天然且未经加工利用的温泉还是第一次。温泉泉口处泉水清澈可鉴，水温适中，泡在水里，一天的疲劳顿时荡然无存，周身各部位轻松自如，紧张的心弦一下子也得到了缓解，真是痛快淋漓。此时的我竟也舍不得的上岸，真的很感谢大自然对我们的恩赐。

这时又有两个队员下来了。为了给他们腾出点空间，我有意把身子往

右侧挪了挪，立刻感觉到这里的水温与刚才所处位置有所不同，凉丝丝的。再往右一点，这种感觉就更为明显。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泉，一个是温泉一个是冷泉，两泉之间相隔不到一米，出水后汇成溪流。我担心在冷水里泡久了会感冒，在高原上得了感冒是很痛苦的，于是我又往温泉洞口的地方靠了靠，立即有一种不知是甜滋滋还是腥乎乎的味道，带着湿气扑鼻而来，相当难闻，越靠近洞口这种气味就越浓。凭直感，我认为这种气体肯定对人体有害，赶紧往外挪。我把我的感觉告诉队友，有的也往温泉洞口凑了凑，与我得出一致的看法。

大伙还在尽情地享受，有的说笑，有的在擦皮肤。我注意到温泉两侧的石崖都呈淡红色，而小溪流的底部呈淡黄色，人一搅水就一片浑浊，过一会儿，流水又变清了。想想小溪流下方的红红的砾石滩，我的兴趣来了，想弄明白，这泉流附近的石头，为什么不是呈淡红色，而是深红色。我穿上短裤，趟着温温的溪流向下游走，又发现浸在溪流中或高于溪流上的石头被严重侵蚀。高出水面约 10 厘米，如龟背一样的石头，其水线浸处的边缘，那浅黄、深红、浅蓝、深绿的线条，颜色分明的环绕着。看到造物主如此妆扮这些石头，我用照相机摄了下来。

至于泉流中及其附近为什么会有红石头，我想那是微量元素挥发的结果。同时我又看到，溪流中突兀出水面半米高的石头，均在中部和上部，形成深深的腐蚀性凹陷。我终于明白了，正浸在溪流中龟背石贴近水面的五颜六色的线条，是腐蚀的印痕。而高出水面的一些巨石的凹陷，是万千年前泉水丰沛，溪流溢满腐蚀的结果。

我在五大连池也见那类似的泉。有一年我去那儿采访，由于一路上长途跋涉使我口干舌燥，一到宾馆就急于找水喝。顺手把保温瓶的水倒进杯里，一尝竟是凉水。怕喝生水带来肠胃病，不敢喝下去。过一会，我突然发现杯子里原本清澈的水，表层变的微红，水面上还漂着油花似的异物，我不禁庆幸自己没有贸然去喝这水。后来服务员说，这是五大连池特有的天然矿泉水，喝了它非但不会生病，反而有助于身体健康。他还提醒我，这水最好倒出就喝，时间一长，水内含有的大量铁的微量元素都空气中的氧发生化学反应，表层水就变红，不能再喝了。为了开发利用五大连池矿泉水，有关研究人员急于解决的课题，这是水接触空气发生反应后的变色问题。

我认为，这些红色巨石，肯定也是泉水中的微量元素，如铁分子和钙分子随着水蒸气的挥发，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化学反应，久而久之，被熏染成红色。如果认为由于雨季的到来，使河水出现漫滩，泉水与河水浸染了周围的砾石，这一说法似乎不能成立，因为这有限的潜水比起泛滥成灾的江水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这泉水具有如此大的腐蚀性和挥发性，以及那难嗅的气味，我实在难以断定，长期洗这温泉浴，是对人的身体有所补益，还是有所损害。现在的关键是需要专家对水质进行分析测试。回到帐篷，我问同行的水资源专家关志华，他说他也说不清，只有回北京问他们研究室搞地热的专家，才能说出个所以然来。我只好带着疑惑把这件事放了下来。

后来，我们在不远处又发现了一个比较大的温泉。这个泉和刚才那个泉有所不同，刚才那个泉是平流，现在这个形成了不到一米的落差，温度也比那个泉稍高，零上 50 摄氏度左右。由于有了这一落差，在泉前躬腰，泉流可以顺着手臂流下。

沙滩营地是美好的，有山，有泉，有白色的沙滩，由郁郁葱葱的森林，

还有江对面垂直而下的几十米的飞瀑，这是我们所没有料到的。这地方正处排龙与扎曲之间，待排龙——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拐弯成为世人向往的地方，完全可以把沙滩营地辟为一个中转旅游地。如果科学家证明这温泉对人体健康十分有益，游客可以一边洗温泉，一边欣赏江对面飞流直下的飞瀑，以及仰视天空的流云。那种感觉与在城市里的温泉洗浴是无法相比的。我在北京去过不汤山一处疗养地的温泉，看到泉池内的人那么多，水也不很洁净，两相对比，让我更对帕隆藏布江边两个长年流淌、清澈可鉴的温泉留下好感。

后来我得知，从排龙到扎曲 36 公里的距离内，就分布了四个温泉，在通麦有一个温度达零上 80 摄氏度的温泉，扎曲附近也有一座。再加上沙滩营地边上的两个，足见这个地方温泉密度之可观。

据有关资料记载，在西藏，从绿草如茵的狮泉河料，到重峦叠嶂的横断山区，东西绵亘 2000 多公里，是我国水热活动最强烈的喜马拉雅地热带，地热分布密度之大，类型之多居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首，在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其地热显示类型有水热爆炸、间歇性喷泉、喷汽孔，冒汽穴、热水湖等 70 余种。前面提到过的 4 个温泉都位于喜马拉雅地震带，它们只是西藏星罗棋布的 600 多个温泉中的几个。

温泉是怎样形成的呢？其有关专家分析，地下水在向地壳深部下渗的过程中，由于温度的增高而改变方向往上流，形成以热水和蒸汽为主要成分，甚至还有某些岩浆成分的流体，这些流体沿着地壳的裂隙，通过各种途径的方式出现在地表。主要有两种形式，间歇喷泉和由水热爆炸。水热爆炸是由于长期水热喷发引起地下掏空而出现坍塌，形成大大小小的热水塘和热水湖，比如我们前面看见的那两个温泉。间歇喷泉是周期性的，水热活动使然。它每隔一段时间就喷射一次高温汽水混合物，由此而得名。相对来说，间歇喷泉比较罕见。

科研人员的多年考察证明，喜马拉雅山区的主要水热区，几乎全部集中在喜马拉雅山以北、冈底斯山以南的藏南河谷地区，纵贯其间的狮泉河

雅鲁藏布江深大断裂带及其两侧的各横向断裂带，这里集中了主要水热区。从通麦到扎曲，恰恰就是在印度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缝合带上。地热之所以分布在这一地区，关键是因为这一地区的亚欧板块和印度板块互相挤压、碰撞，地质构造复杂，活动剧烈，随之出现县地下岩浆活动频繁，温泉众多。现在西藏还有很多温泉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如果有一天都能派上用场，对人民、对国家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五颜六色的帐篷竖立在沙滩上，大伙接着吃饭。天渐渐黑了，我和同帐篷的关志华较早钻进帐篷睡下。年轻力壮的队员韩东光则跑到民工宿营的地方，和他们一起围坐在篝火旁谈天论地，同憨厚的藏民们打成一片。韩东光那句：“雅鲁藏布，轰，拿鱼来买！”每喊一声，都会换来门巴族民工的轰然大笑。这，我在帐篷里听得非常真切。我对在志华说，大韩肯定边说边出洋相，否则，就这么一句话，不会重复一二十遍，民工还总是颇感兴趣。后来，我们眼皮沉得像铅，不知不觉间昏昏沉沉的睡过去了。

到后半夜的两三点钟，震天动地的江水声把我吵醒了。此时，白天的疲劳已经大有缓和。突然，我的脑海里有个念头在闪现，我们距帕隆藏布江只有三四十米的距离，如果上游降下暴雨，河水暴涨，漫出河道，来势凶猛的江水，在我们没有觉察到的情况下，极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将我们卷进江流淹死。我想起了历史上关羽水淹七军的场面，几十万大军在顷刻之间没了踪

影。再一想旁边吉普车大小的砾石都被江水卷到河滩上，更何况我们这些区区血肉之躯。我认为，在野外宿营时，应该考虑各种危险因素，特别是藏东南这样的地区，在泥石流、雪崩、滑坡塌方等自然灾害出现比较频繁的情况下，选择宿营地时千万不能粗心大意，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之后，我忽然想起，这个地方还不是雨季，所以不存在山洪爆发，以及漫滩的可能，队领导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宿营地还是有道理的。想到这儿，我这颗为灾所忧的心才终于落地，接着，我又进入了梦乡。

难于过蜀道

我们从排龙到扎曲的一段路，可用悬、险二字概括。两地距离虽然只有 36 公里，但唯一的一条羊肠小道，有时有钢索吊桥横跨在咆哮奔腾的帕隆藏布江，有时又在幽深静谧的山谷地带延伸，除了我们这些考察队员和协助负重的民工，路上没有其他行人。

考察队事先发了一双棕色的高腰登山鞋，鞋底的纹理很深，也比较厚，我试了试，觉得重些，便放在家里，另外带了一双旅游鞋和一双胶鞋。旅游鞋的鞋底纹理很浅，易滑，走山路比较危险。这样，一路上我主要穿在家常穿的那双普通胶鞋，虽然适脚，但鞋底很薄，踩在湿地石头上，又硌脚又打滑，更增加了路途的艰辛。路上，我一直为没有带来登山鞋而懊悔。可这又有什么用呢！离家千里，没有任何补救措施。

实际上，帕隆藏布江两侧基本是峡谷地带。一路上，我们大多是在临江的半山腰间行走，有的地方左面一侧是五六百米深的陡崖，探头往下一放，令人头晕目眩。由于谷底狭窄，江流落差大，水流十分湍急。加之两侧的山势突兀耸立，又造成水声轰响，很是吓人。行进中偶尔也走到两侧山脊之间距离拉大的地方，出现阶地，声音相对少些，但突大突小，更给人造成一种莫名的恐惧。这使得我们虽置身于峡谷之中，但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体会它那雄奇瑰丽之美。

走着走着，队伍又形成三五个人不等的小分队。因为只有这唯一的一条小道，路面很窄，便无一例外的形成梯队。沿途拍照，是考察队员徒步行动难以集中的原因之一。

每个人的兴奋点不一，有的拍争奇斗妍的植物，有的拍奔腾呼啸的江水，有的拍负重的民工，有的拍悬崖峭壁，队伍自然慢慢散开。好在只有这唯一的路，不存在迷路的问题。

不过，不会迷路并非让人对安全完全放心。我不停地跑到前边去，拍摄队友、民工攀陡崖、过险桥的各种神态。当我拍完了，收拾好相机，整理好装备，他们已经走过去很远，我被甩在后面。因而，相当一部分时间我都是独自一人，或是穿行在阴暗潮湿的原始森林边缘，或是在江桥上颤颤险行，或是在天阶石栈上小心登攀。每临其境，前不见队伍，后不见来者，那种孤单，那种焦灼顿时油然而生，欲排不能。

在我看来，最危险的是徒步经过滑坡区。从排龙到扎曲，一路上要走几个这样的路段，虽然每段只有三四十米，或再长些，却往往让人胆战心惊。

滑坡区的险在于，一侧的几百米之下是滚滚急流，白色的浪花在空中翻卷沉落，然后以排山倒海之势呼啸着奔腾而去。另一侧是滑动后稳定不久的坡度很陡的土石。此处没有小径可言，只有宽一二十厘米略为踩平的一串脚印。走到这里，一旦脚下不稳，身子一斜，就会滚下江里，步入黄泉。摔侄后自救是不可能的，坡上坡下光秃秃的，没有一束可以顺势抓住的茅草，也没有一处土坎挡住下滑的身体。只要滚入江水中，也就干净利落的被死神拥抱走了，转瞬间便无影无踪。依照这一险况，即便队友在路上的一端站着，也无从救助。陡手的他，没有任何可施用的手段。

也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每到了这样的滑坡区，我都“脚踏实地”，一小步一小步艰难的向前移，并暗暗的告诫自己，可不能踩不稳或踩空了。如此这般，我都战战兢兢的过去，过后我觉得背部凉凉的，原来是吓出了一身冷汗。

老虎嘴也是险要之处。还是当地的门巴族人在峭壁当中凿出的路，也可视为栈道。

它只有一米左右宽。所谓老虎嘴，即山体的急拐弯处。顺着岩崖，伸展的半空中的路到了这里，便形成了老虎嘴。由于这地方三面临险，稍不留神即会坠入崖下。

从安全的角度出发，探险队经过这种地方的时候应拉安全绳，起安全保护作用。由于我多次参加野外考察采访，所以考虑得最多的是安全问题。因为探险不是冒险，而是进行科学考察，并获得科学成果，故而安全是最重要的。如科考队员在南极越冬时，站区几十米或几百米的范围内都拉有安全绳，万一一人到室外突然碰到飞沙走石的大风，找不到方向，他就可以顺着牵拉绳回到考察队的站房。同样，通过滑坡区等险要地段，探险队应拉这样的绳子，以备患有恐高症或心脏病的队员经过这里时，有所依附，避免出现事外事故，造成生命危险。

科学探险队员出征前，都要进行身体检查，体检表里，可没有“是否患有恐高症”的体检项目。这样，谁恐高，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我曾经去过三峡巫山县鬼城参观。

当时我们从长江的巫山口岸上几十米高的混凝土阶梯，到了城边，又驱车到参观点的山下。要想登临鬼城，必须乘一段长长的，逐步升高的缆车。当时同行的有一人就患有恐高症，他坐缆车上去的时候，吓得双目紧闭，战战兢兢。参观完鬼城之后，他死活也不肯再坐缆车，执意要一个人走下山去。当时太阳西沉，天色已晚，为了及时赶回江边的渡口，只有乘缆车才能节省时间。再说下山的路又不熟，他一个人穿林过岗同样很危险。

我就跟他说：“我多次参加过野外考察，胆大命大，我跟你坐一个缆车，保你安全。”无奈，他只好听从了包括导游小姐在内的劝说，与我同坐一个缆车下山。为了消除他的恐惧感，缆车在空中运行期间，我不停地跟他说笑，转移他的注意力，总算平安到达了山下。

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考察队中也有这样的恐高症患者、高血压患者，因为没有得到有效保护，从滑坡区或“老虎嘴”附下，走上黄泉路，谁不知道他是怎样失踪的。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假设，不是被野兽叼走了，就是掉到江里了。或者是有什么窝心的事想不开，自绝身亡。或者碰到牛，两者狭路相逢，牛把他拱供了下去。试想一面是悬崖峭壁，脚下是急流滚滚的滔滔江水，万一真的掉下去了，根本就不会留下痕迹。真如此，怎么向他的家属交

待？最明显的例子是 80 年代初，科学家彭加木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罗布泊考察时失踪了，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为了找到他，有关部门真是不遗余力。派直升机搜寻，组织部队战士采取拉网式寻找，均毫无结果，至今下落不明，是一个难解的谜。

对于彭加木的失踪，谁也不知道内情，只能做各种各样的分析和解释。有些外电甚至造谣说他独自出走了，并在美国见到过他……万一我们首次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春季预察人员因附崖失踪了，又该作什么样的假设呢？

我们一路上走过四座吊桥，吊桥上面横置木板，两边几乎没有护栏，即使有也只是用根铁丝缠绕在横跨着的长长的钢绳上。铁丝网空隙较大，鸭子都能钻过去，很难起到护栏的作用。人走在上边，桥晃动的幅度很大。走快了也有危险，急急忙忙看不准脚下，遇到漏空的地方，就有可能踩空。我想，万一出现问题，人必须尽快坐下来，这样既能减小桥的晃动幅度，又能保持平衡。新的桥还算比较结实，桥板几乎没有脱落的。但旧的桥则不然，有的桥板已经脱落，只有竖板，出现很多空格。透过空格，可以看见 100 米之下的滚滚急流。胆小者走到这样的地方，真会天旋地转，魂飞魄散。这 4 座桥有 3 座在 60 或 70 米长不等，而最后一座桥竟长达 180 米。有的横板掉了，山民便用新确下来当木头补上，人踩在上面很容易滑倒，真是千悬万险。

总算战战兢兢地过了这 4 座桥，过后我们都长嘘了一口气，现在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尽管如此，我知道我们还是很幸运的。过去考察队员要通过帕隆藏布江时，没有吊桥，只有凌空横扯在狂奔的大江上的钢缆。过时束好人身，人倒悬着，慢慢的倒爬过去。

从排龙到扎曲，沿着帕隆藏布江，一路上经过峭壁区、碎石区、滑坡区，历尽艰难险阻。最累人的当属接近扎曲时那绝对高度在六七百米，曲曲弯弯的山路，几乎是步步爬坡。此时时近中午，天气炎热，令人大汗淋漓且不说，还几乎喘不过气来。于宪光这个“急先锋”本来一直走在队伍的前面，他也累得走走停停。我跟他说话他不回话，脸色灰青灰青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不理人，他说，这鬼地方简直累死人。他是先抱着一条腿移一下，然后再抱另一条腿抬一步，才艰难的行进着。幸好这个地方海拔还比较低，植被茂盛，氧气充足，否则真会有人累倒在这里。

后来我们路过一个长满野芭蕉的山坡，无不欣喜若狂，因为听说扎曲马上在望。郁郁葱葱的野芭蕉林在远方雪山的映衬下，无限娇媚，我们赶紧拿起相机照了两张，如果是平时，我们会从多角度去拍摄，但今天是在太累了……

快到中午 3 点时，一处有油菜田、栅栏、羊群的村落映入我们的眼帘，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之一——扎曲终于到了，来到了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顶端。

到扎曲之后，我叫队友给我拍张照片留念，相片上的我躬着腰，两手搭在膝盖上，累得站都站不直。还有满脸疲倦，脸色灰青，眼皮肿肿的……我从来没这么疲倦。

大拐弯雄姿

扎曲村坐北朝南，正好处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顶端，背倚峻峭挺拔的青山，南傍呼啸奔腾的滔滔江水，东西两侧是曼坡。举目四望，层峦叠嶂，郁郁葱葱，雅鲁藏布江宛若一条绿色的丝带，镶嵌在绿波林海之中。

我们的宿营地就选在桔口的一块平整的草地上，约有 50 平方米。草地上很不干净，偶尔还有猪牛羊粪。此时大家都疲惫不堪，所以只稍处理就开始搭帐篷，一直同我住在一个帐篷的队友关志华落在队伍的后边，还没有到达营地。考虑到他年纪较大，我应该金干些，所以我勉强挣扎着站起来，把帐篷布放在草地上，一点一点的摊开，再艰难的把它支起来。

这一路上淌了不少汗，浑身到处汗渍渍、粘乎乎的，非常难受。特别想简单擦擦身子，清爽清爽，哪怕是洗洗脸，漱漱口也好。吃过晚饭之后，我和几个队友蹬了独木梯，翻墙爬上营地后面的阶地，因为那儿有一根水管，我们科学探险队做晚饭时用的就是这里的水。可是现在水管里的水已经断流了。一问方知，水已经被对另一户人家截走。原来山水沟通到村里时，各户备一个管道接口，谁家用水谁家就把水截走，移到自家流向的水管上去，其它水管的水就自动断流。藏东南很多偏僻乡镇都是这样用水。这里水质一般都比较好，不需要经过净化处理，只需利用落差、截留等办法，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山上接取饮用水，因为山上有的是瀑布、泉水。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只能把水引到村头，却不知怎样多管道地分流这样自来水，于是才出现排龙村、扎曲村的用水状况，要不任其流淌，要不轮换使用。如此现象，给居民带来很大的不便。由此我想，如果我们的水利专家能够帮助他们改善一下，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采用分流开源的办法，多安些水管，把水导向各家各户该有多好。该地区居民大都是小聚居，住户之间相隔不远，不像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沿克里雅河散居的居民，都是单门独户，且相隔数里、十几里，极为分散。因此，只要有条件的单位努力，对到了村头的水做些多管分路，真可算是给藏东南人民做了一件好事。

也许是我们的营地距居民区太近的缘故，宿营地周围有很多跳蚤在草地上“兴风作浪”，企图叮咬“自投罗网”的队友们。为了保障队友有一个好的睡眠，王维手持喷雾器在每座帐篷四周喷洒药水。我看着这位多次从事科学探险的老队员，勤勤恳恳地为他人服务，顿生敬佩之情。

晚上，考察队的领导到离营地 200 多米远的猎户去家访，了解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各段能否穿行的情况，为秋季的正式徒步穿越做准备。据说户主人林富曾多次潜身于大峡谷之中，比较熟悉各个路段的情况。但他说他也只是分几段穿行过，从来没有做过贯通性行走。林富说，有的路段山热陡峭，又兼有飞瀑，加上树高林密，很难行走。秋天时，由于过了雨季，草木更加茂盛，旱蚂蝗也更为猖狂肆虐。他希望科学探险队对此应该有充分的准备。他还同意科学探险队的请求，秋季徒步穿越世界第一大峡谷时，充当向导。

科学探险队领导家访回来之后，天已漆黑，队员们都躺到帐篷里边休息去了。由于晚饭前，我喝了一杯易贡浓茶，刺激得我一个晚上竟毫无睡意。更心烦的是，有一大一小的两条狗转着我们的帐篷足足叫了一夜。薄薄的帐篷不隔音，每一声狗吠都听得特别真切，格外刺耳。叫的最欢的是那只只有半岁多的小白狗，基本上是叫个不停。我心想，它怎么就不知道累？中间偶停，旁边的一条毛色灰青的大狗马上又接着叫。狗闹了一宿，队员们虽又累

又困，但几乎没有人睡个好觉。

扎曲最美的时候当属它的早晨。一大早，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霞光透过山尖与重重云彩之间的空隙，柔柔地照在营地左边的麦田和小木屋。村里炊烟袅袅，在朝晕的映衬之下，更显得生机勃勃，颇有田园诗意。

扎曲村的南面，不到 300 米处，就是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顶端，站在悬崖边的一个最佳视点，这个呈 U 字形的大拐弯可以尽收眼底。只见雅鲁藏布江从西滚滚而来，折向南边，然后以冲出山门之热向南奔腾而去，同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在山谷中回响。前边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马蹄状的青山，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多布拉雄山。山上除了三块裸露的直立峭壁之外，其它地方绿色葱茏，布满了原始森林；远处群峰挺秀，山脉绵延，满目都是醉人的绿色。

它的西南面，约 400 多米处，是罗布城堆山。伫立山头，不仅可以鸟瞰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如果是晴天，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远处的南迦巴瓦峰也会露出一个三角形的尖顶，雪白雪白的，坐落在绿波林海之上。

往西，又是一个近似 U 字形的峡谷，它就是帕隆藏布江大拐弯。江水继续下泻，注入雅鲁藏布江。这个大拐弯与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极为相似，只是没有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那么壮美，那么有气势。我就曾经产生过这样的幻觉：有一次，我举起相机，想把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全貌再一次带进我的记忆里。结果我发现，这一次在我的相机取景框里，能把整个大拐弯全貌基本包括。当时我觉得很怪，以前几次拍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拐弯时，只能拍下二分之一，这是怎么都进入了取景框。等我突然明白过来，我现在拍摄的是帕隆藏布江大拐弯时，才知道我弄错了地方。接着，仔细一看，它只是形似而已，它的拐弯近乎直角，右拐角江流上还有一座钢索吊桥。呈锥状的山上布满植被，只有一块裸露的峭壁，还有一条小路横穿而过。我在想，如乘飞艇悬在两个大拐弯中间的上空，是否可以清楚地看见从西滚滚而来的江水，和同北而来的江流，山体是否在这里形成一个漂亮的“M”字形呢？如果真的形成这样的地貌，可真够绝的。即便不是如此，在短短的距离之内，竟有两个极为相似的大峡谷，这在世界上恐怕也是极为少见。

向西举目了望，蜿蜒起伏的加拉白垒峰便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早上，当扎曲村还只是东方发白，太阳没照射到的时候，连绵高耸的加拉白垒峰就已经披上了一层霞光，它熠熠生辉，金光闪闪，魅力无穷。为了拍下这良辰美景，队员们早早就起来，跑到高崖支起照相机架。过来一会，当扎曲村也迎来万道霞光之际，加拉白垒峰已由金色变为银灰色，浮云飘飘渺渺，在山峦之间来回绕。又过了一会，太阳已经高高挂在中天，加拉白垒峰由银灰变为白色。在短短的两小时之内，它由金黄色变为银灰色再变为白色，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和回味。

扎曲村北面，是扎曲最高的山峰，山的顶部白雪皑皑，雪线以下是茂密的森林。由于扎曲后山坡度很缓很缓，加之植被覆盖较好，这个村不存在泥石流、雪崩等问题。北山的高山隆起，又成为抵御北来冷空气的一道天然屏障。

扎曲的魅力除了人们所津津乐道的马蹄形大拐弯之外，其丰富的物种资源，纯朴的民风民俗也同样吸引着人们。在这儿，你会看到热带雨林浓荫蔽日，凤尾竹挺立山坡，杜鹃花争奇斗艳，藤萝植物纵横交错。你还可以看到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各种稀有动物、植物，以及颇具民族特色的建筑，如阁

楼式小木屋等。因此，很多人都想身临其境，目睹扎曲的芳姿，领略大自然的玄妙。我国有些研究人员就曾到此，深为大峡谷幽深壮阔、摄人魂魄的场景所陶醉，不由诗兴大发，作诗文以表感受。

雅江峡弯举世惊，三临水畔景色新。

巨石垒岸沧桑证，吊桥高悬峭壁青。

更叹三水汇合处，雪峰溅玉媲晶莹。

绝险绝美遂宏愿，此生不虚雅江行。

作为大峡谷顶端标志点的扎曲村，地势得天独厚，随着科学考察的进一步深入，到这个地方的游人会越来越多，扎曲村一定会逐步兴旺，走向发达，为世人所瞩目。

抒发感言

对杨逸畴、李渤生、高登义和我 4 位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者来说，抒发感言是我们在大峡谷的一项重要活动。在北京时，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到达扎曲，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顶端的时间，正好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公布于众 4 周年纪念日。

直到到了林芝，由于科学探险队临时改变路途计划，决定先不赴派，改由先赴波密与扎曲一带，我这才意识到我们极有可能在纪念日这天赶到扎曲。

这是一个很难得的好机会，如果借此举行一个仪式一定很有意义。4 年前，我们 4 人共同发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这一发现经科学论证，于 1994 年 4 月 17 日公之于众，通过新华社播发电讯，18 日，全国各大报纷纷刊登。4 年后的今天，我们一块来到这块让我们魂牵梦绕的土地，那份喜悦之情自然难以言表。因为这一次 4 人同时来到此地，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我们都知道 1998 年就九十月份的秋季，科学探险队正式徒步穿行大峡谷时，甚至是以后，我们 4 个人不可能再相约共同来到这个地方，而且更不可能碰巧在纪念日的当天赶到。首先是我不可能再来了，我们编辑部公务繁多，我的领导不一定还同意我来；其次，杨逸畴年高体弱，不堪长途奔波之艰辛，他是否再来，也在两可之间，如果不利用这个机会纪念一下，说不定会十分遗憾。

举行一个什么样的仪式呢？我一时还拿不定主意。开会，每个人陈述一番发现第一大峡谷的过程和意义，没有听众，也就没有必要。4 个人在大峡谷边上合影聊表纪念，这个形式过于简单，似乎很容易做到，体现不出那种纪念日的感觉。但如果诉诸文字，把每个人的感受记录下来，既简便也不落俗套，又让这一时刻永远地带进我们的记忆里。

这个想法初步形成之后，我先找杨逸畴征求意见，没想到竟一拍即合，后来我和杨逸畴分别同高登义、李渤生说，他们也非常赞同。既然大家都赞成，我们就着手做准备工作。

要记要写，必须有大批纸张以及粗笔。由于在北京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此只能在当地买。4 月 13 日，我和老杨从我们住的灵芝迎宾馆出来，沿

街向南走去，想去买写感言的纸与笔。沿笔直的铺面房倒是不少，但没有卖纸的，所卖的笔又都太细。但是我们想，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就随便买一本挂历，因为挂历纸比较大，也比较硬，但问了几个店员，都说没有。我们抱着再试试看心态继续往前走，这时乌云密布，天色阴沉沉的，眼看着雨点很快就要掉下来。回不回去呢？我们在犹豫。想到明天就出征了，到下边的县城要是更难买到纸张，我们的计划就有付诸东流的可能。于是，我们又走向厦门广场，向香港街拐去。这里的铺面房更多，打听了两个小商店，都只卖百货。他们指点说，要买纸，只能到斜对面的文具商店去买。一位售货员还热心的向东南方向指了指。此时乌云更黑更浓，雨点已经噼里啪啦地往下掉，接触到地面，马上反溅成白色的水花，但一想到我们颇有意义的计划，我们便冒雨冲了过去。

当时我们穿的是考察队统一发的服装，衣服的后面印有“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考察队”字样，再加上我们到林芝已经住了一天多了，所以售货员一件即知我们的身份，并热情地迎上来，为我们什么时候走？到大峡谷考察什么？要买什么东西？我们一一作出回答之后，便问他们有没有宣纸或比较硬的白纸。有位售货员说只有一般的白纸。我们趋前摸了摸，感到薄了些，此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凑合着买了一张。心想，这白纸对折起来有一定的厚度，也可以勉强对付。纸买好之后又问有没有用于签字之类的粗笔。

售货员摆摆手，说这种笔也没有。不过他向我们推荐另一种笔尖弯曲的笔，说用这种笔写字的时候往下一摞，字迹就可以变得很粗，笔尖往上一抬又变细了。我拿起来看了看，笔上刻有“美术金笔”4个字。还刻有“写尽千古风流，画尽人间春色”两行字。试一试，还可以。我们花了20多元钱买了。笔买了，但墨水没有。好心的售货员说：“你们也只用一次，就别买了，干脆就从我们这儿抽一点。”说着，就拿出一瓶黑墨水让我们抽取。

从文具商店出来，雨下得更大了，雨点密密匝匝，这时候冒雨回去，一定会把纸淋湿，导致我们今天的努力功亏一篑。正犹豫之间，杨逸畴猛地把他的衣服打开，把纸稍折之后抱住怀里。连跑带奔，到了我们就餐的小饭店。我们的衣服虽被淋湿了，但纸张基本保护完好，只是边角着了些雨点，不影响使用。

林芝以后的路途，我都视这张纸如同心肝宝贝一般，生怕有所闪失，损坏了它。小心翼翼地把它折好放在我的挎包后边的夹层里，一路上随身携带，这就是为什么别人都只带一个挎包，而我带两个挎包，原因即在此。在徒步奔向大峡谷的那段路，多么疲惫，那么艰苦，多一个包就意味着多一份重量，多一倍的负担。说实话，我完全可以把它交给民工去背，自己轻装上阵，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我绝对保证这张纸不受损坏，保证我们抒发感言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我们4个人商定：如果沿途谁先想好了感言，谁就先在这张纸上留下自己的“真迹”，以免在现场写时出现病句或思路不畅等现象。因为这些内容有可能发表，甚至有可能载入史册。每个人事先都应先打腹稿，反复琢磨，然后写出最能代表自己心声和意愿的清词丽句。同时，把名字和日期空出来，到大峡谷大拐弯那天，再分别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一路上，我们4个人也确实也为写这个感言下了一番功夫，反复琢磨，最后才诉诸文字。

按照筹划，本来到扎曲的第一天，即4月18日，就该把写感言的活动办了。但这一天紧张得抽不出时间，只好推到19日。19日这天，我们准备

一大早就去大峡谷崖边写感言，主要是考虑早上从东方投下来的光线格外柔和，摄影的效果最好，天气也不热。但吃过早饭后，却迟迟去不了。缘是林芝地区的宣传部副部长普布多吉节和林芝电视台的两名记者要急着回林芝，因为他们来时比较仓促，没带任何装备，既无帐篷已不穿防旱蚂蝗袜子，难以再坚持下去。为了给他们送行，我们只好先把感言一事放一放，毕竟，他们一路上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已是艳阳高照，9点多，我们才急急忙忙赶到大峡谷山崖上最好的摄影点。与我们同来的还有人民画报社记者杜泽泉等。白纸铺开，4个人先后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日期，有的还补了句子。

我们的感言就写在我们在八一镇所买的那纸上。先是杨逸畴写，然后是高登义、我、李渤生。现将感言全部内容照录如下：

1998年4月19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4位发现者高登义、杨逸畴、张继民、李渤生，同期来到这个大峡谷大拐弯顶部，进科学探险考察和科学探险采访，感系万千，特留此言，已志纪念。雅鲁藏布江下游大拐弯峡谷是世界最大的峡谷。大峡谷的发现和认证，是中国科学家和新闻界很好结合的集体成果，是20世纪末一次重大的地理

发现，是对人类深化认识自然做出的贡献。大峡谷不但是世界之最，而且环境独特（特别是大峡谷是青藏高原最大水气通道）、自然景观众多、资源蕴藏特别丰富（特别是水力资源和包括森林资源在内的生物资源以及旅游资源）；大峡谷是一条聚宝谷，是人类共同的自然遗产。今天，我们再次来到大峡谷，面对大拐弯、面对在峡谷奔流的激流、满目青山的万千气象，心情激动澎湃。过去我们在大峡谷山河献出了青春，留下了一片深情，今天我们要为大峡谷继续努力，鞠躬尽瘁。让大峡谷永远碧水长流，绿山永驻。

大峡谷，我的高原情，我的中国籍！

杨逸畴

1998年4月19日
于大拐弯峡谷顶端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遨游在世界第一大峡谷水气通道中，感受这条水气通道同自然环境与人类之间的亲密关系。

高登义

1998年4月19日

难以忘却，1994年4月上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被发现是世界第一大峡谷，是中国科学院三位研究员与新华社一位科技记者智慧交汇，认识互动的结果。可见，自然科学工作者与社会科学工作者必要的合作与联手，会有效地促进和加深对事物的认识，以至升华，赢得重大突破。

哦！大峡谷，我永远神驰意往的地方。

张继民

1998年4月19日
于雅江大峡谷

我坚信：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必将以其雄奇壮丽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的生命世界，朴实无华的民族风情，纯洁无暇的自然环境震撼每一个来访者的心灵；同时她也将成为青藏高原上的一颗明珠，永久地造福于当地人民。能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深深铭刻于世界人民心中而奉献我的青春年华，

我终生无悔！

李渤生

1998年4月19日

接着，我们4个人并排蹲在悬崖边上拍照。当时我们所处的位置特别危险。临崖崖深500多米，谷底即是雅鲁藏布江，稍有闪失即坠入深渊。在我们之前，于宪光险些就在经惨遭不幸，他站在悬崖边上拍照时，像再往边上靠一靠，以为脚下是实地，没想到探脚踩到的却是一丛透空生长的草丛，要不是杜泽泉情急之中拉他一把，他就会一命呜呼。

现在李渤生两腿就半跪在悬崖边上，实在是不能稍稍往外挪一寸。我们照了几张合影，留下了难忘的瞬间。

我们4个人共同发现了世界第一大峡谷，在我们一生中，算是一个很重要的成果，也是对祖国的一点贡献。试想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就有两个世界第一，一个是世界第一高峰，一个是世界第一大峡谷，两者之间相距仅700多公里，难道不值得我们炎黄子孙骄傲吗？珠峰是谁发现的，查阅40年代的资料，说是飞行员在飞机上发现的，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说法。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则是我们，而非他人。在这一发现的4周年的日子里，我们共同来到这里，面对滔滔的大江和绿意浓浓的大山，感慨颇多。感言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情感的真实流露。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为我们的国土上有这样神奇瑰丽的人间美景十分自豪。

我们4位发现者共同认为，我们是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发现者，主要是基于五个方面的理由：一是首次明确提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理论；二是经过了科学论证；三是通过权威的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将论证结果公之于世；四是得到一些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高度评价；五是近年来不断掀起的世界第一大峡谷探险热、旅游热，以及初步形成的世界第一大峡谷文化，基本始于1994年春。

为了使感言更有意义，更具有保存价值，我们沿途请当地邮局盖他们的邮戳，有山南、拉萨、米林、加查等地的邮戳。我们回到北京之后，向同事和朋友们谈论起此事，他们都肯定了我们的做法，并建议把那张感言送进博物馆，让后人永远记住这段难以忘却的往事。

峡谷遇险

我绝没想到，我力尽艰险来到几回魂梦相依的大峡谷，竟在此险遭不测，差点葬身于这青山绿水之中。感谢上帝，他把我从鬼门关里拉了出来，使我幸免于难。

写完感言，合过影，大伙还在兴致勃勃，意犹未尽之际，一看时间尚

早，就顺路向西南方向走去。听老队员说，前方那个凸出的高山叫罗布藏城，海拔 2185 米。我们之所以欣然前往，因为说不定在那儿可以更有效地鸟瞰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雄姿。掉转身子，还有可能看到大帕隆藏布江大拐弯。另外，考察队准备将来在大峡谷设立两座纪念碑，设碑点一个在派，一个就是扎曲。罗布藏堆的山势很有特色，是否是最佳候选点？有待我们踏勘后才能敲定。

我、李渤生、杨逸畴、杜泽泉、林永键一行五人沿着唯一的一条小道爬上山去。山上灌木丛很茂密，由于少有行迹，小径两旁的枝叶，有的互相交错，有的甚至拦至腰际，幸好此时已经 10 多，艳阳高照，天气炎热，否则，这么高的灌丛，正好是旱蚂蝗的栖身乐园，我们难以躲过它的叮咬。

再往前，路更为徒些，路边有两棵高大的树。最有趣的是，这种树的叶子如同八九岁的小孩鞋底大小。除了树上有几片叶子在风中飘零，其它皆落在地上，叶叶相叠，足有 10 多厘米厚。踩在仍有绿意的叶子上面，滑滑的，站都站不住。不仅会摔得鼻青脸肿，还极易滚下陡崖。我还担心蛇藏在层层落叶下边，一脚踩上去后果同样不堪设想。为了防止摔倒或踩中蛇，我顺手拾了一根干树枝，折去侧枝，用做手杖。一是打草惊蛇，吓走它。二是用它挑开厚厚的积叶，以便找到一处脚踏实际的地方。挺直的有一毫米厚的叶片如同涂了油，坡下的刚被挑开，坡上的叶子又哗哗往下滑，盖住了刚挑出的裸露的空地。

好不容易才走到了罗布藏堆山脚下的一个凹口处，我们都疲惫不堪，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李渤生和林永键不知什么时候已窜到山顶，还大声地喊我们，说山顶的风光特别美，有一块什么大石头，并叫我们尾随而上。我们往上一看还有三四十米高，以及树林和灌木丛把小路都封死了，决定到此止步。

此时已近中午，等一会儿中央电视台记者还要采访我们，想到这儿，我们赶紧招呼他们俩下来。他们一前一后下来后说，在上面立碑效果特别好，我相信他们的话。不过，要是真的把碑竖立罗布藏堆小山，必须开辟一条路到扎曲村，为人来人往依碑留念提供方便条件。

下山时，路似乎更难走。我注意到路旁有一棵大树，它的叶柄约有一米长，钢笔那么粗。每个叶柄的端部长有 6 至 9 枚小叶。叶子形状呈椭圆形。刚才上山时我一心一意地提防蛇，竟忽略了这棵树的存在，更没发现它的叶柄这么长。出于好奇，我顺手扯了一个叶柄，想带回去给没到罗布藏堆的队友们饱饱眼福。我从李渤生那里了解到，这种很有特色的植物叫“鹅掌柴”，或叫“鸭脚木”及“公母树”，在我国南部各地和台湾省广泛分部，属于五加科，常绿乔木，掌状复叶，各季开花，呈白色，有伞形花序聚生，成大型圆锥花序，果实球形，暗紫色，木材可制作器具。根皮、茎近和叶子可入药，具有舒筋活血、消肿止痛及发汗解毒之效。

我挎着两个挎包，左手拄着木棍，右肩上就扛着这个大树叶子，身体难以保持平衡。

我颤悠悠地走到上山时经过的那片落叶区，站住向李渤生讨都这是什么植物？他说这种植物叫西藏栎，过去以为这种树不落叶，后来经过考证才发现，这种植物只在四月份掉叶，但很快就长出新叶。由于过去对它的这个特性不了解，还以为它是常青树呢，实际上根本不是。经过研究还发现，它现在正从落叶属向阔叶树过渡。什么时候完结这个过渡，也许是近千年，也

许是几万年，我过去所见的只有两种树，要么是落叶，要么是常绿，落叶的一般只在秋天，春天则是树木吐绿发芽的时候，而西藏栎却在一个季节里同时完成叶落叶发，大自然真是无奇不有，千姿百态。

再往下走不远，我拿木棍继续拨开落叶，寻找落脚点，以保证下山的安全。依然是刚清出一个脚窝窝，马上被滑下的落叶填满，如此反复，怎么也清不出可行的路来。这时后面的人已经跟上来了，我一急干脆一脚踩下去，谁知一落脚，我尚没反应过来，就一下子滑倒，正应验了我刚上坡时的假设。我想打住，但身子怎么也不听使唤，竟滑出一米多远。看看下边是越来越陡的坡崖，吓我一身冷汗，情急之中突然发现旁边有一棵小树，就在这紧要关头，我一把拽住它。总算万幸，要是没有这棵“救命草”，其结局很可能是悲哀的。这时后边的队友赶到我跟前，关切地问我摔得重不重，我无力的摇摇头，便挣扎着站了起来，心想，这个大峡谷真是怪地方，就是落叶，也给来到这里的人带来危险。

再往下边走，我们看到几棵既像松树又不像松树的植物，它也长针叶，但是往下垂。

它的松果有玉米棒子那么长，呈垂直状悬挂，我走到近前拽住几根针叶柔了揉一嗅，分明就是松树味。请教李渤生，他说这叫乔松，仅生于喜马拉雅山地，叶五针一束，针下垂，是最为美丽的松属植物，因它的叶色近于蓝，国外也有专家称它为蓝松。我们顺着山势，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西面望去，发现有好多乔松挺拔直立，在众多的植物中，有如鹤立鸡群，格外秀美。乔松、江水、山势集于一景，更衬出大峡谷的壮丽。

我们正顺着小路艰难地走下罗布藏堆山，这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项飞用对讲机呼叫我们，说他们已经和中央电视台联系好，准备在《午间新闻》直播对我们的采访，叫我们赶紧往回赶。

此时离《午间新闻》的正式播出只有 30 多分钟，刻不容缓，我们只好急急地走回。

为了节省时间，中央电视台记者把一个便携式的微型卫星电话机拿到大峡谷顶端入口处等我们。见我们赶到，项飞赶紧把我们叫过去，被采访的一共是五个人，高登义、李渤生、关志华 4 位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只有我一个人是记者。我之所以被列为采访对象，是因为我是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者之一。

便携式电话机放在大峡谷边上的一块凸起的石头上，为保护电话机，石头上铺一块布，我们 5 个人就在电话机前按先后顺序排开。项飞先做导播工作，给我们讲每个人该讲多长时间，应怎么说，并做了示范。这些导播工作是一定要做的，因为线路一旦接通，时间长短控制不好会影响《午间新闻》中其他内容的播出。我们 5 个人按先后顺序，一个人讲完之后另一人马上接着说。

高登义主要说水气通道理论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其周围地区的体现。

杨逸畴从地理、地貌角度讲大峡谷形成的地质历史。

李渤生说大峡谷是个基因库，这里植物丰富多样，是一个难得的宝地。

我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我永远神驰意往的地方。

关志华则希望大峡谷能成为继三峡之后，中国另一个最大的水力发电站，把喘息的江水变为电力，更好地为人民所用。

后来听说，这个采访录音就在晚间的《新闻联播》中播出。在播我的同期声音时，电视屏幕上还打出“新华社记者张继民”几个字。我的不少朋友就是从这个电视节目中，知道我又赴西藏中国科学院探险采访，离开了北京恬适的生活，可见《新闻联播》节目影响之大。

嗜血的旱蚂蝗

我对旱蚂蝗的最初印象，是 80 年代初采访时，从一些到过西藏的考察队员那里获得的。他们描述旱蚂蝗是如何的猖狂肆虐，叮人吸血，甚至还有旱蚂蝗山，山上旱蚂蝗遍布枝枝叶叶，让人听了心里发麻。

对于蚂蝗，我并不陌生。小时候我生活在农村，在村北的河泡子里，就有很多蚂蝗。

人站在水边，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它在水里摇动着柔软的身体来回游荡。要是把它捞起来，它很快就卷成一团，大的跟蚕豆差不多，小的如同火柴头。我们在河里游泳都提防蚂蝗，但也不怕它，一旦它叮到身上，狠狠地一拍即拍掉了。还知道蚂蝗绝不能硬拽，一拽，它的吸盘反而吸得更深。小时候我被叮过无数次，知道被叮的感觉。有时还喜欢把它从水里捞起来处死，最有效的手段是把它放在干土地上，经烈日一晒，很快萎缩死掉。对旱蚂蝗，我却一无所知，仅限于从考察队员口中和少量文章介绍中得出些许印象。

在去西藏之前，老队员就曾多次告诫我们，去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其周围地区考察，沿途会碰到很多意想不到的艰险，其中一个就是来自旱蚂蝗的祸害。为了充分了解它，做好心理准备，我还特意去查了辞海和汉语词典。

《辞海》的辞条里写道：“蚂蝗，是蛭纲动物的总称，属水蛭科，在我国常见为宽体蚂蝗，体略呈纺锤形，扁平肥状，长约 6 至 3 厘米，背面呈暗绿色，中间有数条黄色纵形条纹，雌雄一体，两端有吸盘，前面吸盘较小，口内有齿，在我国分布普遍，沼泽、湖泊、河流都易见，捕食小动物，虽刺伤皮肤但不吸血，旱形干燥后可入药。《汉语词典》里的有关词条对蚂蝗的解释，同《辞海》大同小异。可见，我国动物学家对人们所常见到的水蚂蝗研究是深入的，但对旱蚂蝗几乎没有涉及。查看以前涉及旱蚂蝗的文章，均没有附加图片去形象地描述它的形状，以及吸血之后造成的后果。因此我想通过此行，如有可能，把旱蚂蝗的样子拍下来，让人们对它有个更直观的了解。这，也是我这次考察的一个心愿。到达拉萨之后，考察队为每位队员配发了两双白色高腰袜。袜子的套管一直到膝盖，穿的时候把裤子套在里边，然后再把袜口的带子系紧，防止旱蚂蝗顺着裤管贴附人身，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袜子并不是那么有效。

我们第一次和旱蚂蝗打交道是在通麦的江玛米滑坡区。路的艰险，前文已经描述过，不再赘述。为使这险区永远留在记忆中，刚过险区，队友们就跳下车拍照。正忙碌之间，突然听说队友何平平惨遭“不幸”。我忙过去察看，遗憾的是没看见旱蚂蝗，只看见他颈部有手指甲那么大的紫淤，其中心部位颜色较深，正不停地往外渗血，很显然，这是旱蚂蝗留下的“杰作”。何平平赶紧用餐巾纸贴创口，血把餐巾纸都染红了，只得又换一次。车子继

续前行。一上车我就跟何平平开玩笑，说他是这支考察队中第一个被旱蚂蝗“亲吻”的人。他苦笑着说：“这词应该改一下，上升一下高度，我是考察队中第一个被‘女皇’‘亲吻’的人。”据他说，他被旱蚂蝗叮时一点感觉都没有，至于什么时候被叮上的，他更说不清楚。还是林芝地区的宣传部副部长普布多吉看见他脖子上有个旱蚂蝗，上前用巴掌把它拍了下来，他才意识到旱蚂蝗已经不知不觉“幸临”到自己头上。我仍感到奇怪，在当时的拍摄现场，近身处根本没有树，只是在10米外才有棵树。

再说我们驻足的地方只有10多分钟，旱蚂蝗不可能从脚底一直往上爬，它也没那么精明，一爬就爬到脖子上。总之，这旱蚂蝗是怎么吸附到何平平身上的，在他身上又停留了多少时间，是个永远解不开的谜。队友们都认为他之所以没有觉察，是因为旱蚂蝗附在人身上吸血时，分泌出一种麻醉物质和一种防凝血物质，致使被叮者几乎难以察觉，而一旦叮上之后就流血不止。这麻醉物质麻醉了疼痛神经，使旱蚂蝗更能迅速、有效地达到目的。

来西藏的路上，老队员曾经给我们说过，旱蚂蝗叮人时一般不易察觉，而且血流不止，当时我还半信半疑，现在这一事实终于得到了印证。再转念一想，如果旱蚂蝗钻进人的衣服里边或万一钻进人体的哪个部位，有可能会造成比流血更大的灾难，后果难以设想。我想起我过去看过的一篇文章，说个人从蚂蝗山经过时，以为他幸免于难，就未加注意，后来居然在他胸下摸出一个滚圆黑青的肉球来，原来是吃饱喝足的大蚂蝗，足有鸡蛋那么大，煞是吓人。一想到这儿，我开始毛骨悚然，人们所形容的旱蚂蝗的危害，绝非传闻，也不是“天方夜谭”。在这个地段，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肆虐的旱蚂蝗偷袭。我第一次对旱蚂蝗产生了不大不小的恐惧感。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从排龙到扎曲的一路上，我们开始进入防御旱蚂蝗的戒备时期。特别是经过茂林时，我们经常是双手握在胸前，弓着腰，以免碰着左右两侧及头顶的荨麻和其他植物枝叶，因为旱蚂蝗极有可能潜伏在这些叶子的上边。人从中一过，它就伸着长长的躯体翘首以待，千方百计寻找机会去叮人。我们每小心翼翼地穿过茂林之后，一走到植物比较低矮的草地或裸露的空地，就把脚抬起来左看右看，与队友互相检查身上的衣服，生怕旱蚂蝗不知什么时候“幸临”到自己头上。一路上不知抬了多少次腿，弯了多少次腰，累得腰酸背痛。至此我终于明白，考察队之所以发白色袜子，是因为白色袜子与黑色的旱蚂蝗可以在色泽上形成强烈的反差，使人能一目了然地看到“吸血鬼”。我很庆幸我当时穿的裤子是灰白色的，使我更容易发现裤子上的异物。同时我也注意到我的好多队友都穿着队里发的黑色和深灰色的裤子，看他们那么费劲地在身上寻找旱蚂蝗，我再一次庆幸领到了一条可以有效防旱蚂蝗的裤子。

由此我想到在野外考察的时候，为安全起见，服装的颜色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如在南极考察，队员们的服装颜色多是红、蓝等深色调，这主要是从安全方面考虑，深色调与晶莹剔透的冰雪可以形成强烈的反差，万一出事，别人从远远的地方就可以见到他。我们有些队员穿的黑、灰色裤子就远不如浅颜色的裤子那么一目了然，患有色弱或色盲症的人更不易辨认。队伍匆匆赶路，不可能老是停下来瞻前顾后地去寻找身上的旱蚂蝗。另外，我们当时穿的上衣是绿黑黄三色布拼制的，如果在冰雪或裸露的山地穿着它会很醒目。在绿水青山的藏东南地区，这种上衣不仅从防旱蚂蝗方面来说很不科学，

而且周围到处是绿树青草，与绿衣浑然一色，一旦遇险，更不易被他人发现目标。虽然这一路上并没发生意外，但我还是觉得考察队对服装的考虑有欠周到。

随着考察的深入，我们对旱蚂蝗的习性的了解也越来越多。那天我和李渤生、何平平从帕隆藏布江边的原始森林爬上来之后，来到一块有蓝球场那么大的平地。我们又累又乏，我和何平平就气喘吁吁地坐在路边的两块石头上，我刚稍微缓了口气，就听见何平平说有旱蚂蝗，我忙低头一看，见三只旱蚂蝗正伸着火柴棍一样又长又细的躯体蠕动着奔向我的挎包，眼看着要爬上去了，吓得我赶紧把挎包提起来离开，并把挎包翻过来倒过去地看了好几遍，然后再把摄影包提起来，确认确实没有旱蚂蝗之后我才罢手。这一吓，使我再也不敢随便把挎包放在地上或搭在旁边的树杈上，只好每时每刻都背着。

想想一路上的苦与累，相当一部分原因归于旱蚂蝗的骚扰。

利用这个休息时间，我正好可以仔细地观察旱蚂蝗这种可恶的“恶魔”。发现它与水蚂蝗并没多大的差别，只是体态细长，同样丑陋无比。借旱蚂蝗在石头上爬动的机会，何平平为了解解恨，就把他携带的印有“北京青年报”字样的红色不干胶贴在蚂蝗身上，想把它永远地固定在石头上，结果粘不住。第一次我以为是石头表面不平，不干胶接触面积小。第二次、第三次，粘性能良好的不干胶对旱蚂蝗仍然不起作用。这是因为它身上分泌出一种润滑液，而这润滑液使它可以见缝插针，处处畅通无阻，这或许也是它生存的一个重要条件。由于受印度洋暖湿气团的影响，使得这个地区温和多雨，很适合旱蚂蝗的生长。这润滑液的分泌恰恰得益于这地方温和湿润的天气。记得徒步奔向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那天，在队伍出发之前，多次参加西藏科学探险考察的队友王维就说：“今天天气阴沉沉的，正是旱蚂蝗活动的好机会。可千万要注意。”旱蚂蝗喜阴雨天气，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它较为活跃，而在骄阳似的天气里有所收敛。一旦它的一个吸盘吸上之后，就伸展身体往前仆。它伸缩能力极强，伸展时身体可比原来伸长一倍余。

在沙滩上宿营时，我的行囊是由民工背着的，他一路上走走停停，不时靠在路边的石崖边、树干处休息，有时甚至索性把包扔在草地上，说不定我的旅行包里已经收容了不少“吸血鬼”。包内的东西塞得满满的，旱蚂蝗藏在里边难以查找，想到这儿，我开始毛骨悚然，好像真的看到大大小小的蚂蝗正在一米多长的旅行背包里边到处爬。考虑到这一因素，当民工把旅行包交给我时，我来不及细看就把它甩到沙滩上，让烈日把旱蚂蝗赶出来或把它晒死。科学探险队发给每个队员的旅行包都是一样的，绿色与粉色相间，包外头有很多小袋袋、小兜兜。过了一段时间，我走近我的旅行包把每个小兜兜翻了一遍，就差没把包里边的东西全搬出来，结果并没发现这小“魔鬼”。看见很多队友都在忙着搭帐篷，我只好先把包放在一边，也去搭帐篷。

帐篷搭好以后，我把旅行包搬到里边，还没来得及打开，就看见一条旱蚂蝗立在旅行包上冲我摇头，一副劫后余生，幸灾乐祸的样子。我赶紧大声叫队友关志华来帮助除掉。好险，幸好发现及时。我倒不是怕它叮上之后流血，而是担心我睡眠时，在毫无防备的条件下钻进鼻孔或耳孔里，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

我不放心，想继续寻找旱蚂蝗，但此时天色已晚，帐篷黑黢黢的，只好听天由命。

由于太累，我很快入睡了，但这一宿尽作些与旱蚂蝗有关的恶梦。实际上这一夜什么都没发生，害得我虚惊一场。

有一次休息时，大家都在历数旱蚂蝗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我就跟于宪光说：“老于，你应该一直走到队伍前边，你的肉比较多，血也比较多，好在前面喂蚂蝗，我们在后边的就可以少受些折磨。”听完我的话，一些老队员哈哈大笑，在笑我的无知。

植物学家李渤生纠正道，事实恰好相反，旱蚂蝗一般很少能叮住走在最前边的人，因为它最初还没反应过来。而一旦第一人过去之后，产生热感应和声感应，惊动了潜伏在荨麻叶子上的、青草里边的旱蚂蝗，它们就争先恐后伸直腰，不失时机地摇头晃脑贴附到后来者身上。听完李渤生的叙说，于宪光冲我做了个鬼脸，建议我还是在后边走，他仍在前边走。

我们就这样力避旱蚂蝗地走过了从排龙到扎曲的这段路。到扎曲之后，我与队友顺着一条小路走到山坡上，从这里可以眺望大峡谷大拐弯的全貌。我拿起相机正往远处瞄，无意中发现一条长 10 厘米左右的旱蚂蝗正叮在我左脚脚踝处，摇动着身体。听我又招上旱蚂蝗，大伙都围过来，叫我乖乖地站在原地让他们拍照。此时的我倒不怕，因为我发现了它，又是叮在防旱蚂蝗的长腰袜上。拍完之后，为了表示我们的积恨，大伙决定把它处死。杜泽泉把它放在一块平面的石头上，然后用厚底鞋踩住，狠狠地转了两圈，旱蚂蝗被踩得稀烂，石头上留下滩泥一样的印痕。

回到扎曲营地，队友陈明发现他右腿的白布袜被鲜血染红了，血印有巴掌那么大，他坐在摄影箱上，抬起脚来让大家来。不用细，便知是旱蚂蝗所为，估计血已经流了不少，否则不会渗透三层裤袜。他不忍见浸润成片的鲜血和吸足了血的旱蚂蝗，便戴着墨镜，伸着腿，咬紧牙关，请队友帮助寻找“吸血鬼”。又是水资源学家关志华主动“请缨”，把他的鞋和袜子扒拉下来，只见他的袜底卧着一条旱蚂蝗。大家分析，这条旱蚂蝗足血后，掉进了陈明走路时反复践踏的脚底，加上干燥，它先是萎缩，然后被踩扁。

否则，它刚刚吸血落地时，该有一个鸡蛋那么大。它吸过血的伤口处还在往外渗血。防旱蚂蝗的袜口本来封得严严实实的，至于它是怎样钻进裤管里去的，实在令人费解。很可能是陈明的防旱蚂蝗袜带子的系结处有一松口，给旱蚂蝗造成了可乘之机。陈明穿的是科学探险队统一发的防水裤，外边又套了一层袜子，血渗出来这么多，可见这小小的旱蚂蝗真是不可小觑。这种惨状，怎能不让人心惊肉跳。

李渤生则认为我们的反应过分。他说，你们这些人真是大惊小怪，旱蚂蝗远比这厉害的还有呢，墨脱有个蚂蝗山，山上的树枝条条都挂满了旱蚂蝗。过山时，必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前进，目的是趁旱蚂蝗还没反应过来之前赶紧过，即便如此，人身上还是挂了不少旱蚂蝗，严重时须用刀刮才刮得掉。我国植物学家徐凤翔有一次经过旱蚂蝗山的时，就创造了一天挂了 400 条旱蚂蝗的记录。真如此言，我们所碰到的一两条旱蚂蝗简直冰足挂齿。据李渤生说，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共有三种旱蚂蝗，一种黑大，有 10 多厘米长；第二种细小，黑色，只有火柴棍那么小；第三种是花蚂蝗，毒性最大。可见，我们碰到的旱蚂蝗还是比较“仁慈”的一种。

沿途，我们又亲眼看到一条旱蚂蝗在一头牛的脑门上吸足了血，变得圆形的，足有鹌鹑蛋那么大，但牛却无可奈何，只好任它吸足血之后自行脱落。

到达扎曲宿营地的第二天，骄阳似火，帐篷里出奇的热，于是我们就想到大峡谷崖边上去站一站，那里绿树成荫。如果在别的地方我们早就不假思索地过去了，但在此地，谁也不想去，怕树上的旱蚂蝗感知到有人在树下，卷成一团从空中掉下来，掉在头顶上，衣领里。想去遮荫又不敢去那种痛苦真是刻骨铭心。值得庆幸的是，这次考察中旱蚂蝗没有吸到我的血。大家都说我戒备太森严了，叫我放松警惕，体会一下被吸血之后的感受，算是不虚此行，我坚决地表示拒绝。其实我也不知该如何有效地防备旱蚂蝗，认为不管防备得如何，它还是有隙可乘。听人说，这地方一到八九月份，旱蚂蝗会成 10 倍增长，不难想象那时候的旱蚂蝗肯定会更猖狂肆虐，因为八九月份的天气热，人穿的衣服少，会给旱蚂蝗提供更有利的侵袭机会。因此，如何有效地防备旱蚂蝗，值得人们去进一步探讨。

世间的事情没有绝对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旱蚂蝗是这个地区，乃至全球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如果旱蚂蝗明显锐减，说明气候在突变。尽管旱蚂蝗是令人讨厌的，但从保持生物多样性来说，倘若哪一天旱蚂蝗突然减少或灭绝了，这不仅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悲哀，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的悲哀。

蚂蝗可以入药，这在医学界早已不是新闻，但它是否还可以用在新的医学领域里边，有待人们去研究。我从一些资料中了解到，国内外有些医务人员正在研究发明一种适当控制凝血的药物，而旱蚂蝗正好能分泌出一种防凝血物质。基于此，能否从旱蚂蝗身上提炼出这种物质制成药物，用于治疗脑血栓、心肌梗塞等病症，或者让旱蚂蝗吸这些病人的血，说不定可以有效地防止中风以及抑制此类病情的恶化。

目前，有关旱蚂蝗的资料研究或少太或流于空泛，有待科学家们更多地去探索旱蚂蝗并使疑问得到解答。如：

旱蚂蝗是否与水蚂蝗一样雌雄一体？

它是如何生殖繁衍的？

它对环境的要求达到什么限度？

世界上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旱蚂蝗，是否中国独有？

旱蚂蝗以什么为生，寿命有多长？

吸血之后对人造成什么影响？是否有后遗症，传染病？

它是怎样进化而来的？

它与全球气候有何关系？

见到毒蛇

蛇，大多数人并不陌生，它那又湿又凉又滑的长长的身子，以及身上各式各样奇异的花纹，还有它可怕的毒性，都令人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感和憎恶感，以至很多人谈蛇色变。即使是没有毒性的蛇，人们也很难产生像许仙对白蛇娘娘的那种感情，也无所谓“敬”而远之。

大峡谷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球环境，使得这里成为各种蛇类的栖息所，有盘卷肥硕的大蟒蛇；有盘卧在草丛中，状如彩色尼龙的“南峰锦蛇”；有僵直挂在树干上的菜花蛇；也有剧毒无比的竹叶青、山烙铁头、眼镜王蛇……

在扎曲一带，我们考察队员就曾碰到过好几条毒蛇。一次我们几个人

顺着山路前往扎曲树西南边的罗布藏堆山，走在前面的林永键突然大叫一声：“蛇！”喊声未落，那条蛇突然飞快地在他面前穿身而过，他险此一脚就踩在蛇身上，等我们赶到他身边时，他还惊魂未定。下山时，我们走在通往雅鲁藏布江谷底的一条坡路上，见到一条竹叶青蛇。它见有人过来，赶紧钻进路边的一个洞。我们屈身望去，还可看到一段 20 厘米长的身子。几个肚子大的队友操起棍想把它挑出来，我连忙闪到一边，怕他们不小心把它挑到我的身上。因为竹叶青是剧毒蛇，其毒性之大，非同小可，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但他们挑了好几次，那条蛇反而钻进洞里去了。这是我们在大峡谷碰到的第二条蛇。短短的一会儿，我们就碰到两条蛇，这证实了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蛇是很多的。

对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蛇，我早就有所耳闻。几年前的一天，我到我的老乡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考察委员会研究人员谢国清家作客，他先给我看了他在青藏高原考察时采到的野生灵芝。继而，饭桌上，他又给我讲起 80 年代初，他与队友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同蛇打交道的经历。他说，当 they 从排龙进入大拐弯顶端考察时，洞路密密的草丛中，蛇特别多，就连当地的民工也不愿意在开路，怕被蛇咬。这时，搞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的小李总是义不容辞地走在前面。在扎曲附近，仅走了 100 多米的距离，他就捉到了 5 条蛇，其中有 3 条是毒蛇，可谓是难得的丰收。蛇在这里分布密度之高为高原地区所罕见。当他们来到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顶端的岗郎时，大家准备在山坡上扎营，突然听到有人一声叫喊：“蛇！蛇！”原来从帐篷边上又游出一条蛇来。小李闻声跑出，随手用钳子毫不犹豫地把它捉了起来。这条蛇棕黑带绿，长 1420 毫米，经鉴定它是在我国首次发现的锦蛇，属一个新的品种，定名为南峰锦蛇。它原来只见于南亚的拉达克、克什米尔到锡金、印度的阿萨姆等地，今天竟在南峰北坡地区发现，这对于研究这里的自然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小李成天和蛇打交道，他见到蛇便喜出望外，如获至宝，因为他是专搞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的。可是每当他用钳子捕到一条蛇时，难题就来了，他一个人怎么也不能把蛇投到装蛇的布口袋中去，因为布口袋中还有不少活蛇要爬出来。没有办法，只好请搞其他专业研究的同志帮他张开口袋，大家也只能硬着头皮帮着干。后面的问题又接踵而至，每到晚上，一口袋活蛇挂在帐篷上，吓得队员们提心吊胆，甚至整夜难眠。但小李总是笑呵呵地说没有关系。到考察结束返回内地时，由于飞机上不能带活蛇，此时小李只能狠心地很不情愿地用药物把几十条蛇活活处死带回去。

1984 年，我采访过一位科学家，他也谈“南峰锦蛇”，进而指出，这种蛇在中国大峡谷的发现，说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不仅是西南季风北进的通道，而且也是各种生物向北迁徙的路径。

过去，学术界对西藏地区有无眼镜王蛇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直到 1983 年 7 月，这个谜底才得到解答。那年 7 月 24 日，一支考察队来到墨脱的希让村。当地一位门巴老乡跑来报告说，他前一天在森林里发现了一条碗口粗的大蛇，吓得一宿睡不好觉。听说有蛇，搞两栖动物研究的队员小李，兴奋劲又来了，他请求那位老乡为他带路。穿过藤蔓交织、枯枝烂叶没脚的原始森林，他们慢慢地搜索着，终于看见一棵大树底下盘着一条大蛇。

小李连连向它投石头，它仍一动不动。于是他又想用树杈把它的头卡住。就在刹那间，眼镜蛇扬起了头，摆出进攻的架势，眼看着蛇要扑过来了，小李忙叫同伴开蛇。随着子弹的射出，蛇受伤了，它愤怒地向周围的人喷身

毒液，总挣扎着再次进攻。小李趁势用树杈卡住它的脖子，并叫老乡帮他压住，准备去捉它的颈部，谁知胆小的老乡竟吓跑了。

这给蛇造成可乘之机，它再一次愤怒地扬起头。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李奋不顾身冲上去用手死卡住蛇的七寸部位。同来的一位队友也不顾一切冲上去按住蛇头，奋战五六分钟之后，这个凶猛的家伙才被他们镇住。据鉴定，这是一条眼镜王蛇，两米多长，4公斤重。

从西藏返回北京的路上，我又听说我们考察队的林永键，在扎曲附近还拍到一次蛇的照片。我问他是真的吗？他点头称是。我请他给我这蛇的照片，他同意了。

细想想，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有蛇并不新鲜。温湿的气候，茂密的森林，加上奇多的小动物，都适合于蛇的生存。好像在这样的地方见不到蛇，那才是怪事。

大峡谷动物知多少

野生动物对环境的要求是比较苛刻的，为求得生存和繁衍，诸如安全，互为依托构成生物链，尽可能避开人群，远离工业污染，寻找适合自己生存的环境空间，这都是它们所需要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就是这样一块宝地，这里树高林茂，人迹稀少，气候温和，很适合各种动物生长，因而这里动物云集，种类繁多，甚至世界上一些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在这里都可以找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不仅是个难得的植物王国，而且也是个重要的动物王国。

我们在大峡谷期间，就曾偶遇一些动物，有剧毒的竹叶青、嗜血咬人的旱蚂蝗、秀美的太阳鸟、迟钝的蛤蚧、成群的蝇子等等。

看见太阳鸟是在扎曲旁边的一片树林里边。当时杜泽泉正举着照相机拍摄。他很惊讶地自问道：“这个地方怎么会有太阳鸟？”我凑过去说：“这有什么奇怪的，树林里的鸟不是很多吗？”杜泽泉说，这种鸟他过去只在墨脱见过，而墨脱距此地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可见这些年太阳鸟也往北迁徙啦！这是动物迁移的一个信息，很潮，值得人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里，抑或是沿帕隆藏布江畔行走，我们经常听到树林里各种各样鸟的鸣叫声，远远近近，忽高忽低。特别是一大早，当太阳刚从东边山头上升起，植物叶片上的露水盈盈欲滴之际，这时只要往大峡谷上一站，就会听见吱吱喳喳的鸟叫声响成一片，仿佛在互相比试高低，叫声不绝于耳。如同平时在公园里见到溜鸟的，鸟笼里的一只鸟先叫，旁边二三十只鸟也跟着叫成一片。但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其邻近地区听鸟叫声，根本享受不到人们常说的悦耳动听、婉转悠扬的美感效果，只有没完没了的喧闹。大峡谷的江畔附近海拔往往不高，又树高林茂，十分适合鸟类生存和繁殖，使得这里的鸟类大量繁殖。

我们在大峡谷到较多的动物之一就是蛤蚧。对于蛤蚧，我并不陌生，我曾去过广西有名的长寿县——巴马瑶族自治县采访，临别时，县里送给我们一些小礼品，其中就有蛤蚧酒，就是用蛤蚧泡制而成的一种药酒，据说这种药酒可以滋补身体。酒内没有这种动物，我一直不知道蛤蚧长的什么样。

它的样子很像北京夏季出现的小蜥蜴，有青蛙那么大。有一次我在大峡谷崖边，正要拍照，突然看见两只蛤蚧趴在旁边的一块灰白色的石头上，左顾右盼，我拍摄完了它依然不走，这时我只要扔块石头，它很可能在劫难逃。

我回扎曲营地的路上，看见台湾记者张贞璞从远处拍摄回来，手里倒提着蛤蚧的尾巴，它还活着。大伙说，这么大的蛤蚧，最好泡药酒。也有人说，要泡药酒，应把它剖开，取出内脏，否则泡出来的药酒太脏没法喝。旁边一队友对此不赞同，指出：此言差矣，应趁蛤蚧还活着的时候，把它往瓶子里一放，立刻倒上酒，这叫原汁原味。众说纷纭，各执一端。蛤蚧在巴马是一种珍贵的药用动物，真有如药酒标签上标明的补肾补身、明目醒脑作用的话，那么，雅鲁藏布江的蛤蚧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药用资源。而这里的蛤蚧又多，又迟钝，便于开发利用。

在大峡谷，还有蝇子到处飞。它比一般的苍蝇体积小一半，形状差不多，但远没有内地苍蝇那么敏捷。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它总在人的面前来回飞动，有时为了驱赶它，我们不得不拿着帽子不停地扇动。否则，它就落在人们的嘴上，眼睛上，鼻口处。这时，只要眨眨眼睛，保准能夹住一两只。用手一揉，不小心，还会揉到眼睛里去，等费劲地把它弄出来，早已泪流成行。而周围的蝇子依旧在面前飞动。为了驱赶蝇子，我们往帽子上喷驱虫剂，以至帽子上的药味十分浓烈，嗅嗅都刺鼻，蝇子不起作用。而对赶不走驱不散的蝇子，我们实在找不出对付它的办法。只好跑到江边躲避。这里地热开阔，风大，蝇子停不住。江边也不是久留之地，风太大，吹的时间长了容易患感冒。而一旦回到背风的地方，又是蝇子的天下，扇跑了一帮，不知从哪儿又冒出来一群，不停地摇动手臂，不一会就把胳膊都摇酸了，简直令人无所适从。

鉴于我们在大峡谷及其附近地区停留的时间短些，因此无法见识这里更为丰富多彩的动物世界。在和杨逸畴、李渤生闲聊时，他们向我娓娓述说了他们以前在大峡谷经历的各种险情，以及见过的各种动物。其中就有熊、马蜂、扭角羚、猴子、野猪等。

有一次杨逸畴和几个民工走在路上，突然看见前边不远处的巨砾堆间，有一只黑乎乎的狗熊正晃晃悠悠地往谷坡上走去。面对这一险情，他们都吓坏了，赶紧往回撤。谁知，它似乎听见声音或有预感，就在原地停了下来。民工赶紧开枪，一枪命中。但凶猛的狗熊并没有马上倒毙，竟向他们直扑过来。在这紧要关头，民工赶紧又连开两枪，才击毙了它。他们走到近前一看，这只熊足有 100 多公斤重。

老杨还讲了他和另外两个队友以前在野外遭马蜂袭击的故事。一次，他们在一处灌木杂草丛生的小块平地上宿营。去方便时，无意中触动了马蜂窝，很快，成群的黄蜂蜂拥而起，吓得他们连奔带跑，其中一个队友跑慢了些，被马蜂团团转住，他只好在地上打滚，以减轻马蜂的袭击。老杨为救队友，先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冲进蜂群才把队友救了出来。只见这位身遭不幸的队友脸肿得圆里放光，疼痛难忍。这是他们初次领教马蜂的厉害。后来他们在马蹄村考察时，再一次触到了马蜂窝，成群的马蜂嗡嗡飞起，幸好他们穿着雨衣，又戴着帽子，但还是有人被叮了几下。还有一次他们走在密林里的一条岔道上，有经验的民工认为前面可能有大马蜂窝，提出绕道行走。考察队员半信半疑，怕多走路，不想绕道，就小心翼翼地前进。谁知民工竟不幸而言中，刚行不远就听见蜂声嗡嗡，接着看见蜂群在天空飞舞。他们穿

上雨衣罩住头对准方向想顺路冲过去，不料有一队员只顾跑，偏了路，一下子歪倒路边，然后向江边滚去，幸好有棵灌木把他挡住，未造成伤亡。当地的老百姓说：“几只马蜂能把一匹马给蜇死，更不用说人了，谁都不敢惹它们。”

李渤生则向我讲起他在大峡谷见到到的扭角羚、猴子、野猪。

“扭角羚”其实就是羚牛，以犄角下弯后扭而得名。它其貌不扬，头上有角，鼻梁隆起，鼻孔极大，身躯粗壮而四肢粗短。它是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山地特有的动物，随季节迁徙。生活在东喜马拉雅山区的羚牛，体色棕黑，而川西的羚牛为棕黄色。它的绝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半山即半常绿阔叶林带和亚高山铁杉林地带，冬天则往山的底处迁徙，有时可到 1500 米左右的常绿阔叶林带，喜食亚高山针叶林下和林间空地的竹丛，以及铁杉和冷杉树皮，嗜饮含各种盐类的泉水。到了春天，它们逐渐往上迁移。盛夏天之际，则全部跑到高山灌木丛草甸地带。李渤生还曾吃过这种动物。有一次他去大峡谷考察，路险难走，又加上遇到倾盆大雨，延滞了他们的行进速度，一天也走不了 15 公里路。八天过去了，他们的距离目的地还有两天的路程。这时，他们已经“弹尽粮绝”，怎么办？为了完成考察任务，也为了生存，猎生们便冒着大雨出去找猎物。傍晚，他们兴高采烈地回来了，猎到一头老的雄羚牛，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这位研究员说，大峡谷的密林中主要有三种猴子：长尾叶猴、熊猴和猕猴。长尾叶猴比较温文尔雅，惹人喜爱，很少惹事生非。熊猴和猕猴则调皮淘气，性如顽童。往往到了庄稼成熟的季节，它们钻出山林，跑到当地农民的田地里连吃带践踏。为了保护田园，每到秋季，当地老百姓不得不日夜守在田地里。但它们出没无常，行动迅速，也不是很好提防的。李渤生曾在树林里见过一群猴子，当时他正披荆斩棘，奋力地挥动锋利的长刀开路，突然看见前面藤蔓在晃动，他以为是虎、豹、熊等凶猛的野兽，赶紧躲到树后仔细察看，原来是一群猴子。他当时的一位队友就曾收养过一只小猕猴，是当地老百姓驱赶猴群时逮到后，送给队员的。他们给这小猴取名叫“南迦”。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小猕猴竟和那位队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听到它的同类的招呼声，竟吓得那位队友怀里钻。

野猪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动物，高不足一米，常隐蔽于草丛中，十分狡猾。公野猪有两只半尺长的大獠牙，常在石上磨牙的内侧，牙尖得如同刀子一般锋利，一旦伤人，不亡即残。母野猪也极其凶猛，行动相当敏捷，当地的猎人把野猪列为第一猛兽，第二是狗熊，第三才是老虎，足见野猪的凶猛程度。在藏东南，野猪一般生活在 1500 米以下的低海拔地区，最喜在废弃的村庄或弃耕后形成的次生林和草丛中安家。野猪常用枯枝败叶在树的干燥处堆成面积约两三平方米、厚约半米的窝，极松软舒适。它们主要吃各种草根，也偷吃附近的庄稼。李渤生曾经差点在野猪林遇难。有一次他们到一个早已废弃 30 余年的小村庄去考察，路上恰好碰到野猪。那是他们休息时，民工把带来的三只猎狗拴在一棵树上，然后便开始点火烧水。水还没烧开，狗突然狂吠起来，怎么吆喝也不停止，竟将项圈挣断，向远处的丛林扑过去。猎手们这才意识到有野猪，抓起枪向狗叫的地方跑去。一声枪响之后，一只足有 250 多公斤重的大野猪应声而倒，猎狗们忙扑到它身上去乱咬。那一天他们一共打了三只野猪。第二天早上他们继续赶路，猎手桑杰多吉在前面开路，李渤生在后边一边作记录一边采标本。快爬到坡顶时，突然听到桑杰多

吉一声惨叫，只见一只黑乎乎的野猪将他扑到，原来是猎狗撵赤麂，见主人没追上来，便又跑回去，却半途撵出只野猪。这是头母猪，见狗在后面追，便冲下坡来，刚好和多吉碰了个照面，野猪见前面有人挡道，急红了眼，后腿一蹬便扑向多吉。多吉本能地举枪顶往野猪的胸膛并扣动扳机。野猪顺势张开大口，咬伤他的额头和拦挡的右手，紧接着又向后边的人冲去。后面的人见野猪来势凶猛，无不慌忙扑倒在地上，眼看着扑到李渤生跟前了，不知为什么，它就窜到密林里边去了。好险！队员们事后认为，幸亏这是头母猪，倘若是头公野猪，多吉的天灵盖早叫它的獠牙挑开了，后边的人也难幸免。

瀑布之谜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被一些学者称为“地球上最后的秘境”。其中的一个自然科学之谜便是：这里有没有比黄果树瀑布还要壮观的雅鲁藏布江大瀑布？一些当地群众说有，考察队员未经实地考察，只好表示等待今年秋天再来揭开这个谜。

4月19日下午，关志华、李渤生、项飞、徐进、张兢、陈明等队员，离开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顶端的扎曲营地，向西跨过帕隆藏布江来到门仲村。村中五六位青壮年告诉他们，从门仲村逆雅鲁藏布江而上，再走三天的路程，有一个洪水期时宽约150米、高60多米的雅鲁藏布江大瀑布。如果这是真的，它会超过宽约20米、高60米的黄果树瀑布。20日，这两位研究员回到考察队，把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向队领导作了汇报。有人提出，应该马上去考察一番，如果这个大B P的规模确如当地群众所言，这将是具有影响的地理大发现。

考察队长高登义决定开队领导会议，由大家讲座后再定。暮色中，沙滩上，紧急会议在召开。通过充分发表意见，大家认为，考察队员已精疲力竭，又未带攀岩装备，门仲村附近有没有大的瀑布，只能待秋季组队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再进行确认。

不要说别人，就是刚回到营地的老关，都格外的让人同情。他累得坐在我俩的帐篷前一动不动，脸色灰灰的，偶尔还伴有感冒的轻咳。队友们叫他去吃饭，去温泉泡泡，平时快言快语的他，连句话也不愿回答，只是摆摆手。其实，如此疲惫的还有很多队友。

有人提议晚上与民工搞个篝火晚会，热闹热闹，马上被队领导否定。累，已搞得大家没了那份情致。全长2057公里的雅鲁藏布江上的瀑布状况，是我国科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的课题，并将其列入考察内容。他们认为，雅鲁藏布江总落差为5435米，平均坡降为千分之二点六，这些数据在我国各大河流中居首位，因此比较容易形成大的瀑布。但至今为止，我国科学家除看到几处数米高的小型瀑布外，尚未发现一处振奋人心的大瀑布。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关志华研究员说，他们曾在雅鲁藏布江流经的桑日——加查峡谷中，发现两处瀑布。一是僧瀑布，高4.6米，宽33米。二是涅尔喀瀑布，高5.3米，宽41米。他们曾在涅尔喀瀑布下面的

回水处，捞过顺瀑布而下摔晕后尚未醒来的鱼。有一天，研究人员还看见当地群众在回水处捞鱼 20 多公斤，基本是裸鲤。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文敬也透露，他曾在雅鲁藏布江流经的白马狗熊附近看见一处叫桑伦的瀑布，高约 10 米，宽约 50 米。又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附近看见一处名叫孔坡尼的瀑布，也有几米高。早在 1985 年，张文敬就在《飞天》4 月号上，以“南迦巴马纪行”为题著文，描述他所见到的瀑布。他说，1983 年，“在当地政府和边防驻军的支持和协助下，我终于深入到大拐弯顶端地段。宽阔的江面在这儿突然变成了窄窄的深峡；峡中江流如射，浪涛飞溅，一个高几十米的大瀑布横锁江峡。

许多美丽的鸟儿不时从厚厚的瀑布水帘下面飞来飞去。被击起的水珠溅落在空中，又敛聚成团团白雾。从南迦巴瓦峰巅倾洒而下的太阳光早照在这白雾中，折映出道道彩虹，这些彩虹又恰似架设在雅鲁藏布江峡谷上的一座座金桥。我欣赏过金沙江虎跳峡的险峻，领略过长江三峡的雄奇，也拜识过黄河三门峡的伟岸，那气势，那风光，那令人遐想万端的奇景，同时在这里得到了集中表现！我们被这瑰丽的景色吸引住了，都不约而同地收住了脚步，尽情的欣赏大自然所赋予的自然美。我们吮吸着散落在唇边的甜甜雾珠，想和同伴说几句赞美的话，可是只见嘴唇动，却听不到声音，那声音早被咆哮的瀑布声淹得干干净净。”

本世纪初，英国人沃德在白马狗熊附近发现过更大的瀑布。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杨逸畴研究员在一篇文章中介绍说，沃德看到白马狗熊附近有两处大瀑布，河床宽 20 余米，分别高 10 余米。其中一处每当红日高照时，就会出现瑰丽的彩虹，因此有“虹霞”瀑布之称。1950 年 8 月 15 日，发生察隅——墨脱 8.5 级大地震，这两处瀑布从此消失了。

参加此次科学探险考察的有关科学家认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近 500 公里的长度内，尚有 100 多公里从未有人涉足。这条江上还有没有什么更大的瀑布，现在谁也不敢断言，只能等待进一步的科学探险考察结果。

闯进原始植被区

如果说地处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的特点，是以气候干燥、植物稀少、在裸露的谷壁上可以观察到从元古代到新生代的各期地层而取胜的话，那么，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其毗邻地区则是到处充满绿色。山上云杉、冷杉挺拔，山下热带雨林茂密。

大峡谷和它的附近地区竟有热带雨林！对于稍具地理常识的人来说，看到这个字眼不能不感到吃惊。从地图上看，北半球亚热带的界线，即北回归线是 23 度 27 分，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其邻近地区远远超过北回归线，又何来热带雨林？

这要归功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它的存在，成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北进的通道，或者称为西南季风北进通道。高登义教授曾形象地把闯进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的暖湿气流称为“温舌”。

每到夏季，“温舌”统治下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时而浓云低垂，雷声轰轰，大雨滂沱；时而阳光灼热，水气蒸腾，闷湿无比。这又为热带和亚热带植物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我们这支科学探险队从拉萨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途中，李渤生研究员向我们讲述起他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中长达一年的热带雨林生活时说，一次他置身于茂林中，抬眼一望，四周是一棵高达30余米的巨树。树干在10余米处分叉，树杈上浓郁的树冠像把巨伞把地面严严实实的遮盖起来，树粗一人难围。他再步入密林深处，一层乔木之下生长着多指橄榄、小果榕、斯里兰卡天料木等各种热带树种，以及更茂密的树冠将林间的天空密密荫蔽起来。有时目光所及不足十米，人就像被禁锢在一座阴森可怕的绿色监狱中。眼前的倪藤、省藤、扁提藤等各种粗大的木质藤木植物盘折曲伏，令人恐惧。

由于充裕的光照，温湿的气候，使得这里成为多种植物生长的富集地，仅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其邻近地区就有3700多种。而所处纬度与中国大致相当的美国仅有2000多种植物。更重要的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还是一些古老植物的避难所，很多植物至今仍保持着原始状态。第四纪冰期到来时，雪花纷飞，天寒地冻，肃杀了数不尽的生物物种。

以至在某些地区，人们发现它们的踪迹，只能通过化石的发掘，从石痕上看它残缺不全的枝干和叶脉，推想它当年的多姿多彩。但在那个遥远而又环境恶劣的年代里，生长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里的植物，却得益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的频频送暖，躲过了第四纪冰期寒流的大扫荡，茂茂盛盛幸运到如今。有活化石之称的藻苔，喜马拉雅双扇蕨、短柄垂子买麻藤、云南铁杉、领春木等珍贵物种，都可以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中看到。李渤生认为，这一地带可称得上是人类最宝贵的自然遗产之一。

从排龙到雅鲁藏布江大拐弯的扎曲，我们一路上可以充分感受到植物的原始状态和过熟状态。莽林之下，茂草之中，自然老化倒地的大树比比皆是。有的倒地木已快腐烂为泥土，上面布满青苔，与林地一色，只能隐约现出其巨大的轮廓。一些悬空朽木，竟成了幼树与杂草的滋生地，形成了死亡与新生共存的有机组合。谷底飞瀑下一根根保持完整的圆木，被激流剥光表皮后，推到河床巨砾堆上，横七竖八，在烈日的照射下，变成铁青色。

由于前往扎曲的路途匆匆，我们只能大致领略这些千姿百态，无限妩媚的植物，而无暇顾及去细细品味它的美感，它奇特的造型，更没有时间向谁一一讨教它们的芳名、习性等。特别是李渤生，这个外号叫“牦牛”的植物学家，一路上老是“脱离群众”，一个劲地往前冲，使我们这些外行只能走马观花，面对众多的植物，看不出所以然来。

我已打算好了，从扎曲返回排龙的路上，或者说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就开始，要千方百计寻找机会与他“耳鬓厮磨”，争取多认识一些植物。52岁的李渤生曾多次到大峡谷进行植物考察，可以说对这里的植物了如指掌，因而自然成为队员们认识植物的老师。

我也有立在先，明确地在这方面拜他为师，他愉快的结受了我这个学生。有了这个“师生关系”，就有了束缚他的条件。他走快了，我跟不上，就说：“你这个当老师的自顾自地往前跑，我这个学生能学到什么？”无奈，他只好等我。一些口语表达不清的植物特性，我干脆请他写在纸条上给我。他一一照办。我看到什么问什么，他基本上都能做到答对如流，可见其植物知识的渊博。也有偶然说不出来的，他就会说，待查完《植物志》再说。这

又表现了他的严谨。我发现，在科学探险队中，公开声明认李渤生为植物学老师的虽然仅我一人，但也有偷偷做学生的，杨逸畴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发现，我几次请教李渤生时，老杨也拿着小本子记。看到这个情景，我开玩笑对老杨说：“您别跟着掺合好不好。”他嘿嘿一笑，依然录下李渤生的话。事后我对队友们说，杨逸畴这人要当记者，肯定是好样的，特勤奋，一天到晚，只要有机会，逮住什么就记什么。对于知识，他这种如饥似渴的精神，有时让我这当记者的都觉得汗颜。

李渤生不时地进行“现场教学”，使我初步摆脱了树、花、草之类的抽象的植物概念，学到了很多具体、生动的植物知识，更深刻的了解藏东南原始植物，可谓趣味无穷。

仅仅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我有幸认识了十多种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植物，有我面前提到的松果状长玉米，所有松针如姑娘的短发自然垂下的乔松；有春季换叶，叶状如孩儿鞋的西藏栎；有叶柄极长，小叶多枚的鹅掌柴；有秀美的马桑，火红的野桐，翠绿的假百合等等。可谓千姿百态，各具特色。

马桑：是一种灌丛，满树枝条上结着密密麻麻的红色小果实，乍看如树上的胡椒。

单株或几株点缀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谷坡上，常不经意的闯进镜头，当人既惊又喜。

野桐：颜色火红的近似“霜叶红于二月花”的香山黄栌。由于它的色彩极为突出，常在绿海林波中巍然挺立，宛若“万绿丛中一点红”，我曾在野桐树小拾过它的落叶，亦红得耀眼。

假百合：叶子绿绿的，泛着油光，显得极为鲜嫩。我所看到的几株，都是生长在林下阴湿的地方。有的高达1米，有的民工将其拔出，只见根部如同白白的大蒜头。

独活：菊科，枝叶顶端开盘状花。花束直径约有15厘米，在绿叶的衬托下，格外秀雅。

南烛：二茎叶皆为粉红色，极为鲜嫩。它成片生长，其叶子可当烟抽，散发出一种香味。

4月20日，我们科学探险队离开扎曲继续沿帕隆藏布江返回排龙村。路上，我紧跟李渤生，果然收获很大。

一次，李渤生举起相机对着帕隆藏布江对面的茂密山林拍照，我问他此景点价值何在，他回答说，这山体明显覆盖着三个温度带的树木，上层的冷杉属寒温带，中层的铁杉属暖温带，下层的半常绿和常绿阔叶林属山地亚热带。多种温度带分层位依序垂直分布，层次分明，令人叹为观止。这也是帕隆藏布江流域乃至整个藏东南地区特殊的景观之一。除了这一特殊的景观，另外，帕隆藏布江沿岸形式各异，仪态万千的植物也令我频频驻足，如状如胡须的青苔，伏地蔓生的蛇莓，形如其名的醉鱼草，味浓刺鼻的野胡椒，摇曳多姿的青刺尖……

蛇莓：一种伏地蔓生的植物，在大峡谷平坦沙地尤为常见，有时成片。它页面褶皱，如同初春的小榆树叶。蛇吞食青蛙、鸟类之后，常以其果实补充体内维生素，故而得名。

其高度不到10厘米，几乎贴在地面，恰在蛇爬行的高度内。它的果实表层是数不清的乳突，而色泽和形状均如红樱桃，妖艳欲滴，非常诱人。我

问李渤生这种东西可否入口，蛇舔过之后人再吃会不会中毒？他反问我：“你在北京吃过的蔬菜哪一种没喷过农药？”颇有道理，但一想到它是可怕的食物味过的，还是不敢贸然相试。正议论间，林永键说他一路上已经吃过好几次了，味道不错，现在仍然安然无恙。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勇气摘一颗扔进嘴里。

青刺尖：灌木，枝条细长，稍弯，沿途常见这种枝条在风中摇曳，上面悬挂着很多紫色或绿色如同马奶葡萄状的果实，又如悬挂的小灯笼。有的枝条上果实密布，顺枝条依序排列，把枝条都压弯了，形成一条条优美的弧线。我曾多次问李渤生这是什么植物，尽管他告诉了我，可能是高山反应的缘故，我每每忘却。直到李渤生在我的笔记本上写道：“青刺关，可入药。”我才牢牢留在记忆中。为了解它，后来我品尝过一次，里面的核很大，浆很苦很苦，赶快将其吐出。

胡颓了：常丛生于河滩地，密密麻麻开着小白花，只有零星绿叶点缀，闻之奇香。

是一种“蜜源”，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荀子木：是一种伏在岩石上和地面上的灌丛。我看到，长在岩石峭壁之上的荀子枝，其枝叉如同伸展的手臂，呈平面上扩展，造型很美，很适合作为一种观赏植物引种。

櫨木：在藏东南雅鲁藏布江和帕隆藏布江峡谷两岸随处可见，连扎曲村也长了好几棵。它属于五加科，与人参同科，是常绿阔叶林下的伴生植物，高可达六七米，枝干上布满硬刺，顶部开花，与人参花极相近。果实可入药，是良好的观赏和城市绿化植物。

尼泊尔常青藤：顺着朽木攀援的藤子有八九米高。茂密的阔叶中结满小果，红黄色，如黄豆大小，果实成束。青藤可作园林绿化只用。

一抹白：此植物最有特色的是用手指一捻树叶，叶面上即明显出现白印，故而得名。

野胡椒：我见过北京山区一些县种的胡椒，多为灌丛。但帕隆藏布江畔的胡椒树高大，可成林。幼树的枝条是红绿色，脆嫩，一折就断。用手一碰叶，指上即留下浓烈的胡椒味，碾碎，更是强烈。沿途我们曾见一野胡椒林，满山遍野，采摘后可做佐料，当地的老百姓常采野胡椒卖给外地人，是一种难得的野生资源。

十大功劳：叶片很硬，有些像高山栎但略长些，外缘的一侧呈三个向内起伏弧度。

弧端长着刺人的尖，手碰上会刺得很疼。它的果实成束，我采摘数过一束，有7颗果实。

果实状如豌豆，但略大。成熟后为紫色，尝之苦涩。李渤生剪过它的一段树干让我看，只见树干外边包一层皮，约1毫米厚，有弹性，如同橡木。内里的木质呈黄色。中医上称“十大功劳”，是因为它具有活血化瘀，疏筋络，治拉肚子等功效。

青苔：状如绿色的胡须，有十几厘米长，又细又远。它常悬挂于林中大树的基部，与平时常见的青苔大不相同。夏季，城市和农村都长有苔鲜，但一般紧贴在潮湿、阴暗的地面上生长。据李渤生说，只要有一定的热度和湿度，苔藓就会发生变异，长成须状。

醉鱼草：叶片如同灰白色的海绵，叶脉凹下，陷藏在叶子里边，不很

明显。粉色的小花极不起眼。鱼吃了它会晕厥、浮起，由此而得名。当时我们想，如果哪个搞恶作剧的家伙把这东西往别人的鱼塘里一扔，鱼可就惨遭不幸。吃了醉鱼的人说不定也会发生类似的反映。我觉得，对醉鱼草很值得做些化学分析，看它究竟含有什么毒，而专门对鱼有害。

藏东南地区草丰林茂，郁郁葱葱，以至有人把这里誉为祖国的又一个西双版纳，甚至可以说这里作为地球上少有的基因库是当之无愧的。置身于大峡谷中，满目都是绿意浓浓，让我陶醉，令我流连，更激发起我想见识更多植物的愿望。这一次时间太仓促，我只能把所认识的几种作些简单的描述。在这诸多植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桫欏木和花头兰。

桫欏木是一种叶子近似于杨树的阔叶树，也有人称它为“先锋树”。这个名字颇有来历：在大峡谷及其周围地区，由于降雨量大，坡陡，因而经常发生滑坡，使得一些原本茂密的森林失去依托，树木被摧毁，有的被埋到沙石底下；有的树根朝天，形状各异，最后全部都枯死。过了若干年之后，滑坡区相继长了一些植物，接着便恢复原来的样子。

而率先来到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长的便是“先锋树”。通麦附近就一块这样的地方，除了滑坡区顶部和两侧狭长地带由于不适合植物生长，出现裸露的空地外，从滑坡底部到近乎坡顶的一个三角地带，全是清一色的桫欏木。就像人们有意在山坡上划出一个三角块特意栽植的。李渤生告诉我，它之所以具有这种特性，是因为桫欏木根部有根瘤菌能固定空气中的氮为己所用，即从空气中吸取氮，有类似于大豆根瘤体的固氮功能，可以改良土壤。当桫欏木林地的土壤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之后，其它树种才“跟踪”而来。而一旦其它树种深深扎根并成林之后，桫欏木自然“隐退”，转向更贫瘠的土地。桫欏木的这种知难而上，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的精神，很像 60 年代雷锋等一批共产主义战士不为名利，不计较个人得失，全心全意为全民服务的品格。应而，桫欏木也被人们誉为“共产主义先锋树”。

花头兰的得名在于它的花冠状如张开大口的虎头，里边的花蕊清楚地呈虎牙、虎舌状排列。花蕊上还有暗红的小斑点，活像老虎头上的花斑。花朵有玉兰花那么大，单瓣，呈淡黄色。花蕊则是深黄色，香气浓郁，极其艳丽。

我们第一次见虎头兰是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当时队友们正忙着赶路，不知谁喊了一声：“嚯，好漂亮的花。”我举目一看，只见在高高的山崖上，几束黄花很醒目的地点缀在周围的野草之中，它的花朵很自然的垂下来，给人以一种淡淡的美感。大家为其所迷，都抢着把它拍摄下来。拍完之后，队友们议论说，这是兰花当中最好看的品种。只是由于山崖太高，没法爬上去仔细观察它。

返回排龙的路上，走到一座吊桥的桥头，我们看到山崖长有几棵虎头兰。李渤生问我是否特别喜爱，我点头称是。他便爬上山崖，用修枝剪去挖，但由于根部太深，挖了半天也未果。这时旁边有个门巴族同胞看李渤生挖得吃力，便在旁边挖了几株，手举着给我们送过来。我忙连声感谢这位好心的老人，同时把兜里的一个钥匙串送给他作个纪念，他愉快地接受了。

与此同时，李渤生也获得成功，挖出的虎头兰花大叶茂。

此处距排龙还有八九公里，为便于携带，我把它扎成一束用手拎着。到了排龙村，队友们见了纷纷迎上来，这花很快就被瓜分完毕。他们还询问李渤生，将这虎头兰带回北京能否存活，李渤生说，只要精心伺候它就能生

存。

为了保证它的存活率，在排龙时，我们拥有虎头兰的几位队友都跑到村边上的山上去挖腐殖质厚的泥土，浇上水，裹在它的根部，并用塑料袋包好。我本想把它放在身边拎着，但从排龙回到拉萨还有七八天的时间，为了避免来回搬运损伤其枝叶，我们把这几株虎头兰集中在一个纸箱里，放在一直跟随着我们，保证给养的卡车上。听说这卡车要早于我们一两天回拉萨。

想到越走天气越热，搞不好这采自帕隆藏布江畔的花儿，到了拉萨，就会出现根部腐烂，叶子萎缩枯黄，枉费了我们一片苦心。但回到拉萨喜马拉雅饭店一看，依然十分翠绿，只是没了光泽。总的印象是，它还活着。就这样，虎头兰随同我们飞越千山万水，来到北京。一下飞机，周围的人眼睛一亮，很惊奇的看着虎头兰，不知道它是什么花儿。

到家之后，我顾不得洗却征尘，第一件事就是尽快把它栽在花盆里。它虽然还绿得可爱，但叶子的底部有些萎缩，我干脆把蔫的叶子剪掉，并每日精心的护理它。刚开始时，它的根部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天天枯黄，最后变干，迟迟不长新叶，我以为它要死了，非常沮丧，差点想把它扔掉，当我毕竟对它怀有很深的感情，并抱有希望。一天，我发现它的根部微微抽出了新叶，这一发现使我欣喜若狂，虎头兰终于在北京扎根了。

此后，它日渐茁壮，到现在，它已经长了好几片新叶，有 20 多厘米高。后来，我又到我的队友家里去看，发现他们的虎头兰还没有我的长得好，这使我得意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的很多朋友看了我拍的虎头兰的照片，都惊羨于它的美艳。同时提出，等我的虎头兰根深叶茂之后，也分给他们一株养在家里。据说，酷爱兰花的朱德同志就曾养过虎头兰。我不敢奢望我的虎头兰还会开花，我总觉得把它束缚在花盆里实在是太委屈它了。

它应该属于大自然。现在看来，它原有的叶子之所以枯黄萎缩，令我不得不剪去，大概是那段长途汽车运输造成的危害。好在这种野花生命力极强，要是娇生惯养的温室里的花木也如此这般折腾，肯定早就没命了。

离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已经好几个月了，那段日子令我怀念，让我痴谜，尤其看到虎头兰，我就想起大峡谷的青山绿水，画画草草，也想起在大峡谷经历过的酸甜苦辣……

极富特色的地名

我们怀着对大峡谷深深的眷恋回到排龙，第二天又马不停蹄地奔向林芝地区行署所在地——八一镇，一路上，虽然还是同样的青山绿水，但桃花已经远不如来时那么艳丽，那么灿烂，有些已明显凋零，枝头上小小的嫩叶也在不知不觉中冒了出来。天渐渐地了。

过色齐拉山口时，原来只有 1 米多深的积雪正慢慢的消融，路面的土石也有一部分裸露出来，路因此变宽了，到处溢满了雪水，湿漉漉的。中午 1 点多，我赶到了八一镇，发现街上的女孩不知什么时候脱下了春装，穿起了花花绿绿的裙子。想想我们离开林芝才短短一个多星期，气候却骤然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

除了上一次前往嘎隆拉山的路上遇到雪崩而未能成行，稍稍有点遗憾之外，总的说来，已有的考察还算比较顺利，比较令人满意。现在大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到派时，能够饱饱眼福，身临其境目睹南迦巴瓦峰的芳容。如果能够把它拍摄下来，那么这次考察就算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反之，没有了这个完美的结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次考察就逊色多来。至少，我们会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西藏，因为谁也不能保证下次还会来到这块遥远的对我们极具吸引力的热土。一时间，能不能拍摄到南峰，以及对它具有面貌的讨论成了整个考察队备受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此时已经是4月底，意味着这个地方的雨季说来就来，难以估测。如果雨季提前到来，重重云雾会遮挡住它的山体，它会羞于向世人展示它的真实面目。因此，考察队领导打算在林芝稍事休息，当日即奔赴派，争取时间去看南峰。由于去扎曲的路上很艰辛，队员们都疲惫不堪，多数人希望休息一天，养精蓄锐，再全力以地赴奔派。这个意见是对的，考察队领导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在八一镇停留一天。

上一次，八一镇整洁亮丽的街道，美好的夜景，商店服务员热情好客的服务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一次，我们又回到林芝时，住在某宾馆。它建在八一镇丁字街的右街角上，是八一镇比较好的宾馆之一。

原本打算好好休整休整，谁知，这一夜竟没睡好，第二天早上8点多，我们就准时出发直奔派。车从宾馆出来往南穿过香港街，然后通过尼洋河大桥，路经苹果林，沿着雅鲁藏布江往西走。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岗嘎大桥，这里设有边境检查站，意味着我们已经到了边境地区。事先为了保证顺利通过，我们取得林芝军分区的支持，办了边防证，所以通过岗嘎大桥时畅通无阻。驶过大桥，考察队兵分两路，有两辆车往西南方向直奔米林县城，去向米林县委、县政府汇报工作，为下次，系秋季首次正式徒步穿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打下基础；我们则沿着雅鲁藏布江向东行走。这时的雅鲁藏布江还在我们的左边汨汨流淌，右边是高山植被。沿途，我们路过几处河滩地，看见几座桥被毁坏，桥栏也已倒塌，可见这个地方到了雨季时，水势特别汹涌，到处横溢。不知科学探险队秋季再来时，能否通过。

下午两点钟，我们终于赶到了派。说起派这个地名，很多人一定会像我一样觉得既新鲜又不可理解。在偌大的中华大地上，以单个字出现的地名并不太多，特别以“派”这个字出现的，除了“派”这个地方，几乎绝无仅有。过去有些考察队曾将此地称之为“派区”，现在西藏的地图上，又标为“派乡”，其实这两个称谓都不对，它实际上只叫一个“派”字，具体含义是“横”。在派确实有“派乡政府”，我们来时路过乡政府，看见了标牌。

西藏的地名很有自己的特色，如“雅鲁藏布江”，这是约定俗成的一个叫法，在中国地图上，小学课本上，均如此写着。甚至歌曲里都有“高不过喜马拉雅山，长不过雅鲁藏布江”。但是西藏很多江流名字后边却不带“江”和“河”字。在当地的地图上，要是“帕隆藏布”或“易贡藏布”或“坡堆藏布”的标名、即后边带“藏布”二字，必须江流名字无疑。“雅鲁藏布江”后边带一个“江”字，就变成了“雅鲁江江”的意思。为什么不准确的叫它“雅鲁藏布”，我曾为此问过有关人士，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回到北京发稿时，我有意在“藏布”的后边加上一个“江”字。如“帕隆藏布江”，这其实是不对的，它与西藏地图地名标示存在明显的出入。当我想，既然大家已经叫惯了雅鲁藏布江，冷不丁冒出一个“帕隆藏布”，很多人一

定以为是地名或人名，为了顾及读者和听众，收到更好的报道效果，因此，我有意在这些“藏布”的后边画蛇添足，多加一个“江”字。又比如“扎曲”，在西藏一些地图上，甚至是权威地图，标的都是“扎西”，不知何意。可见，西藏地名的规范化还大有文章可做，很值得人们进一步去推敲、研究。

汽车快到派时，我们远远就看见山脚下一大片用灰色瓦楞铁皮做房盖的起脊房，基本上呈东西向，比较现代化。我们住在部队的营房。待把行李搬进房间，在地铺上铺好床垫，已经两点多了。此时，去米林县的考察队领导还没回来。我闲着没事，就拎着相机，一个人在院子里转了转，发现房子后边空场上罐头空瓶空盒成堆，几乎有近万个，可见来此工作的人有时是很多的。

之后，我就到对面的山坡上，想看一看周围的景观。旁边有个电机房，房盖早被掀开了，房子里有废弃的电机，看样子以前是个发电站。

山中间有一块独立的大石头，约5米宽，6米高，近似球体，只是它的底部略平，显然从山上滚下来的。最令人惊奇的是，这块大石头的顶部稀稀疏疏长了一些杂草和灌木，如同大石头的毛发。足见这些植物生命力之顽强。

站的山上，周围的风光尽收眼底。往东看，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伸进山窝，山脚下有几间民房，旁边均有栅栏围起。不可思议的是，从八一镇至派的途中，我们所见的桃花已经残败凋零，而这山窝里的桃花依然争奇斗艳，怒放枝头。

往北，即往正前方看，一台台灰白色的房子一字排开，列着山下的平地上形成一个建筑群。一棵高高的大树，傲然挺立在一大片房舍之中，有如鹤立鸡群。房子的北边，就是雅鲁藏布江，它流到这里后，好像已精疲力尽，形成一个水流平缓的开阔水面，犹如湖泊。江面上风平浪静，没有一丝涟漪，令人无法把它与奔腾呼啸的雅鲁藏布江联系起来。而江北，又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到派之前，我不知道它有多么重要，直到来了这个地方，我才发觉它确实值得我们考察，此处起着交通枢纽的作用。

首先，它是一个物质转运站，山脚下那一大片灰色的起脊房其实就是转运站的仓库，相当一部分运往墨脱的物资，就是以这里作为集散地的。夏季到来之前，从别处运来的物资先储存在仓库里，待到多雄拉山雪化时，大批民工，几百人、几千人在这里扛好东西，然后翻过多雄拉山，运往墨脱。墨脱大部分物资供应都是靠派这个物资运转站。现在，这些房子空空的，是为夏季到来而备用。我们问当地人，4月里能不能去墨脱，他们说，如果要从派到墨脱这条路，春季根本没法通行。尽管已经到了4月底，多雄拉山的积雪还有齐腰深。有的雪已结成冰块，走在斜坡上一不小心，就会滑到山脚下，很危险，当地人都不敢贸然行事。

其二，派是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起始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考察队之所以要来派，就是想考察从派到墨脱巴昔卡这496公里的距离内，哪个地方适合建立大峡谷纪念碑。如果在派，这个大峡谷的端点建立纪念碑，也很有意义。

其三，据估测，这里比较适合实施“秋季首次徒步穿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卫星实况转播。我们此行来到派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察看地形，看了进行实况转播的一些重要器材、装备能否运进来。以及此地有没有开阔地带，能够有效地接收和传输卫星信号，届时向全国和全世界实况转播首次

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重大科学探险活动。

其四，对于我们大多数没有到过大峡谷的科学考察队员来说，就无法更深刻的了解整个大峡谷的面貌。

最后，我们来这里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够有幸目睹南迦巴瓦峰的雄姿，因为过去的考察证明，在离派不远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南峰。不知我们能否实现这个愿望。

“羞女”撩开面纱

雄踞在藏东南的南迦巴瓦峰以它险峻奇伟、峻峭挺拔、难以征服而备受科学探险队瞩目。同时又因为它常年云遮雾罩，如同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被人们赐以美名“羞女峰”。此外，由于它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奇特的天工巧合使之神而又神。这些，都深深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科学探险队，他们或想攀登或想考察或只想目睹它的芳容。只不过收获差异太大，有的人高兴而来，败兴而归。也有的人满载而归，不虚此行。

在藏族人民心目中，它是一座“神山”，是神仙居住的仙境。关于它，在当地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其中南迦巴瓦峰山麓格嘎村的一位老人讲的故事最为扣人心弦。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青藏高原东南一带各种毒蛇怪兽兴风作浪，残害生灵，弄得人民困苦不堪，于是，上天就派南迦巴瓦和加拉白垒兄弟俩镇守在这一带。哥哥南迦巴瓦驻守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儿南岸，弟弟加拉白垒驻守在北岸，它们隔江相望，南北对峙，日夜忠实守护着藏东南的万千生灵。很快，各种毒蛇怪兽销声匿迹，从此天下一片太平，但南迦巴瓦自视有功，日渐滋长骄傲情绪，不把周围的众神放在眼里。而勤奋好学、埋头苦干的弟弟长得一天比一天高，一天比一天强壮，武艺也越来越精，大有超过哥哥之势。性格怪戾、心胸狭窄的南迦巴瓦对此十分忌妒，竟在一天夜里，趁加拉白垒熟睡之机，偷偷过江，砍掉了弟弟的脑袋。从此加拉白垒峰成了断头山。据说位于林芝县附近的德拉山就是那颗人头变成的。南迦巴瓦因此得逞，成为藏东南群峰之首。然而，如同所有作恶者一样，终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南迦巴瓦的罪行很快便被上天知道了，为了惩治他的罪过，上天令他停在江边，终身服役。这些神话传说，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性。

想看到并摄下神奇而美丽的南峰，一直是我们这些科学探险队队员的心愿，特别是快接近派时，这一愿望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明显。因为据以前的考察证明，南迦巴瓦峰不是那么容易拍摄到的。有些资料说，本世纪初，曾有少数外国探险家从印度来到南峰，想目睹它的雄姿，拍一两张珍稀的照片。谁知天公不作美，南峰好像成心跟他们捉迷藏似的，等了整整一个多月，它依然云雾重重，千呼万唤始终未曾一展其容，他们只好望山兴叹，败兴而去。我国有些考察队员为了拍到它的照片，也曾在此地坐镇等候，三四十天过去，他们始终未能尽意，最后不得不沮丧的离开这块伤心地。因此，南峰才被冠以“羞女峰”之名。

我们从八一镇赶到派时，已是下午两点多。接着，去米林县进行接洽工作的队领导也回来了。从驻地往东看去，可以清楚地看见好似被砍掉了头

的鞍型双峰山——加拉白垒峰。为近山所挡，则看不到南迦巴瓦峰。

据日落还有两个多小时，有队员迫不及待地提议，应沿着雅鲁藏布江向大度卡方向转一转，即使不能拍摄到南峰，也可以沿途看看地形地貌。队领导答应了。差不多5点时，我们乘坐的4辆丰田越野车奔向大渡卡。汽车沿着盘山道拐了个大弯后向东奔去，沿路还是同样的高山、江水，但多了阶地。快接近大渡卡时，发现此处有大片桃花正竞相开放，十分喜人。我正欣赏这艳丽的美景，突然听见队友说：“南迦巴瓦峰路露头了！”

眼前，被人称为“羞女峰”的南迦巴瓦峰大大方方地把它的美容展现在众人面前，银峰雪线，历历在目，锥形的峰体，是那么雄伟，峻峭，宛若一个魁伟的卫士。山腰浮云缭绕，使整个山体时露时现，又如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那薄薄的浮云，就象少女身上裹着的轻纱，衬托得南峰既纯洁而又端庄。

神山南迦巴瓦峰敞开了它的胸怀，慷慨地向队友们展露了它的真容，并用热烈、期待的目光迎接人们对它的赞美。谁也没料到，盼望已久的南峰竟出奇不意地给我们来了个意外的惊喜，令人们措手不及。大家连忙举起相机，选好角度，随即响起一片“咔嚓、咔嚓”揷快门声。拍了五六张之后，队友们才会过神来，原来大伙都欢喜过度，竟没注意到这个地方其实不太理想，据离南峰似乎远了些，不能很理想地把南峰的雄姿拍摄下来，如果再近些，说不定效果更佳。于是大家连忙收起相机，催促司机赶快往前开。

车飞快地驶下了一段很长又很陡的陡，拐了个弯，来到南迦巴瓦峰西麓的格嘎村。

雅鲁藏布江流到此地之后，好像突然积蓄了足够的力量，原来比较开阔平静的江水，到此一下变得咆哮起来，翻起朵朵白浪，紧贴山麓，猛地向东流去。到了格嘎村，就意味着我们已经深入了世界第一大峡谷。

突然看见冒出来这么多车子，好多老乡都惊奇的围了过来。这时，队友杜泽泉、杨逸畴等发现来人中有一老汉很面熟，再定睛一看，原来是过去协助他们考察过的德钦老人，这老汉穿着一件灰色的棉藏袍，戴着一顶旧毡帽，满脸风霜，约70岁的样子，很和气。老汉也同时认出了他们，便迎上来，很热情地大声问他们问好，看来他们之间交情不浅。

他乡遇故知，杨逸畴很高兴的拍拍老汉的肩膀说：“你真的还认识我吗？”

老汉眉开眼笑，大声说：“认识，认识，我们前几年不是一块上看过温泉吗？你们考察队的备用品，还多次由我来保存。”

杜泽泉也迎上来了，前几年他们也曾经风雨同舟，有过一段不解之缘。这一次见面，大家都非常激动，互相问好之后，就手拉手，又说又笑共同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

周围的人显然被这种范围所感染，又有其他藏族同胞围了上来，坐在旁边静静的看着这个激动人心的场面。我为他们久别重逢而改高兴的同时，也深感此地民风之朴实，大有戏剧舞台上那种又见当年老八路之感。

杜泽泉他们正指着远山谈论之时，李渤生突然提出要留在格嘎村，不想再跟考察队一块回到派的驻地，以便争取时间，第二天直奔直白，进一步深入的大峡谷考察。我当时很惊讶，觉得他的举动真是了不起，因为他没带任何装备，事先也没做准备，留在格嘎村，就意味着要跟藏族老乡一起吃糌粑，喝奶茶，盖居家的被子。这在我们这次考察中还是个先例，精神可嘉。

看来，他是临时突发奇想，否则不会穿一双旧皮鞋来到格嘎。

在这样一个山陡路险的大峡谷，穿皮鞋考察不单是折磨自己的双脚，甚至可以说难以远行。我正琢磨该如何劝他收回这个主意，没想到他突然说要跟我换鞋，要把他的旧皮鞋给我，他穿我的胶鞋。

这个主意不错，我坚决支持。我把鞋子脱给他，他忙弯下腰系系鞋带，蹬了蹬，说道：“哎呀！你这鞋有点小。”我的鞋是41码，他的鞋比我的稍大。我笑着对他说：“你就凑合穿吧，讨饭吃还嫌馊。你的鞋我还嫌大呢。”

考察队事先有这样的设想，到派后，个别队员深入直白进行考察。李渤生自告奋勇，显示了他对科学、对事业的挚爱，以及可贵的奉献精神，让人敬佩。

李渤生准备和藏族同胞回村，队友们这才发觉格嘎村地处低洼地带，它东边是一二百米高的土崖，把人们的视线都给挡住了，根本看不见南迦巴瓦峰。看看表已经晚6点多，再有一个多小时太阳就落山了。大家见势不好，赶紧后撤。决不能等明天，说不定是个阴雨天气，很难说南迦巴瓦峰会像今天这样慷慨地满足人们的心愿。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大伙迅即坐回车上，动作之快有如强敌来临。接着司机加大油门，车子发出阵阵轰鸣，一溜烟离开了格嘎村。

大伙回到原来的高坡，重新选好角度，准备拍照。谁都觉得刚才白白跑了这么多冤枉路。怨谁呢？只能怨自己的眼睛。有人说眼见为实，其实也是相对而言。这视觉差异太大，完全徒劳的把自己支配到低洼地。

拍了好多照片之后，队员们仍意犹未尽，觉得此地角度太单一，只有远山，没有近景相衬。接着又开始往回撤，约撤出两三公里。这时往左边一看，发现下边是一块非常大的平坦阶地，周围是群众用栅栏隔起来的墙。我们试图顺着一条小路从一家院子里穿过去，发现门是锁着的。正好来了一个老乡，我们就问他能不能把门打开让我们过一下，他愉快地答应了。我们径直穿了过去，来到一块约五六百平方米的阶地。这里比较平坦，属于歇茬的耕地，地面上长有很多桃树。往西的阶地，是群众砌起来的石头墙，里面种着绿油油的麦子。为了挡牛挡马，墙上放着三四十厘米厚带刺的枝条。

真是踏破鞋靴鞋无觅处。我们发现，在这儿拍摄南峰，角度是最好的也是最美的。

南峰全貌一览无余地展露在众人面前，清晰可见。整个峰体呈巨大的三角形。峰体西面，是断壁悬崖，格外险峻奇伟。而它的北面，则坡势较为平缓些，但同样如锯齿，似刃脊。

整个山体覆盖着厚厚的冰雪，银峰雪岭，在夕阳的辉映下，更是美仑美奂，堪称一绝。

山间，不时云雾蒸腾，依山而绕，来回飘动，令人赏心悦目。在这儿，以绚丽多彩的桃花作为近景，阶地上，还有一群牛羊，星星点点，散落在绿地之中。远近结合，虚实相生，更平添了南峰的几分姿色。所有的拍摄者都感到莫大的满足。直到太阳快落山，光线暗淡下来，无法再拍照时，大家才互相呼唤着离开。我足足拍了两卷胶卷，李永键比我更甚，他把他的胶卷全拍完了才肯罢休，可见南迦巴瓦峰魅力之大。

这不经意的一行使我们收获颇丰，不管是在格嘎村还是在大渡卡，都有好几个大面积的平坦阶地。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认为，这两个地方都适合秋季实施首次徒步穿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时进行卫星实况转播。更值得一

提的是，由于这开阔阶地的存在，为当地老百姓提供了种植作物的条件，使得他们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地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生存、繁衍。

迎着暮色，大家兴高采烈地乘车往回走，心想，即使明天天公不作美，不能与南峰再见面，也不足惜。我们长久以来的宿愿，已经在这事先没有准备的匆忙之中变为现实，也意味着我们已经大功告成。在我们面前，南峰大大方方的撩开了它的面纱，知道这是老天爷对我们的奖赏，还是我们来的时候是个好季节。无论如何，老天爷待我们真是不薄。

南峰之所以备受人们瞩目，不仅在于它的雄伟壮丽和神秘莫测，更在于它独特的环境，丰富的资源。它是喜马拉雅山东段最高峰，海拔有 7782 米，为世界十五高峰。它与围绕它的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儿形成其奇特的天然巧合，雅鲁藏布江实际上是围绕它呈马蹄形大拐弯。南迦巴瓦峰和它对面的加拉白垒峰，两山之间的峡谷又恰是大峡谷的最深处，有 5382 比。随着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发现，宣传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南迦巴瓦峰已经声名鹊起，并进一步名扬天下。

回到营房，我们向未去格嘎村的队友真实地描述了我们的收获。他们一方面为我们祝贺，另一方面也盼望明天有个好天气，看到南峰风，拍到南峰。

晚饭主食又是大米饭，副食是西葫芦与猪肉罐头大杂烩，几乎天天如此，千篇一律。

有时只是蔬菜的品种稍微有些变化。尽管菜谱单调极了，但由于我们每日过于劳累，吃起来量大菜香，好多队员不吃下三大碗饭是不会放下筷子的。尤其是今天晚上，又累又高兴，令人胃口大开。同志们都开玩笑说，回北京也会爱吃这种饭，而且必须是西藏的猪肉罐头炖菜。

派没有电，晚上黑灯瞎火。8 时多，大家打着手电及清理卧具，心满意足地躺下了。

多数队员很快进入梦乡，偶尔还有几个队员兴致勃勃的谈论南迦巴瓦峰的雄姿，还在庆幸我们来的真是时候。夜里的天气比较寒冷，为御寒，我把带来的毛背心、毛裤全部穿上，然后钻进睡袋。尽管如此，我夜里还是几次被冻醒。究其原因，主要是科学探险队新买的睡袋太薄，只能挡挡一般的风寒。这个问题，不是在派发现的。有的队员从扎曲到门仲住宿时，就被冻醒过。不知是科学探险队出于省钱，还是因为疏忽，但都应吸取教训。我历来主张，对科学探险队员的吃、穿、用品供给要大气些，野外生活本来就苦、就险，把钱用在刀刃上，给以充分的物质保障是完全应该的。实际上，野外考察的生活保障再好，也不如一般家庭生活那么平稳和舒适。

喜见满山杜鹃花

藏东南有很多美丽的自然景观，让我们频频驻足，连连回道，杜鹃花堪称其中的一绝。

在去西藏之前，我曾经听好多老队员说过，在冰峰雪岭的西藏，有很多杜鹃林，花开的季节，满山遍野全是五彩斑斓的美丽的杜鹃花，远远望去，

就像一片花的海洋。我也曾听说过，贵州省大方县有个百里杜鹃，花开时，火红的杜鹃花把整个山映得通红透亮。

遗憾的是我过去没见过杜鹃花，对它，我只能从书本里和老队友口中大致形成一个模糊的印象。知道杜鹃花是一种很有名的花卉植物，亦称“映山红”。或长绿或落叶灌木，叶互生，卵状椭圆形，花有红色、黄色、白色、紫色等，常见的多为红、白两色。

杜鹃花在我国约有 600 多种，其中雅鲁藏布江及其周围地区有 154 种，占世界杜鹃总数（900 种）的 17%，大峡谷有些地方的高山灌木丛主要由常绿杜鹃组成。谈到喜马拉雅山的花卉，李渤生曾说，“没有喜马拉雅山的花卉，就没有欧洲园林。”据了解，欧洲园林一部分植物是本世纪初欧洲植物学家从喜马拉雅山引种过去的。早在 17、18 世纪，欧洲一些探险家到喜马拉雅地区探险，被美丽的杜鹃花深深迷住了，于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它引种过去。直到现在，还有一些欧洲不法分子仍密切关注中国的杜鹃花，想方设法把它偷盗回去。

除了大小叶杜鹃花，大峡谷及其周围地区常见的杜鹃花还有高山平卧杜鹃、栎叶杜鹃、黄柱杜鹃、绿柱杜鹃、米叶杜鹃、长绿杜鹃等。高山平卧杜鹃近乎伏地蔓生，花形很大，与高山草木植物形成五光十色的高山灌丛草甸；栎叶杜鹃的得名出于其叶子极像栎树叶子，花状如喇叭形；黄柱杜鹃叶子肥大略卷，花形散开；绿柱杜鹃叶柄极长，叶柄之上每朵花各各支，花为紫色，极其娇艳。

最早见到杜鹃花是在巴松湖畔，当时车子飞快地向前奔驰，我正好坐在右边的窗口观看沿途风景，突然一簇极其鲜艳的花朵向我轻步颦浅笑，迎在路边，十分惹人喜爱。

我侧身想再仔细地看一看，但车很快一闪而过，那簇花远远被抛在后边。我连忙问旁边的队友，刚才闪过的是不是杜鹃花，旁边一位老队友点头称是。

在色齐拉山我们又一次巧遇杜鹃花，那是在离开林芝县不到半小时的进山的路上，只见路边的杜鹃花星星点点的开着，我顿时精神为之一，心想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我试图想扎西停车，当我们下去尽情地拍个够。扎西师傅笑着说：“这几朵杜鹃花根本不成气候，往派那个方向走去，满山遍野都是成片成片的杜鹃化，那才叫气派！”我相信他的话，也就不再坚持要求下车，因为他毕竟多次到过藏东南，对这里的地形地貌比较熟悉。我深信后边的杜鹃花一定会更多，更美。

车到东久河谷，我们又一次看见可望而不可及的杜鹃花。那是在西侧二三百米高的山崖上，有一小片火红的杜鹃花，从灌丛中探出头来，像是夹道欢迎我们这些远方的来客。其中几朵杜鹃花长得极大，虽正值阴雨连绵，但远远看去，其色红如燃烧的火。山崖高不可攀，我们只能用惊羨的目光远远地欣赏其美艳。

几回回路途偶遇，但却不能把它收入我的镜头，这样，想拍摄杜鹃花的愿望在我心里越来越强烈，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从八一镇前往派时，我就一直想在派去圆我的两个心愿：一是能有幸目睹南迦巴瓦峰的雄姿，当然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二是希望能够见到和拍摄到我几回回魂梦相依的杜鹃花。我始终记得扎西师傅说过的话，在派难看到大片大片的杜鹃花。我也一直认为，派一定是个繁花似锦的花海之地。但事与愿违，从岗嘎大桥

到派，沿途没见到任何杜鹃花，失望之余我又安慰自己，杜鹃花一定会碰到的，无限风光在后头。后来我们又从派驱车到达大渡卡，恰逢“羞女峰”撩开它的面纱，我们兴致勃勃地拍了很多照片，但欣喜之余，我却觉得很不安，去大渡卡洞路，我同样没见到杜鹃花，当时的心情可谓喜忧参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老天爷在赐予我们奖赏的同时，也忘不了给我们留下一点点遗憾，造成强烈的反差。我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走的路线可能不对，于是我又满怀希望去问考察队的领导，是不是还要再往别的地方去。当得知科学探险队已经作好返回的计划，科学探险队不会再往别的地方去考察时，对我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这意味着我们很难再碰到杜鹃花。

我开始懊悔起来，原来满怀信心，想在派多拍几张杜鹃花的照片，结果却大失所望，我便开始怀疑人们所说的派一带杜鹃林存在的真实性，也同时也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先见之明，在色齐拉山和东久河谷拍起杜鹃花的照片。我也不好意思去问扎西师傅，还能不能见到杜鹃花。我发现，其他队员忙着拍南迦巴瓦峰，没有人向我一样对杜鹃花那么情有独钟。别无他法，我知道把这种遗憾默默埋藏在心底。

4月23日，考察队领导决定再次去大渡卡拍摄南迦巴瓦峰。同时声明，如果已去过大渡卡和格嘎村的队友，不愿再去的可以不去，于是我索性留在驻扎区附近，随便看看周围的景色。

他们走了之后，我和另一个队友盘算如何打发时间。刚开始我们想过雅鲁藏布江到山上去看一看，但要渡河。于是我们想请打渔的人，把我们摆渡过去。转念一想，如果过去了，回不来怎么办？渔船不可能老在左岸等着我们，我们也不知要流连多长时间。

这地方人生地不熟，没人知道我们的行踪，到时候找不到回程的路，那真会出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顾及后果，这一举动被否定。不过河，去上山。我们便沿着营房所在地往南走去。南边有一条小路通往多雄拉山，深入墨脱。我们走了一会，后边来了一辆卡车，载着很多藏族同胞往山里跑。过一会，我们才回过神来，觉得应该把车拦住，搭一段车，这样可以走得远些，也会大大减轻我们的体力消耗。这坡虽然比较平缓，但由于我们已经经过好多天的野外考察，体力已明显不支。看看车子已经跑出大老远，我们只好垂头丧气地接着往前走。约摸走了半个小时，到了一个岔路口，我们又犹豫要不要往里边走。后来一想，反正我们带来了饼干和矿泉水，估计也走不了多远，中午赶回去吃饭就行。利用盲目地往前走。十多分钟后，突然迎面呈现出一簇洁白的杜鹃花，我眼睛一亮，连忙奔了过去。这株杜鹃花有两个枝形，一个高高在上约有两米，一个近乎匍伏在地。墨绿色的枝叶与洁白的花朵相配，在周围小片灌木丛的衬托下，非常显眼。

它的枝顶是数朵花团簇在一起，形成一个如碗口大小的花团。我很庆幸我没跟考察队到大渡卡去，否则，我会很遗憾地离开藏东南，没有机会细细品味这么美丽的杜鹃花。站在花前，我以前因它而产生的忧虑，顷刻间化为乌有，转而感到老天爷没有亏待我，满足了我观赏杜鹃花的愿望。

好像是故意引诱我们似的，我发现周围除了这株杜鹃花，再也没有第二株。既然有杜鹃林之说，这山上绝对不止一株，上面还有没有呢？我在问自己的同时，就信步往山坡上走去。约五六分钟之后，果然又见一朵又一朵杜鹃花。再往前走，一团团，一簇簇，密密集集，一面坡上简直就是花的海洋。虽然我曾经多次听人们描述过花山花海，但我绝对想象不到我面前的竟

会有那么多，满山遍野，竞相怒放。这花有白的、有粉的、有黄的；红的像火，热情奔放；白的像雪，冰清玉洁，美丽得近乎华贵。有两株不同颜色的花相互交错，红、白相对，形成强烈的色彩反差，更为引人注目。再往里边，有的杜鹃高达三四米，已成树状，叶子不多，完全下垂，高高地托着花身，更衬托出花色之美。

而那些长得较矮的杜鹃树，叶子浓密，花朵掩于丛中，也极其好看。

有意思的是一处景观是，在一块独立的大石头上，上面居然张了两棵大的松树和一株白的杜鹃。远远看去，白色的杜鹃如装点着青松。

如果我们继续前行，估计还会看到更多的杜鹃花，但为了让别的队友们放心，接近中午时，我们便急急地赶回营地。后来，我曾经向李渤生描绘我到达的地方杜鹃花是多么的美，多么的有气派，他却不以为然的说，在墨脱，有很多高大的杜鹃树，枝繁叶茂，花开的时候，就像一把巨大的花伞，把周围的阳光都遮得严严实实的，那才叫所派。不管怎样，这一次我已获得极大的满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这次的科学探险队员当中，我拍摄到的杜鹃花的照片最多，最美。回北京之后：这些惹人喜爱的照片颇受欢迎，报刊竞相采用。这更让我觉得我此行确实受益匪浅。

意想不到的，在回拉萨的路上，车子经不旦拉山山底时，我们又一次“邂逅”杜鹃花。很多没见到杜鹃花的队员，无不被它的艳丽所吸引，兴冲冲的跑下车拍摄。最有意思的是，不旦拉山植被稀少，只有少量灌木丛，有些地方甚至是光秃秃的，周围尚未返青、紧贴着山皮的枯草。一丛丛忘情的杜鹃花竟在“一丛独秀”，与周围荒凉的景象形成鲜明的对比。山脚下有一处藏民聚住区，既没有树也没有草，显得毫无生气。有些队员说，这里的村民太没有情调了，山上那么多杜鹃花，如果把它引种到家门口装点房舍，一定会使这个村变得漂亮起来，多了几分韵味。然而，这里的村民似乎没有那些闲情逸致。

不旦拉山山脚下是大片的大叶杜鹃，再往上是大小叶杜鹃混杂，雪线以上是小叶杜鹃。其山脚下的花，有白的，有粉的，开得很艳丽，但远不如我在多雄拉山见到的杜鹃那么有派，那么美丽。再往上因寒冷所致，一丛一丛的杜鹃树还尚未开花。还见到一个怪现象，山坡上很多牛、羊，宁肯啃吃贴着山皮的护照，而不吃旁边清翠欲滴的杜鹃花的叶子。我便请教李渤生，牛、羊为什么不吃杜鹃花叶子。李渤生说杜鹃花叶子有毒，牛不敢吃。可见牛、羊对这种植物还有所了解的，这可能也是当地老百姓不喜欢杜鹃花的原因吧。

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山花怒放，的确令人赏心悦目。我们平时常看到各种开得非常鲜艳的奇葩，装点着公园或马路。不管是山东菏泽的牡丹花、洛阳的牡丹花，还是北京的玉兰花、玫瑰花……这些花都经过人工栽培。尽管造型都很美，也各具特，而且随着人工反复栽培、选育，会越来越艳丽，但它们已失去原来的质朴美，给人的感觉只是逼人的富态，远不及山里的杜鹃花。那是一种自然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美感。我曾问李渤生能不能在北京引种杜鹃花，他说杜鹃花是一种喜冷喜湿的植物，北京气候太干燥，不易引种。

我们在藏东南的季节，还不是杜鹃花盛开的时候。经不旦拉山时，我们看见雪线以下，半个山都是小叶杜鹃，由于寒冷，叶面反卷，紧得扣成一条缝，全部呈黄褐色。往山上看去，半个山都是密密麻麻很暗很暗的杜鹃。

不难想象，再过一两个月，叶片完全张开，杜鹃花会争奇斗妍，花海如潮。我相信一定会像扎西师傅说的，那才叫气派！

森林利用的困惑

在人们的印象中，中国森林面积最大的省份是黑龙江，这话不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林木蓄积量最大的地方不在黑龙江省，而是在西藏。

林芝地区素有“西藏的江南”之称，这里集中了西藏 80% 的森林，是我国最大的一片过熟林区。全区活立木蓄积量达 264.4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 46.1%，木材蓄积量达 8.84 亿立方米，居全国首位，年平均伐原木 16 万立方米左右。从拉萨到工布江达，再从工布江达到林芝，我们一路上不时见到一辆辆载重大卡车从我们身边缓缓驶过。我们住在工布江达县城那天晚上，就见城内停了十几辆运木头的大卡车一字排开。车上，整整齐齐地码着六七根原始森林特有的大原木，每天约有 10 多米长，直径 1 米多宽。木头之粗大，一人难拢。论成材年数，绝非一二十年论数。由于负重，车辆开动时，车子往往被压得咯咯吱吱地直叫，速度也失去往日的势头，蜗牛一般向前移动。特别是从工布江达到林芝的路段，由于公路正处于改造阶段，路面坎坷不平，卡车行驶在上面，颤悠悠地东摇西晃，随时有可能把车上的木头抛下来。

在藏东南，我们经常见到一处处颇有规模的集木场，一株株高大笔直的原始林木被砍伐下来之后集中到这里等待外运。这些原木，有的已经被电锯锯成两半，但多数还保持完整地堆在那里。其大小长短，与沿途所见的运木车上的木材不相上下。在东久达兴、扎木镇以及巴松湖附近的村子里，这种景观屡见不鲜，甚至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从而显示了藏东南木材蓄积量之多，森林覆盖率指标。

路以藏东南一些川藏公路路段，随处可见一些粗壮的原木倒下，因为多年无人理睬，变为朽木，或横七竖八地倒在石崖上，或顺直在路边。过去，我到过很多林区，有行距整齐的人工林，由小面积着意保护的原始森林，更多的则是次生林。它们与藏东南大片过熟原始森林相比，给人完全两样的感觉。后者，森林的更迭完全处于自然状态，没有任何人工的痕迹。再往林子里走去，那绿色葱茏、密密匝匝的林木更能体现原始森林之繁茂。各种树木参差杂生，各适其所。上面，高大的榉树，树冠像把巨伞遮天蔽日，严严实实地把地面遮盖起来。树冠之下，是极矮丛生的灌木，灌木之下还有近贴地面的植物。越往里边，林子越密，就越阴森可怕。植被之浓密，有时目光所及不足 10 米。置身其中，根本无路可循。在这儿，即使老百姓出于生活需要随便砍它几棵大树，也丝毫感觉不到他们有损于原始森林。

藏东南森林的丰厚和繁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并非目光所及尽是密密匝匝的森林，这些森林也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有些地方林木相当稀疏，甚至一些山体已裸露出地表，越是靠近居民区越为严重。沿途我们看到一种奇怪的现象，树林里，不时冒出一根根约一人高的大木桩。这是因为伐木者在伐木时，不是屈身从树的根部入手，而是人有多高，就从

多高的地方砍。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省劲，实则反映了他们毫不珍惜木材。

更有甚者，有些树被砍了十几厘米深的口子，树没砍倒，人却走了。对于这一并不鲜见的现象，真是让人费解，伐木者为什么要这样干？

在派物资集散地有两棵比较高的树木，一棵生长在房舍区，一棵生长在附近的山坡上，点缀着这大片灰色的房子，有如两个卫士忠实地守候在这里。但不幸的是，其中山坡那棵树的主干也被人砍了一半。我走近前看了看，斧头印还很新鲜。如果这两棵树全被砍了，房舍区必会少了不少生气，增添荒凉之感。房舍区上边的部分山脊已经光秃秃的，毫无疑问，这是过度砍伐的结果。派房舍区周围没有原始森林，这是很让人不安的。更有甚者，一些地方生长的三四米高的次生的桦树林和高山栎林，如果不加保护，迟早也会面临灭顶之灾。我看到，派附近的居民似乎并不关心这些，他们依然兴致不减的去砍伐这些桦树和高山栎当柴烧。不可思议的是，对于烧柴，这里的居民特别挑剔，他们只要中间的木质较好的木段，丢弃两头，看看高高的树茬子和被扔得满地的树梢，我顿时百感交集，想起西北的一些贫困山区的群众，他们只能烧些燃烧度极差的毛毛小草和树叶。点烧后不仅浓烟滚滚，半天烧不好饭，还把人熏得泪流满面。即便是这样一些野草和树叶，当地老百姓还把他们当成宝贝一般。相比起来，派的居民实在应该反思一番，增加些节约观念。废弃伐下的树木，更能反映藏东南对树木的浪费。我们多次看到，这里的一些人由于过去砍伐了太多的大树，来不及运走，只好长久的成堆码放着。

这些圆木头都有 10 来米长，直径 1 米多，当初木质极好。经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风吹雨淋日晒，这些圆木已经慢慢脱皮，干裂，呈青色。有些甚至已经被蛀空，变成朽木，看似已经放了二三十年的时间。成堆成堆的大木头被废弃，让人感到十分可惜，为什么不能以运定产呢？为什么不把它运往别处，供居民烧柴的？这种粗放的经营，真是粗到无法再粗的程度。

这里的林火也同样不可忽视。在扎曲村之时，我和一队友曾亲眼目睹林火熊熊燃烧。

刚开始只是几缕轻烟顺着山谷往扎曲村上空飘动，但很快，烟把半个山全遮住了。林火在三四百米下的雅鲁藏布江河谷燃烧，噼噼啪啪的，声音之大，盖住了雅鲁藏布江的流水声。我们想看个究竟，因为没路可下，只好站在山腰隔林观火，足足待了两个小时，山火依然烧得很旺。青烟的弥散，使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大拐弯北侧山体，如同被轻纱罩住一般，青翠欲滴的青山变成一种难看的灰绿色。

森林，被人们誉为“人类之肺”，它与人类的生存环境关系密切。森林被破坏，往往还导致气候的恶化，危及人类生存。遗憾的是，这在当地还没形成普遍的共识，不仅表现在有些地方明显的浪费森林资源，而且还表现在当地的绿化建设的落后。比如林芝，尽管被誉为“森林小城”，但其城内却难觅大树，街道两旁只有一些遮阳都困难的小树。

又如米林，城市绿化才刚刚起步。走在大街上，路旁一排排栅栏内，是矮小单薄的树苗，不知它们何年才能长大。出于对森林的爱，我产生了逆反心理。在工布江达的路上，我看到满载着木头的运木车在未修好的路上费劲地往前驶者，我竟觉得有些欣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慢森林被砍伐的速度。如果路况变好了，对森林没有做到“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藏东南的森林植被再丰厚，也架不住毁坏。我希望藏东南的森林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但必须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西藏林芝奇正藏药厂董事长雷菊芳女士长期生活在林芝，她对大峡谷的生态环境寄以关心，一次她同我谈起此事，表示愿意为保护世界第一大峡谷的生态环境倾注全力。可见，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沿途见到不少警示牌子，上面写着“造林光荣，毁林坐牢”的字样，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林芝地区对森林保护的重视。雅鲁藏布江中游流域，我们还见到长得相当茂盛的整整齐齐的防护林，犹如一道道绿色的长城，在阻止风沙肆虐。

林芝和米林城里的绿化尽管不成气候，但毕竟有的已经栽下，有的已经茁壮成长。

裸鲤

在青藏高原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山地上，蕴藏着许多极其丰富的资源，这里江河纵横，湖泊众多，为各种鱼类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栖息之所，使得各种各样独具特色的鱼得以在此生息繁衍。

西藏对鱼的记载历史并不长，清代古籍《藏纪概》中记载有“物产……细鳞鱼”，可能是有关西藏鱼类最早的文字记录。直到后来，我看了一些资料，知道西藏不仅有鱼，而且鱼类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尤其是近年来，渔业生产发展得较快。据 1994 年的统计数字，全区鱼产量已达 104.3 万公斤。并于 1993 年在那曲地区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家鱼粉加工厂，当年生产鱼粉 70 吨，从而为西藏饲料加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西藏鱼类资源之所以开发时间短，并且发展缓慢，这与当地的风俗习惯有很大的关系。还有捕鱼人地位低下等原因，均影响了西藏鱼类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在派，我们就曾经有幸吃到西藏肉质鲜美的鱼。在部队营房区安顿下来之后，突然发现晾衣服的铁丝上晒了几条干鱼。当时午饭还没做好，大家有些饿了。有人看到鱼干，便撕着吃起来。后来我们又发现营房上晒的鱼干更多。我也尝了尝这鱼干，觉得还挺好吃的。

见到这么多鱼干，可见江中的鱼一定不会太少。于宪光钓鱼的“瘾”又上来了，便四处嚷嚷要约人一块去钓鱼。没有鱼钩，也没有鱼线，他出去转了一会，竟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根八九米长的线，叫我帮他拉直搓成绳。有些队友见状，说于宪光要钓鱼，得有姜子牙的本事，否则，瞎耽误功夫。

于宪光也不理他，搓好绳之后，便兴致勃勃，头也不回地又去备钩。我等到晚上，也没见一条小鱼，八成是钓不到鱼，否则，他早就向全体队友报告他的战果了。

第二天早上才 6 点多钟，我就看见有几个人乘着雾色，行色匆匆地向江边简易码头奔去，然后登上停留在那里的小机动船，向远方驶，去也不知道他们去干嘛。他们走后不久，我们几个队友结伴到江边溜达。赶上他们已经回来了，正忙着摘网。

原来是打渔人。队里的王维和于宪光快步登上船去，看看他们的收获，问问价格，想把它买下来。一看他们捕到的极少，总共只有六七公斤，大的

鱼可能重达一公斤，小的只有三四两。鱼有两种，一种是黑斑兆，一种是裸鲤。问价格，只卖两块钱一公斤。

我颇有兴趣地问他们，是不是每天都收获这么少。他们说，就今天的运气不好，只有几斤。王维本来想把鱼买下来用于队里午餐，一看鱼太少便放弃了。

听他们的口音好像不是西藏人，一打听，原来是四川人，在这里靠打渔卖鱼为生。

中午回来时，我们也饿得精疲力尽，便想到厨房里去找吃的。一看，桶里竟放着七八条一斤左右的鱼，据说是一位队员买来的。想到马上就可以打牙祭，我们暗暗自喜。

正得意之际，厨房师傅说饭已经做好，吃完饭，马上就离开派前往米林。看来我们没口福吃这几条鱼，不知它是啥滋味。仿佛看透了我们的心思似的，厨房师傅对我们说：“放心吧，我们把它带到米林县城再吃！”

午饭之后，有两个考察队员从当地群众家里回来，原来他们到群众家里聊天去了。

回来还眉飞色舞地跟我们说，他们在老乡家里吃到了味道极其可口的烤鱼。说完了，一个队友还神秘兮兮地问我吃不吃鱼，我以为他在拿我寻开心，就没理他。没想到他真的从身后拿出一条烤得黄黄的裸鲤，还冒着热气。我吃完后，味道果真不错。

裸鲤的鳞非常非常的细，看似没有鳞，我不知道它的得名是不是原于此。后来，我们到米林的一家餐馆吃饭，并把从派带来的七八条裸鲤交给店主，请帮助料理。鱼端上来之后，顿时香味扑鼻，肉质细嫩鲜美，刺也不多，远非内地市场上卖到鲤鱼所能相比。

据有些科学家说，这种裸鲤也是由一般的鲤鱼进化而来的。它是怎么演化过来的，适应什么样的海拔高度，还有待人们去进一步探索。

由于当地气候寒冷，鱼的生长发育缓慢，一条达到性成熟、体重 200 克左右的鱼，一般至少需要 4 至 5 年，体重 500 克的鱼需要 10 年或更长的时间。因此，对西藏的鱼如果不加以合理利用、保护和管理，稍到过量捕捞便会大大减少它的数量，这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炸通喜马拉雅山

初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人都会发现这里是一块神奇而又诱人的土地。那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木；那山花浪漫，青翠欲滴的山谷；那白雪皑皑，连绵起伏的群山；那奔腾呼啸的滔滔江水；那蓝天白云下悠然自得的牛羊，无不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而这一切，首推西南季风的频频送暖，也恰恰得益于大峡谷所提供的水气通道的作用。当暖湿气团在西南季风的吹动下，向北面的喜马拉雅山推进时，高耸的喜马拉雅山成为暖湿气团很难逾越的天然屏障。急于北进的暖湿气团继续游动，终于找到一个劈开雄奇的喜马拉雅山的朝南的豁口——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尾口，便以不可阻挡之势，顺着又长又深的大峡谷猛烈地

向北冲去。所到之处，和风化雨，润物无声，给当地带来了绵绵不尽的润泽，使得大峡谷及其周围地区物种富饶，资源丰富。

为了更深刻地理解大峡谷作为水气“通道”和加热大气的“烟囱”作用，去对比大峡谷之外的另一番景象，离开派之后，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逆流而上。公路两旁依旧是相看两不厌的青山，山谷谷底依然是狂奔怒吼的江水。但渐渐地，我们的视野变得开阔起来，原来相隔咫尺的两岸青山在悄悄地拉开距离，河谷在渐渐地展宽，有的地方可达两三公里甚至三四公里。江水的轰鸣声也在逐渐地变小，以至不闻其声，只见它在默默地汨汨流淌。再往前，更没了险滩，甚至没有太多的涟漪。它像一部残缺破损的机器，更像一个垂暮的老人，没有任何生气。特别是岗嘎大桥以东的河段，江水分成好几股细流同时在一块大约两三公里宽的平坦沙滩地静静地流动着，与我在大峡谷所见的急流滚滚、气势雄浑的雅鲁藏布江完全判若两样。由于河流的分叉，江心洲一又接着一个，不屈不挠地从江面上显露出来，上面甚至已稀疏地长了些翠绿的灌木丛，有时竟连成一大片，成为江上的一景。

不仅如此，山上的植被也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如果说，从派到米林县城，植被还没有太大的变化的话，而过了米林县城不远，这种状况则大为改观。沿途，我们依然沿雅鲁藏布江往西行，河滩上江水不能冲刷的地方，形成一片较大的平坦河谷地，上面绿树成荫，麦浪滚滚，仍是一派郁郁葱葱的景象。但山上的植被已渐稀疏，岩石裸露，极目四望，不再是满目醉人的绿色。过了县城 30 多公里后，这种变化就越发明显，山越来越秃，只有少量矮小、稀疏的灌木丛艰难地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在风中摇摆不定，给人一种萧瑟、荒凉之感。此地与大峡谷相隔不远，但两种景象却截然不同。一边树茂草丰，繁花似锦，一边是乱石满地，一片荒凉；一个风光无限，令人赏心悦目，一个景况凄凉，令人顿生哀情。对比是何等的鲜明！倘若这里再有一个大峡谷，给南来的水气提供一个北进的通道，那该有多么好，一定又是一个莽林覆地，动物繁多，山花怒放，江水咆哮的大峡谷，一派亚热带风光。

带着无限的感触，我们必须继续马不停蹄地西行。离开朗县之后，环境变化更令人触目惊心，这里已明显呈现干旱、半干旱状态，有的地方几乎寸草不生，没有一丝绿色，除了石山还是石山。朗县县城就坐落在光秃秃的是石山下边。周围没有绿树，树内也难觅几棵树。这些情况表明，从印度洋过来的暖湿气流进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之后，渐渐失去了它所向披靡的势头，到此已是强弩之末。面对如此景象，有人便突发奇想，既然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发挥着水气通道的作用，造就了藏东南的绿洲，那么，能否采取一些人工措施，改变藏西北的干旱状况，使其也像大峡谷一样秀美。于是，便有了炸通喜马拉雅山之说。即除了自然形成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成了从印度洋和孟加拉湾温暖水气向北运动的通道外，再在喜马拉雅山比较适合的地方炸通个口子，再造一条水气通道，让更多的暖湿气流长驱直入，进入藏西北。表面看上去，这个想法实在妙不可言。曾一度，新闻媒介竞相刊登这一设想。脑筋活络者又想以此去国外争取多方面的合作。当然，也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它的可行性。一时间，一些人就此事炒得沸沸扬扬，或进或退，各执一端。

这里，暂不论炸通喜马拉雅山造就一条新的水气通道是否可行，单就雅鲁藏布江中上游生态环境而言，确在恶化，一个明显的标志便是雅鲁藏布江河谷的沙漠化极其严重。

在派，我见到一处沙漠上山的景观，约有五六米高，沙埋没了植物，

形成一小片黄沙地。

离开派大约 10 公里处，又有一处非常明显的沙漠上山。离开大峡谷越远，沙漠化现象就越为明显。有的地方的沙漠把公路都给埋没了，积了厚厚的一层，车子驶进去，越陷越深，以至进退两难。从米林到朗县，至少有四处路段为积沙所掩埋，致使雄风万里的丰田越野在此顿失其往日的势头，陷入连绵起伏的沙丘，且难以自拔。为了赶路，我们的司机不得不冒着炎炎烈日的暴晒，下车摁动前轮的一个机关，变两轮驱动为四轮驱动，以增强车子拔出沙丘的力量。如此反复，才翻过了一个接一个的沙丘，艰难地摆脱了困境。

更有甚者，在米林和朗县中间地段的一个山窝里，漫漫黄沙，竟令绿色节节败退。

不仅五六百米高的小半个山全是黄沙，无情地吞噬了森林，而且还霸占了山脚下唯一的一条公路，长约 150 米的路段全为沙子覆地，令司机望而生畏。不得已，司机只好沿着雅鲁藏布江潮湿、半潮湿的沙滩地行驶，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路面才比较结实些，车子不至于显得太深。再往前，情况更为严重，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处平时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沙害，只见沙漠几乎把整个山埋去了，在色泽上，同周围的山体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沙害，一直到拉萨还可以见到。考察结束，返回内地时，我从贡嘎机场乘飞机起飞后，在雅鲁藏布江河谷的上空飞行时，我不经意间往下一看，首先映入眼帘的又是片片黄沙，蔓延在山坡谷地，约飞了两三分钟之后才不见沙山，足见西藏沙漠化之严重。

沙漠之所以上山，是当地的地形所致。雅鲁藏布江为例，两侧的高山像两道天然屏障，风一吹，沙子没有落脚之地，唯一的选择，只能侵袭两侧的高山。在内地的平原地带，沙子一般是顺着风势来回滚动。

无疑，沙化现象很令人担心，但我们同样看到了令人惊喜的一面。当地人们在治沙方面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快到山南地区之前，只见路边整齐地植有很多人工防护林，横看成行，竖看成线，有的已长得相当茂盛。我们去的时节正值春天，人工林的叶子淡绿淡绿的，更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特别是泽当城北面沿江的绿化林带又宽又长，颇有规模。据了解，这一带的沙化现象曾经十分严重，以贡嘎县为例，风沙季可长达数月，沙化面积以每年 3000 亩的速度递增，贡嘎机场的飞机曾多次因弥天的黄沙无法起降。

解放后，人们为治沙造林花费了很大的功夫，但收效甚微。直到 1991 年“一江两河”工程启动之后，造林任务又提上了日程，在多方共同努力下，短短的 10 年时间便筑成了一道长达 150 公里的绿色屏障，不仅起到了阻挡风沙的作用，而且美化了环境，改善了生态。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一大片防护林，沙漠终有一天会吞并泽当城，进而侵袭城南面的大部分农田。

然而，这种绿化也仅限于雅鲁藏布江南岸的河谷地带。站在公路北望，它的北岸，已形成大面积的沙地，沙丘一个连着一个，白花花的。沙漠化是人类的悲哀，也是人们的大敌，如果听任它继续蔓延，后果将会更加严重。

以前，我曾去过塔克拉玛干沙漠作科学探险采访，对沙害的严重性深有感触。只见沙丘所到之处，吞噬农田，毁灭村庄，让昔日繁华化作断壁颓垣。近年来，我国北部的沙漠仍在南侵，如腾格里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等。在我国内陆地区，如河南的一些地方，也有滚滚黄沙造成大量良田被毁。尽

管各省、区在治沙方面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还远未降伏沙魔，我国的治沙任务还相当紧迫。

其实，不仅在西藏，在我们国家存在沙漠化的问题，而且全世界都面临这个共同的问题。因此，为呼吁全世界人民行动起来，为防治沙漠化做出努力，保护人类的安全和利益，1994年12月，国际防沙防止荒漠化公约的签字仪式在巴黎举行，1998年6月17日是联合国第四个“世界防止沙漠化和干旱日”，沙漠化的问题已经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

炸通喜马拉雅山，改变雅鲁藏布江中、下游干旱及沙漠化严重局面，实际上只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而已。首先喜马拉雅山高耸入云，坚不可摧，是难以炸通的；其次，即使炸通了，能否达到目的，仍是一个问题。有位环境学家曾就这个问题谈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有自然界有自己的规律，人类只有在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才能有效地利用自然，达到自己的目的。他说，在北纬25度至35度这个纬度里，地球上其他地区除了海洋就是沙漠，唯独我国的青藏高原东侧不是沙漠，这正是得益于青藏高原，如果把喜马拉雅山炸通了，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平衡，相关地区就有可能变为沙漠。

因此，可以认为，炸通喜马拉雅山这一设想，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如何遏制雅鲁藏布江中上游地区的干旱与沙漠化，还需要人们进一步去探讨，但无论如何，不能干出诸如炸通喜马拉雅山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蠢事！试想，诸如我们毁林种地、围湖造田之类的违反自然规律的做法，反过来又受大自然惩罚的教训还少吗！1998年，长江全流域，松花江和嫩江流域出现极为严重的水灾，就同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密切相关，为保护我们的家园，我们实在应引为教训。

难忘蛇绿岩

4月26日下午两点整，我们的车轮压上了泽当城郊的柏油马路，欢快的向泽当城奔去。

这表明，从这里到拉萨的190公里路程，再也没有沙石路和其他险路了。我们如释重负，不约而同的长嘘了一口气，并舒舒服服的靠在汽车的后座上。那种感觉真像是光离鬼门关后又重回人间。因为，这意味着我们终于摆脱了崎岖的山路，也意味着艰苦的野外考察降下帷幕。

渐渐地，泽当城微笑着向我们展示她的魅力。迎面便是立于十字街头的一座骏马腾飞的高大雕塑。这是一座整齐漂亮的城市，城市建设远比林芝八一镇有气派。城内一座座现代化建筑拔地而起。市区街道干净整齐，花坛，树木，华丽的路灯，热闹非凡的商店，还有在耳畔回荡的流行歌曲，无一不在展示这座高原城市的现代气息和活力。

我们住在山南泽当邮电公寓，安顿好之后便有一种想出去走走的冲动。我们步出宾馆，瞪着一双好奇的眼睛，就近看看这座于我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城市。正游目骋骋之间，一旁的地貌学家杨逸畴突然对我说：“你看见公寓后边那个石崖了吗？”

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只见在邮电公寓后边30米外的地方有一

堵石崖，崖面陡直，显然是经过人工劈开并清理出来的。但我并没有发现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觉得是极平常的石崖而已。便诧异的对他说：“这石崖没有什么特点呀！”

他告诉我，这个石崖是不寻常的，有着亚欧板块与印度板块相撞的特殊标志，接着，我们走到近前，他又进一步解释，这种岩体表面虽为蛇皮绿色，但内里实为黑色。它埋于地壳深部约 40 公里处，既地幔上面，地壳下面。在第三纪的始新世，印度次大陆同欧亚大陆碰撞，挤压，推起了喜马拉雅山，两大板块如同两块干硬的切糕撞在一起，出现了一道道断裂，同时把下面一层黑色的“豆馅”挤到上面来了，这“豆馅”即是蛇绿岩。

它是两大板块相互挤压造成喜马拉雅山大幅度抬升的重要地质标志。

听了杨逸畴研究员一席话，我顿时来了兴趣，连忙顺手捡起一块小石头掂掂分量，立刻感觉这石头异常沉重，的确非同一般石头。又听说，国内外一些学者到西藏往往以能看到蛇绿岩，引为莫大的荣幸。他们认为，世界屋脊巨大的地壳厚度蕴藏着丰富的大地构造信息，对研究地壳运动、生物起源的理论课题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我细细地端详着手中的小石头，真不相信它曾在地壳下面经过剧烈的翻腾才露出地表。再转念一想，如果在这里设立一个参观点，只要拉上根绳，把这堵石崖围起来，写上文字说明，介绍它的成因和地质意义，向有关人员进行科普教育，不仅具有科学意义，而且可以给当地人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如有必要，对其蛇绿岩块做些简单的包装，作为商品卖出，一定会引起一些有知识，有文化，求知欲较强的人的浓厚兴趣，将其作为礼物和纪念品买去。我的队友高登义就特地给他北京的一位朋友带了一块。他说，他的那位学地质的朋友尽管多次来西藏，一直梦寐以求地想获得一块蛇绿岩，但未能如愿。

由此可见，蛇绿岩很受一些人的喜爱。我看到，泽当城的人们还完全没有意识到蛇绿岩的价值，他们毫不足惜地成车成车地把蛇绿岩拉去垫坑，填公路。后来，我把这一想法写下来，打算寄给山南地区科委或西藏自治区有关部门，建议他们在这里设立一个参观点，一个科学普及的地方，甚至立块牌子，叫做“世界第一地球板块碰撞标志点”。

建立“世界第一地球板块碰撞标志点”，不愁没有观众。泽当地理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从泽当到拉萨有一条平坦的柏油马路，只需三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泽当与拉萨之间有贡嘎机场，使得这里陆空交通便利。泽当经常云集国内外的游人，因为此地有闻名遐尔的西藏最早的建筑雍布拉克，在拉萨喜马拉雅饭店的壁画上就有它的风景画。雍布拉克建在雅砻江岸边的一座山岩下。它没有明显的中轴线，而是以建筑物为中心，沿等高线层层向上修建，将高处的主建筑衬托出来，更显出它的气宇轩昂和独特的高原风韵。它的存在，表明西藏的建筑思想、建筑文化在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经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泽当南还有一个昌珠寺，是吐蕃初期（公元七世纪中叶）修建的西藏最早的四大佛殿之一，属于雅砻江谷地上的名胜古寺之一，也是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居住的宫殿。寺内供奉着五尊石佛，能言观音菩萨和原乃东孜措巴寺的用珍珠缀成的观世音憩息唐嘎。

因为它是汉藏两个民族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更是一曲汉藏和睦相处的千古绝唱。每年，这里的游人络绎不绝，好不热闹。

便利的交通条件，闻名遐迩的文化古迹，使山南地区成为西藏重要的旅游胜地，给山南人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开发再开发出这么一个“世界第一地球板块碰撞标志点”作为科普橱窗，一定会吸引来更多的游客。

永久的纪念

科学探险是一项比较危险，也比较富于传奇色彩的伟业，当队员们已经千难万险，尝遍酸甜苦辣，最后平安的满载而归时，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慨呀！其中，纪念封会成为我们追忆往昔，述说心怀的最好见证品，因为它的背后记载着我们科学探险队员曾经风雨同舟的情谊。

应该设计一个纪念封纪念这段特殊的日子。这是我在去西藏实施首次徒步穿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春季预察的前一个星期才突然想起的。时间紧迫，我没来得及与队友商量，便开始着手设计。然后再请我们办公室的一位同事用电脑设计。回到家，又发动我的妻子谢秋兰和我一块糊纪念封，最后贴上邮票。可以说，从纪念封的设计到制作，再找队友们签字，去各地邮局盖章，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运作，无形之中，这变成了我的一种负担。尽管如此，能为队友们做一件好事，我乐此不疲。我的初衷是，别人没想到的而自己想到了，就应自觉地去，体现团队精神好像就应该如此。据我所知，去南北极，去远洋或去别的地方考察的科学考察队事先都要设计及这么一个信封，来纪念这一段勇敢、卓绝的进军。特别是，信上签了所有队友的名字和盖上沿途各个国家和各个地方的邮戳，其意义更是非同寻常，它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永久的纪念。也就是说，这小小的纸片如同一条纽带，紧密的维系着每个考察队员，无声的述说着不尽的往事。

曾记得，几年前，我随同科学探险队奔赴南极考察，队里当时也曾制作了一个纪念封。信封上签满了队友们的名字。不幸的是，现在，那上边的三个人：高钦泉、金乃千、胡冀援已英年早逝，睹物思人，其音容宛在，于生者不能无悲，不能不回想曾经风雨同舟的岁月。在回忆之中好像又把如梦如幻的过去的生活重新体验一遍，于是万般的感慨便会袭上心头，更平添了几许伤感，几分无奈，以及对他们深切的怀念之情。

我挑了几十个糊得较好的纪念封带到西藏，不少队友，特别是新队友都觉得很新鲜，不知其意义何在。到了林芝，我找队友们签上自己的大名，准备在沿途各地都盖几个邮戳，因为邮戳最能代表一个地方的政府行为。这种感觉，也许在国内体会不到，但在南极那块未被瓜分的土地上，就显得比较重要。在那里，有些国家考察站设立的邮局，确实发挥了邮局的一般功能，适当的办理一些邮政业务，但大多数邮局却没有这种功能，它只是表明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曾经到达该地。倘若将来有一天，南极的土地被世界各国瓜分之日，那么其国家邮局所在的领土就是不可侵犯的，如有违者，可以被视为侵犯他国领土主权。因而，往大里说，一个邮局的设置能代表当地的政府行为；往小里说，盖上邮戳，能表明自己曾经身临其境。虽然照片也可以表示一个人曾经去过该地，但这些都不足以代替邮戳的功能。鉴于此，在签字时，我请队友们尽量往左边靠，以便留出更多的空间来盖邮戳。

一路上，我积极实施筹划此事，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打听邮局所在方位。4月13日，我们来到通麦，当时细雨霏霏，路上满是泥泞。我们恰好路过邮局，赶忙深一脚浅一脚地冒雨赶到邮局。我们把来意说明之后，有个长着—双明媚的大眼，面色白晰的藏族女服务员马上热情地给我们盖邮戳。我们拿起来—看，却是波密的邮戳。通麦是波密的—个地方。此时，我们对邮戳上的“西藏波密”，不大感兴趣，最想要的是通麦的邮戳。这是因为，通麦距大峡谷大拐弯最近，邮局的邮戳能有“西藏通脉”字样，意味着这是在离大峡谷标志点——扎曲最近的—个邮局盖的。由于已经有了—个波密的邮戳，到波密县城时，我们就没再去盖邮戳。

令我们惊奇和不解的是，邮局的邮戳怎会掌握在个人手里。4月16日，科学探险队来到易贡，我们四处寻找邮局的牌子，后来—打听，有位当地人说易贡没有邮局。他话音刚落，旁边的一位则说，有邮局，邮戳在某人手里呢，那个人刚出门，—时半时可能不回来。我们找到了他住的楼，在楼下等了好长时间，他却始终迟迟不—归，我们只能泄气地不再等了。我至今仍不清楚，易贡到底有无邮局，既有邮局，为什么不挂牌子，为什么邮戳掌握在—个人手中，让他满世界乱跑？是当地人对这种政府行为观念淡薄还是邮政业务往来稀少，或者几乎没有，这些，至今仍是一个谜。

我以前—直以为盖盖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不寄信而光盖戳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些素质不高的营业员可能会冲着我们吹胡子瞪眼睛，要么干脆置之不理，—叫三不应，这种现象绝非虚构，在内地其实并不鲜见！要达到盖邮戳的目的，必须毕恭毕敬，费—番口舌或者应该有所表示，哪怕是送人家几个纪念封。可是在民风淳朴的西藏，盖邮戳简单易行，竟让我们—路畅通无阻。无论在通麦还是22日在八一镇，我们自报家门，说我们是科学探险队员，自己制作几个信封，想请他们盖邮戳之类的话，服务员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满足我们的要求。热情之事，让人备受感动。

我们从八一镇出来前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起始点派，途经岗嘎大桥后队伍兵分两路，—路直奔派，—路去米林与县委、县政府负责同志洽谈和汇报工作。因为我没去米林县城，也不知道考察队—步还会不会经过米林县城，为了避免错过机会，我便委托高登义到县城负责盖邮戳这件事。于是，23日米林的邮戳也盖了。派是个通往墨脱的重要的物资转运站，也是大峡谷的起始点，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我—直想在这里盖—个邮戳。

但是，在这么重要的—个地方，却找不到邮局的踪影，甚至连易贡那样的带邮戳出门的人都没有，无邮戳可盖，令人大失所—望。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邮戳竟成了队友们共同关心的一件大事。24日队伍从派回到米林，马上有些队友善意的提醒。我路过岗塔大桥时，那里有个岗嘎邮局，别忘了盖邮戳。这里是兵家重镇，意义深远。那天也恰逢天不作美，接近岗嘎时，突然大雨滂沱。

我在车中，随着车的行进尽力寻觅，结果—无所获。到了县城，大伙都关切地问是否已经盖了邮戳。—听说没找到邮局，好几位队友都连声说：那太遗憾了。到了米林，我们—次深感到在西藏盖邮戳真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去—个电话厅打电话，—进里边就发现有个人手里正摆弄着邮戳。我分析，这个人可能既看守租用电话，同时兼管盖邮戳，否则邮戳怎么会在他手里。

林林最西边的朗县县城夹在一个山窝窝里边，县城极小，好像吸一支烟的时间就能走通全城。城内有几栋很漂亮的楼房，倚着山势，是前几年福建省泉州市人民援建的。

我们于4月25日中午来到朗县，车一停，我们马上环顾四周，寻找邮局。没想到一抬头，两米之外即是邮局，原来车正好停在邮局门口。这一发现使我们一阵惊喜，我连忙飞快地跑进去向邮局的工作人员介绍情况。一听工作人员的口音，竟是我的东北老乡，老乡见老乡，尤其在这样一个遥远的小县城，更令人欣喜万分。寒暄之后，他很愉快地给我们盖了邮戳。但遗憾的是，这位粗心的工作人员却把时间能错了，邮戳上的时间没有变更过来。本来应该加盖25日的流速，却盖成了24日的。

25日下午4点半刚一进加查县城，司机见有招待所字样，便驶了进去。一看，正好是县邮电局的招待所。队领导却联系住宿事宜，我们从招待所出来，去盖邮戳。绕到大街上，却见邮局大门紧闭，原来这天恰逢双休日，不知邮局什么时候关了门。无奈，我们只好又返回招待所，去跟负责招待处的负责人说明情况，能不能破个例，把加查的邮戳给盖上。他闻言马上拨电话，很快便通了。不一会儿，一个女服务员拎着钥匙从家属楼出来，示意我们跟着她去。她带着我们从邮局后门进去，只见里面黑漆漆的。她赶紧拉开灯。服务员很热情地把邮戳拿出来要帮我们盖。为了盖得更清楚一点，我们问她，让我们自己盖可以吗？她很大气地把邮戳交给了我们。

第二天，从加查县出来，我们花了五六个小时才走到山南地区。一路上跋山涉水，非常辛苦，每个人都异常疲惫。但是我们并未因此忽略盖邮戳的事，于是又迈开双腿，到街上寻找邮局，终于在一个十字路上发现了它。

历近千辛万苦，28日，我们终于顺利地回到拉萨。原以为在喜马拉雅饭店附近会有邮局，但我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沿喜马拉雅饭店往北的大街一直走，才找到一个叫河坝林的邮局。不知是因为午后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推门进去，邮局内空荡荡的。我们把来意跟服务员说了之后，服务员很热情的把邮戳拿出来给我们盖，但盖得很不理想，正好盖在字体上，把整个构图的美感给破坏了。眼看着她已经飞快地带了好多个纪念封，我们忙说她盖得不理想，意思是剩下的最后由我们自己盖。她说她是个实习生，不怎么会盖邮戳。我们便从她手中接过邮戳，自己盖了剩下的那几张。总的来说，沿途盖的邮戳挺清楚的，但到了拉萨，却出现了这小小的遗憾。

我把信封发给队友时，大伙都特别高兴，并把它作为珍贵物品珍藏起来。队友们没有想到，这一路上竟盖了这么多邮戳。考察队在总结时，还为此表扬我，说我为考察队做了一件难以忘却的公益事业。的确如此，这给大家留下了一个永久的纪念。

我在想，如果将来有一天，科学探险队在派或扎曲设立了纪念碑，是否应该在这两地设立邮局。在派，交通比较便利，人员又比较集中，特别到了夏季，他们有办理各种邮政业务的需要。因此，在派设立邮局是有必要的。在扎曲，因为它是大峡谷的标志点，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也应该设立邮政局。假使因扎曲路途遥远，人员稀少，不适合设邮局的话，那么至少在排龙应设立一个。通过邮戳，让人感觉到他确实已经到过峡谷标志点所在的地方。从旅游角度上说，如果大峡谷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旅游胜地，游人会越来越多，设立邮局不仅会为游人提供各种方便，而且也为当地人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收入。从集邮角度来说，如果有扎曲邮局或排龙邮局或者干脆命名为大

峡谷邮局，那么其意义和价值更是非同小可。从我们沿途所盖的邮戳来看，看不出它于大峡谷有什么联系，而且除了八一镇、米林、波密是在藏东南盖的邮戳外，其它几个均不是。这么多邮戳只能表明我们到过西藏，到过这些具体的地方，当无法表明我们曾经去过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如果需要回忆当年，要费很多唇舌才能从邮戳上解释清楚它们与大峡谷之间的距离。

我觉得，有头脑的藏族同胞，应该考虑与世界第一大峡谷相关邮局的设置。现在不是倡导知识经济吗？这可能就是西藏知识经济的生长点之一。我不知道我的这一构想，西藏同胞以及工作、生活在西藏的各族人民怎么看，是否有点道理？

野外考察花絮

经幡

藏民族对宗教崇信的广度和深度，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我想，凡到过西藏的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里浓重的宗教气氛。川藏公路，大昭寺前，可以见到磕长头的虔诚信徒；佛教圣迹遍布藏区各地，寺庙里一年四季香火不断；在高山要道两侧，古树上，屋顶处，江桥旁，到处是五彩的经幡，在蓝天下迎风招展，足以使我们这些初到西藏的人眼花缭乱，大开眼界。

经幡大部分采用绸布做成，颜色有蓝、白、红、黄、绿色等，多为素色，大小不等。

经幡幡条具有特定的含义，其组合排列顺序都有严格的规定。经幡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经文和鸟兽图案，各图案也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听老队员说，经幡是藏民祈求福运升腾的象征物，每年藏民们都要挑选良辰吉日，举行庆典活动，更新经幡。之所以插上经幡，是因为当地的信徒们大多没有文化，念不了经文，只为借助自然的力量，风每吹动经幡一次，就意味着他们念了一次经，以此来表达他们对上天的虔诚和敬意。

经幡就其外形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种：一种是蓝、白、红、绿、黄五色相间的小方块布按一定的顺序缝在一根长绳上，高悬在两个山头之间，如在巴河老虎嘴两山之间，以及帕隆藏布江每个钢索吊桥的上空，都高高地悬挂着这类经幡，看上去如同迎宾的彩旗。

一种是好几米长的狭长布条，或红或白，上面印有密密麻麻的经文，布条的一侧连在一个粗长的木杆之上，立在庭前、路边或山口处。在沙滩营地，我们就见过好几根笔直的大木杆上，经幡与木杆相连，成条状的竖在密林边，很有气势。还有一种是五块颜色不一的无字幡和一块单色镶边的主幡方布块组合在一起，主幡条上有经验和鸟兽图案。在墨竹工卡沿路一带的村庄，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竖有这样的经幡，远远看去，五彩斑斓，为村庄增添了不少生气。

此次赴藏，我所看到的最壮观的经幡，是在波密县城的南山赴嘎隆拉山的路上。车子过了拐道口之后，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又高又密的束束经幡，并形成夹道。由于长期的风吹日晒，上边的红文有的已模糊不清，甚至看不

出本色。一些旧的经幡旁边，又新添了很多鲜亮的经幡，对比尤为明显。

经幡是藏民内心信仰世界的实录，它寄托了藏民们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和对命运的祈求，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也是西藏地区特有的一种景观。

日晕

天象是自然界最为神奇的事物之一。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把它当作神明而崇拜。

月的圆缺，阳光的灿烂夺目，以及风雨雷电、虹霓冰雪，朝晖夕霞，星沉星浮，都使人感到宇宙的不可思议和神秘莫测。

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多年的观察和实践，总结出“础润而雨，月晕而风”的生活经验，月晕对人们来说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事，尤其在冬秋季节，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能看见月亮外边形成一个很大的光环，把月亮两圈在最里边，这就是月晕。

对日晕，我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幸而这一次在大峡谷见过两次，否则我很难知道还有日晕之说。

在沙滩营地宿营时，高登义闲得没事可干，就怔怔地望着太阳出神，他突然对我说：“你看，天上出现了日晕。”第一次听说日晕这个词，令我十分新奇，忙抬头望天上看，发现太阳光并不像平日里所见的那么耀眼，光线变得非常柔和，在它的外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光环，十分明显，与周围的颜色完全不同。我忙用相机拍下来，照片冲出来后，自认为效果还不错，但比起高登义所拍摄的照片，我顿时气短了三分，他不仅把整个太阳拍摄下来，而且太阳外边的那个光环也很清晰，而我的只拍到半个太阳。我后来向他请教日晕形成的原因，他告诉我，云层中有很多细小的呈颗粒状的晶体，当太阳光通过云层中的这些冰晶时，往往被折射而形成光的现象，这些光就在太阳外边围有环状，带有彩色，一般情况下它的颜色不是很明显，有时肉眼根本看不到，日晕可看作天气变化的预兆，日晕又通称为风圈。

自从看到日晕之后，有空时，我总是有意无意地往天上看，在派，我又见过一次日晕。短短的几天里连见两次，不知道是这个地方风水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又跟高登义讨教，他说他在北京也曾见过，但这种机会比较少。绝大多数的城市人没见过日晕，是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室内活动，缺少与太阳亲近的机会，再加上一般的人都喜欢平视，又怕阳光刺眼，平时很少往天上看，不像在野外，随时都可领略山川之美和天象的瑰丽奥妙。还有，城市空气污染严重，能见度差，即便出现日益，有时也看不见。

人类来自自然，秉性爱好自然，然而近日人类，大多忙忙碌碌，困顿于现代生活的烦琐与枯燥，实则应自我解放，多亲近大自然，以洗涤心中的尘念，陶冶性情。

乘车

难以想象，在西藏这样一个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的地方进行科学考察，没有现代交通工具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

这一次，我们主要在藏东南一带活动，目的是了解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作为水气通道的作用及其影响程度。其间几经周折，已经坎坷，林芝、易贡、

波密、派、米林、山南等地都留下了我们的身影和足迹。除了徒步奔向大峡谷的那几天外，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车代步，历时达半个月之久，跨越了大约2200多公里的距离。这样的时间，在内地比较平坦的公路上，根本不足挂齿，但在地形复杂的藏东南，是不能用平常的距离来衡量的。

从拉萨到林芝，再到波密，我们走的都是川藏公路。沿途风光极美，路边的江河像一块流动的碧玉，一路伴着我们。还有山的层峦叠障，郁郁葱葱，使我兴奋得一刻也不愿合上眼睡一会，尽情地饱览藏东南的神奇、美丽和富有。景色虽美，但乘车受尽险情之惊和颠簸之苦是免不了的。在一些路况极差的地段，车经常不停地上下起伏，还伴随着左右摇晃。每当这时，人被颠得东倒西歪，饱受折磨。有时一天连续坐十几个小时的车，既枯燥烦闷，又坐得人骨酥筋软，肚子里五脏移位，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身在何处。车一停，颤巍巍的从车门钻出来，踩在地上，累得竟有腾云驾雾之感。

在考察队里，陶宝祥发明一种乘车的新法，即坐车轮流更换位置。比如我们坐的那辆丰田越野车，一共坐5个人，除司机外，我们4个人就不断地更换位置，一般采取顺时针轮换，时间不定，大致是有人下车方便或前边堵车需下去看看或有人渴了下车喝泉水等，车重新启动时，个人所坐的位置就调换一次。

这种做法，确实给我们带来一种新鲜的感觉。人人都知道，车上空间小，没有活动的余地，人只能永远保持一种姿势，时间一长，特别容易产生疲劳，即使坐在紧挨着司机的那个最好的位置上，也在所难免。如果不时地调换位置，至少可以增添点活力，给人一种是动态而不是静止的感觉，这样可以减轻每位乘车人的疲劳度。特别是坐在后排中间者，被左右两人夹着，眼睛只能死死地望着前方，对两侧的景物就看得少些。有一次我被调到紧挨着右侧车窗的位置，窗外如诗如画般秀丽的景色令我目不暇接，如痴如醉。突然，又一景观映入我的眼帘，只见在一大片乱石中间，一棵树干牢牢地夹着一块大石头悬在离地很高的地方，非常有趣。我赶紧请司机停车让我下去拍照，这一绝妙的景观就这样永远留在我的记忆力。如果我此时坐在后排中间或左边的位置，我就无法领略到这一奇观。

行车在陌生地区，本身就是一种学习。尽管是走马观花，但多多少少可以了解沿途各地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花草树木等。因而，这种推磨式的调换可起到一种均衡作用，可以观赏前后左右不同的景观。在这一点上，我们5号车执行得最佳，而别的车这“磨”就推得不好。如高登义、杨逸畴、李渤生、关志华同做的那辆车，其位置基本上保持不动，动也只限于后排的几个人轮换。因为杨逸畴块头太大，往座位上一坐，就占了大半个空间。如果把他轮换到后排，很难容下3个人，无奈，只好让他享受特别待遇，始终坐司机边上的位置。另外有一队友绝对是个瞌睡虫，只要车一开便气吞山河地打起呼噜来。车子小停，他还在睡，如同钉子钉在他的座位上。他不动，别但队友谁也甭想“推磨”。

车旅生活是我们这次考察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而推磨式的调换位置给我们的寂寞而枯燥的行车考察不添了不少乐趣，同时也起到了调解人的精神状态和体力的作用。

峡谷纵横谈

何为峡谷？分析分析“峡”这个会意字，就能明白个八九分。“峡”着，山夹着也。

再一思量，夹着什么呢？夹着水也。有山必有水，当然是夹着为山增添灵气的水，高山流水嘛。《现代汉语词典》作如是解释：“河流经过的深而狭窄的山谷，两旁有峭壁。”在我看来，这个界定并非那么科学。多深算深，多窄算窄。没有峭壁，陡坡就不行？长江三峡两侧的峭壁也是有限的，有的地方宽一两公里，谁又能说它不是狭！

峡谷，作为地球上的一种特殊地貌，一直备受关注，人们总是谋略寻找各个峡谷的奇特之处，如世界上最深的、最长的、最具科学意义的，或者别的什么特色。

至今为止，长期默默无闻的深达 5382 米，长为 496 公里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已名列世界第一，这是毫无疑问的。有人问：你们说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得到美国科学家的承认了吗？这个问题问得真是滑稽。对此，高登义答道：“美国说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世界第一大峡谷也未征得中国科学家的同意，我们有什么必要征得美国人的同意呢？”“回答得好。”我在心里暗暗称赞。科学不认国别，也不认肤色。难道篮球运动员穆铁柱比克林顿总统身材高，也需要美国人承认，否则，穆铁柱就是个矮子？真实的数据表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目前所知的世界上第一大峡谷，这是不争的事实，用不着别人承认。有人问：既然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客观存在，为什么直到 1994 年才被发现和确认是世界最大的峡谷；其实，这不应该成为疑问，存在的未必就已被充分了解和认识。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过去出版的一些词典在词条“最长的河流峡谷”下注道：

“美国西南部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河中游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峡谷。由科罗拉多河深切科罗拉多高原而形成。大峡谷从支流帕里亚河河口起，向下游延长达 440 公里，宽 6~28 公里，深达 1830 米。两侧谷壁呈阶梯状，上部开阔，下部陡窄，谷底水平线的宽度小于 1 公里，个别地方仅 120 米。由于气候干燥，植物稀少，谷壁可观察到从原生代到新生的各期地层，在阳光下显示不同色彩，景色奇妙。已辟为美国国家公园。”

就深度而言，我们现在所说的科罗拉多大峡谷深度，要深于词条中的数字。在词条“最深的河流峡谷”下注者：

“世界大河上最深的峡谷，是中国金沙江上的虎跳峡。从云南省西北部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石鼓以下 35 公里处开始，全长 16 公里。湍急的金沙江，在上、下峡口之间一连跌落 7 个陡坎，落差 170 米。急流汹涌澎湃，声闻数里。最狭的地方叫‘真虎跳峡处’，宽仅 30 米，相传当地居民曾见老虎中江边跃到对岸，因而得名。虎跳峡两岸高山夹峙，右侧为玉龙雪山，主峰扇子陡海拔 5596 米；左侧为哈巴雪山（又名寒波雪山和中甸雪山），主峰也有 5396 米。上、下峡口的江面海拔分别为 1800 米和 1630 米，因而峡谷的深度在 2500~3000 米之间。著名的长江三峡，两岸崖壁大多高出江面 500 米，世界闻名的北美洲科罗拉多大峡谷，深度也只有 1830 米，均不及虎跳峡。”

如今，随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面目显露于世，这些词条都将改写。1994 年 4 月 17 日，我的“我国科学家首次确认雅鲁藏布

江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的报道播发后，文璐同志在《中国记者》杂志写过一篇题为“一篇从科学论文挖出的大新闻”的文章，介绍我的报道挖掘过程。随之，广东省《中山报》的李国新先生给《中国记者》来信，题目是“‘世界之最’，背景最不可省”，认为我的报道有美中不足之处。在此，不妨全文列出：

新华社4月17日播发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世界之最”的消息，称之为

“中国科学家首次确认”。看后颇感自豪——看来我国又多了一项“世界之最”。

但又略有一点遗憾，似乎有提出之必要，这就是：本世纪初，我国“当代徐霞

客”丁文江也曾宣布他发现了“中国最深”同时也为“世界之最”的大峡谷，

地点位于金沙江东面重复支流小江的北岸。丁文江测得一道南北方向的大山中

最高峰古牛寨高出海拔4145米，因为滇北最高的山峰。从古牛寨到小江不过十

公里，小江却比古牛寨山峰低3000米。所以，当时丁文江认为：这可算是中国

最深的峡谷，比美国著名的高老拉多（现多译为“科罗拉多”（Colorado）大

峡谷（Grand Canyon）还要深1300多米。显然在当时，这是一项“世界之最”。

笔者没有见到丁文江有关这一发现的文字，但《胡适散文选》（第四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中却很清楚地记录下当时这一重大的地理勘探成果。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里。这条小江大峡谷（或称古牛

寨大峡谷）一直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与此相反，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倒

是十分风光，颇引人注意。

毫无疑问，对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这一新的“世界之最”报道来说，上述

资料是相当有分量的背景材料，这是因为：一是两者都是在中国发现的，虽然

前后相差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二是二者相距并不甚远，甚至可以说是一对

“姐妹大峡谷”，体现了祖国大好山河的壮美。本世纪初和本世纪末这两大重

大的地理发现使人感到中国大好河山在不断露出“新面目”。三是从增加报道

厚度和信息量、知识性方面来说，亦为必要，因为读者有了一个更加具体的比

较参照。

《中国记者》有关负责同志把这封信转了给我，我认为李国新先生的意见是对的。

但他并不知道，孤陋寡闻的我，毫不晓得丁文江先生的这一重大地理发现。不独是我，恐怕很多人也是如此。这是丁文江先生的失策，也是中国人的失策。中国人当年发现属于世界第一峡谷的小江大峡谷，不许反复宣传，使其最后确立，这就为美国人乘势而入提供了条件。反过来，中国的报章却不遗余力地报道那条所谓的世界第一大峡谷——科罗拉多大峡谷。就是现在，我国发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并经过科学论证，部分中国科学院院士也给以高度评价，个别人仍极感不舒服，甚至予以诋毁，这是很不严肃的。

雅鲁藏布江劈开雄奇的喜马拉雅山，深切出了壮丽的世界第一大峡谷。不唯如此，这浩浩荡荡的高原大河奔流中还切出了许多峡谷。让我们来看看其中游吧：从西向东，就分布着岗来、仁庆顶、托夏、永达、加查、朗县、日敏等主要峡谷：

岗来峡谷长约 15.5 公里，原来山高坡陡，山体边坡在 60 度左右，水面宽度在 40 米左右。是典型的“V”字形河谷。

仁庆顶峡谷长约 49 公里，两岸山体陡峭，山区边坡约为 50 度，水面宽度在 80 米左右。

属“V”型河谷。

托夏峡谷长 16.5 公里，山体边坡在 50~60 度之间，水面宽度在 50 米左右。

永达峡谷长约 10.4 公里，山体边坡大于 50 度，水面宽度在 40 米左右。

加查峡谷长约 37.2 公里，山体边坡大于 60 度，有些地段陡直挺立，水面宽度在 50 米左右。

朗县峡谷长约 20 公里，山体边坡在 50 度以上，河道几乎占满谷底。

日敏峡谷长约 10 公里，山体边坡大于 50 度，为花岗岩构造，岩石破碎，崩塌现象严重。

我想，谁要做一个雅鲁藏布江峡谷模型，一定比较看好的。沿江而下，是一条接一条的小峡谷，最后是一条长长的峡谷，到喜马拉雅山南缘戛然而止。真是悠悠江流，串起段段峡谷，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

我国地域辽阔，山河锦绣，大大小小的峡谷数不胜数。其中，有的早就名扬四海，吸引世人一睹其风采的便是长江三峡。

万里长江，浩浩荡荡，一泻千里。行至四川省奉节县白帝城，它横劈巫山山脉，形成举世闻名的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1998 年 2 月，我乘船从重庆到宜昌，有缘见到神往已久的三峡风光。傍晚时分，到达三峡。只见两岸壁立千仞，层峦叠嶂，林木葱茏，蒙蒙细雨为三峡披上了朦胧的纱衣，果真美不胜收，名不虚传。峡谷的风很大，但我不忍回到船舱。凭栏而望，只见烟雨迷蒙中，神女峰飘然而来。她丰姿绰约，好像要向我们诉说一个久远而美丽的故事。

途中，我趁此机会又游览了长江小三峡。小三峡古称“巴县三峡”，由猫儿峡、铜锣峡和明月峡组成。穿行在陡峭的山崖之中，展现在我眼前的是不同于长江三峡的秀丽景致。水很浅，船就像是在水底的卵石上滚动。小雨飘洒着，风很大，寒意颇浓。撑着伞，我伫立船头，贪婪地吮吸着清新的空气，观赏着两侧的风光。突然，半山崖上的一排木头映入眼中。一问，方知

是运兵运粮的古栈道。只见坚硬的崖壁上凿着一个个方形孔，这是当年插木桩、铺栈道所用。栈道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真不知没有现代施工器械的先人们是如何实施高空作业的。岁月无情，栈道已经衰颓，但它依然告诉我们古人的聪明与智慧。

国人对峡谷的偏爱，不止是大的峡谷，小峡谷也包容在内。因着长江三峡的名气，为数不少的到位于同一河流上相连的三个峡也就成了“小三峡”，现就本人搜集到的资料，辑录于此。

闻名遐迩的四川乐山大佛附近的岷江小三峡位于长江支流岷江之上，由平差峡、背峨峡与梨头峡组成，绵延 10 多公里，两岸悬崖陡峭，景色别致。

长江支流嘉陵江流经四川省合川县境后，由于渠江、涪江的汇入，水量明显增加，滔滔江水穿过九峰山、缙云山和中梁山，自西北至东南，连续形成沥鼻峡、温塘峡与观音峡三个雄奇瑰丽的幽谷，总称“嘉陵江小三峡”。

长江支流大宁河在巫峡西口注入长江，由龙门峡、巴雾峡与滴翠峡组成的“大宁河小三峡”位于巫峡北面，连绵 200 多公里，风光秀美，浪滚流急。因接近长江大三峡，风光也颇多相似之处，来到此处游历的人，如果不作提醒，往往产生错觉，以为这就是三峡。

西江流经广东省高要县时，劈开峻岭，形成大鼎峡、三榕峡和羚羊峡，人称“西江小三峡”。

贵州省镇云县境内的“沅阳河小三峡”由龙王峡、西峡和诸葛峡组成。游人称赞它集峨眉的绣、漓江的美于一身，令人难忘。

北江水流川流不息的冲蚀山地，在广东省韶关市至清远县河段上，形成飞来峡、香炉峡和育仔峡，统称“北江小三峡”。

此外，还有淮河小三峡，包括安徽省凤台县和寿县之间的硖山口，怀远县境内的荆山峡和皖苏交界处的浮山峡。淮河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区，流到安徽北部平原后，因落差不大，致使淮河小三峡峡谷较宽敞，水流也平缓些。但峡谷两岸，山山相对，加上一些名胜古迹，同样比较诱人。

回到拉萨

这次科学探险渐渐的接近尾声。

越野车接着我们，向西急驶而去。车窗外景色一目了然，皆为单调的秃山雪顶。这使我又回想起藏东南那巍峨壮丽的自然景观，那雄奇瑰丽的大峡谷。那高耸入云的冰峰雪岭，那奔腾呼啸的雅鲁藏布江，仿佛又回到眼前，如梦如幻。

4 月 27 日下午 1 点，我们历尽艰辛，长途奔波，终返拉萨，又回到了舒适优雅的喜马拉雅饭店。至此，这次考察终于以胜利告终。我到拉萨的第一件事就是履行承诺，到新华社西藏分社拜访。

28 日上午，在分社记者伍皓夫妇的陪同下，我参观了这座古老而又现代的“日光城”。

这个离太阳最近的城市，阳光明亮而强烈，心中深邃而湛蓝。在这里，

处处可以充分领略到日光城浪漫的情调，不仅有古老的旋律，而且也有现代的气息，古老的宗教文化与现代文明在这里奇特的交融在一起。漫步街头，随处可见五颜六色的经幡与电视天线相依而立，穿着入时的红男绿女与虔诚的朝圣者各行其是，大量的佛事圣殿与现代化的楼宇交相辉映。拉萨，是多种色彩和旋律交融和汇合。

拉萨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这里保存着大量的文物古迹，为雪域高原增添了绚丽的一幕，也使这座千年古城充满了庄严和神秘。因此，如果不到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八角街等地看一看，走一走，就不能算真正来到西藏，也领略不到它那无与伦比的宗教气氛。

布达拉宫，这个被世人称为“世界建筑奇观”的宏伟建筑是西藏建筑艺术的杰出代表。它依山而建，是城里最高的建筑物，几十公里外就可以看见它那金碧辉煌的身影。

站在这座宫殿的脚下，举头仰望，真有一种“天上宫阙，琼楼玉宇”的感觉。其殿宇连接，金顶入云，气势恢宏，曲径回廊，重重叠叠，层出不穷，显示出极高的建筑水平。

布达拉宫共有 13 层，高 100 多米，由白宫和红宫两大部分组成。红宫主体建筑是历代达赖的灵塔殿和各类佛堂。白宫是历代达赖办公和起居的地方，它的最高处是东、西日光殿，这里从早到晚阳光灿烂，站在阳台上凭栏远眺，拉萨风光尽收眼底。同时，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又是一个绿荫环抱的美丽城市，城内建筑栉比鳞次，具有现代风格的高楼大厦和民族特色的藏式新楼各展风采。宽广平坦的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由于气候的原因，拉萨唯一的不足，是四周的山太秃，没有植被，否则，拉萨真会是座非常美丽的城市。

从布达拉宫出来，我们又去了大昭寺、罗布林卡、八角街。大昭寺是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后修建的。该寺建筑宏伟，主殿内供奉着文成公主从长安带去的释迦牟尼像，寺门口有著名的唐柳和唐蕃会盟碑，这是汉藏两大民族友好相处的历史见证。这里，是朝佛活动的中心，一年四季香火不断，人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着踏进圣殿的幸福时刻。还有磕长头的信徒络绎不绝，接连不断的在一条条光滑的石板上顶礼膜拜。寺内供奉着巨大的未来塑像，朝圣者在它面前诚惶诚恐，双手合十，不断磕头，虔诚备至。万盏酥油灯日夜长明，空气中到处弥漫着浓烈的酥油味，加之林立的铜佛，绚丽的壁画，更增添大殿堂庄严肃穆的气氛。

罗布林卡在藏语里意为“宝贝林园”。位于拉萨市的西郊，相传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每年藏历 4 至 9 月，达赖在这里处理政务，举行庆典。全园占地约 36 万平方米，由格桑颇章、金色颇章和达丹明久颇章等三组宫殿建筑组成。园内林木葱郁，花序繁茂，宫殿造型别致，亭台池榭曲折，是西藏最富有特色的著名园林。

今日八角街是西藏高原上最大的一个集贸市场，沿街商店林立，各种摊点密密麻麻，商品琳琅满目。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到处可听见各种叫卖声，人群喧闹声。游客、购物者、朝佛人群川流不息，你来我往，把这条街挤得水泄不通。最奇特的一番景象是朝佛群众汇成一条人的长河，绵绵不断的环绕八角街转经，人们成群结队，有的手持转经筒，口中念念有词；有的手拿念珠，不停地由下而上捻动。置身于这种气氛中，人们会以为他们是在过一个盛大的节日，会情不自禁的融入到队伍中，去感受一下雪域文化的氛围。

和魅力。

当天下午，西藏自治区领导会见了我们科学探险队全体成员，出席的有热地书记，列确副主席，次仁卓嘎副主席，自治区政府秘书长，自治区体委格桑达瓦书记等。会上，他们对我们这次考察的顺利完成表示衷心的祝贺，同时对我们所取得的的成绩充分加以肯定，并声称这会促进西藏的经济建设。热地书记强调说：“要取得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成功，需要我们中国人共同作出努力，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场所的。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你们需要西藏做出什么配合，尽管提出。”

为了表达西藏自治区政府、西藏人民对科学探险队员的友爱、敬重和祝愿，自治区几位领导同志分别为我们每个队员献上了洁白的哈达。哈达是一种丝织长巾，多为白色，大体上分三种，即内库哈达、阿喜哈达、索喜哈达。以阿喜哈达最为常用。献时趋前鞠躬，张开双臂，将哈达捧起，摊举齐额挂在对方脖子上。这是藏族最为常见的一种礼节。

献完哈达，又同我们一块儿合影留念。

晚上，自治区领导和全体科学探险队员共聚一堂，庆祝这次春季预察的胜利。晚会上，藏族同胞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次仁卓嘎副主席和格桑达瓦书记高兴地又舞又唱，把晚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至此，这次科学探险考察宣告结束。

富氧反应

稍具地理常识的人都知道，从地低平的内地去空气稀薄的青藏高原，会引发一连串的高原反应。轻者出现气短胸闷，浑身无力，头疼呕吐；重者可能还会犯高山肺水肿和高山脑水肿，如果抢救不及时，甚至会导致气绝身亡。可见，高原反应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同样，从高原骤然回到海拔很低的地方，也会引起一系列的富氧反应，即高原反应的后遗症。其症状同高原反应有些相似。富氧反应虽然不至于引起大的危险，但持续时间长，很难受，我饱尝了其中的滋味。

这一次去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进行春季预察的队员中，新闻单位的人和科考人员各占一半，都是 10 个人。在考察期间，来自台湾的两位记者频频地用他们随身携带的便携式卫星电话往他们台里发稿，基本上是一天发一次稿。把科学探险队沿途所遇到的困难，所见到的山势、植被、民俗民风等，通过卫星电话口播回去。虽然这种方式只限于声音的转达，没法以相应的图像配合，但也给同行的其他新闻同业人员一个刺激，令其坐立不安。终于按捺不住，也纷纷亮相，施展起各自的本领。中央电视台记者项飞等在大峡谷期间，即在扎曲附近那几天，也用便携式卫星电话向他们自己的单位发了新闻。采用的方法也是现场广播新闻，或将事先采访的录音传回北京。效果不错，不仅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连续几天播出，晚间的《新闻联播》节目也偶尔续播。《北京青年报》记者何平平同样不甘示弱：大致坚持每周一稿。一到能发稿的县城或地区，他便集中精力赶写稿件，然后通过传真机把稿件发回北京，陆陆续续发了四五篇稿子。他们的努力，给广大群众了解科

学探险队的献身精神，而且世界第一大峡谷提供了条件。最后，只剩下人民画报社记者杜泽泉和我没有向北京发过稿子。《人民画报》限于刊物本身的特性，对于这样的野外考察专题，不存在急于发稿的问题，因此杜泽泉显得十分沉稳，一门心思琢磨他的摄影。

看着同仁们相继发出自己的稿件，自然给我形成了压力。我一直在思量，是写还是不写，即加入竞争，还是从更大的利益需要出发“超脱”一下。竞争真是无所不在，在遥远、偏僻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也同样存在新闻记者之间无情的较量。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我决定按兵不动。因为，如果我选择积极发稿，要写一篇一两千字质量上乘的佳作，预计需要半天或一天的时间，而我们这次野外考察时间非常有限，多认识一种树，多积累科学探险队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都是十分难得的。我此行的目的，一是要写厚重的新闻，二是要多拍些照片，三是为日后写书积累素材。如果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价值坐在屋里写稿上，对于实现我的三个目标来说，必然是个冲击，结果是得不偿失。

所以，尽管面临同仁们施加的无形压力，我坚定地认为我还是应该集中精神做好采访工作，仔细观察，做好笔记，待回到北京之后再行努力。事实证明我的这一对策是正确的。

我中5月9日开始发稿，一直持续到6月、7月、8月，还在一些报刊上撰文，介绍科学探险队的此次东南之行。及至10月出版这本书。否则，我真会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可见，走自己的路，不会一时的环境压力所左右，是多么的重要。

有位考察队领导看见各路记者都在纷纷登台亮相，奋笔疾书，而我在考察期间依然迟迟不动笔，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就关切地对我说：“你回北京是否也应该是什么？”

一句话令我哑然，但我马上理解了，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我在此次考察中的写作构想。

当然，我也没有必要对他做出解释。我想，如果科考队到拉萨的喜马拉雅饭店进行总结和评比先进，我可能会被排除在先进行列之外；有的队友可能会说：“他很注意团结，工作也很只苦。白天到处奔波拍照，晚上没有灯时还打着手电作日记。他对知识是渴求的，每天总是追着科学家提出这是为什么？那是为什么？但是，把他此次考察表现出的所有优点加在一起，都是只开花不结果。自科学探险队进藏以来，他不著一字！”好在科学探险队没有去评什么先进，使我没有在“后进”先列中突出出来。

一般来说，从高原回到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因为富氧，身体也有一个重新适应的问题。要在较短的时间内，比如说一个月内，身体获得新的平衡，必须休息好。如果记者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及其周围地区，边考察边发了些稿子，自然大大减轻了回京的压力。

不再写什么或播什么，说得过去。再多干些，那是锦上添花。我呢？身体需要休息时，偏偏要加大工作力度。新闻讲究实效。就我们这次科学考察来说，探险队回京就是一个发稿的好机会，错过了，会大大削减新闻的价值。基于以上考虑，我无法从容地等待身体基本复原后再去报道这次科考，只能把履行记者的职责放在第一位。

我能做没有料到的是，我的富氧反应是比较强烈的。在西藏考察结束时，我已是能吃能睡，能说能笑。即使负重走路，一般队友也比不上我。不

敢夸口称自己适应了高原生活，但结束考察时在拉萨的自我感觉是适宜的，很有活力。回到北京，觉得身体明显地不如在拉萨。具体的感觉是胸闷，身体阵阵发热，记忆力明显衰退等。气短的感觉与最初到西藏的感觉完全不是一码事。在西藏，吸足了一口气能解决一分钟左右的供氧。

要舒适些，再大口呼吸，往复循环。回北京之后，我大口吸气也觉得气不够用。不说话还好，一说话，总觉得没有底气。往往说上一两句，停一会才能接着说下去。自我感觉吐字也不是很清楚。气短的同时还伴随胸闷，总感觉好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上面，气流极不畅，堵闷得难受。5月底，某单位请我去给他们作一场报告，介绍一下我们这次科学探险的历程，我不敢应承。唯一的问题是气不够用，无法长时间讲话。以至我当时还担心，以后还能不能通过语言长时间的表达我的思想。除此之外，还伴有身体的阵阵发热，发热之后身上微微出些汗，这个过程往往持续三五分钟。我还发现我的记忆力明显下降，说话忘词，以及词不达意。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人从高原回到海平面比较低的地方，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明显的身体反应？我想从医学书上找到确切无误的答案，但苦于寻觅不到，只好作罢。听说上海有一家高原病研究所，估计他们那里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几经努力，仍联系不上。

无奈，只好把从队友那里听到的解释写下来。我想一想，觉得还是有些道理的。相当一部分人，从海拔较低的氧气充足的地方到了空气稀薄的高原，由于缺氧，身体会出现明显的不适。为了适应这种缺氧环境，肌体就要寻找自我平衡，即大量增生红细胞。红细胞容易与氧和二氧化碳结合和分离，把更多的氧输进人的肌体里，维持人体的正常运转。一旦这样的人突然乘飞机从高原回到低海拔地区，已经大量增生的红细胞不仅不可能立即锐减，而且还要“工作”，继续大量向肌体供应氧气。氧气过足，就易产生“醉氧”。我回到北京后，“水土不服”，就是这个原因。

由此推想，去西藏，特别是去西藏从事科学探险，对人的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主要是上高原、下高原，致使肌体运转的突然失衡。缺氧、醉氧，都导致身体的不适应。而身体大量增生红细胞，接着又要消减红细胞，为肌体增加了额外的重负。

基于这些因素，如果对从高原回来的人不同情，不理解，不关心，不给予应有的照顾，这样的领导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是无知，二是性格冷漠，三是不道德。我认识一位记者，70年代去西藏进行一次探险采访，回到北京后营养补助始终落实不下来。他当时工资低，又要顾及养家，身体亟待补充营养一事就大大打了折扣。以后，他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以致体表经常出现红斑，痛痒无比。一次会上，他说起这件事，委屈地流下了热泪。对比而言，我不存在他那样的问题，新华社的各级领导对我是格外的关心。在我发了一系列的通稿之后，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迅速安排我去一处修养地休息。接着，国内部主任李尚志又要我参加中宣部组织的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休假团，去内蒙古呼伦贝尔休假与考察。营养上，以我的收入支撑我的营养消耗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使我挂心的是，我们科学探险队的于宪光同志病了，住进了医院。他是我们科学探险队回到北京的当天住进医院的。我们从机场领到自己的行李后，他所在的北京巨星文化传播公司领导用车把他接回公司。晚上为他接风洗尘时发现他有气无力，精神不振，一副很难受的样子。大家劝他去医院看

看，他总是推脱说自己没事。最后，他们单位的领导强行把他送到医院，结果一去就住了院，被医生诊断为高山肺水肿。

从于宪光的住院和我们回京后的一系列不适应，可以看出高原反应对人的身体造成的损害。也许有的读者会说：“我也去过西藏，怎么高原反应不像你们这么严重。”问题的关键是，你们或开会或观光，与我们从事生生死死的科学探险有可比性吗？我们有时登高 5000 米，有时又回到海拔 2000 米多高的地方，突上突下，落差极大。再加上一路野外考察，吃不好、睡不宁，又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不仅大量消耗人的体能，同时也造成精神上的极度紧张。所吃的面条、压缩饼干、罐头等食品，只能维持生存，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西藏真是净化灵魂的好地方，我们走了那么多的县、乡，没有谁请过我们一次客，哪怕是一菜一汤。在内地，吃点、喝点，这是不值一提的常事。这些不利因素加在一起，待到考察结束时，我们一个个已心力交瘁，成为强弩之末。

因此，我的潜意识告诉我，回来之后要好好休息，好好补充营养。否则，对身体是不利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但是我的职业特点告诉我不能这么做。新闻讲究时效性，必须及时、迅速，这是新闻的生命，只有把稿件发出去，我才能心安理得地去考虑休息。

五一国际劳动节这天到北京之后，我就开始酝酿写稿，从 5 月 9 日到 21 日，我集中精力连续发了 10 篇近万字的消息和通讯，并发了 11 幅照片。可以说，每篇报道的完成，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付出，因为是在富氧反应的煎熬之下写成的。

本书涉及到许多西藏地名，均有其特定含义。为了阅读方便，笔者请教了国家测绘局测绘科学研究所的西藏地名研究专家武振华先生，使我获得很多新知，特一一录下。

地名译解

拉萨：位于北纬 29.6°，东经 91.1°。意为圣地，佛地。

米林：位于北纬 28.7°~29.8°，东经 93.1°~95.2°。意为药洲。

派：意为横。

排龙：意为横谷。

林芝：位于北纬 29.4°~30.2°，东经 93.4°~95.4°。汉字曾译尼池。林，又译娘；芝，又译池。池，为宝座意。尼池：实指娘氏家族的宝座意。

通麦，意为平坝下部，坝尾。

易贡：意为美丽、心悦。

波密：位于北纬 29.4°~30.7°，东经 94.0°~96.8°，意为祖先、祖宗。

嘎隆拉：意为喜谷山谷。

加查：位于北纬 28.8°~29.8°，东经 92.3°~93.1°。意为汉盐。

泽当：意为游戏的平坝。

墨脱：位于北纬 27.6°~29.9°，东经 93.7°~96.1°。意为花朵。

工布江达：位于北纬 29.4°~30.6°，东经 92.2°~94.3°。意为凹地大

谷口。

雅鲁藏布：雅，是大的意思；鲁：意为水大而流远；藏布：意为清净无垢。

南迦巴瓦：意为雷电如火燃烧。

西藏：位于北纬 26.8°~36.5°，东经 78.4°~99.1°。西，是汉语词，指西藏这块土地在祖国的西部；藏，原意为后藏、后藏人，纯洁、干净。

喜马拉雅：意为雪之家、雪巢、雪山。

朗县：位于北纬 28.1°~29.5°，东经 92.7°~94.1°。朗：意为想象。

色齐拉：意为僧家山口。

帕隆藏布：意为彼沟江。

墨竹工卡：位于北纬 29.6°~30.3°，东经 91.5°~92.5°。意为“墨竹色青”。

珠穆朗玛：意为圣母“朗玛”。

岗嘎：意为喜悦岗。

罗布林卡：意为宝贝国。

尼洋河：意为“娘”氏家族河。

东久：意为千户所的尾总。

八松错：意为三岩湖。

背崩：意为米堆。

扎木：扎，为猿意；木，指盔甲。

大渡卡：意为房顶上的马。

大昭寺：意为大寺庙的集会厅、经堂。

米拉：意为神人。

易贡藏布：意为心悦江、美丽江。

波堆藏布：波，指波密的波，为祖先意；堆是上方、上面的意思；藏布系江的意思。

恰青冰川：恰青，为大冰意。

唐古拉山：意为揽牛绳；是上山路、上坡路、山、山坡、山口之意。

念青唐古拉山：意为严亏平川神、灵应草原神。

冈底斯山：冈，为雪意；底斯，也为雪意。

附：论世界最大峡谷的命名

吴振华

1997年2月中旬，笔者出席了“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暨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综合开发与保护学术讨论会”。大会重点以深达5382米的地球上最深的峡谷——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为中心，举办了学术讲座。会议决定将组织徒步穿越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的科学探险活动，其中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便是峡谷的名称问题。笔者手头上收集罗列到有关大峡谷和雅鲁藏布江下游段名称的说法计有20余种之多。据笔者所查，汉语

文字图书中最早对大峡谷和对雅鲁藏布江下游段的写法是：《青藏自然地理资料》（徐近之编，科学出版社 1960 年版）一书中称之为“底项大峡谷”；在该书的插图中，把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后的下游段注记为“底项”。随后《辞海》（1979 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中有“底杭峡”词条；《无护照西藏之行》（英国人 F·M·贝利著，1983 年 6 月内部发行，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编印）一书中把雅鲁藏布江下游段写为：“德享河”；36 开本《中国地图册》（地图出版社 1983 年 9 月版）中标注“底杭峡”；16 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1984 年 6 月，地图出版社）内也注记为“底杭峡”；16 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1984 年 10 月，地图出版社）中把大峡谷介绍为“大拐弯峡谷”；16 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1990 年 3 月，中国地图出版社）内仍注明为“底杭峡”……《北京青年报》1997 年 4 月 2 日在题为《壮士四月要远行》报道中，有加引号的“雅鲁藏布江峡谷”一名。至于俗称、俚语以及口头上的说法就更多了，如：林芝大峡谷、墨脱大峡谷、藏布大峡谷、藏东大峡谷、西藏大峡谷、马蹄形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弯峡，等等。

据调查，在西班牙文版的《阿吉拉尔大图集》（GRAN ATLAS AGUILAR）第二册第 201 页上，把雅鲁藏布江下游段用蓝体字母注记为“Dihang”（该注记位置约在“麦克马洪线”南——笔者）；在英文版的《哥伦比亚地名大辞典》（THE COLUMBIAN LIPPINCOTT GAZETTEER OF THE WORLD）第 513 页上作为“Dihang River”词条入选，同时，该词典又在第 260 页“Brahmaputra River”条的词目释文中作“Dihang section 1st explored in 1913”的注解。

根据这两部外文资料中所提供的“Dihang”拼写字样，可以推定，本文前述《辞海》、《中国地图册》、《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省地图集》中提到的“底杭”，《青藏自然地理资料》中记载的“底项”，以及《无护照西藏之行》一书的汉字译名“德享”同源于拉丁字母组成的“Dihang”一条。

雅鲁藏布江上这一水流湍急的马蹄形大拐弯峡谷虽有这么多名称，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像样的正规名称，那么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才最具代表性，才最合适呢？

笔者认为，以“雅鲁藏布”作为大峡谷的专名，是再合适不过了。雅鲁藏布江在中国可以说得上是家喻户晓，当地的藏族群众把它称为母亲河，其流域是藏族的发祥地之一。我国的科研工作者，从七十年代起就对雅鲁藏布江进行考察、研究，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科研成果累累。再者，近些年来我国的新闻界，不仅许多报刊对雅鲁藏布江作过专题报导，而且电视、广播也都对雅鲁藏布江将进行过介绍宣传，“雅鲁藏布”这一名字已经很响亮。亲临实地考察的科技工作者也极力主张用指代性强的“雅鲁藏布”来命名大拐弯峡谷。

从地名研究的角度讲，雅鲁藏布的语源属藏语的标准称说，其涵义健康，又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名称。地名学上有一术语叫“派生地名”，用“雅鲁藏布”这一江河的专有名称，派生出大峡谷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理由也很充足。故笔者认为，把雅鲁藏布江马蹄形大拐弯峡谷名称最后确定为“雅鲁藏布峡”很恰当。

定名为“雅鲁藏布峡”，名称的科学性也是成立的。“雅鲁藏布峡”的罗马字母对外拼写，依据藏文的正字写法也跟着确定为“Yar lung zangbo Xia”。藏、汉语词汇分开，按两段分写，专名与通名结构清晰明了。这样一

次性把汉字规范化名称、对外的标准化拼写形式共同决定下来，有利于对“雅鲁藏布峡”的推广、宣传，有利于不同文版地图上的标记。

把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的名称确定为“雅鲁藏布峡谷——Yar lung zangbo Xia”，符合国务院有关地名命名、更名的精神，具有广泛的社会和科学依据，符合地名命名的原则。

虽然雅鲁藏布江的干流上还有若干个项目，有的有名称，有的还没有名字。用“雅鲁藏布峡谷”命名大拐弯峡谷的名字，不会引起与其它峡谷名字相混淆。雅鲁藏布江上大大小小所有峡谷，可通统为雅鲁藏布江上的峡谷，“雅鲁藏布峡”也在其中。“雅鲁藏布峡”只不过是雅鲁藏布江上这一段世界最大峡谷的名字而已，它只是专指这唯一的大峡谷的名字。流经其它段的小峡谷的名字，只能用各自的具体名称来命名，它们各自也只能代表各自的具体小型峡谷。最具代表性的峡谷，只有马蹄形大拐弯峡谷。马蹄形大拐弯峡谷洪流浩，气势澎湃，汹涌宏大，只有大拐弯峡谷才配有“资格”用“雅鲁藏布”四个字。

派生命名“雅鲁藏布峡”是恰如其分的组词结构。如果再为它重新命名个新名，人们会感到生疏或莫名其妙。以原生地名派生命名地名的现象，在我国地名中比较普遍。

比如，北京的三里河，派生出三里河路；新疆的乌鲁木齐市，在上海派生出乌鲁木齐路；拉萨市派生出拉萨大桥；唐古拉山派生出唐古拉山口……派生地名直观明了，一提“雅鲁藏布峡”，不加思索就会知道是指雅鲁藏布江上的大峡谷。

顺便提一下，为何不用前面《北京青年报》所说的：“雅鲁藏布江峡谷”一名？

为说明问题先把这一名称作一分解，雅鲁藏布江峡谷，并逐一解释。雅鲁，是藏语的区域性地名；藏布，系藏语江的意思；江，为汉语，前面的“藏布”已是江的意思，后面又多出一个“江”来；峡，“两山夹水的地方（多用于地名）”；谷，“两山或两块高地中间的狭长而有口的地带”（均引自《现代汉语词典》1985年版）。“峡”与“谷”释义相近，作为地名在此只用“峡”足矣，不必重复使用峡谷二字。关于地理通名峡谷的问题，在中国地名中普遍的处理方法，是只用一个“峡”字。如，虎跳峡、长江三峡、龙羊峡、三门峡、青铜峡、刘家峡等。上便中皆只有“峡”字，这要用简练的文字，表达了相同、相等的信息。所以，由7个字组成的“雅鲁藏布江峡谷”中，不仅可省去“谷”字，还可删掉“江”字。因已有江的涵意，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经这样一省一删，就形成了缩为5个字组成，藏汉合璧式的“雅鲁藏布峡”。

“雅鲁藏布峡”是新的世界之最，相同“珠穆朗玛峰”齐名海内外。二者为西藏自治区境内一东一西的旅游、探险、科考热点。它也将像珠穆朗玛峰一样，给西藏人民带来财富，带动和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

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和秘鲁的“科尔卡大峡谷”，都用了“大”字。雅鲁藏布江上峡谷的命名，是否也用“大”和“最大”加以修饰呢？

笔者认为，“大”或“最大”这样的字眼可用在对峡谷的介绍文章里或者说明性的报导中，若用在一个密不可分的名称组成部分中，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业的发展，世上很多客观的未知事物，逐步被人

们所认识。因受时间与了解事物深度和广度的限制，当时认为是了不起的、无可比拟的东西，带“大”、带“最”的，可能会被后来者所超出。就拿“雅鲁藏布峡”来说吧，在目前还没有发现超过它的峡谷之前，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在“雅鲁藏布江”未发现、未公布于世前，“科罗拉多大峡谷”是世界上最大的，现在有了“雅鲁藏布峡”为世界之最，已经约定俗成的“科罗拉多大峡谷”一名，也不能更名吧！所以起名之初就应考虑到这一因素。

世界级高峰“珠穆朗玛峰”，是世人皆知的山峰，在它的名称中就未加“大”、“最”之类的词，谁又不知它是世界第一高峰呢？因此，在“雅鲁藏布峡”一名中，无需加“大”，“最大”等之类的字，就叫“雅鲁藏布江峡”挺好！它符合地名国家规范化和地名国际化的原则。

二

拙文《世界最大峡谷应命名——雅鲁藏布峡》（下称“最大峡谷”），先后在1994年第5期《中国测绘》和1998年3月10日的《中国测绘报》刊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年4月初，我国首次徒步穿越世界第一大峡谷科学探险队春季预察人员出发后，有人提出，除了“雅鲁藏布峡”外，大峡谷也可称之为“林芝峡”和“南迦巴瓦峡”。笔者在《世界最大峡谷应命名——雅鲁藏布峡》一文中推出“雅鲁藏布江”一名时，曾对各种说法进行过比较、分析、研究，其中也包括“林芝峡”和“南迦巴瓦峡”两种提法，当时因篇幅所限未能刊登。现将这部分内容分述如下：

“林芝峡”说

林芝，属于汉字译写的藏语地名，曾译为尼池，是指历史上唐代吐蕃时期娘氏大家族的宝座之意。音译汉字娘、林或尼，是Nying（为藏文的汉语拼音字母译转写。下同）的近似藏语语音；芝和池是Chi的近似藏语译音。林芝、尼池同源语藏语Nyingchi。西藏民主改革后，在1960年组建县人民政府时，始用“林芝”命县名，即今林芝县。同时又将新成立的林芝专区命名“林芝”。1994年林芝专区被撤销。1984年复设林芝地区。可是，此时先后组建的乡、公社又不用“林芝”二字，而用“尼池”。追根溯源，“林芝”也好、“尼池”也罢，均源于唐代吐蕃时期的娘氏家族名，只是用不同的汉字翻译罢了。

另外，林芝地区的大部分区域在历史上一直称为“塔工”地区。启用“林芝”只是始自解放后。

1984年恢复后的林芝地区仍管辖与马蹄形大峡谷大拐弯峡谷有关的林芝、墨脱、米林三线。那么，用林芝命名大拐弯峡谷的理由成立吗？笔者认为其理、其据都不足，原因有三：

第一，林芝一名，源出藏语的历史虽然很长，但用它来为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命名却不恰当。首先，前面已经提过，林芝在藏语中实指历史上唐代吐蕃时期娘氏大家族的宝座之意，以一个家族的宝座来为世界第一大峡谷命名，让人很难接受。其次，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属自然地理实体，而“林芝”是从行政区划的角度为县和地区命的名，用人为划定的行政区划的名称来命名一亘古就有的大峡谷，很不合情理。况且行政区划会随着社会变

化而调整的，有其不确定的一面。若以这样一个处于相对变动状态中的概念来为一个相对不变的自然地理实体命名，则有太大的随意性。

第二，从小比便尺地图上看，雅鲁藏布江马蹄形大拐弯峡谷，状似马蹄的峡弯尽管正好处在林芝县境内，但它占整个大峡谷的长度并不算最长，与墨脱县境内的长度相比短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林芝”代表不了整个大峡谷。退一步讲，若再用“林芝”命名大峡谷，显得使用频率太高，县名为林芝，地区名为林芝，大峡谷名再用林芝，有乏味之感。

第三，现在是市场经济的时代，给某地或某一自然地理实体命名，不仅要考虑其社会效益，而且也要考虑其经济效益。而有一定影响的地名往往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

比如：公元 994 年设置的福建省崇安县可谓历史久远。1989 年为何改名为武夷山市？这与发展旅游业有直接的关系。武夷山风景秀美，群山叠翠，峰谷连绵，溪泉清澈，山清水秀，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著名的风景名胜区。每年到武夷山观光旅游的国内外游客达 50 万人次，旅游业的日益兴旺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发展。用“武夷山”这个自然地理实体作为市名，显然提高了这个地区的知名度，有利于这个地区的发展。

况且给一个自然地理实体命名要有全局观念，大拐弯峡谷穿越林芝、墨脱、米林三县，这使三县的旅游事业乃至经济发展都很有前途。若用“林芝”给大峡谷命名，墨脱县和米林县会不会有意见？用任何一个县的县名定大峡谷之名都不完善。大峡谷是共有的，只能用不侵害地方利益的名称。用现成的“雅鲁藏布峡”命名大峡谷，对任何一方的利益都不损害，不会产生争名争利的后顾之忧。“雅鲁藏布”是全林芝地区、全西藏、全中国的江河，大家都可共同享用它的“名份”。

“南迦巴瓦峡”说

南迦巴瓦，是南迦巴瓦峰的专名部份，系用汉字译写的藏语地名，意为雷电如火燃烧。汉字还曾译为南迦巴华、那木加巴尔瓦、南加巴瓦、朗甲巴瓦等，汉语拼音字母拼写为 Namjagbarwa。南迦巴瓦峰海拔 7782 米，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的最高峰，正是它迫使流经此地的雅鲁藏布江改变流向，形成中外闻名的马蹄形大拐弯峡谷。从雅鲁藏布江东西的流向看，南迦巴瓦峰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它的隆起是大拐弯峡谷的主要成因，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其对岸有海拔 7294 米的加拉白垒峰，相距仅 20 公里。两峰隔江对峙，形成极其壮观险峻的大峡谷。试想，如果用行政区划名和山峰命名峡谷，就显得不恰当了。

其次，从知名度上分析，三者当中雅鲁藏布江的知名度最高，人们在内日常生活中不时提到它，从 50 年代起就开始在不同形式的新闻报道，不同题材的文艺作品中介绍雅鲁藏布江，只要一提西藏就会联想到雅鲁藏布江，一讲雅鲁藏布江中不由自主地会恋念西藏。雅鲁藏布江不仅在西藏、在中国，甚至在世界上名气也是响当当的。因此，用雅鲁藏布江名称中的“雅鲁藏布”四字命大峡谷之名，是容易被人接受的。林芝县、林芝地区虽然也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与雅鲁藏布江相比逊色多了。南迦巴瓦峰的知名度就更小了，南迦巴瓦峰是近些年随着登山事业的发展才有了名气。将历史形成的、“约定俗成”的习惯称说“雅鲁藏布”用在雅鲁藏布江上的大峡谷名称上，

以推出任何一个新名称都好，用“雅鲁藏布”定名“雅鲁藏布峡”是最佳的选择方案。

对于“底杭峡”的处理

有关“底杭峡”的来龙去脉，笔者在“最大峡谷”文中已有详述，于此不再重复。

底杭峡不是大峡谷的正规名字。再者“Dihang——底杭”的涵义不详，属何语种也无从查考，充其量正象前面提说，它只能当作大峡谷局部地段的名称。从查阅的上文图书资料中，也足以说明“Dihang”只标注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南，“底杭”一名的知名度与“雅鲁藏布江”更无法比拟。用“雅鲁藏布峡”取代“底杭峡”是理所应当之事。

“雅鲁藏布峡”是雅鲁藏布江下游马蹄形大拐弯峡谷的总体名称。其在地图上标记的位置从派（曾为“派区”名，现在“派乡”名）起，一直标注到巴昔卡（即中印传统习惯线）为止的中国领土之内。

赘述到此还有一事说明，即本人最早见到“大拐弯峡谷”的书写字样，是在供“高等学校教学参考用”的《中国自然地理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4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的地貌地质和矿藏幅、陆地水幅和西南地区幅中。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峡谷的名称，用“大拐弯峡谷”作为地名出现，注记在地图中似乎有点不伦不类，读起来不象地名。

倒象对自然地理实体的一种解释、说明或脚注，不是一个顺眼顺耳的规范地名。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地名以音译的藏语地名为主，地名宜“名从主人”。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命名地名，对国家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语言文字政策等都需要认真遵守和贯彻执行。

西藏辖区内的地名，尤其在雅鲁藏布江世界第一大峡谷的地段，用汉语命大峡谷之名更不妥，而以采用藏语命大峡谷的专名为上策。

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拥有多项世界之最

以其深度和长度名列世界峡谷之首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在水能资源丰富度、生物多样性、热带山地气候带北界分布等方面还拥有多项世界之最。这是中国科学院有关专家最梳理多年青藏高原考察成果得出的结论。

这里是世界水能资源最为富集的地方。雅鲁藏布江流经派以后，进入下游河谷段。

这里为高山峡谷地区，河流穿过两座海拔7000多米的高山谷底，围绕南迦巴瓦峰形成一个奇特的U字型大拐弯，山高谷深，水流湍急。从派到巴昔卡496.3公里的下游河段，河流水面高程由2910米，急剧降至155米，天然落差达2755米，全段平均坡降为千分之五点五，居世界各大河流首位。尤其是从派至墨脱，212公里的河段，两地直线相距不足40公里，水面高差却达2230米，平均坡降千分之十点五，加上派附近的多年平均流量为1900米秒，从而使这里成了世界上水能资源最为丰富、最为集中的地区。在这里可以兴建装机容量约4000万千瓦的水电站。这一设想若真能实现，它将成为

为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超巨型水电站。

这里是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峡谷谷地。雅鲁藏布江大峡谷是世界上山地区生态系统类型、植被类型、生物群落最丰富的峡谷谷地。从海拔数百米的谷底，直到海拔 7782 米的南迦巴瓦峰顶，热带低山常绿半常绿季风雨林、亚热带山地常绿半常绿阔叶林、暖温带中山常绿针叶林、寒温带亚高山常绿针叶林、亚寒代高山灌丛草甸、亚寒代高山冰原和寒带极高山冰原等生态系统，沿谷坡依序分布，如此丰富的山地生态系统类型和山地植被类型以及生物群落，堪称世界之最，因而被誉为世界山地植被类型的天然博物馆。

从山脚到山顶 7000 余米的垂直高度上，可以看到类似从赤道到北极各种湿润地区生态系统和植被类型。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区无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物多样性资源可持续利用上，均有着世界级的极其重要的意义。

这里是世界热带山地气候分布的最北界。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热带山地气候带和自然带的分布，达到了北半球水平分布的最北界和垂直分布的最高限，即北纬 29 度 30 分，海拔 2000 米左右。这是沿雅鲁藏布江大峡谷通道自南向北强大的水气输送影响的结果。在北半球，热带气候带和自然带的分布平均在北纬 23 度 30 分，海拔 1000 米以下。然而，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由于强大的自南向北的水汽输送的影响，使得这儿的热带山地气候带和自然带向北推进了 6 个纬度，并分布在更高的山地，许多典型的热带动物和植物都可以在大峡谷中发现。诸如，爬行类动物中的蟒蛇、眼镜王蛇，鸟类中的棕颈犀鸟，哺乳类动物中的孟加拉虎、长尾叶猴，昆虫中的端齿棒鼻白蚁、金印度秃蝗，真菌中的黄白蚁伞、环柄香菇和大锁银耳，高等植物中的千里榄仁、阿丁枫和小果紫微。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21 日）

后 记

我先前并没有料到，我竟带着《走进世界第一大峡谷》的书稿，来到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边过“游牧生活”边修改。这是因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近年来曾多次组织中央宣传文化系统的专家（均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出京赴外地学习考察，我今年也被列入其中。

7 月 26 日，坐在从北京飞往海拉尔的飞机上，我就想，如果呼伦贝尔草原的魅力无穷，引得我无心去修改这部书稿，那就放一放。呼伦贝尔草原的确美极了，蓝天白云下，只见一望无垠的草原上，花朵艳艳，鸟儿宏鸣，河流弯弯，牛羊成群，毡房簇簇，奶茶飘香，无不令同行的专家们陶醉其中。他们多是全国著名的作家、画家和歌唱家，被呼伦贝尔草原的旷美与神经所感染，他们一路诗画一路歌，尽情地抒发情怀，颂扬北疆的民族团结和绚丽风光。尽管如此，仍然难以夺去我对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的浓浓思恋。那里的雪山峡谷、那里的大江奔腾，那里的原始森林，那里的淳朴民风，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考察团一有行动的间歇，我就神情专注地看着书稿。力图通过这些文字，道出我对大峡谷的情与爱，并把我与队友们在藏东南所经历的艰险泻于笔端。

当书稿脱手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要感谢支持我写作的诸位朋友。

我缺少墨脱的照片，杜泽泉先生听说后积极予以提供。我需要了解美国飞行员 50 年前附机易贡的情况，我在拉萨工作的朋友伍皓很快将相关材料电传给我。我发现武振华先生关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地名研究文章很有深度，提出附录于本书，他一口答应。我书中缺少示意图，征得高登义、杨逸畴先生的同意，也将他们所绘的几幅图例附于书内，增色不少。特别是我的同行刘思扬同志，力促我撰著此书，更让我难忘。

我属于上班族，这就决定我没有相对固定的时间去写书。限于人民日报出版社提出 9 月就出版发行此书的愿望，我只能利用 1998 年 6 月和 7 月两个月里的八小时以外的余暇从事写作。这样一来，我不仅要拒绝一切社会应酬，连亲属和朋友交办的一些事也一拖再拖，只望他们能体惜我的难处。

满腔热情的向外界介绍世界里大峡谷——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让更多的人认识它，了解他，是我撰著此书的初衷，也是我的追求。但限于我对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了解的有限性，书中难免有疏漏和失误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作 者

于呼伦贝尔草原

1998 年 8 月 1 日

